



人文译丛 总主编◆何怀宏

The Problem of Modernity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后发展国家的现代性问题(上)

贺照田◆主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人文译丛 总主编◆何怀宏

The Problem of Modernity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后发展国家的现代性问题(上)

贺照田 ◆ 主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发展国家的现代性问题 / 贺照田主编.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11

(人文译丛)

ISBN 978-7-206-07147-8

I. ①后…

II. ①贺…

III. ①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文集

IV. ①D50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6298 号

后发展国家的现代性问题(上、下)

主 编:贺照田

责任编辑:崔文辉 孟 奇

封面设计:张 迅 孙浩瀚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制 版:吉林人民出版社图文设计印务中心

印 刷:长春方圆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720mm×1000mm 1/16

印 张:34.5 字数:477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07147-8

版 次:2011 年 1 月第 2 版

印 次: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64.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总 序

中国乃一文明古国，而人文精神又于其间特见其长。“周文”已灿然可观，而孔孟老庄荀韩等先秦诸子更大略厘定此后二千年中华文化发展基本格局，且时有奇葩竞放，异彩纷呈。然近代以来遇强劲欧风美雨，不免花果凋零。究其因，既有外来文明之横决，亦有自身后继之乏力。

今日世界一体，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孤立发展乃至生存，古老的华夏文化更有从域外接引各种源头活水之亟须。百年来国人译事多多，今不揣浅陋，亦立此一“人文译丛”，名称不惮其大，俾使各种有价值译著多能收入其中，且有愿为中华人文复兴略尽绵薄之意焉。

译丛取材选目则不吝其小，且力求主题相对集中，现约略勒成数专辑：一曰西方古典思想与人物，尤以古希腊为要。二曰西方政治理论与实践，特重近代以来作为西方思想制度主流之自由民主的发展。三曰知识分子与自由市场，全球化使我们皆卷入市场经济，而人文知识分子对此的态度尤可玩味。四曰基督精神与人文，此种超越性大概正是较现实的中华人文所需特别留意处。五曰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思想，藉此希望国人眼光也能注意我们近邻心灵的深邃。六曰《学术思想评论》，由贺君照田主编，其中有译有评，最近几辑尤注意中西历史交叉延入“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

数年来能有此初步实绩，端赖吉林出版界领导周君殿富、

胡君维革大力支持及责编与诸多译校者鼎力相助。“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文复兴并非“指日可待”之事，我们愿使“人文译丛”成一长久事业，除继续充实现有专辑外，亦将开辟新专辑，并深祈此一事业继续得到各界同人的关注与支持。

何怀宏

2002年11月18日

谨识于北京西郊泓园

重版总序

凡是在出版业工作的人都知道一句行话，叫做“选题定位”，或曰“图书定位”，亦曰“市场定位”。我非常赞成这句话。一个出版社必须进行明确的选题定位，只有明确的选题定位，才能打造图书品牌乃至出版社品牌，只有有了品牌才能占领市场，出版社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近些年来，我社的选题定位是十分明确的，就是主打国内外学术类图书。就国内的学术著作而言，我社先后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实录》（10卷）、《北大哲学门》（10卷）、《高清海哲学文存》（6卷）、《孙正聿哲学文集》（9卷）、《楚辞源流选集》（5卷）、《中日甲午战争全史》（6卷）、《毛泽东评点的帝王大传》（16本）、《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学术文库》（6卷）等高档次、高品位的学术著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较好的影响。就国外的学术著作而言，我社先后引进出版了《人文译丛》（60本）、《绿色经典文库》（16本）、《大美译丛》（8本）、《支点丛书》（10本）、《世界经济畅销书系》（10本）、《人类文明史图鉴》（24本）、《西方社会科学基础知识读本》（22本）、《美国思想史》、《西方建筑史》、《剑桥战争史》、《剑桥医学史》等在世界上较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好评。从总体上说，图书的价值主要在“传承”和“传播”4个字上。“传承”是就历史纵向而言，图书要为后人传承人类创获的思想文化成果；“传播”是就历史横向而言，图书要向世人传播人类创获的思想文化知识。我社出版的学术类图书，虽然远远没有达到这个境界，但我们一直向着这个方向努力。

在我社引进出版的外国学术类图书中，最有影响的是何怀宏先生担任总主编的《人文译丛》这套丛书。何先生是一位学术精深、工作认真、

待人诚恳、诲人不倦的专家学者。为编好这套丛书，他亲自确定书目、遴选译者、审阅书稿，每一本书都饱含了他的心血。功夫不负苦心人，经过 10 年的努力，到现在这套丛书一共出版了 60 本。一个地方人民出版社能够出版一套 60 本的外国学术著作丛书，实属不易。每当看到这套丛书时，我们总是对这套丛书的总主编何先生产生由衷的敬意。

为了更好地保护《人文译丛》这套品牌性图书，最近，我社调集 30 多名资深编辑，对这套丛书进行了重新出版。在重版过程中，我们主要做了以下三项工作。第一，将已经出版的《人文译丛》中的图书悉数收入，同时又从我社出版的外国学术著作中选出 20 本，加在《人文译丛》中，使《人文译丛》总量达到 80 本。第二，将收入《人文译丛》的 80 本图书，统一开本，统一纸张，统一版式，统一封面风格。第三，对 80 本图书进行重新编辑校对，对个别图书的有些文字或段落进行了处理。通过以上工作，使这套丛书更加完善了。

有人说：翻译出版一本外国学术著作，比自己撰写出版一本学术著作还要难。这话很有道理。由于我们水平有限，重版的《人文译丛》尚存在着以下三点不足。第一，有个别图书，从学科属性上讲，放在《人文译丛》中不甚合适，敬请广大读者原谅。第二，有些图书中的个别译文还不够准确，编校也不够到位，敬请广大读者指正。第三，有些图书中的思想观点，囿于历史局限，我们不能接受，敬请广大读者进行批判性的阅读。

重版《人文译丛》，对我社来说，既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也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在三个多月的工作中，全体编辑、校对、照排和印制人员都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令我感动不已。在此书即将付梓之际，我真有许多感谢的话要说，纸短情长，不尽一一。

胡维革

2010 年 9 月 28 日

于长春百汇街寓所

目 录

专题:后发展国家的现代性问题

| | | |
|-----|-----------------------------------|-----------|
| 钱永祥 | 现代性业已耗尽了批判意义吗? | 003 |
| 赵 刚 | 如今,批判还可能吗? | 020 |
| 瞿宛文 | 全球化与后进国之经济发展 | 048 |
| 王振寰 | 全球化,在地化与学习型区域:理论反省与重建 | 072 |
| 赵慧净 | “你陷入了想象之井”:压缩型发展中主体性的 形成 | (倪伟 译)111 |
| 孙 歌 | 寻找“近代” | 141 |

阐释与分析

| | | |
|------|---------------------------|-------------|
| 石元康 | 引导性的哲学与认知性的哲学 | 185 |
| 江宜桦 | 约翰·密尔论自由、功效与民主政治 | 197 |
| 林镇国 | 从佛教形上学到佛教诠释学 | 224 |
| 希尔斯 | 反思中国知识传统下的市民社会和市民风范 | (应星 译)239 |
| 酒井直树 | 文学的区别及翻译工作(修改稿) | (贺雷 译)282 |
| 哈耶克 | 文化进化与事实性知识 | (邓正来 摘译)306 |

| | |
|------------------------------|------------|
| 安东尼奥 哈耶克的理性与历史 | (赵刚 译)334 |
| G.Borradori 尼采还是亚里士多德? | (田立年 译)352 |
| 桑德尔 对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的回应 | (万俊人 译)369 |
| 福 柯 自我照看的伦理是一种自由实践 | (李猛 译)407 |
| 伯 林 孟德斯鸠 | (李河 译)432 |
| 伯 林 休谟与德国反理性主义的渊源 | (李河 译)466 |
| 诺齐克 政治的之字形过程 | (沈岗 译)496 |

序 跋

| | |
|------------------------|--------------|
| 周锡瑞 中国城市的现代性与民族性 | (吴飞 李静 译)509 |
|------------------------|--------------|



专题：后发展国家的现代性问题

现代性业已耗尽了批判意义吗？

——汪晖论现代性读后有感

(Has Modernity Outlived its Critical Potentials?)

——A Response to Wang Hui)

钱永祥 [1]

摘 要

本文借用哈柏玛斯关于文化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的对比，说明现代性不仅不同于单纯的现代化，并且由于文化现代性具有反思与自我正当化的基本特色，现代性内部其实蕴含着丰富的批判能量。从一个有限的意识上说，这种批判性格，在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上，可以见到明确的表现。自由主义乃是现代性的承载者；不面对现代性的严肃挑战，不会感受到自由主义的真正意义。值此各类传统势力甚嚣尘上、各种保守意识正忙着提供兴奋剂与避风港之际，正视现代性的严峻要求，乃是维护社会改造的动能、维护社会进步远景的重要一步。

Invoking Habermas's distinction between cultural and societal modernity, this article—a response to Wang Hui's justly celebrated discourse on Chinese modernity—tries to salvage modernity from modernization by emphasizing self-reflection and self-legitimation as the defining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al modernity. It is argued that therein lies the critical potentials of the modern consciousness. The unbalanced state of Chinese modernity is then explained in terms of

its ties to nationalism. It is further argued that in this age of late modern exhaustion the critical thrust of modernity is best represented by liberalism, which stands as a bulwark of post-metaphysical sobriety against all sorts of conservative/romantic regressions.

关键词：汪晖，现代性，自由主义

Keywords: Wang Hui, Modernity, Liberalism

晚近的中国大陆思想界，对于“现代性”这个议题，有一些以批评为主的反思。这个现象其来自：中国社会内部规模庞大而进度急遽的变革、西方最新的思潮影响下对中国近、现代史的重新理解、以及中国民族意识面对西方强势文化压境时的反弹，使得现代性成为一个触动层次繁复的敏感议题。不过，“现代性”的理解与评价问题均极为复杂，以全面的肯定或者全面的否定去面对它，几乎必然有失。那么它的复杂性何在？这是本文想要探讨的主题之一。在这种复杂的理解之下，对“现代性”的评价必然也需要复杂化，这是本文准备探讨的主题之二。经过较为复杂的探讨之后，我们对现代性的进步意义，或许可以得出较为正面的看法。

一、现代性的双重意义：文化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

约二十年前，为了回应新保守主义与“青年保守主义”（也就是傅科、李欧塔等在哈柏玛斯心目中名为后现代、而实则反现代的思想家）对于现代性的批判，哈柏玛斯回到韦伯，检讨韦伯有关现代性的奠基论述。他发现，尽管韦伯明确掌握到了现代性问题的起源（世界宗教的理性化趋势在世俗世界的延续），却由于概念架构的限制，他将“现代”局限在“社会现代性/社会理性化”（societal modernity/societal rationalization）的面向上。结果，韦伯心目中的现代，等同于目的/工具理性所界定的理性

化，也就是单纯由资本主义经济和现代官僚国家所呈现的现代。哈柏玛斯认为，这个片面、选择性的现代性观念，决定了新保守主义与青年保守主义对现代性所采取的负面态度。

相对于“社会现代性”，哈柏玛斯建议我们正视“文化现代性”（cultural modernity）的历史意义。尽管哈柏玛斯对于这个概念的经营既复杂又有争议，它的确有助于我们较辩证地理解现代性的深厚内容，因为它既说明了为什么现代性不等于资本主义与现代国家，也说明了为什么现代性始终蕴含着批判的潜能。在这里，由于惮于其复杂，我不能正面探讨哈柏玛斯的理论建构。不过借用他有关文化现代性的说法，似乎可以为中文世界有关现代性的讨论，适度地增加其复杂面。^[2]

文化现代性的出发点，立足在韦伯的“世界的祛除迷魅”这个戏剧性的意象。由于世界的除魅，一统而融贯连续的整合世界观宣告崩解，生命所必须经营、呈现的价值，遂告分化成了几个不连贯而自主的领域。哈柏玛斯借用韦伯的理论，再根据自己有关沟通理性的分析，说明现代性的特色在于三大价值领域的分化：相对于客观对象世界的认知领域、相对于客观社会世界的规范领域、以及相对于主体内在这三个世界的感性表达领域，分别成为独立的价值单位。所谓独立，意思是说领域之间没有概念与价值的延续性；任何一个领域里的价值，均无法成为另外一个领域里的评价基础。

在哈柏玛斯的心目里，文化现代性——以及随之而生的价值领域的分化——的重大意义，在于自然、社会、与主体内在这三个世界得以独立地发展出丰富的文化意义。这里所谓独立，一方面指独立于前现代的超越性（因而确定而且霸道）的根基，另一方面又指强烈的自觉与自主。这样发展出来的科学、道德与艺术，自内部自行营造、证立本身的价值认定，从而对这类价值认定发展出了高度的自我意识。于是，面对自然世界，认知—工具理性预设了以“实”（true）为导向的妥当性主张；面对社会世界，道德—实践理性预设了“对”（right）为导向的妥当性主张；面对内在世界，感性—表达理性预设了以“真”（authentic）为导向的妥

当性主张。根据哈柏玛斯的语用学 (pragmatics) 分析, 妥当性主张 (validity claims) 最后指向一个公共性的、开放性的规范世界: 参与这些领域中活动的人, 对于这些价值的妥当有共识; 而若对这类共识发生疑义、争议, 还可以藉理想的沟通与讨论去修改共识的内容。换言之, 在文化现代性之下, 价值与规范必须由当事者藉沟通自行提供正当性。

在此引述哈柏玛斯这套规范性的现代性概念的建构, 不是因为他的建构完全服人; 而是因为他的问题意识, 为我们评价现代性的批判潜能, 提供了一些启发。建构一套现代性的概念, 需要满足两项形式的要件: 第一, 我们需要有一套论述, 能够在现代与前现代和后现代之间, 作出一贯的区别; 第二, 这套论述能够在现代性内部作分辨, 也就是能够发展出现代性本身的内在批判, 而又不沦为反现代。哈柏玛斯的理论, 似乎满足了这两项要求。

于是, 哈柏玛斯的现代性概念强调, 在传统的、形上的或其他种类的规范基础流失之后, 文化现代性指向一种用后传统、后形上、后理性主义的方式, 建立引导性的 (regulative) 价值理想的可能。这也代表一种建立内在的批判标准的可能。这种引导性的价值理想, 虽然内在于特定的实践活动, 却由于不是任何特定实质传统的禁脔, 又对挑战与对话保持开放, 它们具有超越一时一地实践脉络的普遍性。反思与批判, 于是有了实践中的立足点。放弃他这套问题意识 (或者具有类似自觉的问题意识), 意味着两种可能。或者, 让社会现代性。也就是资本主义与官僚国家作为代表的现代化意识, 垄断所谓的现代性, 批判者于是走上“启蒙之辩证”的悲观绝望, 或者如后现代一辈思想家, 转而诉诸感性主体的反现代姿态。又或者, 为了反抗这种现代性的窒息铁笼, 于是追求另一种形态的社会现代性, 也就是非资本主义式的社会经济发展、非官僚国家式的政治组织方式。后面这种态度, 在中国这样一个矢志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大国, 对知识分子曾经有过可观的影响, 虽然这条路几十年来的经验 (文化大革命应该是最突出的例子), 还很难令人对前景乐观。

二、当代中国语境里的“现代性”概念

由于近代中国历史的曲折遭遇，无论是在“启蒙”或者“救亡”的论述取向里，现代性几乎都等同于社会的现代性，也就是说“现代性”每每悄然无声地变成了“现代化”。早期知识分子的努力在此不论，到了1949年以后大陆的情况，藉由汪晖先生的大作《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我们清楚地见到，社会现代性如何业已泛滥成了现代性的全貌。

这个说法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汪晖说明了当代中国各类思想主流——无论是批判的或体制内的——如何均陷身在社会现代化的思想架构里。这个论断可能极可急议，不过汪晖的看法，是值得当事各方认真回应的，因为这个问题不仅具有深厚的思想史意义，更牵涉到了当代中国人的自我意识与自我定位；它是一个有重大前瞻意义的议题。第二，有趣的是，汪晖自己也认为，凡是肯定现代性价值——例如自由、解放、启蒙——的思潮，必然因此肯定了现代化（社会现代性）的价值，从而对于资本主义与官僚国家的意识形态，也就丧失了批判能力。换言之，不仅中国的思想主流将现代性等同于社会现代性，汪晖这样一位对于社会现代性有强烈质疑（质疑社会现代性本身的价值、质疑接受社会现代性的人如何能与追求现代化的国家保持批判的距离）的批评者，也一样将社会现代性等同于现代性。^[3] 中国思想界在这个问题上的共识程度，于此可见一斑。

这种思想上的共识，我愿意相信是现实的忠实反映：中国的现代性，确实始终是由社会现代性所包揽的。不过汪晖的论述，也让我们看出，在中国国家的现代化目标、社会不同部门对现代化的迎拒、以及思想文化界对现代性及启蒙思想的理解之间，存在着某种有机的连带。这种连带的基础何在？为什么一个如此庞大的社会，多时代与多空间的交错杂陈如此令人目不暇给，居然在首肯社会的现代性这一点上，表现出如汪晖

所描述的惊人一致？

原因当然很多、很复杂。不过汪晖的一个论点，值得特别重视。他认为，中国的启蒙主义与社会主义，一样都是以民族国家的现代化为主要关怀。而启蒙主义（精确地说，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蹒跚出现的新启蒙主义）版的这个诉求，到1980年代末叶为止，发挥过很大的批评功能。可是一旦追求现代化成为中国国家的目标，启蒙运动的历史使命即告结束。由于新启蒙主义自己陷身在现代化方案的局限里，它业已“丧失了诊断和批判已经成为全球资本主义一部分的中国现代性问题的能力”。

说中国现代性的历史发展以民族国家的现代化为主要动力，应该是很确实的。可是不难理解，民族国家所仰仗的道德论述，也就是民族主义，正好是一项以现代为形式、却以前现代为实质的论述。它的现代形式在于提供普遍而平等的成员身份（国民、公民、人民），将个人由传统、自然的关系中解放出来，代之以政治性的身份界定；它的前现代实质在于，民族主义的论述，莫不企图提供某种自然的、文化的或者历史哲学式的超越建构，作为民族的集体身份所寄。民族主义这种半现代、半前现代的特色，会影响到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走向。

这种影响之一例，就是前述的文化现代性的发展，总是保留了一些前现代的胎记。从社会生活的一般面貌、到思想文化的演变、到个人的身份认同，都可以见到一些传统的、天人合一式的（cosmic-ethic）价值与规范，藉着民族主义的论述发挥着作用。这类社会可能在社会现代性方面相当先进，却无须直接面对“世界解除迷魅”的全部后果，因为这样的社会，总可以攀附着某些无须由它自行正当化的价值基石。这样的社会，享受着前现代的安适，同时又追求着现代的资本主义与国家机器。可是它的幻觉很容易遭惊动，而它的整体正当性，也是很容易出现缺口的。

最容易暴露的缺口，可能就是这个社会的社会整合（social unity）的基础。所谓整合的基础，是指社会成员关于价值性的信念与认定是否有共识。社会成员关于所处的社会、关于自己、关于自己的利益与目的和

社会的利益与目的之间的关系，都需要一套说法，一套意义性的叙事。这套叙事的一个重要功能，在于为社会的共同性——由原本个别的个人来进行社会合作——找到一个根基。在前现代式的社会里，维持社会整合的因子不一而足：血统纽带、历史传承、文化认同、利益的一致、价值观的统一等等。这些因子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它们的妥当、也就是正当性，乃是先于个人意志的，也就是说它们有独立的正当性根据，无赖于个人的认可。可是随着现代性的扩展，这种可以豁免于正当性挑战的共识基础，逐渐丧失地位。简单地说，这类宣称代表实质价值的因子，已经无力再将杂众熔铸成整体。

近代的一些思潮，对这个情形深感不安。可是它们的反应，并不是破釜沉舟地咬牙面对、回应现代性的要求，而是憧憬过去整合状态的温馨安逸，企图在今天重建、复制某种前现代的理想。浪漫主义、社群主义寄望于某种传统、有机的生命共同体；民族主义寄望于一个文化、历史性的命运共同体；马克思主义寄望于社会经过改造之后，成员的利益能够趋同而凝聚成超越于个别利益的人性共同体。这些努力当然无法成功，却徒然转移、回避了文化现代性所提出的严峻问题。^[4]

我觉得，民族国家这种集现代与前现代于一身的特色，正是许多由国家担任现代化推动者的社会所面临的困扰之一。藉着垄断论述与权力，国家一方面强化社会的现代性，另一方面窒息文化的现代性。莫怪乎由国家领导的现代化，最后容易走上专权体制与民族主义。这种社会里，文化现代性所要求的自我正当化，事实上没有制度的、文化的管道由社会成员来自行反思进行。

三、自由主义作为文化现代性的承担者

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的“现代性”的程度与性质，还有待分梳定性，不是可以信口断言的。我更必须强调，中国的现代性经验，涉及了传统的延续以及西方的进逼；两方面的爱恨交织与迎拒两难，使它所建立的

自我意识因而更是纠结周折，远远超出了本文的架构所能处理者。以上所言，只是提供了一个进一步观察、验证的角度而已。至于中国的现代化努力，包括逐渐（被）卷入全球资本主义的秩序中，是否真的消灭了现代性所蕴含的一切批判能力，就值得怀疑了。至少，衡诸其他更属于资本主义核心圈的社会经验，并不能直接证实如此消极的论断。

前面的讨论业已隐含地指出，现代性的批判潜能，系于文化现代性必须抗拒社会现代性的垄断、也必须抗拒保守倾向的前现代诉求。这表示，文化现代性本身，必须设法提供一套对于“现代情境”里人的道德生活的诠释。这套诠释，需要能够落实“自行营造、证立、修改引导性的价值理想”这项现代的需求。广义的启蒙，正是这样的一套诠释；而自由主义则可以看做启蒙原则的社会/制度性主张。

关于启蒙的理解，当然聚讼纷纭。不过把启蒙看做在现代情境里建立价值理想、尤其是作为社会生活所需的共识对象的价值理想，启蒙原则所揭示的要求其实相当明朗。我想举出四点来呈现这套价值理想。^[5]

(1) 启蒙肯定理性，是因为认定一己以及共同生活的安排，需要由自我引导而非外在（传统、教会、成见、社会）强加；至于理性这个概念是否适当的表述了人的自主与反思，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要看我们如何发展出一套后形上时代的理性概念。(2) 启蒙肯定个人，是因为认定个人不仅是道德选择与道德责任的终极单位，更是承受痛苦与追求幸福的最基本单位；至于这种个人是否一定沦为抽象、原子、普遍式的个人，从而忽略了社会脉络与集体身份的主张，也是另外的问题，要看我们关于个人之构成的理论是否层次丰富。(3) 启蒙肯定平等，是因为认定每个人自主性的选择，所得到的结果，具有一样的道德地位；至于这种道德地位的平等，蕴含着什么样的政治、经济、社会条件的平等，又是另外一个问题，要看我们对于“待人为平等的主体”发展出了什么样的政治理论和资源分配原则。(4) 最后，启蒙肯定多元，因为所谓自主的选择，预设了能够在其间选择、调整的众多选项、也蕴含着不同的选择与修正结果；至于选择有没有限制的必要与可能、多元是否蕴含着相对主义、怀

疑主义，又是另外的问题，要看我们准备给多元主义什么样的道德限制。这些，也就是个人的自主与生活形式的多样与平等，我觉得表达了启蒙的基本诉求，也比较明确的呈现了一套社会理想。

值得注意的是，这套理想满足了前述现代性概念的两项形式要求：它明确体认到现代与前现代道德情境的差异，也就是认识到虚幻性的公共价值之不可恃；它也致力于发展公共的正当化过程所需的条件，也就是强调理性、个人的认可、平等、与多元等几项必要条件。事实上，启蒙理想的这两个面向互为奥援；用罗尔斯的话来说，它一方面剔除全面性（道德、宗教、形上）学说的政治整合功能，另一方面则找寻“自由而平等的个人进行社会合作的公平条件”^[6]，作为社会整合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启蒙的动机、以及自由主义运用这些条件对于启蒙动机的说明，构成了现代性、并且是有批判意义的现代性的典范理论。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主义承担着文化现代性的基本向往。

当然，没有哪一套历史上的启蒙“论述”，完全落实了上述的几个侧面。各种历史条件与主体位置，决定了上述几个概念的诠释要受到什么样的挤压与扭曲。可是这套社会理想是否属于“现代性”的一部分？追求现代化的民族国家，结构上是否有与这套社会理想的某些因子相抵触之处？当全球化的趋势据说将中国整编到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后，这套理想是否就丧失了现实的或者批判的能力？如何回答这些问题，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如何诠释个人自主与多元平等这两项基本诉求。在今天，自由主义正在经营这套社会理想；除了自由主义之外，各类自许为“现代”的政治思想，例如社会主义、放任自由主义，也都在这个大方向之下摸索。^[7] 诚如汪晖所言，自由主义能否妥当处理相关的问题，还属于极为庞大的未知。^[8] 不过自由主义至少不能离开个人自主与多元平等的基本立场，而真诚放弃了启蒙价值的政治思考者，在宣称进入后启蒙之际，究竟准备如何看待这些基本价值，似乎还没有见到完整的说法。



四、普遍与特殊：现代性面对的考验

此处之所以着意使用自由主义的语言，重述启蒙主义的理想，除了届此为止曾略述的概念性的理由之外，也是因为汪晖将中国启蒙论述的凋零，联系到自由主义在“全球化”与“市场社会”下的萎缩这个更为特定的诊断。他的诊断接触到了真实的问题，可是这类趋势对于自由主义构成的挑战究竟多么严重，仍然有待追究与厘清。在此，由于其跨骑在现代与前现代之间的尴尬姿势格外富有启发性，我想只处理一个汪晖视为当然的论点：文化、族群、性别、国族，乃至各类各种的社群的特殊要求与主张，是否必然否定了启蒙的个人主义和普遍主义？^[9]

汪晖所关切的问题，可以说就是如何打破启蒙的普遍主义霸权；攻击的突破点，汪晖选在自由主义，尤其是自由主义以西方的政治规范强加于其他文明、文化等等的企图。这类对自由主义的质疑，近十余年来在英文文献里也频频可见。容我取巧，姑且简称之为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之争。我现在要触及这个问题，原因主要不是赞成或者反对汪晖的质疑，而是由于这个问题有助于说清楚现代性的一些特色。

自由主义的“普遍主义”究竟是何物、又为何必须否定特殊主义？普遍主义的主张，似乎可以粗略地分成三个方面来看：一、知识论与/或实践哲学中关于理性的看法，认为某种理性概念的妥当是普遍的，可以得出普遍妥当的是非对错标准；二、道德哲学里关于主体的看法，认为主体具有无差别的道德地位，也就是所有这类主体在道德上都是平等的；三、制度上关于公共身份的看法，认为某种公民身份是由一些无差别的权利与义务所构成的。

在这几点上，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冲突吗？试想一下否定这三个命题的后果有多么荒唐或者恐怖，我们就知道冲突不会发生在这个层次。冲突，其实牵涉到上述“理性规范”、“主体”与“公民”三个概念是如何取得其内容的。由于发展这类概念的传统途径，多是利用一套先于/超越

社会生活之偶然性、特殊性的“道德观点” (the moral point of view)，这些概念的推导，走的常是一种直接否定特殊性的路向。而这种名为普遍的路向，自然会忽视现代性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妥当性或者正当性是开放的、是要由人们的沟通交往的过程里逐渐建立、认可、修改的。不经过这个过程，哲学论证、道德劝说、乃至民主、科学之类的“现代文明”招牌，恐怕都不可能具有太多说服力。

可是在一个现代/后形上学的视野里，道德观点的出现并不需要否定偶然与特殊。道德观点所要求的，只是平等的尊重与相互对待。这种道德观点所蕴含的普遍主义，企图在平等尊重与平等对待^[10]的条件下，经由沟通与讨论，建构具有普遍妥当性的规范、具有平等道德地位的个人、以及公平的权利义务关系。^[11]这种普遍性不会吞噬或者淹没特殊性，但是它注定要挑战特殊性；挑战的理由，不是它在任何实质的意义上比对方来得进步、明智、全面或者理性，而是因为它迫使特殊者面对具体的“它者”而进行反思，藉着与它者的对话，达到更深一层的自我意识、自我认知与自我修正。这种由它者“回归”自身的普遍性，乃是一种成就、有成败是非可言，而不是一种预设、无须面对它者的考验。因为借着面对它者，主体才能设法超越自己的信念、归属、位置、身份与认同，逐渐形成“后俗成的自我” (post-conventional identity)。后俗成的主体、后俗成的规范，共同构成了一套后俗成的普遍主义。

自由主义所要求的普遍性，正是这样的后俗成意义下的普遍性；这样的普遍性，也正好符合前述的启蒙自主性理念。那未曾与自己的“既予”战斗过的，不算自主；那未曾背叛过自己的天赋、社会祖产的，不算自主；那未曾横眉冷对自己的出身、身份、认同的，不算自主。战斗、背叛、冷对之后，也许还是回归（甚至有道德的义务必须回归）。但用苏格拉底的名言来说，经过反省的，才是有价值的。在这里，身份政治、族群政治、乃至性别政治，都要受制于自由主义的普遍要求，却并非注定要受到普遍性的斲伤。

自由主义的批评者，却往往忽视了这项普遍主义要求的进步意义。

自由主义有可能将个人淘空为抽象的幻影、将自主化为毫无理由可言的偏好之抉择、让平等流为形式的一致、让多元成为商品销售策略。可是自由主义没有必要假装白痴，按照批评者的期待重蹈这类早已为人熟知的覆辙。相反，自由主义的普遍性主张蕴含着明确的实质要求。它要求自由主义的理想社会维持一个开放的文化，也就是维持最多样的文化、身份、价值、生活方式的选项；它要求社会维护一个选择、批评、改变的空间；它还要求社会提供实质的平等，以资让每个人的选择机会获得实质意义。自由主义所坚持的，只是这类选项或者集体性的价值，不得凌驾于个人之上、不得违背它们为个人存在、而非个人为它们存在的原则。这正是汪晖视为自由主义缺陷的一个特色：集体性目标的重大价值不在其自身，而在于它们构成了个人自主多元生活之可能性的条件；它们的意义，在于它们是个人从事反思与选择时所亟需的资源，而不在于它们自身的内在价值。换言之，社群主义、多文化主义，乃至倾向于身份政治论的各种主张，正确地强调了社群、文化与其他群体特色对于个人的自由、发展以及生活内容的重大意义；根据这个理由，自由主义要求这些集体性的事物受到尊重与保障。在这里，自由主义没有理由与上述各类主张直接冲突。

不过，自由主义同时也会坚持，这些群体性的事物，需要根据个人的自主、发展和追求更丰富的生活的需要，来加以检验与批评。自由主义不是文化保守主义、不是排它的民族主义、更不会相信集体的价值与行为方式的存在，直接便保证了其合理。自由主义的确自有其“普遍”的标准，也因为这个标准，它能够成为一套具有批判能力的学说，跳出现实存在的各种集体信念与实践，保持批评的距离。相对于它，社群主义、多文化主义以及身份政治的某些流行版本，由于矫枉不惜过正，不免洋溢着多少的保守气息和现实崇拜。在这个节骨眼上，“启蒙”事业的严峻意义之难以承担，表现得格外明显。



五、结语

本文由文化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的对比出发，说明现代性不仅不同于单纯的现代化，并且由于文化现代性具有反思与自我正当化的基本特色，现代性内部其实蕴含着丰富的批判能量。这种批判性格，在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上，可以见到明确的表现。在我看来，自由主义其实是现代性的承载者；不面对现代性的严肃考验，不会感受到自由主义的真正意义。值此“现代”的脉动衰竭、现代化的魅力黯淡、现代人业已“自主”得疲态毕露、意兴阑珊之际，我们见到各类传统势力甚嚣尘上、各种保守意识正忙着提供兴奋剂与避风港。这时候，我个人觉得，正视现代性的真实内容，乃是维护社会改造的动能、维护社会进步远景的重要一步。

这一步，当然并不好走。以上的叙述，并没有进入任何问题的内部，展开实质的分析讨论，所以本文既未能面对真实的议题，也没有资格做乐观或者悲观的预言。不过，如果历史注定我们要活在一个后形上的时代，而我们仍愿意维持“败而不溃”（non-defeatist）的方向，我看不出还有什么其他选择。^[12]

注释

[1] 邮递地址：台北市南港中央研究院社科所：Email:sechin@gate.sinica.edu.tw。

[2] 哈柏玛斯的论点，见 Jurgen Habermas, ‘Modernity: An Unfinished Project’ (德文本 1980), in M.P. d’Entrevies and S. Benhabib, eds., *Habermas and the Unfinished Project of Modernit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7), pp. 38–55; 完整的论述，见 Jurgen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德文本 1981), English trans. by Thomas Macarthy, in two volumes (Boston: Beacon Press, 1984, 1987)

[3] 从汪晖的其他著作，可以看出他熟悉哈柏玛斯关于两种现代性的

分辨与讨论；他并且批评哈柏玛斯的这个区分只有形式的意义，缺乏历史—现实的意义。一个例子是他的长文《科技作为世界构造和合法化知识》，收在汪晖《死火重温》（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第190—297页。可是该篇长文里的理论思考，似乎没有反映在现在这篇有关中国现代性问题的讨论中。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在其他著作里（例如上引书中《现代性问题答问》，第3—41页），汪晖对现代性的评价要较为复杂曲折；他深知现代性包含着对自身的反思与批判、对现代性的质疑包含着对现代性的认定（他用的字眼是“承诺”）。可是在这篇文章里，却只能见到否定的一面。

[4] 以上的说法，或许有人会以为不尽公平。他们会说，这些思想取向，不必然尽是高悬海市蜃楼的“共同体”为将至鸿鹄——无论前面加上的形容词是“生命”、“文化”、“命运”抑或“人性”。在另一种较为积极的诠释之下，它们都有一定的抵抗与批判的涵蕴，因此是进步的。例如从赵刚所谓的“培力”（empowering）的角度来看，这里所列的几种思潮都可能有其积极功能；相反，自由主义式的个人，由于脱离了任何“连结”的可能，将沦为权力的刍狗而毫无抵御能力。见赵刚《告别妒恨：民主危机与出路的探索》（台北：台湾社会研究丛刊，1998）。又或者从汪晖所谓的“社会防卫”的角度看，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社群主义也都可能有进步的意含与功能。赵刚和汪晖的关怀可以理解，不过问题不在于如何找出甚么共同体是消毒无菌的，而是如何让人们在清醒实际的条件下集结成社会力量。梦不怕美，而是怕醒。

[5] 这四点并不是随兴数家珍；它们其实都是“自主性”这个概念所涵蕴的要件。否定这些原则中的某一项，就是否定自主性这个概念的融贯；这四个原则，合起来也完整地说明了什么叫做自主性。不过在此我无法对这样的分析多做说明。

[6] 这是罗尔斯自由主义的出发点也是终结点。见 John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1996)。万俊人先生的汉译本《政治自由主义》（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将“条

件”译做“项目”，恐怕难称达意。

[7] 见 Will Kymlicka,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An Introduc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0) 有关当代政治哲学之共通性的说法。从这个观点来看，近年来中国大陆知识界所谓的自由主义—新左派论战虽然喧腾一时，其性质仍亟待当事者再加以确定。论战要有收获，需要不时厘清争执的层次何在、彼此的异同何在。我猜想，经过整理之后这场论战各造会发现，他们的分歧多部分来自对于现实现象的理解与判断（当然不免掺杂有抢占道德制高点的心理需求），其次一部分来自关于政治原则的理解与诠释，真正原则上的差异所占分量相对是轻微的。这场论战的一些代表性文章，已收在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话说回来，类似的“意识形态”论战，在台湾的文化界、学术界已经无法想象；这中间的原委得失，也值得台湾知识界有所反省与检讨。

[8] 自由主义有没有能力应付现代社会的结构性冲突，我目前没有明确答案。读者可参考 Richard Bellamy, *Liberalism and Modern Society* (University Park, Penn: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2) 所提的质疑与批评。另一方面，自由主义当然是受到严格局限的；真、善、美的问题，人生的目的与幸福的问题，文化命运与人性前景的问题，它都无言以对。可是这不是特属于它的症候，而是现代以及现代人的症候。自由主义的实践问题则是，它在勾画出现代社会生活之自我正当化所需的必要条件之后，由于不愿意赋予任何主体的认识、道德或者历史目的论上的优势地位，它的论述缺乏确定的行动者。相对之下，民族主义、社群主义、多文化主义，乃至放任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当然还有社会主义，都会特别中意某个价值的承载者，某种在道德、认识或者政治上居于选民地位的主体。自由主义无法变成社会运动，原因或许在此。可是这是应该批评的缺点吗？我还在犹豫如何陈述这个问题，自然也还没有答案。

[9] 这个问题，在汪晖的思考架构里占有相当沉重的分量。在另外一

篇文章里，他直接处理这个问题，表达了如下的判断：“当代自由主义没有能力在一个同质化与异质化相互交织的世界里提供普遍主义的权利理论。” (2) “如果说自由主义的权利理论为先前的民族解放运动、民权运动和妇女运动提供了平等的基础，它的那种抹平差异的平等概念对于这些新近发生的“承认的需求”则是十分陌生的。” (14) 进一步他还说：“权利自由主义是一种普遍主义的、怀疑集体目标的模式，它不理睬保存文化差异这样的集体目标。” (14) 见《承认的政治、万民法与自由主义的困境》，收在《死火重温》第 298-357 页。这篇文章原是汪晖给汪晖、陈燕谷主编的《文化与公共性》(北京：三联书店，1998) 所写的导论。上引页码系《文化与公共性》一书的页码。

[10] “平等”的意思在这里至为关键。我觉得 Ronald Dworkin 有关“视为平等的人对待/以平等的方式对待” (treating as equals/treating equally) 的区分，和 Benhabib 所谓“具体它者/一般它者” (concrete others/generalized others) 的区分，乃是透过不同的语言，表达“平等”涵蕴、重视个人自主性的基本精神。尊重自主，必然涵蕴着尊重自主者的选择结果；由于这个结果是当事者身份的一部分，因此应该受到尊重，于是也就应该由当事者为它负责 (这种伦理，Dworkin 会称之为 ambition-sensitive 的伦理)。这个题目，值得进一步探讨，以资显示所谓“权利自由主义”其实有远远多于权利的关怀。

[11] 当代思想家中，Seyla Benhabib 可能是这个取向比较自觉的代表，见她的 *Situating the Self* (New York:Routledge,1992)，以及后来她回答批评者的几篇文章。不过这个取向，在其他思想家的著作里也可以见到，包括 John Rawls。至于纯粹概念性的陈述，黑格尔关于普遍 (单纯自在的存有) - 特殊 (面对他者的存有) - 个体 (回到自身的自在自为的存有) 的辩证发展逻辑，极其一般性地呈现了这种由主体面对“他者”之后方能取得 (具体) 普遍性的模式。可是由于黑格尔的主体概念仍限于一个未分化的“意识”，他关于这个过程的说明总嫌模糊。

[12] “败而不溃”一词格外见真章，来自 Maeve Cooke, Language and

Reason: A Study of Habermas's pragmatic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4) ,pp.43ff.,150ff.,。Cooke 根据哈柏玛斯，说“败而不溃”的意思就是“顽强地批判” (stubbornly critical); 它包含两个意思：超越既予的脉络背景、以及维持乌托邦的远景。

如今，批判还可能吗？

——与汪晖商榷一个批判的现代主义计划及其问题

赵 刚

在对启蒙主义（特别是作为现代化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高度质疑这一点上，汪晖（1998）（下称汪文）和后现代主义有表面姿态上的共通之处。但除此之外，汪文可以说都在激烈地反对后现代——不论它是作为知识、作为政治、或是作为知识分子的生命样态。透过理论家的窗外看到的世界并无异质空间的缤纷多样以及差异政治的愉悦轻快，反而是“思想的废墟”，以及耸立在这废墟之上的“超越国界的巨大的资本主义市场”（20）。汪文所表现出的危机感与挫败感颇类于二三十年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但可能尤甚于后者，因为在现今的这个时代里，连可以作为实践支撑的规范性基础或乌托邦信念皆蒸发殆尽。但这个规范与信念的危机并没有导出一种后现代犬儒，反而和批判的严肃结合起来诡悖地构成了汪文的首要特征。对于这个特征的意义的讨论，将会是这篇评论论文的首要标的。^[1] 透过对整体性（totality）与历史性的现代主义社会理论式的重新肯定，汪晖这篇论文的核心企图就在于呼吁“批判性”的重建。对汪文而言，当代中国思想状况的核心症候就是“批判性的丧失”——这不言可喻的是一个典型的现代主义诊断与企图。

在这篇论文中，我首先将藉由汪文对中国大陆当代知识界批判性丧失的讨论，厘清汪文的“批判性”这个概念的可能的分析构成（第一节）。然后，我将分析一个内在于汪文的我所谓的“现代主义计划”的重要内容（第二节），并对它的当代关连性及可能的问题提出评论（第三节）。最后我将藉由将汪文与 C.Wright Mills 的“社会学想象”的内在关连的讨论，

拉出整体性、批判、规范与激进民主之间的关连思考。

一、批判性的丧失

汪文对当今中国大陆知识界“批判性丧失”的危机诊断，是建立在一个新历史时期的认定基础上。汪文指出，始于90年代，“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过程已经成为当代世界最为重要的世界性现象，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已经将中国的经济和文化生产过程纳入到全球市场中”（9），但是这个新历史时期并没有被各种马克思主义者或是启蒙主义者认识到，他们的思想仍在一个过时的基础上操作，因而最多只能是道德姿态，而效果上则可能成为回护霸权的意识形态。由于一种敏锐的历史感而产生危机感，汪文其实和20年代的现代主义前卫派有亲近之处：新的时期来了，赶紧找新的语言掌握住新的现实。但80年代（假如不是更早）之后，跨越全球（至少是已开发地区）的时代氛围却是现代主义前卫派（不管是文化的或是政治的）的大退潮与后现代主义的涨潮。汪文即是在这个后现代主义浪潮下，进行现代主义风格鲜明的斗争。但是在逆流而上的勇气的一旁，我们也可以看到深刻的对于失语症的恐惧：新的时期来了，但是却找不到描述和分析新时期地平线的新语言！于是汪文问到：“中国的问题是怎样的问题，或者，用什么样的方式以至语言来分析中国的问题呢？”（9）

当然不是所谓的后现代语言。对于“中国的后学”，汪晖斥其为虚无主义，因为它在洋洋自得的众声喧哗之中，自我取消了批判性格。后学批判性的丧失反映在两方面。其一，后学挟其“市场经”、“大众文化”的措辞，以拥抱大众为名，支持上升中的霸权计划，而这个计划的特征就是“大众文化与官方意识形态相互渗透并占据了当代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17）。^[2]因而，就其论述效果而言，后学仅仅是一种“现代化意识形态的补充形式”（16），就其论述意图而言，则可能是一条佯作行走边缘却意欲重返中心的终南捷径。其二，也许是更重要的，后学藉“多元文化主义、相对主义理念和现代虚无主义的各种理论姿态”创造了一



种取消批判性本身的论述形势。清楚地感受到规范性基础在当代情境中几已荡然无存，汪文英雄式地指出“需要重新确认批判的前提”（9）。虽然我们将看到这个工作在汪文中并没有完成，但它的成就无可否认地是负面指出某些曾作为批判前提的二元对立范畴（例如西方/中国、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已在当今失效。

“批判性”是汪文的一个核心但缺乏外显界定的概念。依据汪文的内在逻辑，我们还是可以分析出这个概念的核心内容：与霸权的距离、历史/经验研究与理论创新、及规范性定向（normative orientation）（最后一点汪文低度发展，稍后详述）。我先把内在于汪文的“批判性”诸判准厘清，然后再依照它们简述汪文对各种现代化意识形态的批判。

首先，批判性不是浮在相对性大海中的措辞（不管它听起来多么凌厉、花哨、正气），而是可以从权力空间中测量出来的。我们总是要追问：论述与霸权（既存的或是上升中的）究竟处在何种关系位置上？这个简易试剂虽然经验上准确度很高，但它的有效度仍然取决于如何厘定霸权。对于有些论述（例如新启蒙主义、儒教资本主义），这个试剂可以马上验出他们的批判性丧失，但是对于另外一些论述（例如分析马克思主义、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论），这个试剂的问题性就很大了，汪文必须要把霸权作高度扩张性解释，才能对它的批判性质疑。这一点我将稍后再讨论。

其次，批判性不只是信念，批判者也不是信徒，批判活动不是以一组超越的价值批判另一组超越的价值。那么批判者如何避免成为自己信念的使徒呢？这牵涉到批判活动和理论、经验/历史之间的三边互动关系。任何具有批判性的社会理论（相对于自命“价值中立”的社会学理论）都必须了然其自身的规范性定向，然则规范性定向必须成为理论反思的对象，而非先验预设，要达到这个要求，社会理论必须展开和经济与历史的对话，也就是，要作研究与分析，要对目的进行手段批判。批判的社会理论的展演本身就必须是社会性与历史性的，它的存在即预设了历史仍在进行，社会研究仍属可能。因而，社会理论如果预设了历史终结或社会研究的终结，那即是等同于取消自身的批判性。而在理论终结与历

史终结之后，“批判”也不过是道德姿态与措辞罢了，或成为意识形态本身。

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汪文指出后学批判性丧失的原因在于后学家们其实成为了一种“信徒”（16），以为祭起解构的旗幡，就不必作研究分析；对现代性、中西现代文化的关系、启蒙主义的主体性没有历史分析；对资本活动、大众消费文化没有社会经济分析（16—17）。^{〔3〕}因此，这个看起来是方法的问题其实也是权力的问题，当后学家们在进行非历史的解构活动时，他们已经在和某一种宣扬历史终结的霸权同流了。这造成了批判性的丧失。

如果作为“现代化意识形态的补充形式”的“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已经完全不具任何批判性，那么在不同历史时期分别居于现代化意识形态正统位置的各种马克思主义与启蒙主义又如何呢？对汪文而言，这些思潮不是已经失去了批判性（例如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启蒙主义），就是不曾具批判性（例如“实用主义马克思主义”、儒教资本主义、乡镇企业现代化论），要不就是批判性正陷于危机之中（例如分析马克思主义、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论）。不管是马克思主义或是启蒙主义，汪文是以其作为意识形态而反对，而非整体地否定这些思潮所可能内蕴的合理价值。以“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为例，汪文看到它的历史作用在于以个人及自由为名，为1978年以后的启蒙主义打开出路，催生了中国社会的“世俗化”运动，而采用的策略则是把1978年以前的社会主义当做传统宗教批判。这个思潮的历史作用恰恰好在于遮掩了两个历史现实；一、1978年以前的社会主义道路本身就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二、1978年以后的中国社会结构的现代性危机和人道主义价值之间的矛盾。因此，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批判性丧失的原因或征候，类似于中国大陆的后学，就在于它和上升霸权的历史共谋关系，以及它对于历史和社会现实分析的阙如。但相对于汪文对“中国的后学”的几近完全的否定，汪文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完全否定，不但没有，反而还期望一种能够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的出现，一种“具有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12）。

批判性不是道德措辞（例如人道主义者所耽溺的“异化”、“疏离”），而是必须作功课。^[4]

新启蒙主义是另一个批判性丧失的例子，它曾是 80 年代最富活力的思潮，但迅速地转变为“当代中国资本主义的文化先声”（14）。由于新启蒙主义的思想泉源主要来自西方的自由主义传统，因此外界很容易认为新启蒙知识主义是代表与国家对立的社会良心，而新启蒙知识分子也容易这样自我理解。汪文指出这于外界是误认，于新启蒙知识分子自身，则是一错误的自我意识，因为“新启蒙”的历史意义就在于“为整个国家的改革实践提供意识形态的基础。”（12）。^[5]对汪晖而言，新启蒙主义和它所要革掉的马克思主义其实都是“现代化意识形态”，因为它们表现在“实际的历史关系”中的共同价值目标和历史理解方式（13）。向资本主义霸权靠拢，缺乏历史向度，是汪文认为新启蒙主义丧失批判性的两个主要原因。但有趣的是，和之前对人道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一样，汪文并没有全盘否定新启蒙主义的内在合理性，反而表露出对某些启蒙价值（例如“主体性”）再生的期许。汪文承认“主体性”概念仍有其批判潜能，但在新启蒙主义的手上给玩儿完了，变成了现代化意识形态的主要构成物，而如果要再生这个概念的批判力，则必须把它“置于新的历史条件中”。这样的作法类似杜威对于传统自由主义的重建，透过对于新的历史条件（例如，垄断资本主义在 20 世纪初的形成）的掌握，把启蒙传统或是自由主义的进步力量（例如，自由、个体性、智能）自陈腔滥调中解放出来（赵刚 1998：224—236）。就这样的一种厘清历史、价值与实践之间的关系的“内在批判”（immanent critique）立场而言，汪文其实是典型地在现代主义社会理论（例如马克思主义与杜威的实用主义）所设定的平面上操作。

但汪文在批判新启蒙主义时，并非全然一致地依循内在批判的原则，指出意识形态和制度现实之间的矛盾或落差，它（不乏任意性地）也用另类的价值理念和新启蒙主义的价值相抗衡，例如，以经济平等、实质参与民主、以及美学现代主义来对比经济自由、形式民主、以及文化现代

化。这样的作法自然是以一套规范基础挑战另一套规范基础，或用汪文常见的语言，是以一种“道德姿态”对抗另一种“道德姿态”。但因为整体而言，汪文对于规范性基础的讨论可谓非常稀少、零散、甚至任意，因此非常不清楚的是它如何看待批判事业中的规范基础的问题；批判性丧失的问题是否也包含规范基础的危机的问题？如果规范基础的问题已被取消（如在后学的表面语言中所展现的那样），那么汪晖是否允许汪文的批判性立场（例如，那并没有历史地、社会地申论的“参与民主”）只是另一种“道德姿态”？

上述的“经济平等”、“实质参与民主”、以及某种美学现代主义敏感，在汪文中并没有被原则化地视为对“现代化意识形态”进行价值批判的规范立场，它们与作者的关系也不明确。事实上，汪文在阐明为何当代中国各种思潮的批判性丧失这个重大题旨时，经常只能非常形式地处理，例如，汪文把作为现代化意识形态的新启蒙主义和作为现代化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我认为过度且有些极端的）混同（conflation）。汪文在最需要以细致的历史功夫分疏这两种意识形态的时候，反而放弃了历史，进而以一种超大的历史观，指出因为它们都享有“共同的价值目标和历史理解方式”的这个“实际历史关系”（13），所以它们都是现代化的意识形态。这至少对一个局外人如我是有些理解的困难。

从一个后设的观点来看，也许问题更复杂。汪文念兹在兹所要指出的不就是各路思想的批判内容的丧失，徒留姿态吗？那么汪文如何正当化他所召唤出来的（虽然有些任意性）经济平等或是参与民主的价值呢？也许在当代后结构、后殖民的语境中，批判者都已内化了一种深刻的焦虑，不愿意自己的批评论述被钉在一种实质立场上，因此不得不避开对实质价值的各种申述；在汪文中我们就看到了对于价值立场的这种刻意距离化。但是，无法对诸价值进行分疏性（相对于笼统性）的批判的后果，可能就是所有的牛在夜晚里看起来都一样黑。说新启蒙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甚至于“分析马克思主义与批判法学”）都是“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因为它们之间有“共同价值目标和历史理解方式”的“实际历史关



系”……，这样的谈法可能对两者都不公，因为在大历史叙事中看起来相同的东西，逼近了看毕竟不同。其实汪文的写作可能也意识到了这个不同，毕竟它是透过对新启蒙主义（而非中马）的批判展现出另类规范。这是否意味新启蒙主义至少就作为背景而言，较中马更有助于规范性定向的厘清呢？

虽然汪文对当代中国大陆的各种思潮的批判性丧失，提出了有力的批判，但汪文本身也陷在一种批判性的危机之内。这个危机展现在对于价值或规范的分疏性批判的不足（这一点稍后在第三部分还会再谈到），从而产生了在批判社会理论建构与创新过程中的规范性定向模糊的问题。但这些问题都不足以否定汪文在绘制当代思想状况地形图上的努力及其意义，因为一个妥当的认知图绘（cognitive mapping）是任何批判知识活动所不可或缺的一个必要构成。

二、一个批判的现代主义计划^[6]

除了偶而把现代性和现代化交错使用，汪文的批判标的始终是“现代化的意识形态”，而非现代性本身。如果说，现代性的价值（好比平等、自由、主体性等等）在20世纪的历程中，早已蜕变为一组空泛的道德姿态，或更糟糕地，变成维护既存现状与利益的意识形态，这并没有让汪文因而采取一个和现代性断裂的态度，汪文选择的是依然站在现代性的母数上反对现代性，而非站在现代之前或之后论述。这就是为何我称之为批判的现代性计划。这个计划包括了几个核心内容：意识形态批判、反抗、历史性、知识分子与整体性。

汪文的论说模式是典型的批判现代性的体现；以探知（inquiry）与反思为认识基础，汪文激烈地反对“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这个关键词的使用是有认识论上的重要意涵的，间接地表示汪文不是站在傅柯式在后结构主义的立场去看待这些思潮的，不然，汪文应该使用“论述”，而非“意识形态”指涉它们。使用后者当然就预设了某种相对应的



实存 (reality), 因而关于世界的陈述就有了真的和假的之分, 而假的陈述就是意识形态。这个真伪之分在后结构主义里被解构掉了, 剩下的只有在权力场中竞逐真理之名的各种论述, 而惟有胜利者得其名。因为不再预设一个事物表面和真实内里的深度结构, 所以傅柯的知识/权力论被称为尼采式的实证主义 (Jay1984:522)。唯有了解到这一点, 我们才能体会汪文为何称中国大陆的后现代为虚无主义、为何坚持社会与历史研究、为何呼唤“具有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至少在认识和方法层次上, 汪晖是个典型的现代主义者, 因为“汪文”是在一种现代主义的深度模型 (depth model) 中操作知识。根据 Jameson 深度模型 (或是“诠释学模型”) 所展示的世界有内/外、表/里、显/隐、真/伪、能指/所指、脉络 (语境)/文本之间的距离深度, 而后现代主义的语言则是这个深度模型的扬弃, 取而代之的则是多重表面, 在这个镜中世界只有践行、论述、文本游戏及文本交互性 (Jameson 1991:12), 而意识形态、错误意识、批判、与“实际历史关系”, 则都是过时的无效词汇。不消说, “汪文”的语言明显的属于后者。

一个批判的现代性计划的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为“反抗”保留可能性, 就算只是在认识论层次上。也就是说, 一个激进的反抗在现实上也许没有条件, 但是就算是仅作为一种话语也得要薪传下去, 以期维系一个可能性的光谱。反抗的伦理意涵不在于“彼可取而代之” (或台湾流行的“政党轮替”) ——主要在一个妒恨政治的平面上操作, 而是在类似 E.P. Thompson 所说的创造历史——创造一个生活方式迥异于今的未来 (Thompson 1966:211), 一个 P.Bourdieu 所谓的“合理的乌托邦” (reasoned utopia) (Bourdieu 1998:125-130)。这样的反抗实践首先需要一种历史敏感度, 也就是要努力保存一种 Benjamin 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辩证关系。欠缺了历史的辩证性, 反抗如何可能? 而现今对于这样的一种反抗和历史之间的关系的现代主义提法正遭遇来自两个方向的空前挑战, 一个来自右派传统 (或更具体地, “新右派”) 的“历史终结说”的挑衅姿态 (这种说法的最初版本是 50 年代 D.Bell 等人的“意识形态终结说”),

目的是取消左右对立甚或任何政治愿景上的对立状态。

另一个挑战则是来自后现代主义。在后现代主义里头，历史性 (historicity) 完全被空间化，成为极端差异性 (differences) 和特定性 (specificities) 的代名词。虽然后现代主义者宣称他们要透过取消大叙事 (甚至要取消理论本身) 里的同一性逻辑 (identity logic)，解放历史性于在地化的身体展演，但是在标举这样的历史性 (Jameson 称这样的历史性的谈法是一种“生命力的历史主义” (libidinal historicism)) 的同时，古典社会理论里头的历史分析 (如汪文所采的方式——拉长时间纵深来看中国的现代化历程) 就被空间化的“历史性”所取代了。不像后现代、后结构、后殖民里头的“历史性”是以作为结构的对立而被想像，汪文的历史分析是与社会结构的改变的分析结合在一起的；尝试理解我们当今的集体存在处境的历史基础何在？它又将引领到何种方向？作为社会主体，我们如何免于漂流 (drift)，掌握变迁？对这些问题，后现代是无法处理的，但摆出的却是问题早已取消的高姿态。后现代主义是一个矛盾的展现，一方面宣称它是一个有关新的时代的理论，但另一方面却根本地否认历史 (Wood 1997:8)。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当代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对后现代情境 (例如，历史空间化、历史终结) 的解释，就是拒绝将它这个情境自指化，进而将时空关系的改变重新置于历史资本主义的语境之下，而这在方法上的意义就是重新召唤历史唯物论分析与诠释的当代有效性 (Harvey 1989: 306-7; Jameson 1991:32-38)。

指出一个批判的现代性计划的重要，并非出自学院派的知识典范之争，而是来自于对新自由主义及其鼓动的全球化意识形态霸权的急迫危机感。从一种后现代或是后结构主义的知识与政治的平面上寻求对新自由主义的“历史终结说”进行反击是徒劳的，因为前者也是在诉说一种历史终结，不过是以不同的措辞来进行罢了。虽然后现代文化左翼召唤“边缘战斗”、“搅局”、“语言颠覆”，因而不能说他们的批判性危机在于和霸权共谋 (至少动机上应不是如此)，但是他们独特的历史终结说却在现实的知识/政治斗争中，成为了新自由主义的侧翼，而他们所发动的

攻击，也因为受限于他们对于历史辩证性的否定，而沦为一种极端的当下主义 (presentism) 与在地主义 (localism)。虽然这不可说不是对于历史左翼运动中的中央集权的反动 (Berman 1988:35)，因而有一定的激进民主意涵，但这个意涵却可能在极端零碎化与瞬间性中被消解于无形。作为一个“后 68 人士”，傅柯就在 70 年代提出了“特定” (specific) 知识分子，取代“普世” (universal) 知识分子，后者是以马克思主义者为参照者，在“‘普世性’、‘范例性’、与‘为所有人的正义与真理’的模式下操作”，而前者则是“操作于……特定的部门，就是在他们自身的生活条件或工作条件所设的特定位置上 (住屋、医院、精神病院、实验室、大学、家庭与性关系)” (Foucault 1980:126)。

在傅柯对知识生产或知识分子的性质提出这样一种在地主义与当下主义谈法的 20 年后，应有必要对这样的说法的历史效应提出反省。首先，这种论述的效果是生产出各类的有机知识分子，还是正当化了反对运动的学院化呢？今天，特别是美国，后现代主义 (以及更晚近的后殖民主义) 变成了一种争取学院零和资源的爬梯斗争的一部分 (阿里夫·德里克 1998)。这种学院斗争又在什么意义上，会 (如傅柯的乐观期望) “使他们 [知识分子] 对斗争产生更直接更具体的自觉… [因而] 在现实上把他们和无产阶级或群众之间的距离拉的更近” (Foucault 1980:126)？这个期望当然落空了，非但没有更近，反而越来越远。傅柯的“特定知识分子”这个准社会学范畴甚至被后殖民的无限流动的“主体位置”所取代，在此，历史性变成无限杂种性 (infinite hybridity) 的同义词，以一种更激越的立场反对历史-结构知识。因此，后殖民论述以历史性的名义反对结构和总体性，并非出自于对历史性 (作为创造历史) 的肯定，而是肯定了一种“自指性的和普遍化的历史主义” (阿里夫·德里克 1998: 461)。

那么这种历史主义有何困局呢？德里克认为这个困局是所有缺乏结构意识的历史主义的共同困局——“没有一个跨区域的关系网络，就无法确定什么是差异性、异质性和区域性” (Ibid,462)。作为史学家，德里克与汪晖不约而同地反对后学的历史性概念，共同呼吁对“世界新形势”

(即,“全球资本主义”)进行研究与分析。这个立场在方法上的意义也许就是重新带进并且重构以马克思和韦伯为主干的古典社会理论研究进路,重新以资本主义在全球的发展作为核心分析与批判对象。德里克批评后殖民主义因为拒绝承认资本主义的基础地位,因此在发展对“现代性”、“启蒙”、“欧洲中心主义”批判的同时,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给放掉了。他的理由是,如果经由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把“现代性”等同于殖民主义,那么就可以把整个斗争界定在认识论或文化上头,但是,如果把资本主义当做解释世界的基本范畴,那就无法不追问“欧洲中心主义”后头的“物质关系”。德里克认为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移花接木为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是有利于全球资本主义的,因为“欧洲中心主义”在今天并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他甚至明说后殖民主义“本身就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产物”(Ibid,464-465)。随着德里克与Harvey,我们是否也可以提问:把“知识分子”这个连傅柯都还有限度支持的范畴转化为无限流动的的主体位置是否也是后福特主义的弹性积累在知识生产作为商品生产上的表现呢?

汪文和德里克都是在进行一种批判的现代主义计划,现代时期并没有终结,因为资本主义并没有终结。当资本主义透过时空压缩、弹性生产在全球急速扩张的同时,我们必须警觉到一种新的、全球的权力结构的出现,而知识分子要是持续地耽溺在自指性的文化主义措辞并忽视这个可能性,就有可能在现实上是霸权的共谋。要让这种浮现中的整体性霸权存在于我们所监控中的视野,那么就必须在认识上“保持某种结构与总体性意识以对抗断裂性与局部性”,对德里克而言,这是完全必要的,“否则对于霸权的质疑就有可能退化为维护霸权的同谋”(Ibid,465)。

那么这个所谓的“结构与总体性意识”是否又重新召唤回来黑格尔/马克思式的“大叙事”,重复诉说一种承载客观精神的、救赎性的、集体单一主体的、目的论的老故事呢?有可能。但是滑到另一极端,对无限杂种性以及无限小叙事进行崇拜,也可能会达到消解主体性并挫败任何目的性行动的后果。所以这不应是两个极端之间选择其一的问题。为了担

心“大叙事”暴君的出现，而放弃对结构性与总体性的探知，那就如同把婴儿连洗澡水一起泼掉一般。自称是“后现代女性主义者”的 Nancy Fraser 与 Linda Nicholson，就直接批评 Lyotard 那种不由分说就把已经失去信度的哲学性大叙事与“大型的历史性叙事” (large historical narratives) /“社会层次的宏观结构” (societal macrostructures) 的分析描述混同在一块儿的做法，因为这样做的效果就恰恰是放弃了对于宏观支配结构的分析，并进而让不同空间位置的女性在进行有效政治行动之时受到重大挫折 (Fraser and Nicholson 1988: 390—391)。Fraser 与 Nicholson 提出的重要质疑是：如果在地的各种运动群体之间没有发展出一套有关共同情境的分析，那如何谈结盟，如何集体行动呢？

以“全球化”、“弹性生产”、“解除规约”为口号的新自由主义正在史无前例地对所有有碍实现利润最大化的障碍进行清除工作，而几乎所有其他价值 (包括环境、社会正义、非立即利润导向下的文化生产) 都在这个单一目标下被直接或间接摧毁 (Bourdieu 1998:126—127)。面对这个来自新自由主义的挑战，后学不但无法面对 (因为它的“超越”政治经济学?)，反而可以说在侧翼支持这样的一种新自由主义战略。被台湾学术圈公认为“后现代思想家”的 Bourdieu，就直斥某些所谓的后现代知识分子要比那些奢谈理性、沟通的迂阔理论家还更脱离批判知识分子的角色，因为他们透过他们的知识不是消极的不作为，而是积极地与新自由主义霸权合作。后学在这个合作上所作的投资是为“意识形态终结的意识形态提出极端花哨的最新版本，再加上对各种大叙事的谴责，以及一种带着虚无主义味道的对科学的扬弃” (Ibid.,127)。

思索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就必然意味对宏观结构的整体性知识的需求。因此，在世纪之交的今天，一个能够重新肯定一种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关连性的现代性计划就显得无比迫切。而这也意味马克思主义也必须与时俱进，必须要跳脱一些传统的限制，这些限制有历史原因造成的，例如“一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但现在必须被超越并上升到全球范围的观点。另外有些限制则是和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理论逻辑有关，例

如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即是一例。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工具能够有效地提供我们语言用来分析全球范围的垄断与剥削形式的根本改变，但吊诡的是，由于对物质生产的过分重视与解放视野的失落，却又使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以大工厂的意象想象世界，从而和“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接轨，这只要回想苏联的官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就可思过半了。我想是在这个意义上，汪文把由一批年轻知识分子在90年代推出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仍归在他所批判的“作为现代化的意识形态的启蒙主义及其当代形态”之中，虽然（或尽管）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汪文讨论的不下十种思潮中可能是最有批判潜力的一种，因为它直接挑战了90年代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中的权力、财富的重新分配过程。分析马克思主义者批判透过瓜分国有资产所造成的社会不平等，重新揭橥社会主义对抗资本主义民主，视前者为经济与政治民主的同义词（18）。

汪文并没有质疑分析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不平等趋势所做的分析，但质疑它的整体观不够彻底，指责它仍然在“底层/上层建筑”的方法/暗喻下操作，没有赋予文化资本与生产足够的重视。在这个意义上，汪文认为一个包含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整体观必须要被提出来，因为这三种资本在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操作是相互纠结穿透的。在透过对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中，汪文提出了它的批判的现代性计划中有关方法的最重要的原则，那就是一种整体论的方法；他呼吁“要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寻找文化分析与政治经济学的结合点”（18）。虽然汪文并没有更进一步地发展有关这个结合的讨论，但以汪文一贯的批判理论立场以及对自指性文本主义的质疑，有理由相信这个结合是有方向性的，也就是说，汪文要把文化分析的有效性结合到政治经济学中（而非反之），以求建立一种“具有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12）。在能够保存理论和经验间的辩证关系，与保存表面和内里之间存在落差的深度模型的前提下，把政治经济学、历史与文化在探知行动中被整合起来——虽然汪文理解到这个工程仍艰困地停留在初步阶段。^[7] 其实，持续地追求一种作为方法与政治的

整体观的历史轨迹本来就是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的历史轨迹 (Jay 1984)。摆在一个世界史的视野中，汪文的批判现代性计划既是面对中国大陆的特殊状态的努力，也是一个更广泛的传统的延续。

三、关于这个计划的一些问题

在这节的讨论里，我想就这个计划的一些可能的问题（例如，笼统性批判、变迁问题、批判的规范性基础与社会性基础等等）提出我的想法。

之前约略提到，这个计划在对价值的批判上有太过笼统之嫌。这首先表现在汪文对自身的价值立场并没有外显地进行批判，因此难以了解作者对于特定价值的立场为何。例如，我先前提到，在措辞的层次上，汪文显然表示了“参与民主”和“经济平等”是优于新启蒙主义的“形式民主”和“经济自由”，但并没有深究参与民主和形式民主之间的关系为何？经济平等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为何？又，如果汪晖的确是以参与民主和经济平等作为他批判活动的规范性基础或愿景，那么是否意味汪晖的价值体系和新启蒙主义还较有亲近性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一个重要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就需要被回答：汪晖如何看待自由主义传统？同样地，当汪晖指出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现代化意识形态，但因为也反对现代性中的理性化与科层化，因而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现代性理论”，后者且是晚清以来“中国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10）。那么汪晖如何评价这个“悖论”？我们可能从这个悖论中抽绎出“参与民主”和“经济平等”的文化资源，进而对整个现代化历程进行批判吗？

这些问题的提出意谓汪文不能简单地以它们都是“现代化的意识形态”的笼统批判来处理这些不同的思潮；它们的批判性需要被分疏地评价，要不然，把“儒教资本主义”和“分析马克思主义”和“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论”笼统处理，反而会削弱了批判的力道。这个笼统处理的做法其实是建筑在汪文为现代性经营的一个大叙事的基础上头。汪文说：

作为现代化的意识形态的“新启蒙主义”和作为现代化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 [具有] 共同价值目标和历史理解方式：对进步的信念，对现代化的承诺，民族主义的历史使命，以及自由平等的大同远景，特别是将自身的奋斗和存在的意义与未来远景过渡的这一当代时刻相联系的现代性态度… (13) (我的强调)

的确，不论是宗教、或是启蒙、或是社会主义，都许诺一种存在于未来的理想状态，而“现在”则是主体不停地朝向这一目标的前进过程。在今天，这样的目的论叙事已经失去信度了，可能只见于宗教或是政治辞令。但是对目的论的质疑也必须具有一种分疏的敏感，避免笼统扬弃，因为后一种做法会使社会理论的整个的认识和伦理基础崩塌——举凡工具性行动、目的合理性、计划、规约、反抗运动、意识形态批判……不都是和某种汪文所谓的“现代性态度”有密切关连的吗？汪文能够一方面和现代性里头的这种时间观采取一种绝然断裂的态度，而在另一方面又能维系社会理论的存在基础吗？汪晖在一篇有关“汪文”的答问中，援引 Foucault 和 Lyotard 的极端的视角主义 (perspectivism) (例如傅柯的权力与论述说)，来否定现代性中的这种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关系，^[8] 我认为这是危险的引用，因为 Foucault/Lyotard 等人的极端视角主义及其并生的当下主义与空间主义根本抹消了一种可以正当化的历史性，没有后者，我们如何批判 (指出知识的意识形态性质)，如何正当化我们的规范与价值 (例如经济平等和参与民主)，如何诊断和指出危机 (例如“全球化”)？如何保卫任何一种另类愿景？

我认为汪文并没有完全成功地厘清现代性和现代化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别 (征候地反映在两者偶而地交叉使用)。这使得汪文对现代化意识形态的整体批判偶而被移转到现代性身上，从而使汪文无法在理论层次上一贯地、充分地展现“现代性是一个存在着内部冲突的结构”。^[9] 我完全同意这一点，而且正好认为在有关历史的态度这一点上，现代性是有内部冲突的。例如，传统马克思主义或是结构功能论在不约而同地展

现出一种现代化目的论这一点上是很“现代的”，但是一种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例如 W.Benjamin;E.P.Thompson）^[10] 或是激进实用主义（例如杜威）对历史的看法也不能说不是现代性的展现。杜威就是以“视野中的目的”（end-in-view）质疑“宗教目的论”。“视野中的目的”否定宗教目的论里头的命定式的历史发展归趋，但并不因此放弃对于历史的运动趋势（tendency）的掌握，而对趋势的掌握也就是对于运动可能趋向的方向有一个“事先的意识”（fore-consciousness）。这个事先的意识在宗教目的论中表现的是命定的、客观的、外在的规律，但在“视野中的目的”中，目的却在行动过程中时刻重塑（Dewey 1988:279-280）；这样的一种对历史的看法允许行动者在行动中形塑目的，并对行动提出工具和目的批判，因此在知识和方法上能够调和极端启蒙主义里的科学与艺术、理性与身体的对立，这既能避免大叙事的集权主义危机，又能避免“怎样都行”（anything goes）的虚无主义漂流（drift）。如果一方面承认现实中是有一种正向前行的运动（例如“超越国界的巨大的资本主义市场”（21）正在扩张中），但另一方面却以把婴儿（可正当化的目的性行动）连同洗澡水（哲学大叙事）一起丢掉，那就等于把现代性中所有可资反抗的资源全丢弃了。

在传统革命左派目的论的挽歌，在新自由主义历史终结的凯歌，在后学政治正确的喧闹嘈杂声中，任何欲将左翼传统创新的尝试，都可能面临一种深刻的信念危机：希望在那里？动能在那里？在当代，这样的提问往往带来的是自我摧毁性的效果，进入到一种类似 Adorno 与 Horkheimer 在“启蒙的辩证”中所展现的那种有知识精英趣味的孤绝情绪中——“在大饭店的高处俯瞰深渊”。汪文有可能是有意识地抵抗这种绝望感，因此以一种高度自律的方式把所论及的中国当代危机限制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范围内。这是一种外科手术式的对一个悲观病情的局部处理，因为毕竟思想状况可能并不是一般状况，可能有些进步力量是在“知识界”的掌握之外。汪文把写作限制在“思想状况”当然有可能仅是任何有效写作所给自身设定的范围，但这个范围的设定在论述效果上的确在形式上也保留了一个愿景的空间。

然而，这个谨慎地限制论述有效范围的做法的进步效用，却在汪文的实质写作中被抵消，特别是在汪晖处理“市民社会论”和“公共领域”的谈论上。汪文在批判经济自由主义者的自由市场论，指出国家就在市场内部，并无所谓自由市场的同时，也指出并不存在所谓的“市民社会”，因为中国大陆的资本主义发展并没有产生出一群高度自主性的市民阶层，反而产生一群二合一的经济与政治精英（19）。汪文认为市民社会论的盲点就在于它在规范性上赋予“社会”进步的光环，但却无视于当今中国真正有批判性的公共空间（而非哈柏玛斯意义下的公共领域），往往在国家内部（虽然汪晖也指出这个空间并不自主）。因此，汪文的批评要点在于：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论召唤出一个不现实的理想主义，而代价则是放弃了对国家进行介入和斗争的机会。

在此，我不拟质疑这个说法的事实性，但我要对这个说法的可能效应表示担忧。汪文的批判工作在针对分析马克思主义、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论时，是否走过了头，以现实分析和总体认识为名，驱赶掉了规范性概念，因而造成了规范性失血。如果一个批判的社会理论封闭了对“社会的”（the social）和“公共的”（the public）的可能性的讨论，那么这个批判的社会理论的实践空间在哪里？中国大陆的“社会性”到底何在，非我所能置喙，但我期望社会理论的创新能包含一种规范力量和一种希望资源，作为一个运动往前行的建构力量，而非以一种历史主义的方式指出中国社会的特殊性。^{〔1〕}汪文的普遍主义在最需要它的地方，表现出一种特殊主义的姿态。这让我联想起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以及 K. Wittfogel 的东方专制论，这些理论都从一种批判的社会理论观点出发，却抵达了“符合中国历史”的国家理论——这是否是历史一再地制约了理论的可能呢？！在汪文的申论中，能对这个国家进行干预的作用力，似乎也只有全球资本主义下的国际资本（以及“知识界”？）了。汪文的批判工作因而无法对在地的、社会的、公众的、怀抱“视野中的目的”的各种社会运动，提出理论层次的展望。除非汪文宣判当代中国历史的唯一作用者是“知识分子”，要不然，它无法回避这一个有关“社会变迁”的

问题。^[12] 这是汪文批判工作的一个重要困局。如果一个历史文明如中国没有发展出和政治国家抗衡的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经济—社会领域，那么对于知识分子在这个政治国家逻辑（虽然未必单一）主导的未分化领域中的有限批判性角色的期待，可能还是一种可以理解的现实策略。我能同情地理解这个策略，所要指出的仅仅有两点：一、这个现实策略的代价可能是没能保存一个对进步社会作用力的历史可能性的视野；二、如果中国大陆上没有任何相对自主的批判空间（“市民社会”或“公共领域”），那么汪文念兹在兹的批判传统在哪里能找到立足点呢？汪文曾对批判性的存在与否下一个重要的判准：与权威的距离，那么，如果批判的知识分子的批判性只是依附于国家（有“结构性的裂痕”），因为它只不过是“国家意志内部的冲突”，如汪文对新启蒙主义者所做的揭露一般（12）。但同样一个质疑也会回弹到汪文本身的批判性立足点。汪文对知识分子的批判性提出真诚的期望，但是却也许在一个无意识的层次上把批判性的社会学基础给抽掉了。

四、批判的现代性与民主：汪晖与 Mills

这些评论都不否定汪文是一个中国理论者对当代中国思想状况的一个真诚的反思，这个真诚，我认为，特别表现在它只以知识分子的立场对知识界说话。惟其因为这里没有夹杂着对于知识分子角色的掩藏或是过度浪漫的期望，所以更能直接讨论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当代责任与逃避。虽然如前所述，这个立场仍有些重要问题尚未解决，但的确仍是有重大正面价值的，因为它要求知识分子对他们自身的社会角色进行清醒的反思。

尽管汪文批判启蒙意识形态的口吻是那么的严厉，但汪文对启蒙知识分子作为一种类型的感情却是复杂的，虽不同意他们的知识内容，但却同情他们的“知识运作方式”。对汪文而言，1989年是一个分水岭，之后的知识分子已经“明显地转向了职业化的知识运作方式”，蜕变为“专

家、学者和职业工作者” (8)。如果说“启蒙知识分子”的批判性是很有问题性的，那么专门化的学者根本就没有批判性可言。这的确是一种“蜕变”，因为在过去，知识分子赋予他们自身一种理解社会整体的任务，以及在这个对于整体情势之下，他们该当提出什么样的危机诊断与方向分析，并且结合于浮现中的进步社会力量，而现在的“知识分子”则自动或被动地放弃了这个自我期许。

汪文所谓的“蜕变”，对很多自由主义者而言 (特别是二战后的美国的现代化派的自由主义者) 则是一个进步，因为专业化的知识生产是社会分化的必然结果，且有助于知识积累与社会进步。专业化知识生产在原则上必须排斥任何对于“有关社会整体的知识”的探索欲望以及自许。但这对汪晖 (或是 50 年代美国社会学的一大异数 C.Wright Mills) 而言，皆是不可接受的，因为一种以研究和批判社会整体为抱负的知识分子，于今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还更迫切需要。四十多年前，Mills 称自由派此种反对任何对整体性有承诺的心态为“自由派的务实性” (liberal practicality)；他敏锐地看出其实自由派并非要追求科学的客观性，那只是措辞，真正的目的是在防堵“热情的承诺”。没有后者，知识生产就是在官僚体制下知识工厂的异化劳动，生产现实所需要的知识成品，从而所谓务实性则不外乎是护卫现实状态 (识时务) 而已。这种“知识分子” (摆在社会科学界的特定脉络下) 就是 Mills 所指的“埋身于特定情境的社会科学家” (socialscientists of milieu) (Mills 1959: 86)，和 Foucault 所称道的“特定的知识分子” (specific intellectual)，虽然有很多差异，但在一重要点上是一致的，这一点即是对极权政治的恐惧感。A.Gouldner 对于马克思传统 (不管东方还是西方的) 中的知识分子的批判就在于指出热情恰足以带来新的极权，带来的不平等机制，产生新的阶级 (Gouldner 1979)。虽然很难遽然把 Gouldner 归诸于自由派，但的确这样的一种批判经常被自由派援用为对新左 (不管是西方的还是中国大陆的) 的批判。这个批判的不当在于不当地把整体性 (totality) 这个概念和极权主义 (totalitarianism) 混同。在此，我想拉进来 Mills 在这一方面的讨论，作为我讨论汪文的结

束。

四十多年前，Mills 提出“社会学想象”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就是要把整体性和民主关连起来。在自由派务实性与后现代破碎性的两种威胁下，发展这样的一种关连性的论述在今天尤其重要。“社会学想象”，一言以蔽之，就是要为一个现今已变成陈腔滥调的“全球思考，在地行动”找到理论上的支撑，重新赋予它理论上的生命力。社会学想象的核心关怀就是把特定个人或群体所感受到的特殊的、在地的“困扰” (troubles)，转变成公共的议题 (issues)。一个遥远的不为在地日常生活所意识到的结构变迁也许正在影响到 (不管好或坏) 我们的集体生存处境和我们每个人的“个人的”生命历程，因此，民主的、在地的、日常的、社区的行动必须要有和某种有关结构的知识相结合。这个非目的论的结构知识不是对行动者的单方向指导，而是行动者自我培力 (empowerment) 的重要构成，这是因为我们对有关结构或整体的知识的需求不是出于一种旁观者的知识需求，也非出于目的论的催促，而是来自日常生活中的感受——我因为要解决这个或那个问题/困扰，或我要追求这个或那个价值，或我要改变这个或那个现状，因此我要积极地、有方法地探索造成在地或个人问题的各种超越在地或个人的问题源头，在这个探知/实践活动中，人们把他/她的个人传记和时代历史，把他/她的在地特殊情境和结构整体关连起来——这，就是社会学想象。用当今的学科分类的语言来说，就是要结合文化研究、历史和政治经济学 (或夏铸九所说的“复杂型思考”)。“社会学想像”能力的平民化可能是任何民主乌托邦的必要条件。Mills 是否有这样的一种浪漫企图我不确定，但我确定他认为“社会学想象”至少是进步知识分子对于一个民主体制所应该做到的批判工作。至于从事这样的“独立的”探知与批判工作的知识分子，Mills 称之为“知识工匠” (intellectual craftsman) ——他宝爱他的知识劳动、追求独立自主的生产过程、为特定的、可辨识的人群生产。凡此，都和现代社会中的“机器知识分子”处在对立状态。

Mills 提出的是一个已经丢弃了哲学大叙事的现代性计划，在这里，

我们看到一种在普世性知识分子和特定性知识分子两种典型之间，在高烧现代主义 (high modernism) 和后现代主义之间，找出一个出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 Mills 提出了一个真正激进的“第三条路”。

虽然存在着很多不同，但汪文和 Mills 都是反现代化的现代主义者，在他们的现代性计划中，整体性、批判性和历史都被赋予重要的理论位置。他们两位也都和古典的社会理论家有非常高的亲近性，甚至可以说，他们两位都还基本上是在马克思、韦伯与博蓝尼 (特别是前两者) 等古典社会理论家所描绘与界定的思想和语言平面上操作，虽然他们都明白表示不再接受整体“最终而言” (in the last instance) 由经济决定，这一某些马克思主义者的最后底线；他们也都反对韦伯的政治精英主义；他们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这两个意识形态关系至深——虽然批判这两个现代化意识形态，但他们的愤怒或不满往往却是来自典型的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的规范性基点 (例如对各种垄断与宰制的愤怒，对于虚伪意识的不屑)；最后，他们都企图因应新的情势 (汪晖所谓的“全球资本主义”，Mills 所谓的“后现代”)，对社会理论进行重建，而这个重建绝不是一个巨大的智力游戏，而是希望能介入地创造历史。Mills 甚至直接地呼吁社会理论与研究能够成为“公共智能器官” (public intelligence apparatus) (Mills 1959:181)，促成整个社会的公共智能的解放。汪文虽然没有外显地为他的批判厘清规范性基础，但对于各种知识/意识形态描绘认知地形图的工作也的确也只能指向一个目标：呼唤批判的知识分子的出现。最后，引述汪文的最后一句话：

作为一个历史段落的现代时期仍在延续。这就是社会批判思想得以继续生存和发展的动力，也是中国知识界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历史机遇。(22)

参考书目

汪晖，1997，《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杂志》，第5期。

——，1999，《现代性问题答问》

柯志明，1993，《台湾都市小型制造业的创业、经营与生产组织：以五分埔成衣制造业为案例的分析》，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

夏铸九，1999，《资讯时代的新空间形式与过程：流动空间与地方空间的辩证对立》，发表于《间别千年：临界空间与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东海大学社会学系主办。

陈光兴，1996，《去殖民的文化研究》，《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1：73—139。

——，1999，《文化研究在台湾到底意味着什么》，第2至15页，《'99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研讨会论文集》。

赵彦宁，1999，《同志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观点》，第21—40页，《'99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研讨会论文集》。

赵刚，1998，《告别妒恨——民主危机与出路的探索》，台北：台湾社会研究丛刊—06。

戴锦华，1999，《犹在镜中——戴锦华访问录》，北京：知识出版社。

Benjamin,Walter.1968.Illuminations.New York: Schocken Books.

Berman,Marshall.1988.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New York:Penguin Books.

Bourdieu,pierre.1998. " A Reasoned Utopia and Economic Fatalism." New Left Review 227:125-130.

Dewey,John.1988.Experience and Nature.Vol.I of John Dewey:The Later Works,1925 -1953.17 vols.Edited by Jo Ann Boydston.Carbonda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Dirlik,Arif. (阿里夫·德里克) 1984.The Postcolonial Aura:Third World Criticism in the Age of Global Capitalism." Critical Inquiry 20 (winter) . (本文引用陈燕谷译：《后殖民气息：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批评》，

收于汪晖与陈燕谷编，1998，《文化与公共性》北京：三联书店。

Foucault, Michel. 1980.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Writings and Other Interviews 1972-1977*.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Fraser, Nancy and Linda Nicholson. 1988. "Social Criticism without Philosophy: An Encounter between Feminism and Postmodernism."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5:373-94.

Couldner, Alvin. 1979. *The Future of Intellectual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Class*. New York: Continuum.

Harvey, David. 1989.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Cambridge: Basil Blackwell.

Jameson, Fredric. 1991.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Jay, Martin. 1984. *Marxism and Totality: The Adventures of A Concept from Lukacs to Haberma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Mills, C. Wright. 1959.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hompson, E. P. 1966.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New York: Vintage Press.

Wood, Ellen Meiksins and John Bellamy Foster (eds.) .1997. *In Defense of History: Marxism and the Postmodern Agend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注 释

[1] 这篇评论不预设对汪晖的重要著作有一概括性掌握，也不尝试对汪晖这篇论文的生产语境以及对话对象作历史性的理解，而诚然这些功夫对于任何一个深入的评论皆属必要的。所以，这篇评论论文，与其说是评论汪文，还不如说是“借汪文说话”，希望借由和汪文的理论性（也许太理论性了）的对话，反省一些自己的想法，也拉出一些在地反思，

这些反思大多记录在本文的注脚里。再强调一次，这篇评论无意宣称是对汪晖整体思想的再现/批评。

[2] 台湾的“后殖民论述”（例如表现在《中外文学》1995年左右的一些“辩论”）是否也是站在上升中的中产阶级国族霸权的一边呢？汪晖批判中国大陆的后殖民论述从没有站在边缘立场对汉族中心论提出分析（17），这个评断是否也可以同样施用于台湾呢？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陈光兴（1996）所呼唤的“去殖民的文化研究”在一个重要的意义上即是重新提出某种阶级观点（“历史唯物论”）在方法上与政治上的必要性，这在台湾的保守的“后殖民论述”中是一异数。至于台湾当代的显学之一——受后结构重大影响的同学运动与研究，最近也遭遇严厉的批判。赵彦宁（1999）指出台湾同运的发展与动员其实是以“可敬的”、“洁净的”中产阶级的道德想象为基础，不但没有着力于反省自身的阶级/阶层立场（因而从来没有认真发展“性公民权”和“性正义”的思考——她指出唯一例外是宁应斌），更是高度地和媒体与流行商品文化搅和在一起。赵彦宁指出主流的同学运动变成媒体宠儿正是因为它“不足以挑战既存社会的政经权力结构”（Ibid.,p.231）。与陈光兴对于台湾“后殖民”的批判类似，赵彦宁也提出一个历史的、政治经济学的进路，期望同学研究能摆脱去历史的、去阶级的自指性文化研究典范，进一步把台湾的同学现象摆在“第三世界同志文化工业发展”的脉络下思考（Ibid., p.218）。

[3] 后学以及以后学为方法论的“文化研究”在后设层次上呼应了新自由派的“历史终结”的问题，已经为台湾的文化左翼所认识到。陈光兴在一篇体检在台湾的文化研究的现状的文章中，就指出“文化研究最为人诟病的就是历史深度的浅薄，没有历史性的解释，一切诉诸抽象的理论概念，最后是站不住脚的……我们期待台湾的文化研究与历史学的领域有更为深刻的互动……”（陈光兴 1999：7）。虽然或许因为文章的性质，陈光兴并没有交代他所谓的“历史性的解释”是什么意思？是古典社会理论传统里的历史解释吗？文化研究愿意在多大程度上对“因果解释”

持开放态度?文化研究愿意在空间性或是历史性的紧张关系上采取开放立场吗?又,见于古典历史分析与科学探知的内在亲密关系,文化研究是否愿意重思它对“科学”的全盘质疑?也许一个根本的问题是:一个激进的文化研究传统和马克思主义传统该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些问题,我认为有待更细致的处理。

[4] 台湾主流的“国家主义女性主义”者在处理娼妓问题上,变得比谁都更“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动辄使用“商品化”、“异化”等词汇,抬高道德姿态,但从没有看到有任何关于台湾资本主义发展、冷战结构和性产业之间的关连的历史与政治经济分析,事实上她们在使用这些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词汇的同时,往往截断了所有和这些词汇有关的阶级分析语言,而她们论述的服务对象也是台湾的中产阶级霸权。因此,像汪晖对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诊断一样,台湾的主流女性主义也代表了一种批判性的丧失。

[5] 和中国大陆的“新启蒙知识分子”有“选择性亲近”的台湾“自由派”知识分子不也是批判性丧失的一个具体实例吗?除了早期的雷震、殷海光等人是在自由主义的信念下对抗专制国家外,之后的“自由派”,不论是“大学杂志”、“中国论坛”或是“澄社”,不都是在为一种企图自由化、本土化的发展政权提供意识形态基础吗?他们有任何对于台湾“现代化”的道路(与代价)提出原则性的反省和批判吗?如果说站在国家机器内部的一个裂片(例如,政党)反对另外一个裂片,就算是站在反对运动的话,那也太以一种天真的“政党轮替”论来遮掩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内在分裂特质了。因此,这些自由派是以一种现代国家是铁板一块的“前社会学”宣传,来包装自己的道德姿态。澄社社长瞿海源(中研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在2000年三月天中,由于明显的新政权效应,指责国民党中央党部前的丢石抗议者,并自我标榜“搞了十年的反对运动,从来没有丢过一块石头”。我不怀疑这个陈述的事实性,但更相信他们连一块象征的石头也从没丢过哩。

[6] 必须说明的是,汪文并没有外显地提出任何“计划”:就它的写

作目的和范围而言，也不需要提出一个正面的计划，我这里所谓的“批判的现代性计划”仅是就我对汪文的理解，所片面推演出来的一个理论-逻辑建构。由于我一直希望能有机会把这样的一个我曾提出但不曾深入探讨的“批判的现代性”（赵刚 1998：167，196）作一个自我的厘清，也相信台湾本地的“知识界”也需要这样的一种反省，因此就很兴奋地抓住汪文借题发挥，并为它戴上了这顶也不一定合适的帽子。

[7] 在面对“全球-资讯化资本主义”的崭新时代挑战，夏铸九（1999：6—9）表达了他对既存知识分裂状态的忧心与批判。他认为当下的形势要求建立一种“复杂性思考”，能够兼容并蓄“主体论的政治经济学”、非思想游戏的文化研究与能进行解秘的历史学。这个诉求的提出对当前台湾日趋割裂琐碎的知识分工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值得深思。但他对各知识范型的性质的厘清（例如，什么是主体论的政治经济学？）、统合这三种知识范型所遭遇的方向性问题，以及这三种知识（分子）的立场调和的问题，显然缺少必要的问题化，因而有过度早熟搓合（reconciliation）的嫌疑，可能因而抹杀了作者原先所期望的各知识传统间的对话契机。虽然站在空间专业者或运动者的立场，对各种理论资源采“拿来主义”的立场是充分正当的，但以当下运动需要为由的正当化措辞，并不能成为让运动知识分子免于对知识/权力间各种复杂且充满伦理张力的立场问题进行更细致思辨的藉口。举个例子，我们允不允许我们的知识实践只是被认定在“说故事”而已？我们的知识实践是对支配的“反抗”呢？还是“仅仅游戏”？在写这篇评论时，我恰巧在阅读一本中国大陆知名的女性主义者戴锦华的访谈录。戴锦华很清楚的（如她文章的标题“清醒的立场”）指出她的后结构主义知识与政治立场：“在福柯 [台湾译作傅科] 的意义上，加入了反抗，便加入了统治的游戏……对我个人说来，我从福柯的启示中，学会了拒绝游戏。拒绝加入统治——压迫/反抗的游戏，而这类行为本身便可能成为消解统治游戏的姿态。当然，这也同时意味着你作为一个有机知识分子的意义受到损害。这又是一个困境，一个两难。在这两难之中，我仍选择拒绝 [加入统治的] 游戏”（戴锦华 1999：



13)。我想，戴锦华的“困境”可能还包括她必须要说明她何以还认为她必须要坚守在一种“社会批判立场” (Ibid.p7)， “批判”何所指？“社会”何所指？“立场”又何所指？

[8] “现代性问题答问”， p.5。 (出版资料不全)

[9] Ibid.,p.13.

[10] Thompson 与 Benjamin 都努力于为一种“救赎性的历史书写”辩护，前者并且集毕生之力在实践这一种史学。他们都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对于启蒙/资本主义有深刻的批判，但他们并没有掉到反现代的传统主义或后现代的虚无主义中。在他们有关历史的书写中，可以强烈的感受到他们对于维系一种“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三维辩证关系的努力。进入未来，要凭藉“像老虎一般地”从当下跳到过去寻求力量。因此，Benjamin 所反对的并非启蒙本身，或甚至不是“进步” (progress) 这个概念所蕴含的某些价值，而是反对“进步”这个观念的基础意象：在一个同质的、空洞的时间之流中往前推进 (progression)。 (Benjamin 1968:261)

[11] 这不可误读为汪文是在支持一种中国独特性的说法。汪文对“乡镇企业现代化论者”的批判即在于他们夸大了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性，而这个夸大又来自于他们无法宏观地掌握乡镇企业与全球资本主义的关系。汪文并实质地批评这个现代化理论的变种事实上很肤浅，只是效率崇拜，并没有思考到经济民主、政治民主和生态问题 (16)。有趣的是，汪文对于中国大陆乡镇企业的批判竟然也非常切中此间对血汗工厂的褒扬论述，认定台湾充满“弹性生产”特色的小型加工业是具有台湾特色的制度创新。这类研究 (例如柯志明 1993) 同样地也无视于这种生产制度和全球资本主义之间的关连，也对于生产过程中的家父长制缺少批判，更缺乏对于生态的意识。

[12] 那么汪文是否表现的是一种知识分子主义呢？答案在是与否之间。一方面，汪文对知识分子的分析经常采用一种知识社会学的架构，尝试从社会大环境的改变理解知识分子的变化。是在这个脉络下，汪文



批判了 1994 年左右有关“人文精神失落”的提法，指出这种提法完全忽视了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已经在资本主义生产下被专业化分工并被重新整编 (16)，“逐渐地蜕变为专家、学者和职业工作者” (8)。此外，汪文也指出“思想状态的明朗化实际上来自社会问题的明确化” (8)。这些看法都和一种以知识分子为独立的社会阶层，提供整体知识和社会良心的传统精英主义看法相对立。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汪文对知识分子（虽然已蜕变为“专家、学者和职业工作者”）还是抱持着他们是社会变迁（包括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推动力量的希望（我不知道他还对什么其他社会阶层或群体抱持希望？） (22)。这至少可以说是一种预设值的知识分子主义 (intellectualism by default)。

全球化与后进国之经济发展

瞿宛文 [1]

1. 导言

汪晖 (1998) 的文章着重讨论思想层面，经济方面的讨论当然不是重点，不过认为“中国社会在经济领域迅速地进入全球化的生产和贸易过程”，是他论述中一个重要的对历史发展的认定，同时也显然是一问题与焦虑的来源。汪文不可能正面处理“进入全球化过程”的优劣问题，但这问题之重要性极为明显，故本文将针对此问题进行探讨。

全球化至今已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日常用语，不过它到底是什么意涵，它是否是一无可抵挡的趋势，后进国家在参与全球化之后，是否会失去自主性，而担任其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命定的边缘位置？

关于对全球化影响的看法，在全世界占主导地位的是以主流经济学为代表的新自由学派 (new-liberalism)，也就是这 30 年来在欧美领导风潮的新保守思潮。这派学者认为自由市场是解决经济问题、促进成长的最佳机制，依据比较利益理论，任何国家都可以在国际市场上找到适合其条件的分工位置，而分工必能提高效率，因此自由贸易能使所有参与者都获利，是最佳的体制。至于资本的流动，此派学者认为外人直接投资 (对产业实质的生产性投资)，必然会带来先进的技术，对当地影响必是有利的。不过金融资本的自由流动，资本帐的全面开放是否如自由贸易一般，带来双赢的结果，则即使在新自由派中也是有争议的。 [2]



新自由派对于全球化趋势产生的原由，则多半采“中性”的解释，如运输以及通讯技术的变革，使得流通成本大为降低，因而使各国之间的贸易与投资流动更为容易等，或是由于 GATT/WTO 的贸易谈判^[3]，以及近年来美国主导的自由化的政策。既然自由贸易是最佳策略，美国政府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等组织，近二十多年来，持续施压要求众多后进国家开放市场进行自由化的作为，在新自由派眼中，当然是正义之举。

这个居主导地位的新自由派的看法，至今在国际上仍居领导地位，所受到的挑战基本上是来自广义被称为修正学派 (the revisionist school) 的阵营，而后者的批评比较是修正式的，而非全盘否定。近年来的争议主要包括关于东亚经济发展中国家以及产业政策的角色，关于前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进行经济改革的策略问题，关于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强迫落后国家采行自由市场策略的问题，关于全球金融自由化带来金融危机与国际金融不稳定的问题等 (这些理论争议将在文后 3.1 节中再讨论)。

不过修正学派并不全然反对全球化，也不会主张落后国家不参与国际市场与世贸组织，主要是挑战自由市场理论，并对制度与政策提出不同的论述。

主张后进国不参与国际市场的，主要是在早期曾风行一时的依赖理论，不过此理论影响早已式微，即使在第三世界反帝国主义的阵营中也影响力大不如前。倒是先进国美国中一向主张保护主义的工会力量，以及其反全球化的盟友，有时会引用此理论来合理化其保护主义的立场，声称其保护主义不会伤害到第三世界的劳工^[4]。

很多后进国已相当程度踏上全球化的路径，其中较成功发展的东亚等国，是全球化过程的得利者，而其他后进国虽未必得利多少，但在当前情势下，也只能希望在参与国际市场时得到较好的条件。只有如中国大陆这样开放较晚腹地广大的经济体，才有条件与余裕考虑是否加入世贸组织，并衡量加入的利弊。

本文所要作的是对全球化的现象以及其体制的变革作一简单的检视，主要将讨论近年来修正学派学者，关于全球化对后进国之影响所提出的

看法。

2. 全球化的趋势

2.1 全球体制的变革

国际市场整合程度的持续上升，并不是一个全新的现象，在 1913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 50 年，就会见到如此的现象。不过两次大战之间的数十年，是相反的潮流当道之时，保护主义与管制盛行，当然还有强权之间争夺领域的战争。直到第二次大战结束，在美国重新稳固霸权之后，欧美先进国才又开启这战后的整合过程。

二次大战后世界经济秩序的蓝图，主要是依据凯恩斯学派的设计，1944 年在美国 Bretton Woods 开会定下方案。相对于二次大战前的失败经验，新体制着重稳定的秩序与管制，先进国家以财政与货币政策强力调节国内经济，对外维持固定汇率与资本管制，同时决议成立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作为维持这体系秩序的制度安排。不过也相对应于战前保护主义下不成功的成长经验，先进国于 1947 年成立 GATT，决议互相开放市场，逐步协议降低关税。

不过 GATT 刚成立时只有 23 个会员，这战后秩序与制度的建立当然是由欧美先进国所决定，开放市场所指涉的也是先进国之间的关系。二次战后众多殖民地先后在政治上独立，不过在那时，或许是后进国实力还是太微不足道，美国并没有像现在这样忙着逼迫后进国开放市场，同时对后进国的输出也比较开放，因此对后进国而言，在 1980 年代以前这段时间，它们不单可以保护自己的国内市场，同时先进国市场开放的程度也比较高。

一般认为“市场开放程度随着 GATT 贸易谈判的成功与日遽增”的说法，其实只是从欧美的观点来看才是属实。譬如说，早期的贸易谈判主要是先进国之间互相在利益交换原则之下，谈判调降关税的幅度与范围，

但先进国本身保护程度原本就不高，如1973年到1979年的东京回合贸易谈判^[5]，先进国的关税从平均7%降到4.7%。相较之下后进国关税原本就高，后其在压力下调降关税的幅度就很大。

最重要的变化，当然是在于欧美政策与思潮的全面保守化。在1970年代之后，原先战后秩序的继续，在国际与欧美国内都遇到很大的阻碍，凯恩斯经济政治与社会民主福利模式的发展遇到瓶颈，失业、生产力停滞、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等难题并陈，已难再用原有政策工具解决。在此情况下新自由派全面抬头，在政治上以英国首相柴契尔以及美国总统雷根的上台为代表，思潮上则是提倡自由市场的新古典经济理论成为主导性意识形态。

到了1980年代新自由派经济政策成为风尚，在柴契尔与雷根领导推动下，私有化（在美国是去管制化 deregulation）、自由化与全球化成了具高度正当性的目标。同时在先进国之间，固定汇率体系已经在1970年代初期解体，其后各先进国采取浮动汇率，并逐渐各自放宽资本管制，开启了日后金融市场走向整合的发展。另一方面，后进国在1980年代初期陷于国际债务危机之中，在美国推动下，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全面转向推动新自由派的政策，它们的新做法是在有困难的后进国中，提出紧缩方案（austerity program），要求对方自由化开放市场、私有化、减少财政赤字并减少社会补贴等，实行这样的改革是得到援助的先决条件。至今这样的新自由派方案，已被称为华盛顿共识（The Washington consensus）^[6]。

同时，美国从1970年代初期开始，生产力成长开始停滞，年成长率从原先的平均2.6%降到1%左右，经济问题层出不穷，到了1980年代美国经济霸主的地位居然开始受到日本的挑战，惊愕之余，甚至有人开始怀疑美国是否要步大英帝国之后尘而开始走上衰败之路。更重要的是从1980年代开始，美国贸易赤字日渐庞大，在短短几年中从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变为最大的债务国。

美国一些较老旧的工业，如纺织、汽车与钢铁，受到进口品很大的

威胁，也开始向政府要求协助^[7]。美国政府也开始用各种方法来提供协助，如要求日本等国“对出口自动设限”，或自行对进口品征收反倾销税等。不过最重要的是开始积极推动自由化，积极逼迫日本以及东亚新兴工业国调升汇率并开放市场。1985年先进国间达成 Plaza Accord，美国先迫使日元升值，下一年就来逼东亚南韩与台湾的汇率升值，同时美国国会通过所谓的超级 301 法案，开始每年以此为武器以贸易制裁为要挟，要求个别国家开放特定的市场，让美国资本进入^[8]。

在此同时，1986年到1993年进行了 GATT 第八回合的谈判，欧美先进国在新自由派思潮的主导下，推动了更进一步的自由化，并且第一次涉及工农业产品之外的服务业以及智慧财产权的规范。最重要的决议是决定成立一常设机构——世界贸易组织，并设立协调仲裁贸易纠纷的机制，世贸组织于 1995 年成立，现已经有 134 个会员。

虽然在表面上平均关税至今已经大幅降低，非贸易障碍也逐步减少，不过这个架构离真正无障碍的自由贸易，还有非常大的距离。譬如说国家对研究发展进行补贴还是被允许的，因为美国不可能放弃对自己国防工业的补贴，欧洲国家则坚持保留对国内发展较落后的地区给予补贴的权力，而欧美当然还是规则设定的主导者。同时各国还是可以用反倾销来抵拒进口品，而反倾销手段用的最多的也就是美国与欧体^[9]。

2.2 全球化趋势之变化

以上是对现在全球贸易体制变革的简要描述，不过在这体制下，全球化的整合到底达到了何种程度？全球化的趋势确实存在吗？

一般谈全球化会从贸易、资本流动以及人力移动等三方面来看。在贸易方面，通常是用出口或贸易总值与 GDP 的比例为指标，来衡量各经济体参与世界市场的程度。就世界总体而言，总出口占 GDP 的比例，确实从 1950 年的 7% 上升到今日的 19% 左右，贸易量成长了 16 倍，生产总值则只扩大了五倍半。在战后贸易比例虽清楚升高，不过对一些西欧国家而言，它们在 1913 年之前也曾达到如此比例^[10]。同时若观察历史上

不同时期贸易比例的变化率，则可发现最大的变化是发生在 19 世纪，二次大战后贸易比例的成长率并不特别高^[11]。

因此二次大战后贸易比例虽确实上升，但增加速度并未加快，至今也只是刚超过 19 世纪的高峰值。同时，国家经济之间的界线仍非常明显，即使就邻国而言，产品市场在国境内的整合程度仍远远超过跨国界的关系，各个国家的产品价格也并未显现趋于一致的趋势。虽说形式如此，不过国际贸易的产业内容有相当变化，后进国整合进这体系的性质也有显著的不同，因此整合之影响也与从前不同。譬如说，后进国出口中工业产品的比例已从 1983 年的 42% 升至 1997 年的 66%^[12]，同时后进国在近十多年来贸易依存度（贸易总量与 GNP 之比例）大幅提高，从 1987 年的 35% 升至 1997 年的 48%^[13]。

资本流动可分为直接外人投资与金融资本流动两种，外人直接投资（flow）现约占全球总投资量的 6% 左右，而外人直接投资的资本存量（stock）与全球生产总值的比例现则约为 10%，而这比例在 1913 年是 9%。其实在 19 世纪帝国主义殖民时代，英法荷等国对外投资的数目，有时会高至等于其国内投资数量，规模远远超过今日^[14]。虽然流向后进国的外人直接投资的数目在近年来比重稍有增加，不过以 1997 年的存量而言，七成仍是先进国之间的互相投资，剩下的三成才是流向后进国^[15]。

外人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的角色密切相关，虽然外人直接投资仍是以先进国为主，不过其在后进国的影响非常深远，跨国公司因拥有先进技术，而能长期占有国际主要产业的领导地位，这地位至今仍非后进国所能挑战。跨国公司的外国子公司所生产的产值，其占全球总产值的比例，由 1982 年的 5.3% 已升至 1997 年的 6.9%，而它们的出口在 1995 年占世界总出口的 32%^[16]。

在过去这十多年来，主要在美国的压力下，世界各国确实大幅降低了对资本移动的限制，因此全球金融资本的流量大增，汇率以及金融商品的跨国交易量年平均成长率近三成，在美国债券与股票跨国交易量对 GDP 的比例，在 1980 年只有 9%，到了 1995 年达到了 135.5%^[17]。



金融资本流动的大幅增加，是导致近年来国际金融危机频传的主因之一^[18]，无论是1994年的墨西哥危机或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虽说各国国内金融问题也是危机发生之必要条件，但流动性高的短期国际金融资本之进出，是引发危机并使其恶化的主因，虽说支持金融开放的新自由派学者认为只要金融市场健全，则开放不是问题，但后进国的特征之一就是市场制度尚未建立完善，它们本身问题已经够多，实不需要额外的风险负担^[19]。

不过到处流窜的金融资本，虽增加了整个国际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不过整体的国际金融体系尚称不上是一整合的市场，国界内的关系紧密度仍远超过跨国界的关系，国内的投资资金来源仍主要出自国内的储蓄，即使先进国之间的利率也没有清楚的趋于一致的趋势^[20]。

至于人力的移动则是清楚的没有整合的趋势。在17—18世纪大量非洲人被卖到美洲当奴隶，19世纪中则有数千万名亚洲苦力被卖至各地，另一方面西欧约有六千万人选择移民到新殖民地，在那帝国主义时代移民管制并不普遍。二次大战之后，移民管制成了常规，不过在战后初期，先进国因劳工缺乏而进口后进国之外劳，但在1970年代成长趋缓之后，又开始严格管制直至今日。至今若有任何劳动力全球化之现象，那就只限于一些特殊的专业人才，或是跨国公司的经理技术人员，或是后进国的脑力外流到先进国。后进国虽曾在贸易会谈中要求先进国放宽人力流动的限制，但这可能性显然不大。

2.3 全球化趋势会逆转吗？

由上讨论可见贸易、资本、人力方面的全球化趋势之显著程度各异，不过在未来，这全球化的趋势会继续发展吗？这问题的答案至今并未有共识。诚然乐观者认为趋势难挡，不过这个全球化过程的主导者是欧美先进国，尤其是美国，而美国国内的政治的发展已经产生变化，日后美国政府是否会如以往一样全力推动全球化，则未必是没有疑问的。

譬如说，去年底西雅图的世贸组织会议，以及今春在华府的世银与

国际货币基金会议，都引来了大批的示威者，规模之大近年仅见引起世人注目。示威者的诉求虽然相当歧异，但主要反应了美国人一般对全球化影响之焦虑，而这对美国大选政治必会产生影响^[21]。

若真有转变，则在历史上也有先例。在 1913 年之后到二次大战之前，先进国各自扭转 19 世纪全球化的趋势，而转向保护主义。有学者认为这可能是因为之前全球化造成国内不平等所带来的反弹^[22]。而现在先进国国内，类似的问题是否正在累积，矛盾是否正在激化，以致未来可能会产生对全球化的反弹，以致美国会改变推动全球化的政治立场？

近 30 年来美国国内的所得分配持续恶化，有技能与无技能者的劳动报酬差距日益扩大，即术语所谓的技能溢价 (skill premium) 提高了，不过这是否是源于与后进国的贸易，意即后进国的进口是否造成美国低技能工人的工资下降^[23]？欧美工会以及一些亲工会的左派学者，确实是持如此看法，并因而主张保护主义，或是要求世贸规章中加入劳动与环保标准。由实证上检测国际因素对美国薪资差异之影响的研究不少，至今结论则多是“有影响但不大”^[24]不过这当然还是有争议的议题。

有学者认为全球化的影响不只是表现在技能溢价提高与否的问题上，全球化使得有技术有资产能够从全球化中得利的人，与无法从中得利的人，两者之间的鸿沟随全球化日渐扩大，但同时在新自由派政策的影响下，可以协助后者调适的社会福利制度，在近二三十年来已经大为减弱，使得问题更形严重。即使对全球化的反弹最后不发生，阶级严重的对立必也会带来社会问题，社会中全球化的胜利者也将要为此付出代价^[25]。

总之，先进国尤其是美国国内的情势，会影响到美国政府在国际推动全球化的决心，这些发展对全球化之趋势是否持续会有决定性的影响。

3. 全球化对后进国经济发展之影响

3.1 经济发展思潮变迁

由上述讨论可以看出，这个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制度演变，主要是由欧美先进国主导，不过这是否意味着后进国在这体系中无法有自主性，只能据有命定的边缘性受剥削的位置？这是否意味着不加入这体系对于后进国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在二次战后初期，主流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后进国的经济发展前景，一般皆持乐观的看法，其中最甚者如现代化学派就认为，若假以时日后进国必能跟随先进国的步子而发展，不过结构学派则强调后进国的结构弱点，因此需要鼓励或扶植私人投资，并采取进口替代政策等。到了1970年代前后，因为多数后进国经济发展并不成功，作为对原先现代化理论之批判，依赖理论 (dependency theory) 因应而生。依赖学派主要依据拉丁美洲国家的失败经验，而认为后进国与先进国的关系正是问题之所在，后进国与先进国的经贸关系越密切，则受到伤害越大越无法成长发展，无论是贸易与投资的关系，都是先进国得利而后进国反而受损。

在此同时，主流经济学中新自由派大势崛起，他们却是从另一角度批评结构学派，此派学者认为东亚四小龙能够成功发展，而拉丁美洲反而失败，主要是因东亚采取出口导向与对外开放的策略，而拉丁美洲则相反，因此其实是证明了自由市场理论的优势。

修正学派则对东亚经验有截然不同的解释，此派学者认为东亚发展之所以能成功，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是发展取向国家 (developmental state)，在发展过程中国家以强力干预方式来扶植新兴工业，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政策并用，国际市场不单提供实践经济规模的可能，更提供了国家规范资本检验成果的工具^[26]。

东亚四小龙的发展经验给依赖理论很大难题，因为这些经济体出口

依赖度很高，但这样的“依赖”关系显然并没有阻碍其成长，甚至反而有助于其发展。更重要的是在理论上，“依赖”难以清楚定义，贸易与投资为何在不同情况下有不同的结果，为何必然成为中心剥削边缘的机制，则也是在理论上很有争议的问题。同时即使马克思学派本身看法也相当分歧，Warren (1980) 在他这本以“帝国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先锋”为名的书中，就批评依赖理论是后进国民族主义的迷思 (nationalist mythology)。这 20 年来在学界其实依赖理论已不太得到重视。

东亚经验其实再次证实，后进国必须要学习先进国的技术与经验，自给自足自力更生对小国是不可行的选择，Gerschenkron (1962) 就曾对“落后”提出了很辩证的看法，亦即落后必然是包袱，但也可以是动力，越落后就越有进步的可能，可以学习的先进技术就越多，也越可以跃进 (leapfrog) 的方式，来直接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进行工业化，这在 21 世纪在先进与落后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之时，显得有点太过乐观^[27]，但也表示追赶的急迫性，不过无论如何，闭关自守不是合理的做法。

新自由派政策已经主导世界经济发展近 20 多年了，近来的争议多与此主导性理论与政策之批判有关，即众多学者针对这些年来在全世界范围内所进行的经济革新 (economic reform) 提出批判。譬如对于东欧等国经济转型的问题，修正学派就批评新自由派所提出并被采用的休克治疗 (shock therapy)，认为其因迷信于自由市场理论，而无视于市场机制必须依赖各种非市场制度的支持才能运行，以至于这些经济体在采用这样政策后，至今都尚未恢复到革新前的水准^[28]。譬如这几年来的国际性金融危机，引发了众多对金融开放的质疑，以及对国际货币基金的批评^[29]；同时这 20 多年来，世银与货币基金在第三世界所推动的经济革新，尤其是其紧缩方案，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成长的影响，也引起不少的批评与争议^[30]。

由此脉络来看，现今依赖理论其实已经失去影响力，只是此次在美国工会保护主义者，反对全球化影响之时又再次出现，作为支持他们反对后进国出口导向发展的理论依据。

现今当然全球化成了众人所瞩目的议题，世贸谈判的进展，先进国尤其是美国提出在贸易规范中加入劳动与环保标准之要求，极具争议。如本文第一节所述，对于全球化，新自由派是采取积极肯定态度，在下节将呈现修正学派对此所提出的不同的看法。

3.2 修正学派的看法

“后进国发展的途径为何？后进国能从全球化中得到吗？”这些问题古来有之，其所牵涉的理论议题也绝非新的问题，只是现在环境当然有所不同。

在先进国本身的发展来看，分工所带来的生产力的进步是无可置疑的，如亚当史密在其名著《国富论》开宗明义所言，同时他认为分工的程度会依市场的大小而定，市场范围越大，分工可以越精细，生产力进步越大。马克思虽将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不断变革的动力来源，定位在资本对利润的追求以及市场的竞争，不过他对分工与生产力之间的看法，与亚当史密并无基本差异^[31]。

不过对于后进国而言，参与国际分工是否能够提升自身的生产力，并不是一个有清楚答案的问题。新自由派认为答案是清楚肯定的，依赖理论认为是否定的，修正学派则是有条件的肯定与否定。

新自由派认为依据比较利益理论，在自由贸易情况之下，任何后进国都能在国际分工的光谱中找到适合自己的生产与贸易产品，但是问题是后进国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差，所能找到“适合的”生产活动都会是低附加值类的，更重要的是比较利益理论并不说明，后进国如何可以在自由贸易情况下，在比较利益的阶梯上晋级。譬如说非洲国家的比较利益可能只是输出矿产或初级农产品，但要如何踏上工业化之路则似乎无迹可循。

修正学派则指出至今为止，任何一个成功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国家，或许除了工业革命先驱英国之外，都曾会经过国家干预、保护幼稚工业、以国内市场为基础的工业化发展阶段，美日德皆是如此，今日的东亚后



进国也如此，绝非在自由贸易情况下“自然”发展升级的^[32]。

其实在战后，全球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成果整体来说并不好，东亚是唯一能够缩小其与先进国之间差距的地区^[33]。根据 World Bank (2000: 14) 在过去 30 年来，排在中间三分之一的国家，其人均所得从原来先进国水准的 12.5% 降为 11.4%，而最穷的三分之一国家，这比例从 3.1% 降为 1.9%。有研究甚至指出，从 1870 年到 1990 年间，最贫穷与最富有的国家人均所得的差异增加了六倍^[34]。先进国大致维持稳定的成长，并且其相互间所得水准有趋于平均化之趋势，但是绝大多数的后进国却与先进国差距越来越大。

重要的是在二次战后，落后国家之间经济成长的纪录差异相当大，而发展最成功的东亚，也正是由发展取向国家强力干预经济发展的地方。在其他地方，拉丁美洲发展趋势有相当的起伏，从原先 20 世纪初相当接近先进国的水准，至今则已经被东亚等国超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则是悲惨的大陆，人均所得从战后至今几乎是零成长。东亚四小龙则能持续维持成长，战后人均所得年成长率平均超过 5%^[35]，其他亚洲的所谓的第二梯次新兴国，则在本次金融危机之前，有相当高的成长率，不过成长趋势为时较短且较不稳定^[36]。

东亚确实是采取了出口导向政策，并且藉由出口数量的急速成长，而对生产技术进行了快速的学习，不过更重要的是，发展取向国家同时也利用进口替代政策来扶植中上游的重化工业以及高科技工业，亦即国家主导产业的发展策略，主动的促进经济体在国际分工阶层中位置的提升，推动比较利益的升级。同时如 Amsden (1989) 所言，国家对资本的补贴是全世界普遍存在的，东亚的特殊之处在于其国家设法以国际竞争力的表现来规范资本。

同时如修正学派学者 Amsden (forthcoming) 所指出，东亚在过去的发展策略下，主要在担任生产及学习的单位是本地的企业，而非外国跨国企业，也正是这些本地企业学习了先进技术，因此未来才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相反的，早期实行进口替代而非出口导向的拉丁美洲国家，至

今主要产业已经皆是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局面，因此国家未来更无法掌握本土资本主义发展的主动权。亦即这方面与依赖理论所预期的相反，贸易的依存度与本地资本的成长，其实未必相冲突，重要的是谁能掌握成长与学习的契机，学习与成长的主体必须是在地的。

当然这经验的意涵必须谨慎解释，东亚只是后进国中的少数，并且多是小国，原本就不可能依赖国内市场为基础来发展，这经验对中国大陆、印度、印尼及巴西等大型国家的意涵为何，则须再做讨论。同时，东亚虽成功的发展资本主义，或藉由资本主义发展了生产力，但至今仍只是成功的跟随者，离追赶上先进国有相当大、且看来不易再缩短的距离。

不过这并不表示这些经验对其他后进国没有意义，相反，对东亚经验做出适当的解释，应能对其他后进国有相当助益。东亚经验主要教训是，东亚之所以能成功发展，是因为其国家成功扮演了主导产业发展策略的角色，并运用出口与国际竞争力作为规范受扶植产业的奖惩标准，它们同时采取保护国内市场与出口导向的政策，由两方面来培植本地资本。

同时，东亚发展取向国家能够成功的执行这些发展政策，是因为其社会中财富分配在启始阶段就相当平均，在发展过程中成长的果实也能相对的普遍共享。Campos and Root (1995) 认为东亚成长成功之关键在于“making shared growth credible”；产业政策必然意味着国家要选择性的给予补贴与奖惩，作者们认为东亚国家用实际的作为，让人民相信可以分享到未来成长的果实，因此能够顺利推行增进全体成长的产业政策。除此之外如 Amsden 与 Wade 等修正学派学者，也都强调所得分配平均对此经济发展模式的助益。关于发展取向国家的构成条件，以及其与政治民主的关系，有相当多的文献，因本文着重于全球化经济面向，无法在此对这些文献多作讨论^[37]。

而东亚能够采取这种策略，当然部分是因为在 1980 年代之前，东亚发展出口替代时，欧美尤其是东亚的主要市场—美国是比较开放的，那时美国尚不觉得受到后进国的威胁，因此东亚既能保护国内市场，又可

以进入美国市场。但现在欧美已经不再如此开放，美国在觉得受到日本以及其他东亚小国威胁之后，随时举着 301 的大棒，胁迫各后进国开放市场^[38]。

因此比起从前，如今其他后进国所面对的国际市场的处境，是不同于当年东亚所面对的，相对而言困难更增加了。自由贸易下被迫过早开放国内市场，当然会不利于后进国工业化的企图，不易进入先进国市场，则不利于后进国藉由出口导向来进行生产学习与工业化。如果世贸组织真的在欧美国家的推动下，通过了加入劳动与环保标准，则显然会对后进国的工业化更是一大打击。

不过世界贸易组织已经成形，成员数目不断增加，弱小国家也没有不加入的余地^[39]。东亚各国比较有余裕，也大致做了加入的准备^[40]，一方面了解如何应付美国的要求以及世贸的各种规范 (how to get around the rules)，同时也希望可用世贸的架构，来抵挡美国的 301 之类的单方面独断的威胁。同理，其他更缺乏实力的后进国，只能希望世贸能替他们打开先进国的市场，同时摆脱美国专断的统治。世贸虽是先进国打开市场的制度设计，但弱小的后进国还是发现它优于美国的独裁，或许甚至如中印等大国也是有此考量。

全球化或国际市场的竞争，使得后进国之间的差异扩大了，并且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如东亚这样各种条件比较好的后进国，就有能力以民族国家为主体，以产业政策来主导经济成长，利用参与国际市场的机会，来学习并追赶先进国。而像非洲有些国家，则尚没有这些条件，无法承受国际市场的压力，长期以来经济难以进步，甚至饥荒内战等天灾人祸不断。

在更激烈的竞争环境下，国家角色在全球化下并未消失，只是环境不同，做法必须改变，而且对于国家角色的挑战与要求，可说是更高了。因此后进国若要改善生存条件，至今为止，除了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发展经济外，在现实上并无其他选择。

欧美先进国藉由资本主义发展了高度的生产力，但其过去二百多年

的发展过程，绝不是个美丽的历史。东亚近年来浅盘式的经济发展，也呈现了其相当丑陋的一面，发展过程中对劳工的压制与剥削，社会的不公，环境的破坏等，都是有目共睹的。

不过近日来有些先进国的进步人士，藉由经济发展对环境的破坏来反对发展主义，提倡反发展主义 (anti-developmentalism)，这实在是个错置的说法。在后进国发展之时，要求他们参考先进国当初在环保上失败或错误的经验，以更先进的环保知识来进行开发，这应是非常合理而有帮助的说法。“不计一切为成长”的做法当然不符合后进国人民的长期利益，但若认为不发展是环保的最佳方式，而要求后进国为了环保不发展，则是无视于后进国人民受困于失业与贫穷的困境，无视于后进国人民改善生活的要求，实在是欧美中心的看法。现有各种国际公约或谈判，来处理如生态保育及全球气候变迁等问题，在运作上尚称顺利，因此美国为何主张要在世贸条款中加入环保标准，当然令人怀疑其保护主义的意图^[41]。

4. 结语

由上述对现今全球化趋势变化的检视，我们发现在贸易、投资等各个方面，全球整合的程度在战后确实在增长，增加的速度却有相当差异。不过民族国家的国界仍非常显著，真正整合性的全球统一性市场尚未出现，即使近年跨国流动量增加最快的金融资本方面，也尚未整合到有全球性市场的程度。

同时，这全球化趋势也不是一个新的现象，第一次大战前的整合趋势，被战争以及两次大战之间的保护主义阶段所打断，二次大战之后这趋势又在欧美先进国领导下，在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中再次开始滚动。

全球化趋势的动力确实来自资本扩张的需求，企业在市场竞争压力下，必须不断扩张争取更多的市场，在此需求下各种降低运输与沟通成本的新技术也不断被发展出来，使得国际市场能更进一步发展，市场上



的竞争也日益激烈。不过这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制度与规则，仍是由民族国家间经由谈判与角力来决定，国家在国界内的各种政策也具关键性作用，有很多因素会影响甚或打断这所谓全球化的趋势。

在贸易方面，战后世界贸易量不但持续的增长，并且成长速度一直超过 GNP 的成长率，因此贸易依存度普遍增加。后进国的贸易依存度，在近十多年来更是大幅增长并超过先进国的比例，而后进国的出口中工业产品的比例也持续增长。

不过贸易依存度与经济成长之间的关系如何，则各国的情况相当分歧复杂。后进国在战后经济发展的成果整体而言并不好，人均所得平均年成长率，非洲为零、拉丁美洲低于 2%，东欧在开放之后不断倒退，至今尚未回复到原先水准，只有东亚接近 6%，是唯一成长率超过先进国的地区，也就是唯一缩短了与先进国距离的地方，亦即除了东亚之外，富者益富贫者益贫，而同时东亚却是贸易依存度特别高的地区。

战后初期欧美在国际市场秩序稳定之后，开始经由谈判互相开放市场的过程，并为此建立 GATT。不过此时他们的市场对后进国比较开放，并且也不多要求后进国开放市场，因此给予东亚等国采取出口导向发展策略的空间。

在资本流动方面，外人直接投资的数目其实一直有相当波动，并且至今也是大多数流向先进国，即使近年来流向后进国的数目有增加，其分配形态也是分布很不均匀的。而东亚在发展过程中，对外来投资的依赖极为有限。

金融资本的流动在近十多年来，显现了最清楚快速的成长，远超过贸易与直接投资的成长速度。在 1970 年代初，原先 Bretton Woods 体系解体之后，金融资本的跨国大幅流动在先进国间就已经开始。不过对后进国而言，是在 1980 年代后，美国协同世银与货币基金，持续胁迫后进国开放资本管制之后，后进国才开始受到这现象的波及，而后进国金融制度必然不够健全，因此也导致近年来国际金融危机不断的发生。

到了 1970 年代，欧美国家中推崇自由市场的新自由派兴起，到处推

行自由化、私有化的政策。同时，美国生产力成长停滞，贸易赤字大幅增长，一些传统产业感受到日本以及东亚后进国进口品的威胁而要求保护。美国政府的对策是运用其超强的霸权地位，在国内采取更多保护主义措施，在国外以贸易制裁为威胁，要求贸易对手国进行自由化，开放产品及金融市场。美国同时协同世银与货币基金，要求各后进国推行自由化等所谓华盛顿共识政策，并在与此同期间举行的第八回合贸易谈判中，推动更进一步的自由化，包括保护欧美的智慧财产权规范。而于1995年成立的世贸组织，也是这个乌拉圭回合的决议。

后进国虽并不信服贸易规则的公平性，不过世贸组织大势已定，后进国也陆续加入，希望能用世贸规范来抵抗美国的需索，而后进国的贸易依存度在近年也在持续增长。

吊诡的是在此同时，从全球化得利最多的美国，其国内近年来反对全球化的势力日增，美国政府为了争取工会选票，也支持推动在贸易条款中加入劳动与环保标准。曾有研究指出，两次大战间为何会出现保护主义，是因为全球化利益在国内分配不均引起反弹所致。在新自由派影响下，社会福利日益缩减，更无助于减缓社会紧张。日后美国政府在政治上对自由化执著的程度，将会对未来世界全球化趋势是否持续，有决定性的影响。

相对于推崇自由市场的新自由派，修正学派学者则认为无论从理论上或从历史经验来看，纯粹的自由市场无法带来经济发展。他们基本上认为市场永远是不完美的，市场的运行需要有众多非市场制度来辅助支持，除了硬体的基本建设之外，必要的非市场机制包括财产权之规范、法律体系、社会福利、教育制度等等，这些制度的建立，都需要国家来扮演统筹推动与协调的角色。

同时，后进国要追赶先进国，必须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用产业政策等工具，来策划产业发展策略，以补贴与奖惩并用的方式培植幼稚工业，扶植本地企业，尽快学习先进技术，如此才有可能在竞争日益激烈、先进后进差距日益扩大的情况下，不单在国际市场上争得一席之地，并且

在国际分工的阶梯上逐步晋级，转换并提升本国的比较利益，如此才可能使经济持续发展、生产力得以进步。

现今先进国领先差距日益扩大，并且先进技术皆掌握在跨国大企业手中，在如此情况下，后进国若不参与国际市场，则很难能够很快的学习到先进技术、累积学习效果并培养生产能力。就学习先进技术、实现生产的经济规模等因素而言，后进国参与国际分工是合乎理性的做法。

问题只是在于后进国如何在参与国际分工的过程中，能够发展自己的生产力，并且持续的提升自身的比较利益。而要能够做到此目标，就一方面需要上述的发展取向国家的主导角色，另一方面也需要国际市场上的空间。在竞争日渐激烈的环境下，后进国要达到此目标的条件会越来越高，不过仍并非不可能。参与国际市场的程度与方式，会依国情而异，但是拒绝参与国际市场，在理论上缺乏根据，在实际情况上也难以实现。

东亚战后成长的方式，正是如此模式。东亚发展取向国家在高度的危机感促使下，积极主导产业发展策略，一方面藉由参与国际市场来发展生产力学习技术，另一方面则以产业政策推动产业升级与深化。二战后其他后进国家经济发展的相对不成功，使得东亚经济成长的经验显得例外，不过这成功的经验，无论如何显示了这种方式成长的可能性，也支持了上述的修正学派的理论。

战后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中，先进国与后进国经济成长的纪录显示，这个体系对于绝大多数的后进国而言，是个很严苛的考验。很多国家失败或近乎失败了，而先进国的实质援助与新自由派的理论处方，多无济于事，甚至有害。但在目前的国际情况下，后进国也只能自救，此即是本文的出发点。

参考文献

汪晖，1998，《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刊于《文艺争鸣》。

陈添枝, 1999, 《1980年代以来台湾的贸易自由化》, 发表于《1980年代以来台湾经济发展经验》学术研讨会, 中华经济研究院, 3月, 台北。

Adams, C., D. J. Mathieson, G. Schinasi and B. Chadha, 1998. *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s: Developments, Prospects, and Key Policy Issues*, Washington, D. 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msden, A. H., 1989. *Asia's Next Giant: South Korea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9. *The Left and Globalization, Dissent*, Spring, 7-9.

——, forthcoming. *The Rise of the Rest*,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aker, D., G. Epstein and R. Pollin (eds.), 1998, *Globalization and Progressive Economic Poli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hagwati, J., 1998. *The Capital Myth: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rade in Widgets and Dollars*, *Foreign Affairs*, 77 (3), May-June, 7-12.

Camops, J. E. and H. L. Root, 1995, *The Key to the Asian Miracle: Making Shared Growth Credible*,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Chang, H.-J., and P. Nolan (eds.), 1995.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mmunist Economies*. London: St. Martin's.

Cline, W. R., 1997. *Trade and Wage Inequality*. Washington, D. 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1984. *Exports of Manufactures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Evans, P., 1995.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Gerschenkron, A., 1962.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Krugman, P., 1995. *Technology, Trade and Factor Prices*. NBER Working Paper No. 5355. Cambridge, MA: NBER.

- Maddison,A.,1995.Monitoring the World Economy,1820-1992.OECD.
- Pritchett,L.,1997.Divergence,Big Time,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1 (3,Summer) :3-17.
- Radelet,S.and J.Sachs,1999.What Have We Learned So Far from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Paper presented at the ASSA meetings in New York.
- Robinson,M.,and G.White (eds.) ,1998.The Democratic Developmental State:Politics and Institutional Design,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odrik,D.,1998.Who Needs Capital-Account Convertibility?Essay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 207,International Finance Section,Department of Economics,Princeton University, (May) :55-65.
- ,1997.Has Globalization Gone Too Far?Washington,D.C.: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Shapiro,H.,and L. Taylor,1990.The State and Industrial Strategy,World Development,18 (6) ,861-78.
- Stiglitz,J.E.,1994.Whither Socialism?Cambridge,Mass:MIT Press.
- ,1996.Some Lessons from the East Asian Miracle,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August,11 (2) :151-77.
- ,1998.Must Financial Crises Be This Frequent and This Painful? McKay Lecture,Pittsburgh,Pennsylvania,September 23.
- ,1999.Two Principles for the Next Round;Or,How to Bring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form the Cold,Geneva,September 21.
- UNCTAD,1998,World Investment Report 1998:Trends and Determinants. NY and Geneva:United Nations.
- Wade,R.,1990.Governing the Market: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Princeton:Princeton UP.
- Warren,B.,1980.Imperialism:Pioneer of Capitalism.London:Verso.
- Williamson,Jeff,1996.Globalization and Inequality Then and Now:The Late 19th and Late 20th Centuries Compared.NBER Working Paper No.5491.Cam-

bridge,MA:NBER.

Williamson,John,1994.In Search of a Manual for Technopols,in J. Williamson (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licy Reform.Washington,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Wood,A.1995.How Trade Hurt Unskilled Workers.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9 (3,Summer) :57-80.

World Bank,1993.The East Asian Miracle.N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World Bank.

——,2000.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9/2000.N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World Bank.

Yoffie,D.B.,1983.Power and Protectionism:Strategies of the 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N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注 释

[1] 联络地址：台北市南港区 115 中央研究院社科所，e-mail: wwchu@gate.sinica.edu.tw。

[2] 赞成者认为让资本去自由追寻最好的报酬，是会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反对者就认为高度流动的短期金融资本，对于地主国只会带来金融波动与伤害，如果地主国缺乏资本，那应该是吸引外人进行长期生产投资，而非金融资本。提倡自由贸易最力的 J.Bhagwati，就激愤的认为自由贸易理论的优点，被提倡资本自由流动者不当的利用，他认为有一个精英集团盘据在华尔街—美国财政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藉由自由化的正当性，在全世界推动金融资本的自由流动，图利自己。参见 Bhagwati (1998) 以及 Rodrik (1998) .同时，如 World Bank (2000:37) 所示，外人直接投资流量的变动性比金融资本要低。

[3] GATT/WTO 缩写分别代表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与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4] 近来在美国反对全球化的力量兴起，譬如去年 (1999) 年底在西

雅图反世贸组织、以及今年春在华府反世银与货币基金年会的庞大示威，就清楚的显现了它在美国社会上的力量，一些美国左派学者也提出反对全球化的论述，参考 Baker, et al. (1998)。美国政府为了争取工会支持，在政策上支持在世界贸易协定中加入劳动与环保标准之要求：依据这提议对于没有达到这些标准的产品，就要给予贸易制裁使其不能进入美国境内。并且其所要求的劳动标准，除了禁止童工与组织工会权等一般性工作权之外，更进一步要求设置或提高最低工资，并限制工时。可预期的，落后国家的政府都反对这样的条款，参见 Amsden (1999)。

[5] 至今贸易谈判共举行了八个回合，早期参与者较少、谈判范围较窄、谈判时间也较短。东京是第七回合，共有 99 个国家参加，第八个乌拉圭回合是从 1986—93 年。

[6] Williamson (1994:26-28) 列出了这个共识的清单。

[7] Cline (1984) 就讨论在各产业中当进口的市场占有率超过某种限度后，国内要求保护的要求就会出现。

[8] Stiglitz (1999:10-11) 就批评美国政府利用减少双边贸易赤字的理由，来逼迫他国开放市场，这做法不单理由错误，并且会使得后进国怀疑美国的意图以及自由化的好处，更进而质疑整个贸易体系的公平性。一方面双边贸易赤字未必显示贸易障碍的存在，贸易赤字主要是显示一国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差额；再一方面，自由化应能让后进国从中得利，而不是当做一种惩罚。

[9] 一些新兴国显然学了先进国的榜样，开始大量利用这工具，以致在反倾销案数目上渐赶上先进国，参见 World Bank (2000:60)。

[10] 参见 Economist, Oct. 18, 1997, 及 World Bank (2000)。

[11] 参见 Baker et al. 1998, Table 2, p. 6。

[12] World Bank (2000:269) .

[13] World Bank (2000:5) .

[14] 参见 Economist, Oct. 18, 1997; Baker et al. 1998, Table 5, p. 9。

[15] 参见 UNCTAD (1998) ,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1998, Table 1.3, p.

5. 这比例分配历年来有相当变化，譬如说外人直接投资到先进国的比例在1985与1990年分别为72.3%与79.3%。

[16] 参见 UNCTAD, 1998, Table 1.5, p.6。

[17] 参见 Baker et al. 1998, Table 6B, P.10。

[18] 探讨东亚金融危机原因的文献极为丰富，可参见 Stiglitz (1998), Radelet and Sachs (1999), Adams et al. (1998), 以及 Nouriel Roubini's Asian and Global Crisis Homepage。

[19] 参见 Stiglitz (1998)。

[20] 欧体间协调货币政策的结果则尚待观察，不过那主要会是一政治决定的结果，而非市场趋势。

[21] 参见 Economist (April 15, 2000, p.29-30)。文中引用民意调查显示，61%美国人赞同全球化，但是更多人同时认为美国的贸易政策太忽视美国劳动者的利益，并赞同贸易条款加入劳动与环保标准。

[22] 参见 Williamson (1996)。

[23] 或许是因为工会以及其他制度的力量，西欧各国中低技能工人的薪资，没有发生像美国这样大幅下降的现象，不过有人认为高失业率是其代价。

[24] Cline (1997) 的测估结果是20%，亦即国际因素可以解释二成美国薪资差异的增加，而这在众多测估结果中是比较高的估计。Krugman (1995) 认为从后进国进口制造业产品的贸易量太小，约只占先进国GDP的2%，因此影响不大。

[25] 参见 Rodrik (1997)。

[26] 参见 Amsden (1989) 对南韩以及 Wade (1990) 对台湾的研究。

[27] Amsden (1989) 就认为到了20世纪后期，因技术差距太大并且技术多为跨国公司的私产，跃进已不可能，因此如东亚之后进国就只能先靠学习 (learning)，来缩小与先进国的差距。

[28] 参见 Chang and Nolan (1995)。

[29] 参见注 [18]。

[30] 参见 Stiglitz (1998)。

[31] 精细分工对劳工造成的疏离问题, 技术变革必会带有便于资本统治的偏向等问题, 无法在此多作讨论。

[32] 参见 Shapiro and Taylor (1990)。

[33] 即使如此, 至今台湾的人均所得也只达美国的四成。

[34] 依据 Pritchett (1997:Table2), 最富与最贫的国家的人均所得之比例, 在 1870 年为 8.7, 在 1990 年为 45.2, 而先进国之平均与所有其他国家平均人均所得之比, 则由 1870 年的 2.4 升为 1990 年的 4.5。

[35] 参见 World Bank (1993:2)。1965—1990 年拉丁美洲人均所得年成长率平均为 1.8%。

[36] 依据 Pritchett (1997:13-14), 在样本内 108 个后进国之中, 它们在 1960—1990 年之间, 有 10% 的国家其人均所得的成长率超过 4% (这些成功起飞的國家主要包括东亚等国), 另外有 37% 小于 1%, 26% 小于 0.5%, 15% 负成长, 差异相当大。

[37] 如 Evans (1995) 讨论发展取向国家, 如何能对社会同时保持密切合作关系, 而又维持其相对自主性; 如 Robinson and White (1998) 就针对以往发展取向国家必然不民主的说法, 而提出民主的发展取向国家 (democratic developmental state) 的论述。

[38] 不过 Yoffie (1983) 认为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 成功的从长期发展的策略观点, 来对付欧美政府所提出的短期应急的市场限制措施, 用短期的让步换取长期的利益, 成功的维持了贸易体系的稳定, 并增加了贸易所得。

[39] 根据 World Bank (2000:53), 1982 年尚有 23% 的世界出口是在 GATT/WTO 规范之外的, 到了 1997 年只剩 10%。

[40] 虽说如此, 连南韩这样实力较强的后进国, 也在全球化过程中、在加入 OECD 之后, 却因为金融自由化的配套措施没做好而摔了一大跤。

[41] 参见 Stiglitz (1999)。

全球化，在地化与学习型区域： 理论反省与重建

王振寰

1. 前言

全球化 (globalization) 一词，从 1980 年代以来就是国际政治经济中最为流行的关键词之一，它指涉以下的现象：过去以民族国家规范为范围的经济和贸易、投资等活动逐渐被世界性的跨国界的组织网络组合起来，而大幅度地避开了国家和国际的规范架构。资本利用国家之间的差异，以及通讯资讯科技的发达，选择最有利的地点，零散化其生产流程，有利地利用差异化的劳动成本、环境规范、税制优惠、政治因素等条件来扩大其影响力的利润。某些学者认为，现阶段跨国经济活动的大量出现，已经将全球各地社会整合起来，形成新的全球资本主义，或大前研一所说的“无国界世界” (Ohmae 1990)。国家机器在全球化的阶段，失去规范资本的作用力，而成为资本跨国自由流动和投资情势之下的禁裔。

但是全球化的论点，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同意。有些学者认为，虽然现今资本主义的跨国活动相对于战后是活跃许多，但是资本的跨国活动从资本主义一开始就是如此 (Wallerstein 1974)，而且从资本对外投资量和比例的角度，未必比 1913 年之前的资本主义来得大 (Hirst and Thompson 1996; Wade 1996)，因此他们认为将现阶段的资本主义视为新的全球资本主义阶段是夸大其词。到底对全球化的争议，这样的不同观点，症结



点在那里？

另一个争议的焦点是，是否在全球化的阶段，资本真的可以随意流动，而区域或地方本身的社会政治条件对资本不构成任何的限制？虽然1960年代之后，由于欧美传统成衣、制鞋、钢铁等产业逐渐外移，造成了产业空洞化或去工业化，使得旧有的工业区域衰退和社区瓦解 (Ross and Trachte 1990)，但是诸多的研究也显示，资本并不是随意流动，而与社会结构有密切关连。从第三意大利传统产业 (如皮革制品和成衣) 的在地升级 (Piore and Sable 1984)，到矽谷的高科技产业 (Saxienian 1994)，都指出了区域生产和全球化并非对立的现象，以及区域条件并未在全球资本流动快速的阶段失去重要性。这样的争议，症结点又在那里？

本文将以调节理论的观点指出，在第一个争议中，将全球化视为国际资本流动多寡作为指标的说法，忽略了资本主义在社会政治经济各层面的改变，资本主义已经从福特主义迈入后福特主义阶段，全球化现象只是资本主义转型的外显现象；而对第二个争议中，必须区分产品性质与资源因素 (assets or resources) 之间的关系。强调某些地方社会之所以不会在全球化中失去重要性的说法，反映了某些产品的资源因素需要社会制度的支持，特别是在激烈的竞争中，这些产品需要既有的社会关系和制度对创新性生产活动以及制度学习的支撑。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讨论后进国家或东亚国家在全球化阶段的发展，并不能只从世界分工或是技术依赖的角度，而必须从后进国家技术学习是从终端产品往前端技术开发的途径迈进。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资源因素镶嵌性低的产品开始外移，而技术镶嵌在社会制度和学习机制的产品，则仍在国内升级和生产。同时，本文也将指出，进一步的发展需要建立在社会镶嵌的学习制度上，而这些制度并不是转移生产技术就能够达成的。

2. 争议之一：全球化真的发生了吗？

全球化指涉的是世界经济从1970年代之后的几项重大的改变，例如

资本国际流动、跨国生产、并购和策略联盟的大量增加等。它特别指涉了国界的消失，以及跨国公司 (MNCs) 成为全球公司 (TNCs)，逐渐无母国而以全球为基地，可以随意的安置到或转移到最安全和获利最高的地区投资等 (Ruigrok and Tulder 1995; Hirst and Thompson 1996)。把全球化这个现象细分，可以有以下几个面向：金融的全球化，企业和投资的全球化，科技的全球化，以及管制体系的全球化等。

金融的全球化：这特别是指涉在现阶段的资本主义，由于金融和外汇管制的解除，加上电脑资讯科技技术的发达，使得金融部门的资金移转，透过电脑屏幕前的操作，就可以将数目庞大的资金从世界各地随意移转，获取巨大利益。这样的资金在全球的大量流动和移转，与先进国家大量将退休金，储蓄金，以及大量兴起的共同基金投入股市有关，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并购，股市狂热等现象。有人称此为“赌场资本主义” (Strange 1986)，也有人将那些没有拥有大量资本但却可以对全球经济具重大影响力的股市操作员，称之为“纸上企业家” (paper entrepreneur) (Castells 1996)。

有五个重要的因素对金融的全球化相当重要 (Simon and Koppel 1995: 14)：1. 全球银行网络的形成，首先由美国，其次是日本和欧洲的各大银行加入；2. 全球资讯网络的发展；3. 由人造卫星和电脑科技支持所形成的全球贸易体系的出现，使得市场的任何一笔交易都可以形成世界性的连线；4. 跨国间金融市场的同质化和一致化；5. 国际金融政策的对话和合作等。由于资金移转的快速和全球资本主义的转变，大前研一 (Ohmae 1990) 认为现今跨国经济流动的活跃，并购，策略联盟，合资等的大量扩张，使得国家机器的管制和作用愈来愈无效，甚至不再具有意义。

企业和投资的全球化：这指涉了生产和行销的全球化，生产不再集中一个地区，而行销亦是各地而异。这是由于资讯科技的发达，使得联系各地的网络得以形成，生产和行销易于协调而因地制宜。现今的产品大都是联合国的产物，是由很多国家各自生产部分，最后才组装而成，而非某一特定国家的产品。因此，企业的全球化其实意味者“全球网



络”，正如 Reich (1991:110) 说的，“替代旧有金字塔型大量生产的企业形态之高价值产业的新组织网络已在全球形成。因此我们所看到的不再是美国（或英国、法国、西德）的公司组织，甚至没有产品可以说是美国（或英国、法国、西德）的产品。”

这样的企业全球化隐含了大公司愈来愈成为分化和分权，而又不那么紧密连结的企业联合体，它们可以由于顾客和市场的特性，以厂内外包或对外联盟的方式，在国内或国外，用最佳的组合方式来生产和行销，而不再受限于国界或国籍。在此情况下，全球公司经常发现它与自己的网络公司在竞争相同的市场，成为竞合关系的伙伴。正如 Simon and Koppel (1995: 19) 说的，“在全球化的时代，问题已不再只是公司能够在那里生产低廉的产品，而是那里能够构成成本，品质，以及技术的最佳组合。”

科技的全球化：由于高度竞争，成本考虑已不再是最重要，竞争力最重要的基础在于如何创造高价值的产品。而科技在此扮演重要的角色。所谓的科技全球化，在现今有以下的特质 (Simon 1995:5-7)：1. 研究发展的跨国化，在不同国家同时进行研究和协调生产。由于新科技的研发需要大量的资金，而市场情况却又不确定，因此有愈来愈多的跨国合作形成，共同参与研究发展，以争取时效和界定市场规模。2. 与过去由单一的大型公司开发，在市场饱和成熟之后才开始外移的现象不同的是，现今的科技研发经常在开发初期就已经形成国际合作。3. 由于大量的国际合作，因此科技移转的机制大量出现，而且跨国的科技交流也比较开放和频繁。4. 但是这样的跨国合作并不表示全球各国都受惠，在全球化的同时科技市场愈来愈两极化，国际间有与无高科技国家的差距愈来愈大。

管制体系的全球化：全球化造成了民族国家在管制市场经济运作上的困难，高度的竞争已经不再是民族国家能够使力的范围，但是无限制的市场竞争，将造成市场失能，形成重大问题，因此需要跨国的组织来统理 (governance)。世界贸易组织 (WTO)，欧体 (EU)，或北美贸易协定 (NAFTA) 等的出现，就是以跨国合作的方式来管制新的全球化市场趋势

(Hirst and Thompson 1996)。这不只是政治单位之间的合作愈来愈需要，而且也意味着公司之间在产品规格上的合作界定，来规范竞争和减低危机。

以上这些有关全球化的讨论，当然有部分的事实，但也在很多的经验证据上遭受到质疑。首先，在金融的全球化上，虽然资金的流动在近年来大量增加，从1980年的320亿美金到1990年的2250亿美金，但是这个流动并不是全球普及的现象，大部分的资金流动仍然集中在美国，欧洲，和日本三大经济体。在整个1980年代，全球对外投资中有80%是集中在这三个地区，而且有愈集中的趋势。在1970年代中期，有1/3的对外投资是到发展中国家，到了1980年代初期则是25%，到了1980年代末期则剩下19%左右 (Ruigrok and Tulder 1995:150;Gold and Islam 1995;亦参见 Hirst and Thompson 1996;Castells 1996;Wade 1996)。这显示资本的流动主要考虑已经不再是以成本，而是以科技和接近市场为主要考虑。进一步以人口资料显示，三大经济体的人口约占世界的14%，却拥有75%的对外投资。而10个新兴工业化国家 (NICs) 约是世界人口的29%，也占了全球16.5%的对外投资，这两类加起来约占世界人口的43%，但却拥有91.5%的对外投资。换言之，剩下的全世界约70%的人口地区只占全部的8.5%而已。从此角度，全球化所指涉的比较实际的用法其实是三角化 (triadization)。

相同的，在企业的全球化上，大部分的公司仍有母国，而非全球公司。依联合国资料，在1990年代初期，全世界有37,000家跨国公司，控制170,000家附属的组织。其中24,000家(约70%)的母国是在14个已发展国家，90%的跨国公司总部设在先进国家。1992年，全部对外投资的总额大约是2兆美元，而操控这些对外投资的跨国公司的销售总额大约是5兆5千亿美元。这比1992年世界贸易总额的4兆美元还多。其中，只有5%的对外投资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而对外投资的资金也相当集中，最大的前100大跨国公司大约拥有三分之一的全球对外投资的总额。其中60%是在工业生产，37%在服务业，而3%是在初级

产业。依照 Hirst and Thompson (1996:96) 的统计，这些大公司不论在制造和销售上，仍是十足的以母国为基地，其估计大约 70%到 75%的跨国公司的附加价值是在其母国领土内生产的，而且其经济活动也大多在其国内。因此，跨国公司仍然是国家镶嵌的，而非全球化无根的公司。

在科技的全球化上，虽然跨国合作有增加的趋势 (Cooke 1997)，但是新的专利仍大多集中在三角经济体和跨国公司的母国。根据一项统计，在美国登记的专利，不到 10%是来自外国和本国跨国公司的国外分公司，其在 1970 和 80 年代的比例没有变化 (Hirst and Thompson 1996:98)。欧洲的跨国公司的专利则有比较大的比例是来自国外，但也大约是 30%左右 (Ruigrok and Tulder 1995:148n)。而日本的专利更是主要以本国公司为主的，很少是由外国或国外分公司所登记 (Cooke 1997:353)。整体而言，科技的研发，欧美之间的交流比较频繁，而日本则是自成一格。但大致而言，科技的研发仍集中在先进国家之内或之间，而未有全球性的流动和合作。

最后，在管制的全球化上，民族国家的消失或退位言过其实，因为不论是世界贸易组织或欧体，都是透过民族国家的努力才形成，特别是在国内经济发展上，国家机器的重要角色并没有减少。即使是推动去管制化的自由化政策，也需要国家机器设立管制规范，让资本自由流动以及对劳工和工会采取压制性的措施 (Jessop 1994)。另一方面，虽然随着冷战的结束，传统的政治形态改变，但是由于国内财富分配的需要和认同政治的兴起，民族国家的角色仍然重要，而这个角色并不是其他机构所能取代的 (Hobsbawn 1996:Mann 1997)。

从以上的说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并未产生全新的现象，而在资本流动和科技研发上，反而是愈来愈集中在先进地区，而不是普及到全球各地。以上对立的看法是从资本流动、生产组织、科技和管制体制的角度在争议，而并未触及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到底资本主义在表象上的变化，是否意味着更深层质上的改变，是否资本主义有根本的改变才造成表象上的变化？本文认为，对于这样的争议，应该从资本主义本身的

改变来讨论。以下我们以调节理论的说法来指出这样的转变。

调节理论有几个重要的概念，作为其分析的工具（见 Aglietta 1987; Boyer 1990; Lipietz 1987; Jessop 1990; Peck and Tickell 1994）。1. 工业或科技生产典范（an industrial paradigm），这个概念指涉劳动过程中的技术和分工，例如手工业生产，大量生产的泰勒主义。这个概念是在最微视的经济层次，指涉了劳动分工的程度。2. 积累体制（an accumulation regime），是在短视经济层次，针对市场的稳定来讨论，指涉维持稳定经济生产与消费平衡类型的模式（Lipietz 1987:14）。例如，在大量生产需要大量消费来配合，才能形成稳定的积累体制。但是调节理论更认为，一个稳定的积累体制需要外在于经济的政治社会机制来调节，这就是3. 调节模式（model of regulation）基本上是分析介于微视和巨视中间的社会制度层次，指涉融合规范，制度，组织形式，社会网络，行为类型等在一起的复合体，它们使得行为者遵守规则，形成体制再生产的模式，而维持一个积累体制的稳定（Lipietz 1987:14）^[1]。4. 发展模式（model of development），当工业典范，积累体制和调解模式相互调整互补而能够维持一段相当长时期的资本主义稳定发展，这样的发展称之为发展模式^[2]。因此，调节理论假定了一个发展模式之内不同层次之间的配合，当他们能够稳定契合时，一个发展模式就能够维持一段长时期的稳定。但是当内部或外部矛盾无法解决而形成危机时，新的调节和新的可能性就可能出现。

调节理论认为，二次大战之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是奠立在福特主义式的发展形态：在工业典范上是泰勒主义的大量生产方式，机器和大工业成为主要的生产单位；在积累体制上，大量消费配合具有高度生产力的大量生产，形成良性循环。而在调节模式上，由于政府的介入保护工会和维持福利国家制度，加上个人主义的社会规范，维持了积累体制的稳定。这些层面在福特主义时期是高度配合的：由于大公司和泰勒主义生产具有高度的生产力，使得公司利润维持，有能力付给工人相对较高的薪资，而薪资的成长，得以维系高度消费能力；同时经济和薪资的成长能够维系福利国家制度的运作。这些面向的相互配合，使得福特主

义发展模式得以维系，呈现良性循环。而布莱顿森林 (Bretton Woods) 会议所建立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以美国黄金储备为基础，并以美元为本位作为世界各国汇率的基准，来维系国际贸易和投资的运作。

但是这样的福特主义发展模式，从 1970 年代之后出现危机。由于欧、日资本和美国资本在国际的激烈竞争，一方面大公司无法快速地竞争调整策略，科技进步缓慢，使得生产力下降；另一方面由于工会的势力高涨，劳资对立，使得对工资弹性僵化，造成资本外移而大量向外投资，国内失业率节节升高，这又间接造成福利国家面临财政危机和工会势力瓦解；进一步，由于美国在 1970 年代初期放弃美元做为世界货币的角色，战后建立的国际经济秩序瓦解，各国相继采取浮动汇率，资金流动快速，既有的国际架构失去规范能力 (Amin 1994; Blustone and Harrison 1982; Boyer 1990, 1991; Hirsch 1991; Jessop 1994)。

以上这些危机促成了福特主义的危机，使得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上的重组，迈向了所谓的后福特主义 (post-fordism) 时代。调节理论认为，在后福特主义时代，相对于前期的福特主义有以下的几个特色：1. 在工业典范上，由于市场竞争的激烈，大型跨国公司的庞大体质愈来愈无法面对变化快速的市场需求，而逐渐缩编或改组成数个小公司，小量多变的生产形态逐渐成为主要的生产特色。甚至在新科技的发明上，大公司不再是主要来源，弹性而专业的中小企业逐渐扮演重要角色；2. 在积累体制上，由于生产力的下降，大量生产与大量消费的配合出现问题。因此，3. 在调节模式上，国家机器采取比较倾向自由化的去除管制 (deregulation) 措施，对企业和工会的约束愈来愈小，让市场机能发挥调节的功能；大量删减福利预算，减低国家机器的财政赤字，强化市场对劳动力的鞭策作用。4. 而在国际体制上，以美国为首的战后经济秩序，由于欧、日的窜起，美元本位的瓦解，浮动汇率的崛起，使得既有的国际架构无法面对，新的国际情势缺乏新的国际架构来规范。但是调节理论也指出，后福特主义不像福特主义时期那么清楚的有制度的支撑，弹性多变而无明显的规律是其特色，一个稳定的发展模式仍未出现^[3]。

从国际分工的角度，福特主义与后福特主义也有不同。前者的生产基本上仍是以先进国内部的生产和消费为主。然而由于先进国之间的激烈竞争，福特主义的生产流程分化，使得部分厂商将生产流程最标准化的后段外移，这造就了边陲地区的工业化。而边陲地区的工业化，基本上是基于便宜劳动力，其生产是断裂的，主要在供应先进国的市场，而无内部市场。在这样的国际分工情势下，先进国与后进国壁垒分明，核心、边陲或半边陲的区分仍然清楚。然而随着福特主义的瓦解，以及后进国，特别是新兴工业国家的兴起，和逐渐形成具有内部市场的边陲福特主义，一个随着后福特主义阶段的更新的国际分工局势出现。在这阶段，世界分成欧、美、日和各自邻近地区的三大块，之间相互竞争，而且在三大块之内，也各自形成了内部的次级世界分工，有中心和边陲地区的出现。由于弹性生产、跨国合作和资本流动的快速，新的国际分工已不再像过去那么区位分明，而是在不同地方以不同的方式生产相类似的产品 (Lipietz 1997)。全球化因此意味着全球的区域化，而在各大区域内又有内部分化和分工，各小区域以各自的特色生产又在国际上竞争。

用很简单的话来说，西方先进资本主义从 1970 年代以来的转型，就是从过去僵化的福特主义转变到弹性的后福特主义。Harvey (1989:147) 称这时期为弹性积累 (flexible accumulation) 阶段，“它基于劳动过程，劳动力市场，产品，以及消费类型的弹性上。其特征是由全新的生产部门的出现，新的财务金融服务方式的提供，新的市场，以及特别是密度相当高的商业、科技和组织的创新来界定”。Castells 甚至认为当今的资本主义已经进入资讯化的社会 (informational society)，资讯的使用已经渗透到经济社会生活各层面，而带动这个新的发展模式的就是资讯科技的大量发展和使用。在这个资讯化社会中，生产力的主要来源是知识和资讯，而其结构的基本逻辑是网络，是透过互动式的学习制度而进行创新和发明。而过去的工业主义，其生产力来源是能源和工业，其组织结构的基本逻辑是科层式组织，而学习则是集中在大公司总部的研发部门 (1996: 33)。

从调节理论的角度，资本主义已经从福特主义转变到后福特主义，从生产流程，生产组织，社会调节模式，一直到国家机器的类型和国际分工都有质上的转变。因此，对调节理论而言，资本主义从 1970 年代之后，已经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以资讯通讯为基础的生产力，使得资本流动的跨国界现象，特别是在三大区域内，有了与以前完全不同的物质基础，全球化的四个面向——金融、企业和投资、科技、管制体系——正是这个变化的一部分，是既有体制转变的外显。因此只从现象上资本外流在量或比例上的争议，并没有触及资本主义本身的转变。回到“全球化是否发生的问题”，从调节理论的角度，我们可以这样说，这四个面向的全球化的发生，虽在外表上与过去类似，但是却与过去有本质上的不同。

3. 争议之二：全球化与区域经济

在全球化的论述里，另一个争议的问题是资本流动与区域经济的关系。是否资本的高速流动使得地方特色或区域经济失去意义？正如前述，资本主义已经对以国家为单位的资本主义重组，同时将各地的地方生产透过商品链、投资、贸易等活动连结起来。全球化因此也意味着地方/区域之间的连结 (Amin and Thrift 1994)。而且由于通讯资讯的发达，资本的快速流通，更使得这样的流动跨越传统空间的限制，而形成 Castells (1989) 所说的“流动的空间” (space of flows)。

资本的全球化是否造成区域不再具有意义，形成 O'Brien (1992) 所谓的“地理学的终结” (the end of geography)？这样的说法一方面假定了资本可以随意流动，往有利的地方投资，以及生产的资源因素，例如土地、人力、资本、交通运输，甚至资讯等不构成限制条件。另一方面也假定各地的生产已经标准化，因此资本可以随意配置，使用当地劳动力，基础建设条件，和劳动组织形式，以强化竞争能力并占据市场。但这样的假定，在实际的经济世界有相当多的问题。首先，不同商品的资源因素的

限制性并不相同 (Storper 1997; Clark and O'Conner 1997), 某些商品的资源因素可以在各地便宜的取得, 但是某些商品并非如此。其次, 交易成本也构成资本移动的限制因素, 当外在竞争愈激烈和愈不稳定, 厂商愈必须依赖合作、人际关系和信任, 来面对不确定性, 这使得产业聚集 (agglomeration) 形成而不会大量移动 (Scott 1996)。

在资源因素上, 现代资本主义商品生产需要很多外在的条件配合, 包括劳动力, 原料、土地, 交通运输, 还有资讯的获取等。某些商品的生产需要特定区域的人力、原料、资讯, 其受制于地域条件的程度较高。另外某些商品则不太受到这样的资源因素影响, 则其移动性较高。例如以简单劳动力为主的大量制造的运动鞋, 劳动力需要的技术能力并不高, 因此便宜劳动力成为最主要的竞争力, 其流动性就高; 但是高科技的半导体, 甚至需要大量设计的高档服饰, 都需要技术和设计能力, 这就不是便宜劳动力就足够的, 因此受到资源因素的限制。

Storper (1997) 依国际化程度高低和区域化程度高低, 划分商品性质为以下四种: 1. 高区域性和高国际化流通的商品: 这类商品具有区域特色又具高度国际流通的品质, 且有不可取代的资源因素, 特别是人力因素。例如高科技产业和特定的工业区位的产品。2. 低区域特性但高度国际流通: 这样的商品之资源因素取代性高, 而透过分散的商品链连结起来。例如, 高度国际分工之已经标准化生产的商品 (制鞋, 大量生产的成衣)。3. 低区域特性和低国际化的产品: 这些商品是提供地区的基本服务, 但又不是国际公司想要进入的商品项目。4. 高区域特性和低国际化的商品: 这样的商品生产基本上是为了服务本地特定的品味和需求, 而很少国际竞争, 主要原因是其无法替代性。例如, 具地方特色让观光客购买的商品。

从 Storper 的角度, 从第三、四种商品生产逐渐转移到第一、二种商品生产, 意味着国际化程度愈来愈高。但这二种具国际流通性质的商品, 素质并不相同。第二种的商品的共通特质是高度的国际流通, 跨国公司到处寻求适当地点投资, 透过商品链的形式形成国际分工。这种类型的



商品，其资源因素可替代性高，只要能够提供适当的交通运输和便宜的劳动力，就可以形成国际流动。同时这类商品的资讯相当透明，其他地方容易取得，竞争性高，因此成本要素成为国际投资的重要参考 (Clark and O'Connor 1997)。但对第一种商品，虽然其国际流通性高，但是资源因素的人力并非随地可以取得，而且也相当依赖该地区的社会制度，学习机制，网络，和地区知识 (Storper 1997:35)。换言之，由于这类商品生产的资讯具有不透明性，而且高度依赖地区特质，则其移动性较低。从此角度，虽然在全球化阶段，商品或资本有高速的流动性，但是区域经济的某些商品，由于有一些社会制度特质，因此并不会失去重要性。“地理学的终结”此项说法过分夸大。

从交易成本的理论，资本全球化将会使得区域经济消失的说法亦面临挑战。任何的经济活动不只包含了生产成本，还内涵了交易成本，也就是“衡量交换事物之价值成分的“讯息”成本及保护、监督和执行合约的成本” (North 1994:37)。Coase (1998/1995) 著名的公司理论说明了公司兴起与扩大或萎缩的原因。他指出，生产活动虽然可以透过个人间的契约关系完全独立地进行，但由于个人间的签订契约进行交易需要成本，只要这些交易活动在厂商内部进行的成本小于市场进行者，厂商就会出现。而且一个厂商会倾向扩张，一直到其内部交易成本等于外部交易成本时 (1995: 17)。换言之，当内部交易成本小于外部交易成本时，公司倾向形成垂直整合；当相反情况发生时，则公司倾向转向市场交易或是形成垂直分工或水平分工，以分散风险和降低交易成本 (Williamson 1985)。这样的厂商/公司组织理论有空间分配的意涵。

任何的生产组织都坐落在既定的空间结构之中。生产组织需要外部条件，例如原料，人力，交通运输等因素的配合。因此设厂生产初期，地区性的资源因素的邻近性成为最重要的考量，因为衡量资讯和执行契约的交易成本可以由于距离短而降低。但是距离并非不能克服。正如 Scott (1988) 指出的，运输的交易成本可以因为量大，商品的形状的一致性，以及常态化，而使得交易成本大量降低，而且距离愈长相对成本愈

低。在这种情况下，愈是标准化，能够规格化 (codified) 的产品，厂商会倾向扩张，垂直整合，而且全球性流动生产愈是可能。相反的，愈是非标准化，市场不确定，少量多样的生产，则愈是依赖地区性的厂商之间的相互配合，形成垂直分工或水平分工网络，以合作的非正式制度，降低交易成本，以面对外在的不确定性 (亦参见 Storper and Scott 1995)。正如 Scott (1988:53) 说的，“以分散，多工，和在不稳定经济环境生产的厂商，倾向形成高成本的连结网络，其交易形态多样，少量，不标准化，且时空条件高度不确定”。

交易成本理论不只讨论组织的形成，也讨论制度的重要性，在空间意涵上也具意义。制度学派 North (1994) 从交易成本的角度来讨论社会制度与经济成就之间的关系，他问的问题是：假如市场机制使得各种发展条件达到均衡，为何世界上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会有不同的表现？North 的解答是，差异发生在社会制度。由于交易需要成本，而市场的资讯并不完全，因此交易需要制度来规范，使得市场交换具有秩序。因为“制度为交换提供了结构，(加上被采用的技术) 而决定交易的成本和转换的成本” (North 1994:44)。而不同的地方由于文化社会规范不同，造成了不同的制度，决定了不同的交易成本，也影响了经济成就。一般而言，交换的复杂程度和专业化高低，决定了交易契约的制度化层次。当专业化程度愈高，有价值之特性数目愈大且所具的变化性大，越必须倚重可靠的制度 (包括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 进行契约行为，降低不确定性。虽然 North 的分析单位是国家经济，但是放到本文的脉络，我们也可以推论出，这些特殊的制度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创造竞争优势。特别是在现今高度不确定的市场状态下，有利的地方社会制度更是地方产业发展需要的条件。至于何种制度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有利市场竞争，正是本文要深入讨论的重点^[4]。

从空间的角度，以上这些因素正是使得厂商必须依赖特定区域内部之制度，厂商之间的合作关系，来维系低交易成本的重要因素，而这也构成了区域经济形成和强化的原因。与前面资源因素的说法相比，愈是

标准化、不需要特殊制度支撑而交易成本愈低的商品,愈能够全球化生产,这也就是第二类的商品;而愈是非标准化,且愈需要地区制度支撑的产品,愈是需要区域内部的合作来降低交易成本,也就是第一类商品。而在全球化阶段,高度的竞争,已经迫使原来垂直整合的大公司,逐渐扁平化,形成垂直分工,和外包很多原来部门的生产给当地厂商;或是将部分标准化生产的部分,外移到其他地区生产,造成了全球性的分工体系。从产品循环的理论来说,假如一个商品的生产包含了研发,技术生产,半技术生产,到标准化生产,则外移的就是最不需要技术和研发人力的大量而标准化的部分,而留下来的在母公司当地的是需要高技术人力和知识体系的部分 (Frobel,et.al.1980),这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形成。

因此,从资源因素和交易成本的角度,区域经济都不会因为高度的全球流动而失去重要地位。愈是需要技术,人力,以及知识的部分,愈会留在特定的区域,透过当地特定的制度和知识,生产特定产品,在全球流通^[5]。因此,全球化并不指涉地理区域的终结,而是地理区域的连结,全球化与区域化 (regionalization) 是一体的两面。这也是为何学者将全球化和地方化看成是一体关系的原因 (Amin and Thrift 1993,1994;Cooke 1997;Lash and Urry 1994),也创造了一个新的名词叫做全球地方化 (glocalization),来描述新的全球现象。

但是,这里仍有一个问题需要讨论。那就是,为什么有些区域在全球化竞争中失败了,例如底特律地区,而某些地区却维持或创造了成功的竞争力?什么样的机制,可以使得既有的区域,不会在全球高度竞争中失去地位,而维持或强化其在全球性生产中的重要性?Storper and Walker (1989) 曾经区分区域竞争能力为弱竞争 (weak competition) 和强竞争 (strong competition) 两种。弱竞争是指资源因素是取决于外在条件,例如土地、人力、原料、生产流程等。因此在全球竞争中,便宜的成本是这种区域竞争力的基础。然而,这种基础的替代性高,因此只要有别的区域在这些条件上占了优势,则区域竞争力就消失。相对的,强竞争是指区域本身的资源因素就是竞争力的来源,而且是内在于区域内而无法取

代的。也就是，资源因素的人力不是由于便宜而是由于生产力和特定的技术，生产流程不是标准化而是知识，厂商之间的关系不是纯粹契约关系，而是信任和合作。相对于弱竞争资源因素是基于便宜的成本且容易买卖，强竞争的资源因素是基于特定的镶嵌于地方社会之中的知识、技术和社会关系且无法买卖。因此，弱竞争的利润有限，且易被取代，但强竞争不易被取代之外，还可以创造巨大的利润（亦参见 Cox 1997）。这种强竞争的区域，就是以下所要讨论的学习型区域。

4. 学习型区域

在 1984 年 Piore and Sable (1984/1989) 出版了“第二次产业革命”一书，引介了“灵活专业化” (flexible specialization) 概念，指出由于大量生产产品市场的饱和和消费者愈来愈需求多样多变的产品，大量生产的体系无法应对。在这个新的不稳定情境里，生产组织要能够灵活的和快速的反应市场的变化^[6]，在这样的条件下，关系密切的专业、使用多功能工具、高科技、具有多样才能的劳工和手工业传统的产业，最能够有效而快速的回应。同时，他们也指出了中小企业网络的重要性以及它们所形成的区域特性，在新的时代有重要的意义。因为灵活专业化极度需要厂商之间的合作、信任和社会整合，形成优良的具有创新能力的空间聚落。他们以意大利和德国巴登地区的产业发展为例来指称这类型的发展为灵活专业化（亦参见 Sable 1994）。

这个有关区域网络和创新活动之间关系的论点，后来成为创新环境 (Castells 1996; Camagni 1991)，学习型经济 (Morgan 1997)，学习型区域 (Florida 1995)，或国家创新体系 (Lundvall 1992) 等观点的起源。这些观点都同意，在现阶段的全球资本主义，竞争力的来源已不再是便宜的劳动力，而是知识和创新。因此，区域经济假如墨守成规而不能创新，则很容易在高度竞争中失败。而区域的创新活动，需要长期的知识和经验累积成为当地视为当然和常规化的“隐形知识” (tacit knowledge) 外，也

能透过厂商之间的网络关系建立信任，转化既有知识加以创新，而这些需要社会制度的配合和支持。以下分项说明。

4.1 创新是知识累积足够的过程和学习的结果

创新 (innovation) 不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而是一种渐进的、将过去的知识重组以获取新知识和技术过程 (Lundvall 1992; Johnson and Lundvall 1991)。因此创新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一个长期累积的过程和结果。个别厂商是透过学习既有知识和技术之后，才可能在既有基础上突破；同样的，一个地区生产既有的产品，累积了相当多的人力和知识之后，也才能够累积足够的知识而更上层楼。这样的现象，即使是科技典范的转移或发生根本性的创新时，都是相同的。科学家只有在常规化的研究过程中，由于碰到问题而尝试提出解答和新的做法。正如孔恩 (Kuhn) 在描绘科学典范的转移时所指出的，在科学典范转变之前，对相类似的问题，其实已经有相当多不同的创新理论出现。有时候，创新是靠着简单的人力，而不需要太大的创造力；有时候则是靠着大量的团队力量和相当强的创造力，才有了某些突破。但是无论如何，“几乎所有的创新都反映了既存的知识，并将之以新的方式结合” (Lundvall 1992: 8; Johnson and Lundvall 1991)。同样的 Porter (1996:68) 也指出，“很多创新是来自平时的累积而非一夕之间诞生，创新有赖经验的沉淀而非技术的突破，它的观念不必然是最为新颖鲜奇，一般人却容易忽略，因此学习型组织的重要性不下于正规的研发工作”。

从个别厂商的角度而言，厂商首先是透过“做中学” (learning by doing) 和“用中学” (learning by using)，来对工具和生产流程熟悉，累积对既有生产的知识和技术。而这样的学习累积到一定程度，可能碰到问题，随后才又进到“搜寻中学习” (learning by searching)，以及“探索性学习” (learning by exploring)，搜寻可能的知识和做法，探索可能改进和创新的作法。而当学习进展到比较大的范畴时，厂商则是进到“互动性的学习” (learning by interacting)，透过与顾客，研发与制造，制造与销

售之间的整合，将学习和创新变成是系统性的活动 (Cooke 1997)。这样的互动预设了厂商已经有一定的知识和制造能力，而互动更能使它们透过与外界的接触去摄取资讯和知识，成就成功的创新。这样的系统性创造与学习因此是链状的模式，有往前和往后的回馈介面，透过既有的知识和技术，对回馈的资讯消化和整理，并在制造上调整和改进，甚至创新。

个别厂商的创新是学习的过程和结果，而区域的情形也类似。过去累积的经验和知识，成为当地的记忆和隐形知识，而所谓的学习型区域就是透过制度环境，使得区域“扮演知识和想法的汇集者和储存者的角色，提供强化知识，想法，和学习的根基环境和基础架构” (Florida 1995:528)。我们将很快讨论这个部分。

4.2 创新是互动式的学习

熊彼得 (Schumpeter 1947) 很早就说过，由于竞争，资本家必须不断的创新以保持优势，“竞争来自新的商品，新的科技，新的供给，新的组织形态……竞争主导了决定性的成本和品质优势 [7]”。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创新来自企业主，而随着资本主义的进入垄断时期，大公司将主导创新但也将导致僵化。

历史的发展一方面证明了熊彼得的慧见，不过另一方面，新的发展却也指出了熊彼得的不足。正如前面科技的全球化所指出的，现今的科技研发，大公司虽仍占重要角色，但是由于研发成本愈来愈高，使得跨国间合作的策略联盟成为趋势以分摊风险和成本；另一方面，在新科技特别是资讯产业的发展上，很多的新产品愈来愈是由中小企业生产出来，大公司的科技研发之垄断地位逐渐受到挑战 (Amin and Thrift 1994; Castells 1989; 1996; Cooke 1997)。因此，翻开资本主义科技创新的历史，是从厂内工匠的学习和合作，然后集中到大公司的研发部门，之后又回到常规化的生产过程中来。在英国工业化初期，新科技的发展主要是在厂内，或小型工作场的工匠之间的合作和学习，透过发展、改进和测试新的生产机具所造成的成果。但是 19 世纪末化学、钢铁和电力工业的发展改变了

创新的地点，而愈来愈集中在大公司的研发实验室。不过，今天的创新情境似乎又回过来了，在以科学为基础的资讯科技的发展过程中，重要创新则是奠立在常规化的学习、搜寻和研发，而非大型的实验室 (Lundvall 1992:13)。Castells 甚至认为当今的资本主义已经进入资讯化的社会 (informational society)，生产力的主要来源是知识和资讯，而其结构的基本逻辑是网络，是透过互动式的学习制度而进行创新和发明 (1996: 33)。Castells 指出，

科技创新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反映了一个知识的境界，一个特定的制度与工业环境，一定的可用技术来界定和解决科技问题程度，一种应用成本——效益的经济心态，以及一个生产者与使用者的网络，能透过做中学 (learning by doing) 和用中学 (learning by using) 的沟通而累积经验：精英是做中学，而修正其科技的使用；一般人是用中学，因此是在套装的科技之限制之下。科技创新体系内的互动，以及其依赖特定理念、问题和解决方式交换的“环境” (milieux) 非常的重要，从过去到今天的科学革命无不如此 (1996: 37)。

假如创新是一个累积的过程和结果，那么在常规化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过程中，已经隐含了大量讯息的沟通和交换。这样的讯息构成了学习和创新来源的重要因素。对个别厂商而言，劳工、工程师或者是售货员的日常经验，可以影响和决定创新努力的方向，其知识和洞见对创新过程有重大的影响。一个有利于创新的环境是能够将常规化的讯息，纳入学习的机制，而使得创新成为生产和销售活动中的一部分。正如 Lundvall (1991: 9) 指出的，“假如创新反映了学习，以及假如学习部分是从常规化的活动中延伸出来的，那么创新必然是根基于现有的经济结构中。”从此角度，过去将大公司的研发部门，大学的研究单位，或私人科技机构视为唯一的创新来源，并将他们的人数与支出作为一国创新的

唯一指标，是过于窄化的看法，我们最多只能说科学家、工程师或技术人员的创新，只是创新的制度之一，而非全部；而人员和科技支出也是创新的指标之一，并非全部。

对区域而言，互动式学习和创新，构成了所谓的创新环境 (milieux of innovation)。它是“在一既定的地理区域内，主要透过非正式社会关系所构成的复杂网络，他们经常决定了对外特定的形象和特定对内的呈现和归属感，透过了这些因素的融合和集体的学习过程，强化了地区性的创新能力” (Camagni 1991:3)。创新环境强调的是地区性的非正式关系和网络所构成的学习和支持机制。也就是创造力和持续的创新，被视为由于既有制度而形成集体学习的效果，这样的社会制度习惯，包括由于区域内代间知识的传递，管理技巧和科技创新的成功模仿，人际间面对面的接触，公司间正式和非正式的合作，隐而不显的商业、财务或技术讯息的流通等所融合而成。特别是在区域内的公司网络内，这样的非正式接触和合作，更强化了互动和学习，而有利于创新活动的开展。

假如创新需要过去累积知识为基础，依靠非正式关系作为互动的学习机制，那么为什么有些过去相当活跃的区域会消失，而某些则愈兴盛？地区性的记忆有时构成创新的障碍，有时构成创新的基础。如何遗忘以及如何记忆 (Sable 1994)，牵涉到地区性的制度架构是否有利于创新。

4.3 创新需要社会制度的基础

所谓制度 (institutions) 广义的说，就是习惯、规则、法律和常规化的行为规范，它提供人们行为的参考，在不稳定的环境和大量资讯充斥的情况下，使得行动有所依循 (Johnson 1992)。因此，制度是地区性的文化社会产物，提供了人们认知的架构。在愈来愈依赖知识和创新的全球化阶段，虽然很多的专利和机器都能够买卖，但是最重要的隐形知识却无法买卖或从书本获得，它无法从区域内部转移出去 (Lundvall and Johnson 1994; Gregersen and Johnson 1997)。

而创新环境就是能够透过地区制度的建立和努力，强化学习和信任

(trust)。这种制度是在不断重复、试误的过程中逐渐建立的。当它一旦成为习惯，就成为地区的记忆和资产，成为社会中隐而不显的知识和技术。这个有利于学习和创新的社会制度，包含了几个面向：能够强化学习之机构的设立（大学与研究机构）；它们与工业之间人员与资讯交流；厂商之间的沟通、合作、互派技术人员驻厂；学习式的工厂，生产与销售部门之间有不同管道资讯的流通，与消费者有资讯管道；以及地区性的政府机构的介入等（Florida 1995）。透过这些机构的设立，强化研究机构、厂商之间、员工之间的互动和学习，建立了信任和不断强化知识，构成了学习型区域。它因此“内含了学习和扩张知识基础的能力，也指涉了不只是科技研发系统——大学，研究机构，厂内研发部门等的重要性，同时也指出了经济结构、组织形式和制度机构的学习含意的重要性”（Lundvall and Johnson 1994）。这样的集体建构所形成的区域，透过过去累积的知识，新机构的设立，互动的强化，以及长期合作关系积极培育信任等因素，可以使得区域对内具有集体目的，对外有集体展现，这成为当地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也成为对外竞争和号召的基石。相对于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和物力资本（physical capital），社会资本是社会集体建构，透过网络，规范，信任等的建立，来强化合作协调以获取共同利益。它不是那么显而易见，但是却可以使物力和人力资本的投资得到更大的利益（Morgan 1997:493）。这种支撑创新活动的区域性制度，也被 Amin and Thrift（1994）称之为制度浓度（institutional thickness）。它可以界定为“机构之间互动和合成效果（synergy），许多组织体的集体再现，一个共同的工业目标，和共享的文化规范和价值等因素的结合。它的浓度是建立在正当性和培育信任关系上。它的浓度也在持续的激起企业家精神和巩固工业的地方镶嵌性上”（Amin and Thrift 1994:15）”。

以上说明了在全球资本主义阶段，为何某些区域能够在激烈竞争中不断创新而维持或强化竞争力的社会制度基础。地区性的学习机制和制度的建立，是在全球竞争中的关键。但必须指出的是，创新区域必然是全球连结的区域，过度的强调区域内的互动，容易形成封闭的自足系统，

成为闭锁 (lock-in) 的体系。这正如 Granovetter (1973) 所指出的, 强连带经常成为封闭系统形成内在惯性, 而不利于改变和创新。因此, 网络必须是开放的弱连带, 才能够成为具有创新的形态。而在全世界激烈竞争的时期, 地区性的创造活动必须能够不断透过不同的机制, 将世界新的知识连结起来, 使之不至于成为封闭的体系。因此, 创新环境不只是区域网络的连结, 而且是全球网络中的节点。这也是 Camagni (1991:6) 指出的, 非正式的与隐而不显的网络关系在高度经济和科技变迁的时代, 也许并不足以达到国际竞争的目标, 因此将地方的创新环境或学习型区域与外在网络联系和融合起来相当重要。创新环境或学习型区域因此意味着全球性的多中心的网络连结。以 Castells (1996:195) 的话来说, 现今的全球资本主义是由“多重网络构成的网, 镶嵌在多样的制度环境中”, 是全球网络与地区环境的融合。

5. 后进国家在全球化中的竞争

由前面讨论, 全球化并未造成区域经济的消失, 在强竞争中, 区域特色仍是使得某些地区在资本高速流动中, 仍占有全球优势的原因。而在弱竞争中, 只要资源因素仍具竞争力, 其区域经济的可能性仍存在, 只是这个部分替代性高, 资本流动的可能性也高。而从学习型区域的讨论里, 更指出区域内部学习机制的建构和存在, 假如能够形成地区性的制度习惯, 在全球竞争中, 则有相当大的竞争能力。这样的说法, 对后进国家有什么启示, 对既有发展理论又提供了什么可以反省的地方?

学习区域的论点, 其实隐含了一个重要的观点: 那就是发展路径是一个演化 (evolutionary) 的过程 (Cooke 1997)。不论是个别厂商或是一个区域内的厂商网络, 对于生产知识甚至是管理或流通, 都是透过回馈环节 (feedback loop) 学习而来, 它可能是透过自己的经验累积的反省, 也可能是透过与同行知识的学习和对照。而在一个区域之内, 产业长期所累积的知识, 形成当地的隐形知识, 而透过学习机制的建立, 网络信任

关系的维系，形成了动态的系统，能够对现有知识改造创新。这个创新并不是凭空而来，而是奠基在过去的知识和制度，因此区域的发展具有相当的路径依赖 (path dependence) 的特色，它也是科技，社会制度，经济结构不断互动的合成效果 (synergy) ^[8]。

从此角度，后进国家的发展或是其区域的发展，也必须放在演化的观点：学习机制是否建立而能够有效促进科技学习，是关键问题。众所周知的是，后进国的发展模式与先进国有不同的途径。先进国比较是自发的，而后进国则是在资本主义全球性扩张之后，经历了被殖民，独立，纳入国际分工体系之后，逐渐发展或低度发展。而在发展中国家，透过国家机器的介入，与西方跨国公司合作和采取科技转移的方式，加上其他有利的社会结构因素，才逐渐吸取西方经验和学习，迈向发展。因此，后进国面临的是透过学习来追赶 (catch up) 的发展模式。如何追赶，用什么方式追赶和学习，就是重要问题。下面我们讨论后进国家的发展和追赶模式。

5.1 后进国的追赶型发展和学习

在讨论追赶型发展的文献中，东亚快速发展被视为具典范作用和作为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模仿的对象。而这些研究大多指出一些战后共有的特质；例如，发展主义国家机器，有利的阶级结构 (地主的消失)，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劳工的顺从，平和的社会环境，和出口导向工业化等 (Appelbaum & Henderson 1992; Dickens 1993; Gereffi & Wyman 1990; Haggard 1990; Wade 1990)。而东亚地区的发展形态，虽然各有不同，但国家机器的积极介入却十分相同。例如，新加坡是透过国家机器介入积极拉拢跨国公司，利用跨国公司的科技和生产能力，提升新加坡的发展；南韩则是在朴正熙政权时期，积极透过国际借贷，培育国内大型财团，并以金融控制和其它财政和政治介入的方式，让大财团进入国家亟欲建立的产业部门 (Castells 1992)。

虽然有关东亚的国家机器是否真的是发展主义 (developmentalist)，有

些争议。例如 Hamilton (1996) 就认为台湾的经济发展是基于中小企业的弹性网络以及关系主义的制度基础，国家机器所扮演的角色有限。但是从科技学习的角度，国家机器的重要性却不可忽视。例如，Amsden (1989) 指出了南韩经济企划院的规划，以及透过国家机器与跨国公司谈判的科技转移，使得南韩的电子和半导体工业在现今资本主义世界中能够处于领先地位。

Hobday (1995) 对东亚科技学习的研究，在这方面提供了相当重要的贡献。他指出，西方先进国家科技的发展，依循着产品循环理论的说法，是从全新产品研发开始。在这阶段产品创新程度高，生产技术基本上是实验性高且不太稳定，在上市时，市场也不是非常确定，且标准化程度低。而一旦产品在市场上销售成功，主导性的设计和标准化生产程度逐渐出现，销售量激增且市场的不稳定性消失。最后，这项产品将会由于标准化大量生产，技术的透明化，和其他产商的加入，使得产品的竞争愈来愈基于价格，而迫使厂商必须压缩成本。在这产品成熟阶段，生产程序愈来愈标准化，而创新也愈来愈是局部的而非根本性的 (Hobday 1995:43-44)。因此，从产品循环的角度，一个产品是从研发，技术生产，到标准化生产，从不稳定技术到稳定的大量生产流程。

后进国家的技术学习正好相反，是从产品循环的末端往前回溯的过程。后进国家的厂商是从最标准化的、依赖低成本生产流程的部分逐渐开始学习和内化技术，逐渐往具有技术能力甚至研发新产品的阶段迈进。在每一阶段，它们透过一点一滴的改进和创新，逐渐拉近与先进国和市场领导者的距离。它们很少创新一个全新的产品，而是透过制程的创新 (process innovation)，也就是压缩生产成本或改变一个产品的品质的方式，来学习新的科技和追赶既有的生产技术。这正如 Amsden (1989:4) 说的，“假如发生在英国的工业化是基于发明 (invention)，以及假如德国和美国的工业化是基于创新，则现在发生在‘落后’国家的工业化就是基于学习”。

以东亚的例子来看，1960年代之后的出口导向工业化，基本上是通过

过跨国公司在当地的投资或寻找代工，而逐渐开始其技术学习的阶段。在此阶段，正如产品循环理论或新世界分工理论所指出的，是因为产品成熟竞争激烈，成本是最主要的考虑，因此跨国公司将最末端的标准化生产外移到其他地区生产，以降低成本强化市场竞争力所致。虽然依赖发展理论通常会认为，后进国的发展在技术上和产品的流通上，主要仍依赖先进国，但是也就是在这阶段开始，后进国的厂商逐渐摸索和学习产品的生产技术，而逐渐沉淀累积。

后进国厂商的科技学习，经由几个管道而来 (Hobday 1995:35)。包括：经由外国投资和技术输入；外资和本地资本合作生产；非正式管道的参访，海外人员训练，雇佣外人；外国买主的技术要求和合作；先进国厂商的授权生产；代工生产 (OEM)，在此阶段，本地厂商的技术能力已经达到类似先进国的水准；自行设计代工生产 (ODM)，本地厂商可以自行设计得到对方认可，而代工或外包生产；当本地厂商达到这个阶段，逐渐已经具有研发创新能力，为得到更高的技术或参与更尖端的产品开发，则可以进行海外兼并吸取新的技术，或是与先进公司进行策略联盟，共同开发新的科技和产品。最终，某些具有开发创新产品的公司，不再从事代工，而开始建立自己品牌。因此，学习是一个长期追赶的过程，经由刻意地努力，从最简单的生产技术，逐渐内化累积知识，改善制程，透过工作现场以及与先进国厂商的一点一滴的技术学习，逐渐成为自己的知识系统的过程。也因此，学习和知识是累积性的，它包含了经验，也包含了正式的训练和非正式的模仿，拆解机器，再重新组装的反向学习过程。而当这些知识累积到一个地步，就成为本地的隐形知识，具有特殊性，而不易取代，且逐渐有能力自行开发和创新。

再放回全球化和区域化的角度，前面讨论过，当资源因素愈是取代性愈高时，其流动性愈高，而当资源因素愈是累积的，愈是依赖在地的隐形知识时，取代性愈低。出口导向初期，东亚国家所生产的基本上是商品链的末端，是依赖简单加工便宜劳动力的产品。而长期生产和知识的累积，使得东亚地区逐渐能够透过学习而迈向产品循环的前端，知识

和技术累积程度愈来愈高，产品的性质也开始蕴含较多的知识和技术。在此经济重组的（1980年代）阶段，由于经济发展的关系，工资以及土地等要素成本愈来愈高，商品链末端的竞争力逐渐低于其他成本较低的国家，因此这类末端的产品也开始外移。但是具有附加知识和技术的部分，则不易移动，倾向留在本地。另一方面，从交易成本的角度，一些长期从事某类产品生产的地区，由于地区性累积的隐形知识，不易在其他地区购得，也不会容易外移。特别是长期网络关系所建立的信任和知识，在现阶段高度竞争的商品世界中，这类的知识和信任，更是地区性竞争的社会资本。

必须强调的是这些后进国的经济区域并不是自给自足的封闭系统，而是连结到世界网络和全球镶嵌 (globally embedded) 的区域，并且是透过前面所讨论的学习机制的建构和建立，而构成全球化中地区竞争力的重要部分。它很可能并未取代由西方跨国公司所建构成的垂直分工之全球性的商品链，而是成为商品链中的中间重要环节；或也可能与这样的商品链形成平行分工，将地区与全球网络连结起来 (Gereffi 1994) ^[9] 全球性的连结加上区域性的学习制度，形成了后进国家的学习型区域。相对于先进国家的学习型区域，这样的区域具有以下特质：

1. 它必然是全球网络的一部分。在全球化阶段，产品具有全球竞争力，必然是与全球商业和工业网络结合。特别是后进国，出口导向工业化相当程度依赖国外市场，这样的全球连结，才可能使地区经济持续维持。

2. 工业生产基础结构愈来愈是以知识和技术密集的厂商所形成的网络。工业化初期的简单加工生产，一方面累积了知识和技术，但另一方面也由于替代性高，逐渐外移。具有竞争力的是前期所累积和转化的知识和技术密集的产业，其附加价值高，也比较能够有国际竞争能力。但相对于先进国的产品创新网络，这样的地区基本上从事的是制程创新和追赶更先进的技术和知识。

3. 它需要有公共的学习机构（如大学和法人研究机构）之设立，来转

移和研发先进技术和知识。学习机构的重要性在于创新，这类机构的设立，有利于对现有知识和技术研发和瓶颈突破。而先进国的研发机构和大学从事的是新产品的创新，后进国的研发机构和大学的设立，经常是透过模仿来创新，再将科技和知识转移到合作厂商。在这部分，海外人才经常扮演重要角色，他们可能是海外留学或在外国厂商工作数年的归国学人，在外国学习先进的知识和技术，对现阶段的技术和知识发展有专长，能扮演知识和技术转移的角色。

4. 这些研发机构与厂商有经常性的人员和资讯的交流。这对先进和后进国中的区域经济体的重要性是相同的。先进国的厂商能将市场需求和环境讯息回馈到研发系统，透过人员和资讯交流，从事产品创新。而后进国厂商在追赶的过程中，特别需要对最先进生产技术和知识以及市场的资讯，厂商对市场的敏感度或参与国际商展，以及研发机构收集的资讯和知识，形成回馈环节相互加强，而从事新技术和知识的学习和创新。

5. 厂商之间有合作，互派人员和相互学习的机制。区域经济的重要性在于地区之间的厂商是形成网络合作关系，不论是垂直分工网络或平行分工网络，厂商之间经由长期合作建立信任，以及由此形成的人员来往，可以使得技术相互学习。不论是上下游之间或平行关系，这样的合作使得技术训练和学习机制得以形成，也得以使知识和技术提升。

因此，与先进国的学习型区域或创新环境，其创新是前缘性的产品，后进国的学习型区域是在追赶和学习新知识和技术。它们都是全球网络的连结，但是在商品链上所占的地位并不相同。然而，透过学习，这些区域有可能逐渐发展而进入商品链的前缘，而这与地区的发展程度和社会学习制度是否能有效形成有密切关系。

总之，虽然后进国家在发展初期，是技术依赖也的确生产商品链末端的产品，但是透过长期累积的学习，是有可能从商品链末端逐渐往前端发展。而这有赖发展型国家机器的带领和建立学习机制。另一方面，长期累积的知识和技术，也在社会沉淀，形成隐形知识和技术，成为迈入

商品链前端的基础。在区域发展上，某些长期从事特定产品的地区，更可能由于学习机制的建立，而成为全球化过程中的特殊区域，在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由东亚地区的例子，后进国的追赶模式，是学习型的。它们也并不命定一定是依赖而没有可能追赶上先进国。假如这样的命定存在的话，就不会有今天的日本和东亚四小龙。

5.2 发展理论的反省

从以上的讨论，现有的几个有关第三世界发展的理论解释，有相当多的错误和缺失。它们不是命定的认为后进国家没有机会与先进国竞争，就是认为后进国的发展，是由于先进国商品生产外移所产生的外溢效果，而缺乏关注后进国是如何的追赶的面向和事实。

首先是世界体系理论 (Wallerstein 1974)。虽然世界体系理论摆脱了依赖理论对第三世界发展的悲观论点，而指出了部分第三世界国家有可能发展，成为半边陲地区，但是在这理论中，分析单位是世界体系，而且也将发展动力放置在中心资本的流动。因此它忽视了中心地区资本并不是一体的，而且由于激烈竞争，使得第三世界国家可以利用国际资本之间的竞争，透过谈判来形成有利的发展动力和科技移转的机会 (Henderson 1989:15)。因此，这个理论严重的忽略了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发展动力和能力。从台湾与其他东亚国家的例子显示，虽然在科技层次上，仍落后先进国，但是透过了不同的学习机制和谈判策略，这些国家已经超越大部分的第三世界国家，而且在部分产业上 (例如南韩等地的电脑和半导体产业) 在世界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第二，新国际分工理论 (Frobel, et, al, 1980)。它试图以产品循环理论的观点，说明新兴工业国家的兴起，是由于中心地区资本的激烈竞争，使得部分资本将产品下游标准化的劳动过程外移到其他地区，这造成了中心地区的去工业化，也造就了新兴工业国的崛起。产品循环理论指出，新产品的开发经过五个步骤：开发，上市，大量成长，市场饱和，以及需求下降等阶级。在开发和上市等阶段，创新扮演重要角色，但是当产

品开始大量生产，需要的创新和技术层次就愈来愈低，而愈来愈是标准化生产。Veron 认为，前面三个阶段发生在公司的母国，当市场饱和和面临激烈竞争之后，才逐渐外移寻求便宜的生产地来取代。新国际分工理论指出，新兴工业国兴起的结构性原因，是由于产品循环的最后环节从中心外移到边陲所造成的。这样的分析，基本上仍依照着资本的利润和成本逻辑，Frobel 等人指出，

新国际分工是资本的一项新的制度创新，是由于变化的条件使然，而非由于个别国家或所谓的跨国公司自由选择而改变的发展战略造成的结果 (Frobel, et, al 1980:46)。

这个看法忽略了非中心地区的国家机器角色，以及非经济的文化和制度因素在发展上的重要性 (Henderson 1989:20)。从本文的目的而言，这个观点过于悲观地认为后进国只能由先进国学到过时的技术，无机会由于长时期的学习、发展而改善其科技水准。其问题因此与前面的世界体系理论类似。

第三，在调节理论 (regulation theory) 中，Lipietz (1987) 认为原来的第三世界国家，由于国际分工的关系，逐渐工业化。但是在工业化的过程，第三世界没有自主性，其工业化的发展，主要是由先进国家的需求所带动的。在 1960 年代的第三世界工业化，可称之为“原始的泰勒主义” (primitive Taylorism)，因为这些国家，包括台湾与南韩，是利用廉价而技术层次相当低的标准化生产的劳动力，来带动发展。这样的发展，以压制性的国家机器吸引投资，而不考虑劳动力的再生产。这样的国家，在经过一段发展之后，在 1970 年代之后，逐渐成为“边陲福特主义” (peripheral fordism)，开始有高一层次的技术生产能力，而且由于有部分中产阶级出现，因此有部分的国内消费市场出现。但是它们仍然是边陲，因为没有自主的市场，而是以中心的需求带动发展。

Lipietz 的论点，遭受到严厉的批评，因为他仍然是以中心的观点来看

新兴工业化国家，到底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内部的社会调解机制为何，并没有被认真的考察 (Amsden 1990)。以台湾为例，福特主义的劳动过程，主要在跨国公司，中小企业并非以福特主义的大型生产，而是以弹性的劳动力使用，企业之间的连结也非是科层制，而是大量使用网络关系为主 (陈介玄 1994; Hamilton and Kao 1990; Whitley 1992)。同样的，Amsden (1989,1990) 以韩国的例子指出，南韩的发展国家机器扮演重要推动角色，而在发展过程中的学习 (learning) 机制，也被严重忽略。换言之，假如要以调节理论来研究新兴工业化国家，必须正视社会制度的面向，而不能重复过去依赖理论的那种中心决定边缘发展的说法。

这些理论所显示的缺点，主要在以先进资本主义的资本移动逻辑来看待后进国的发展。因此这些后进国家在这些理论中，不是命定的被先进资本主义的逻辑所决定，就是在走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走过而过时的道路。这些理论所忽略的是，后进国家由于既有的社会制度，以及学习机制，可能在全球经济重整的过程中，利用既有的机制和机会，强化既有的发展形态追赶先进国。

6. 代结论：一个新的研究架构

本文回顾了现今有关全球化论述的两个主要争议，到底全球化是否发生，以及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之间的关系。在全球化是否发生的议题上，我指出了反对者忽略了资本主义在本质上的转变，并以调节理论的观点指出资本主义在诸多面向的转变，以及这个转变所展现的全球流动和经济社会的不同外观上。而对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之间的关系上，我以资源因素和交易成本的论点指出，某些地区性经济并不会因为资本的快速流动而失去重要性。这是因为这些地区长期所累积的知识和技术，不易被取代，而且在高度竞争和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中，区域的亲近性和网络关系，有利于合作和学习。这样的区域也称之为学习型区域，它们是全球化和区域化的连结点。最后，我以学习型区域的论点，指出后进国的发

展模式是追赶型，是透过由后往前的反向学习的形态。由商品链的最标准化生产中，逐渐累积知识和技术，往前的发展。这使得某些区域能够累积知识和技术，而在全球化过程中，成为后进国的地区性经济体。本文也指出，这类型的学习型区域与先进国有性质上的不同，它基本上是对先进国的追赶和学习，以转移先进科技和知识，制程创新的性质高于产品创新。但透过学习制度的建构，这些区域有可能逐渐追赶上先进国，成为全球经济中的重要区域。最后，我也以这样的观点反驳既有的发展理论，指出它们的西方中心观点，严重忽略了后进国本地的学习和追赶。

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的转变有密切关连，而区域经济的重要性日益彰显。这些在全球资本流动快速流动的情况下，仍能维持重要地位与其学习机制有不可分的关系。这样的观点，用来研究后进国，特别台湾，现今所面对的经济重组和资本外流，有相当的启发性，也是可以用来研究的理论架构。如何剖析这些地区的学习机制以及它们面对高度全球化环境所采取的策略，将能够对后进国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且不同于现今发展理论的新见解。而这将是未来研究的重要课题。

参考书目

中文部分：

陈介玄 (1994) 《协力网络与生活结构：台湾中小企业的社会经济分析》，台北：联经。

陈东升 (1998) 《高科技产业组织网络统力架构的内涵及其演变的探讨：以台湾积体电路封装部门为例》，台大社会系，未发表手稿。

英文部分：

Aglietta, Michael (1987) *A Theory of Capitalist Regulation*. London: Verso.

Amin, Ash, ed. (1994) *Post-Fordism: A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Amin, Ash and N. Thrift (1993) "Neo-Marshallian Nodes in Global Network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6:4, 571-

587.

Amin,Ash and N.Thrift (1994) " Living in the Global." in Ash Amin and N.Thrift, (eds.) *Globalization.Institutionalization,and Regional Development*.NY:Oxford University Press.pp.1-22.

Amsden,Alice (1989) *Asia's Next Giant:South Korea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N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msden,Alice (1990) " Third World Industrialization: ' Global Fordism' or a New Model." *New Left Review*,182:5-31.

Appelbaum,R.and J. Henderson.eds. (1992) *States and Development in the Asian Pacific Rim*.Newbury Park,Ca:Sage.

Bluestone,Barry and B.Harrison (1982) *The Deindustrialization of America:Plant Closing,Community Abandonment,and the Dismantling of Basic Industry*.NY:Basic Books.

Boyer,R. (1990) *The Regulation School:A Critical Introduction*.N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Boyer,R. (1991) " The Eighties:the Search for Alternative to Fordism." in B.Jessop,et.al. (eds.) *The Politics of Flexibility*.Aldershot:Edward Elgar, 106-132.

Camagni,Roberto (1991) 'Introduction:From Local" Milieu" to Innovation Through Cooperation Networks',in Roberto Camagni, (ed) *Innovation Networks:Spatial Perspective*.London:Belhaven Press.

Castells,Manuel (1989) *The Informational City:The Space of Flows*.Oxford:Basil Blackwell.

Castells,Manuel (1992) " Four Asian Tigers With a Dragon Head: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State,Economy,and Society in the Asian Pacific Rim." in Appelbaum,R.and J.Henderson. (eds.) *States and Development in the Asian Pacific Rim*.Newbury Park,Ca:Sage.

Castells,Manuel (1996) *The Rise of Network Society*.London:Blackwell.



Clark,Gordon and D.O'Conner (1997) " The Informational Content of Financial Products and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the Global Finance Industry." In Cox,Kevin, (ed.) Space of Globalization:Reasserting the Power of the Local.NY:The Guilford Press.pp.89-1114.

Coase,R.H. (1988) The Firm,the Market,and the Law.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中译, 陈坤铭, 李华夏译, 1995, 《厂商、市场与法律》, 台北: 远流。)

Cooke,Philip (1997) " Regions in a Global Market:the Experiences of Wales and Baden-Wurtemberg."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4: 2,349-381.

Cox,Kevin (1997) " Global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Distribution:A Critical Assessment." In Cox,Kevin, (ed.) Space of Globalization:Reasserting the Power of the Local.NY:The Guilford Press.pp.115-136.

Dicken,Peter (1993) " The Growth Economies of Pacific Asia in their Changing Global Context." in Chris Dixon and David D-Smith, (e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Pacific Asia.London:Routledge.pp.22-42.

Elam,Mark (1994) " Puzzling out the Post-Fordist Debate:Technology, Markets,and Institutions." In Amin,Ash, (ed.) Post-Fordism:A reader.Oxford: Blackwell.43-70.

Florida,Richard (1995) " Toward the Learning Region." Future,27: 5,527-536

Frobel,Folker,Jurgen Heinrichs,and Otto Kreye, (1980) The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ereffi,Gary (1994) " The Organization of Buyer-Driven Global Commodity Chains:How U.S. Retailers Shape Overseas Production Networks." in G.Gereffi and Korzeniewics,M. (eds.) Commodity Chains and Global Capitalism.London:Praeger.

Gerrefi,Gary and D.Wyman.eds. (1990) Manufacturing Miracles.Prince-

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p.231-266.

Gold,David and Islam Azizul (1995) " The Evolving Nature of the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Cause and Effect of Globalization." In Simon,Denis, (ed) ,*Corporate Strategies in the Pacific Rim*.London:Routledge.

Granovetter,Mark (1973) "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1360-1380.

Gregersen,B.and Bjorn Johnson (1997) *Learning Economies,Innovations Systems,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Regional Studies*,31:5,479-490.

Haggard,S. (1990) *Pathways from the Periphery*,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Hamilton,G.and Cheng-shu Kao (1990) "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hinese Business." *Comparative Social Research*,12.Greenwich:JAI Press.

Hamilton,Gary (1996) " The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of Asian Business Networks." In Gary Hamilton, (ed) *Asian Business Networks*.NY:Walter de Gruyter.

Harvey,David (1989)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Cambridge:Blackwell.

Henderson,Jeffrey (1989) *The Globalization of High Technology Production:Society,Space and Semiconductors in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Modern World*.London:Routledge.

Hirsch,J. (1991)" From the Fordist to the post-Fordist State." in B.Jesop,et,al. (eds.) *The Politics of Flexibility*.Aldershot:Edward Elgar.pp.67-81.

Hirst P.and G.Thomson (1996) *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London:Polity.

Hirst,Paul and J.Zeitlin (1990) " Flexible Specialization vs.Post -fordism:Theory,Evidence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Economy and Society*,21:1.

Hobday,Michael (1995) *Innovation in East Asia:the Challenge to Japan*.Aldershot.UK:Edward Elgar.

Hobsbawn,Eric J. (1996) " The Future of the State." *Development and*

Change,27.

Jessop,Bob (1990) " Regulation Theories i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Economy and Society*,153-216.

Jessop,Bob (1994) " Post-Fordism and the State." in Ash Amin, (ed.) *Post-Fordism:A reader*.Oxford:Blackwell.pp.251-279.

Johnson,Bjorn (1992) " Institutional Learning." in Lundvall,Bengt -Ake, (ed) *National System of Innovation:Towards a Theory of Innovation and Interactive Learning*.NY:Pinter.

Johnson,Bjorn and B.Lundvall (1991) " Flexibility and Institution: Learning." in Bob Jessop,et,al. (eds.) *The Politics of Flexibility*.Aldersho Edward Elgar.pp.33-49.

Lash,Scott and John Urry (1994) *Economics of Signs and Space*.London: Sage.

Lipietz,Alaine (1987) *Mirages and Miracles:the Crisis of Glob: Fordism*.London:Verso.

Lipietz,Alaine (1997) " The Post-Fordist World:Labour Relations,International Hierarchy and Global Ecolog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4:1,1-41.

Lundvall,Bengt -Ake (1992) " Introduction." Lundvall,Bengt -Ake, (ed) *National System of Innovation:Towards a Theory of Innovation and Interactive Learning*.NY:Pinter.

Lundvall,Bengt-Ake and B.Johnson (1994) " The Learning Economy." *Journal of Industry Studies*,1:23-42.

Mann,M. (1997) " Has Globalization Ended the Rise and Rise of the Nation-stat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4:3,472-496.

Morgan,Kevin (1997) " The Learning Region:Institutions,Innovation and Regional Renewal." *Regional Studies*,31:5,491-503.

North,Douglass (1994) *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中译: 刘瑞华, 《制度; 制度变迁与经济成就》, 台北: 时报出版社。

O'Brien, R. (1992) *Global Financial Integration: The End of Geography?* London: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Ohmae, K. (1990) *The Borderless World: Power and Strategy in the Interlinked Economy.* London: Fontana.

Peck, Jamie and Adam Tickell (1994) "Searching for a New Institutional Fix: the After-Fordist Crisis and the Global Local Disorder." in Ash Amin, (ed.) *Post-Fordism: A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pp.280-315.

Piore, Michael and Charles Sabel (1984) *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 NY: Basic Books. 中译: 李少民, 刘英莉翻译, 1989, 《第二次产业革命》, 台北: 桂冠出版。

Porter, M. (1990)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NY: Free Press. 中译: 李明轩, 邱如美 1996 《国家竞争优势》, 台北: 天下。

Reich, R. (1991) *The Work of Nations.* NY: Alfred Knopf.

Ross, Robert and K. Trachte (1990) *Global Capitalism: the New Leviathan.*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Ruigrok, W. and Rob. Tulder (1995) *The Logic of International Restructuring.* London: Routledge.

Sable, Charles (1994) "Flexible Specialization and the Reemergence of Regional Economies." in Ash Amin, (ed.) *Post-Fordism: A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pp.101-156.

Sassen, Saskia (1990)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Tokyo.*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axienian, Anna L. (1994) *Regional Advantage: Culture and Competition in Silicon Valley and Route 128.*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chumpeter, Joseph (1947)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Y: Harper.

Scott,Allen J. (1988) *Metropolis:From the Division of Labor to Urban Form*.Berkeley and Los Angeles,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cott,Allen (1996) "Regional Motors of the Global Economy." *Future*, 28:5,391-411.

Simon,Denis (1995) "Globalization,Regionalization,and the Pacific Rim." Denis Simon, (ed.) *The Emerging Technological Tjectory of the Pacific Rim*.NY:ME.Sharpe.pp.3-27

Simon,Denis and Bruce Koppel, (1995) "From Interdependence to Globalization;Changing Perspectives and the Chang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n Simon,Denis, (ed) ,*Corporate Strategies in the Pacific Rim*.London:Routledge.

Storper,Micheal (1997) "Territories,Flows,and Hierarchies in the Global Economy." In Cox,Kevin, (ed.) *Space of Globalization:Reasserting the Power of the Local*.NY:The Guilford Press.pp.19-44.

Stoper,Micheal and Allen Scott (1995) "The Wealth of Regions:Market Forces and Policy Imperatives in Local and Global Context." *Future*,27:5,505-526.

Stroper,Micheal and Richard Walker (1989) *The Capitalist Imperative: Territory,Technology,and Industrial Growth*.Oxford:Blackwell.

Strange,Susan (1986) *Casino Capitalism*.Oxford:Basil Blackwell.

Tickell,Adam and J.Peck (1992) "Accumulation,Regulation,and the Geographies of Post -Fordism:Missing Links in Regulationst Research."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16:2,190-218.

Wade,Robert (1990) *Governing the Market: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Wade ,Robert (1996) "Globalization and Its Limits:Reports of the Death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Are Greatly Exaggerated." in Berger,Susan and Dore,Ronald. (eds.) *National Diversity and Global Capitalism*.Ithaca,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60-88.

Wallerstein,Immanuel (1974)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I: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NY:Academic Press.

Whitley,R. (1992) *Business System in East Asia*.London:Sage.

Williamson,Oliver,E. (1985)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Firms,Markets,Relational Contracting*.NY:The Free Press.

注 释

[1] 具体地来说, 一个调解模式包括: a. 薪资关系 (wage relation)——劳动力市场, 薪资调整模式, 个人与社会薪资, 生活方式等。b. 企业形态 (enterprise forms); 内部组织, 利润来源, 竞争模式, 企业间的连带, 与银行间的关系等。c. 货币的本质 (nature of money): 交易的形态 (信用或货币), 金融体系, 与生产体系的关系。d. 国家机器: 劳资妥协的制度形式, 国家机器干预的方式与程度。以及 e. 国际体制 (international regimes): 包括贸易, 投资, 货币交易, 政治组织等的国际联合组织等。因此, 调节理论假定了一个发展模式之内不同层次之间的配合, 能够维持一段长时期的稳定, 而内部或外部的危机, 造成新的调节和新的可能性。而国家机器在此扮演重要的角色, 因为国家机器的制度形式是妥协的结果, 使得国家内部不同团体免于永无止境的斗争 (Lipietz 1987:19)。Jessop 更认为, 国家机器透过霸权论述和计划, 来整合社会各团体, 以及强化想象社区的共识 (Jessop 1990:218)。

[2] Jessop (1990) 指出, 一个稳定的发展模式还需要文化霸权体系 (hegemonic system) 来形成共识和习惯, 因为一个发展模式的稳定“明显地不可能只以经济逻辑来分析”。

[3] 有关 1970 年代以来对西方资本主义转型的理论可以简单的区分为三个 (参见 Amin 1994;Elam 1994;Ruigrok and Tulder 1995): 一个是本文讨论的调节理论 (the regulation theory), 该理论认为现阶段的资本主义已

从大量生产的福特主义逐渐过渡到强调弹性分工和专业化生产的后福特主义 (post-Fordism)，这是由于前期僵化的劳动力市场，国家机器政策，和激烈的竞争导致了生产力下降而产生了危机之后的转变。但是后福特主义不像福特主义时期那么清楚的有制度的支撑，弹性多变而无明显的规律是其特色 (见 Aglietta 1987; Boyer 1990; Lipietz 1987; Jessop 1990; Peck and Tickell 1994)。二是新熊彼得主义 (Neo-Schumpeterianism)，主张世界资本主义有规律性的景气循环，在 1970 年代中期之后走向新的循环。在这阶段，电脑资讯的创新发明成为最主要的科技动力，它将逐渐渗透到社会各部门，改造新的科技和社会环境而将对新的景气循环造成重大影响。新熊彼得主义的讨论被认为具有科技决定论的色彩，认为新科技的发展将带动整体经济的改变，忽略了科技发展的社会制度基础，以及相关的政治经济条件 (Elam 1994)。第三是弹性专业化理论 (见 Piore and Sable 1984; Hirst and Zeitlin 1990)，强调大型福特主义式生产在这个新阶段失去竞争力，而具有竞争力的是小型，弹性，而又具有专业设计和生产的组织。例如第三意大利，和德国的巴登地区的产业。由于这个理论研究的是特定地区产业的改变 (因为地区性的长期信任和合作关系)，并将大量生产与小型专业化的生产对立，且以地区性的改变来认定未来资本主义将会朝向小型专业化生产，而被批评忽略了整体产业和社会因素的整合关系 (Amin 1994)。因此对于 1970 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在体制上的转变，不同理论已经有相当的共识，只是各自从不同的出发点来讨论。

[4] North 同时指出，由于市场竞争存在不确定性，因此没有人真的能够知道利润极大化的基础在那里。正因为如此，分散型的决策过程是面对不确定性高的情境最有效的方式，因为它会让社会尽力去发掘各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也能尝试错误并从挫败中学习，这个观点与后面我们所要讨论的学习型区域或学习型经济类似。

[5] 在都市的研究上，也有人认为全球化将造成都市的终结，因为网路和通讯的高度发达，使得都市作为整合的功能将被通讯所取代。但是 Sassen (1990) 认为这样的看法是错误的。她的“全球城市” (global



city) 的研究指出, 正因为资讯通讯的发达, 可以使得生产分散化, 而不必像过去一样集中在都市地区。但是由于生产的分散化, 所以更需要集中化的专业服务, 而这些服务, 包括法律, 会计, 软体设计, 广告等等, 由于需要面对面的沟通, 距离短因此重要, 都市中心的功能在全球化阶段更为显著。

[6] 灵活专业化的论点, 主要指出由于现今大量生产市场的饱和, 而且由于需求的多变, 福特主义式的生产已经无法因应, 地区性网络式的中小企业的弹性生产反而比较能快速灵活的面对多变的市場。这样的市场决定论被 Amin and Thrift (1994) 称之为新史密斯 (new-Smithian) 主义。

[7] 熊彼得继续指出, 创新“它所冲击的不是边际利润以及既有厂商的产出, 而是它们的根基以及它们的生命”。熊彼得所说的是由于不断的创新, 资本家必然不断的改造制度和创造出他自己的敌人 (劳工与知识分子), 而造成了资本主义的“创造性毁灭” (creative destruction)。

[8] 在逻辑上, 学习型区域当然不意味它一定在国际竞争中成功, 也有可能学习错了而失败。但是任何成功的区域, 假如没有形成学习机制, 则无法在高度竞争中占有优势。我们可以这样说, 学习型区域是区域经济在国际竞争中的必要条件, 但不是充分条件。而从历史和科技不断发展的角度, 我们无法确认什么因素会是充分条件。

[9] 有关跨国界区域经济及其制度治理机制的形成之研究, 请参考王振寰 (1997)。

“你陷入了想象之井”^[1]： 压缩型发展中主体性的形成

——对现代性与韩国文化的女性主义批评

赵慧净

序 言

以二分法思考
被一种受骗感所困扰。
陶醉于悲剧的心绪
不知怎的却被阴谋理论所吸引。
不信任本土的讨论
却相信宏观理论能解释一切。
这些都是障碍
本地知识分子必须予以克服。

1997年11月的某一天，韩国人突然听到这样一条新闻：他们国家需要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财政援助。直到90年代中期，韩国的政治家、商人以及普通民众都还一直沉浸在乐观的情绪中。韩国声称开创了高增长型经济发展的一种新模式，并为自己能跻身东亚“四小龙”而自鸣得意。来自东南亚国家的学生纷纷涌入韩国，研究韩国的“经济奇迹”，探讨“儒家资本主义”之成功经验的学术研讨会也不断举行，“儒家资本主义”被认为可与西方的“清教资本主义”相媲美。但如今却爆出了韩国债务累累、需要给予财政援助的消息。

随着经济危机的严重程度逐渐明朗化，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反应为考验韩国应付危机之能力提供了一次机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起初被认为是超级大国的替身。许多人都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企图在韩国建立“托管制”，因而都把危机看做是国家的耻辱。随着人们从最初的恐慌中缓过劲来，人们开始普遍认为韩国应该接受现实，引入自由市场原则。大财阀成了人们批评的首选目标。人们觉得政府腐败——劳动力市场的僵化使其更趋恶化——和财阀的垄断地位是经济危机的根源所在。因此，所有人都认为，既然韩国要放开市场、增加竞争，那么就必须推行“透明”和“公正”的原则。然而，解决方案实施起来却并不那么容易，因为过去几十年里经济的快速增长已使人们的身体与精神都陷入了极度的疲惫之中。

自从韩国经济被并入由跨国资本主宰的世界秩序的那一刻起，危机即已潜伏。认清这一事实将有助于我们清理对于危机的思考。只看到国内的因素并认为韩国的情况是独一无二的，这是极其错误的。假如存在着提高收入的种种动机，那么在任何一个国家里——只要在那里教育已经普及到一定程度，好莱坞电影已成功地撒下了中产阶级幸福生活的迷梦，人们都会努力工作，甘愿牺牲自己的时间和快乐，当他们陷入饥饿或是遇到挫折时，就更是如此了。一旦那些努力想摆脱贫困的人开始赚到钱，不管他们有着许多文化差异，他们都会获得自己能成功的自信心，也相信他们的奋斗能使国家经济起飞。跨国金融资本涌入韩国之时，正是“饥饿的”韩国人不惜代价一心想脱离贫困苦海的时候。如今已不再有“饥饿的”劳动力，资本也就离开了这个国家，移到工资更为低廉的地区。在危机发作之前，人们相信资本好处良多，并为不断提高的经济统计数字而心醉神迷，对“成功的神话”也坚定不移。如今他们却是晕头转向，茫然不知所措。

对于目前的危机，那些曾经领导韩国经济发展的国内“玩家”当然也负有责任。若是不知道“游戏规则”是如何制定的，就不可能理解目前的境况。我赞同某些学者的看法，他们认为要解释清楚韩国的经济增

长，首先必须追索过去 30 年里有利的外部环境 [曹喜渊 (Cho, Hyiyon) 1997; 金皓起 (Kim Hogi) 1998]。这些解释必须被放置在东亚地区资本主义发展的背景之中；尤其是，韩国必须被作为一个依赖出口以实现积累的政权、一个李斯特式的福利国家以及一个威权主义式的发展动员结构的范例，来加以剖析。简言之，由于在 60 年代、70 年代以及 80 年代国际资本的流动性，冷战的政治环境——美国在其间有力地支撑起资本主义经济，以及韩国有能力仿效日本那种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模式，韩国有着经济快速发展的种种有利条件。

要了解危机的多种向度，就必须避免把分析单位局限在国家界限之内。同时也要避免陷入阴谋理论的泥淖，特别是在有这么多人都觉得是被牺牲了的这一时刻。倘若能避开这些陷阱，就会产生关于殖民地现代化及其危机的富有成果的讨论。在过去数十年里，韩国人没能创造出堪与他们所体验到的经济变化相称的生活方式或合理的劳动制度。相反，倒是造成了一个萦心于“奇迹般的统计数字”的社会。人们被推挤着涌入殖民地现代化的大潮，竟至很难给批判性的反思或是创新留下余地。日常生活领域被严重地扭曲了。

从某一方面来看，目前的危机是可以逆料的，“我们”那种要救“我们国家”的激烈反应也是可以想见的。令人担忧的是数量在不断增长的年轻一代如今觉得“与其陷在矛盾冲突中不能自拔，倒不如死了好。”韩国人一直找不到一条超越于激情四溢的防御性民族主义和冷酷无情的市场原则这种两分法之上的道路（见 Kim, Elaine and Choi, Chungmoo 1998），这让我颇感绝望。但作为一名文化人类学家，我同时也无法掩藏内心的兴奋，金融危机为推行韩国社会的“本土人类学”研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知识分子的工作仍然会在转型的边缘、在希望与绝望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

随着目前的危机引领我去思考世界体系的历史，我开始反思后发工业化国家的“压缩型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冲击，这种反思又引领我去思考压缩的时间，资料库和专家的缺乏，以及用以谈论日常世界的“语言”

的匮乏。在这篇文章中我关注的焦点是现代性和主体性的形成。而这一切必须从韩国“反常的”现代化以及极端不平衡的“发展”形式开始说起。

1. 从金融危机来看“我的社会”： 压缩型经济发展和涡轮式资本主义的历史

当门终于打开，
我却没有准备离去。

(贴于千里眼网络服务商的首页，2月19日) [2]

《全球化的陷阱》一书——事实上它值得如今韩国的每一个“在想问题的人”一读——引入了“涡轮式资本主义”这一术语。它说的是资本主义何以能够在80年代后期前苏联和东欧坍塌之后毫无羁绊地获得更为快速的发展。 [3] 该书的作者马丁和舒曼强调指出，“涡轮式资本主义”快速地破坏了一个社会的传统文化，从而摧毁了其赖以延续的根基。除了这本书之外，最近还有不少其他的书籍都指出，资本主义的市场驱动时代会因其对社会基础的无情破坏而使人类遭致悲剧性的命运。 [4]

韩国社会是通过“涡轮式资本主义”发展经济的一个典型例子。直到80年代，国家始终对各社会群体的一切需求置之不顾，宣称他们在基本生存问题得到解决之前必须等待。当韩国人为有能力举办1988年奥运会而欢庆时，基本生存问题已不是那么紧迫了。此时他们可以把注意力转向诸如民主化和生活质量问题等其他一些领域。许多人感到如果奥运会晚四年举行，韩国迟一点加入经济协作与发展组织(OECD)，或是国际货币基金的对冲方案迟五年推出，那么情况就会好得多。不管怎样，事实是韩国尽管在经济上获得了巨大发展，但在文化上却是贫困的。在人均收入达到1万美元之前，社会上奉行的还是“必须通过削减开支来

进行竞争”的原则，而当财富似乎真的积聚起来时，却被虚掷在对帝国主义的模仿上。国家领导人如此热衷于跨进“超级大国”的行列，而人们也总是有着追逐的目标。

我最近和建筑家金镇爱（Kim Jin-ae）进行过一次交谈，她提到，一个在日本工作多年的英国建筑家说过这样的话：一座在英国需要一年时间才能建成的建筑，在日本只要6个月就能建成。她补充说同样的房子在韩国可能只需要3个月就能建成。这种速度和流动性是从何而来的呢？为此又必须付出哪些代价呢？虽然我可能已有所概括，但在下面我还是将试图简要地概述韩国在过去30年里的发展/不发展的情况。

在“一穷二白”的状况下起步后，现代韩国逐渐变得越来越容易被资本的流动所控制，而这种资本流动从一开始就是无力加以控制的。这种适应能力成了韩国资本主义的力量所在。然而，“涡轮式资本主义”也给韩国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留下了大批粗制滥造的危房，肤浅的文化，毫无根据的乐观主义以及势不可挡的个人对现状的顺应能力。眼前此刻，韩国人似乎可以分成两大群体：其中之一可称之为国民（这个词是由意指“国”与“民”的两个汉字组合成的。虽然有时它被翻成“公民”[citizen]或是“人民”[people]，但在英文中并没有与其确切对应的词），他们固执地相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三年后就会被扫地出门，而另一群可称之为“非国民”的人则怀疑他们能否活到世界末日那一天。由于缺少一种全面的社会调和机制，许多“非国民”都有一种无奈感，觉得无论怎样努力，终究还是会一无所获。

虽然社会缺少一种全面的调和机制，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没有潜在的“体系”。在过去的这一个世纪里，韩国涡轮式资本主义的驱动力是生存的焦虑，由此也相应建起了“食物链”。“食物链”这个词所指的是一种通常被学者们称为“亲情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的现象。“经济人”在韩国是占主导地位的人格类型，这种人通过建立和维护“食物链”来获取食物、住所和财富。韩国社会就是围绕着这样一些关系网链结构而成的；正是以大规模的“私人利益团伙”为核心，使韩国社会的性质

迥异于对集团共同体生活有着长远眼光的现代的理性的组织。“私人利益团伙”形成于准战时动员时期，它是依照进行肮脏的密室交易所必需的一些“人们熟知的秘密”而运作的。对“人们熟知的秘密”毫无知晓且无力加入到“食物链”中去的人就被边缘化了。社会中的权力和机会是由个人在准私人关系网络中的位置所决定的，而这种私人关系网络通常是用所谓的“人之常情”（每个人都共同拥有的自然的感情）的公共伦理加以掩饰的。

我想再往深里挖掘这段历史。在1910—1945年的殖民时期，以及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期间，已经产生了一种社会体制，在其中，人们本质上被简化为置身于危急国家之中的难民。许多人除了他们日复一日的生存之外，根本无力关心任何其他事情。当韩国人民在其后被推上“追赶”之路、寻求高速发展时，这种体制非但没有遭到削弱，反而得到了增强。从理论上说，现代社会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原则的基础之上的，即任何个人只要他或她不侵犯他人的自由，就能享有自由。在一个建立在“食物链”关系网络之上的社会里，一种威吓的态度显得更为普遍：“你为何要在我努力向前时拖我后腿？”韩国的精英们不停地谈论被高度精炼的道德原则和在逻辑上相一致的社会理论。而人们的日常语言中却总是充满了粗鲁的安慰，感伤主义，或是直接的威吓，这与精英们的语言真有着天壤之别。这种二重性并非实施过程中失败的结果，相反，它恰好是使“私人利益团伙”得以正当运作的基础。

改革者们若是不把这种体制因素考虑在内，就很容易会失败。这也就是由政治家们和政府所提出的许多改革从一开始就只是打算平息民怨的原因所在，这就像汉城的一个出租车司机坦言的那样：“这就像是把奶瓶塞给啼哭的孩子。”最近，一项根据成绩确定工资等级的方案又被作为对目前低效率体制的“结构性改革”的一部分提了出来。然而，一切还是回到了老路上，所谓的“韩式”的根据成绩定级的制度只不过是磨磨嘴皮子而已。直到目前为止，组织机构们都只是建立和维护了这样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们忙着如何在他们中间“分馅饼”，而不是

去制定一种能更为恰当地评价雇员表现的制度，以便“做一个更大的馅饼”。因此，改革仍将会陷于失败。

压缩型发展以及对那段时期的强烈体验对社会有着不可估量的毁灭性影响。对现代性和压缩时间性（compressed temporality）等概念早已谙熟能详的社会科学家们指出：“现代性自身内部从一开始就包含有压缩时间性所引发的悲剧。”^[5]然而，由于韩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压缩的时间跨度，“我们”的体验比之于追寻内部生长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他们”，是极不相同的。^[6]就此而言，倘若这种时间压缩的后果未能得到充分的了解，那么让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坐在同一张谈判桌前，也就毫无意义了。认识不到“形象的殖民”和对主体性的严重的涂抹（Pieterse & Bhikhu 1997），就很难来谈论一种全球市民社会。我们需要分析为何会有那么多第三世界的人民遭受着相对的剥削，为何牵涉到诸如民族、家庭、地位再造等问题的极其程式化的电视剧会如此受欢迎，以及为何民众运动会变得无所作为，困难重重。这些现象是与这一事实紧密相关的，即现代化是在一个极端“压缩的”时间段里被追寻的，它没有给反思和现代制度建设留下时间。

由于社会对某些改革和政策未有准备，因而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我来举一些例子。尽管存在着种种困难，韩国依然决定实行改革以增加地方行政部门的自治权。不幸的是，这一改革在时间上却与国家的建设热潮以及建筑承包商的巨大成功相合拍，那些建筑承包商大多数都不是本地人，但是他们却作为一个有势力的精英群体在当地冒了出来。结果是地方自治制度沦落到为一些唯利是图的个人的利益而服务，而不是为本地的将来出力。

金泳三政府雄心勃勃地想要实行的信息时代的国家政策是又一个例子。打着“领先信息潮流，支持制造产业”的口号，政府将昂贵的电脑分发到了中学。然而，虽然硬件设备分发下去了，可是却没有配备足够的软件或是人力以便能够利用这些硬件设备。不仅如此，由于受到“大学入学考试”的巨大压力，中学生们并没有时间来使用这些电脑（赵慧

净 1995)。“考试战”中的学生最需要的是能迅速解除压力的办法。因此，政府所提供的电脑，或是许多觉得电脑是孩子教育必需品的父母为孩子购买的电脑，若不是被弃置在储藏室中，就是被主要用来玩游戏和欣赏网上色情读物。

妇女运动又如何呢？随着 80 年代反对独裁的社会运动开始衰落，那些在大的社会运动圈子里无法建立起自己声音的女性主义者感到她们的时代已经来临了。她们兴奋地想把 80 年代的民众运动中残存下来的“革命力量”组织起来。然而，消费资本主义——它作为“压缩型”发展的后果之一来临得如此之快——却把新一代女性拖进了时尚展览会、百货商场和有着奇异风情的咖啡馆里。女性主义运动失去了往前发展的机会，只能就此止步。由于这种时间进程的非同步性，很多精力被浪费了，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社会不公正和不平衡变得越来越严重了。

让我最感忧虑的是这种压缩和不平衡带来了对日常生活世界的破坏。当我的学生们声称与其陷在矛盾冲突中不能自拔，倒不如死了好，或是他们累得不行无法思考时，他们是在揭示一个事实，即相互沟通能力的瓦解。人们开始感到有计划的行动只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性的后果。那么多人在追求自己想望的东西时，都显得犹豫不前。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人们变得软弱无力，丧失了那种如何来谈论他们的不满和挫折以改善他们的生活的意识。尽管从其他国家进口了许多“硬件”，但是能够改善他们的日常生活的“软件”却依然少得可怜。问题的严重性植根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很多人都已经放弃了创造信息和软件。如果谁都不想靠自己的力量去做事情，那就不会有软件；如果没有人想做软件，就不会有数据库。直到目前为止，韩国的生产追随的还是“殖民地”现代化的路子，使用从其他国家拷贝来的软件。其结果便是不可能积累起信息与知识。

因为有着已经发展到先进阶段的模范社会，韩国发展的区别特征是“通过模仿的压缩型增长”。它所需要的只是制定一个发展计划，并劝导人们勤快工作，无需作任何反思。由于认为即便是粗略的未来蓝图也都

无必要，韩国知识分子只知道摹仿从发达国家舶来的堂皇宏伟的理论，而生产线上的工人则只能不假思索地亦步亦趋。理论术语逐渐被用来伪饰现实，严酷的工作条件又破坏了思想和反思的维度。由于发展的最终目标已经被定下来了，怀疑和疑惑被认为是破坏性因素。必须要做的事情是快速且未加思虑的模仿。冷战的体系更是强化了这一倾向。冷战年代迫使韩国人以“敌与友”的极端两分法来思考问题。实际上就不曾有过任何中间性的可供选择的空間。

忙忙碌碌的生活方式本身就破坏了人们思考的能力。人们越是忙，就越容易落入两分的思维方式。男人和女人，大人和小孩，我们的人和你们的人，我的校友和那些上其他学校的人，我的家庭和与我无关的人，从小就接受钢琴教育的人和那些没能受此教育的人——这样把每个人都分类归入两个组群，许多事情就能自动地得到安排。许多人都觉得生活这样忙，没必要浪费时间去认真思考。需要决定的倒是该跟谁站在一起。在一个忙忙碌碌的世界里，最终的目标是一清二楚的，而且有一位“老大”决定着社会的方向，在这里只需要策略性的思考。

至此，我试图强调的是“急遽的压缩型发展”滋生了一种无力感。它把人们拖进两分的逻辑之中，剥夺了他们自我反思的能力。势不可挡的速度和时间进程的非同步性通过将他人工具化而削弱了人们互相理解的能力和愿望。但是，我相信并且希望在目前的危机中，生息在韩国的人们会开始感觉到现在正需要来修正发展的不平衡，去创造一个崭新的、均衡的社会。人们已经开始展开讨论，认为一种能描绘社会未来走向的洞察力是必不可少的，它能够分析和阐释急剧的变动，而且会努力获取一种能够缩短人和人之间距离的社会空间。下面是我的一位学生写的一篇文章，她对自己在经济危机中的生活进行了反思。

有一天我偶然在一档电台访谈节目里听到，在一次国际会议上，以奇迹般的经济增长和保护腐败的体制为其特征的韩国发展模式，被作为主要论题提了出来。尽管在政府和产业界之间存在

着特有的勾结，也暂且不论其官僚文化的合理性，韩国的经济确实一直显示了很高的增长率。有些与会者甚至提出，腐败的体制本身即作为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积极变数发挥了作用。韩国的例子似乎被作为已有理论的一个反证而引起了讨论。

在汽车上听着这场讨论，看着窗外的街景，我低声嘀咕道，不该以这样一种乐观、陶醉的方式结束讨论。这还是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那时我已经感到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了。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中，我却感到有一种解放感。我们似乎终于能够用一种正确的眼光来看世界了。我读小学时用的插图本历史书总是以这样的画面结束：被气球簇拥的国旗，人们的笑脸，背后是冉冉升起的太阳。如今我们必须放弃这种用诸如此类的形象来含含糊糊地描绘韩国之未来的习惯。

每当我开始谈及自己时，总是有需要解决的更重要、更紧迫的问题堵住我的嘴巴。为了明天，就必须克制今天的我。而当明天来临时，那个明天又得消失无踪，以便为下一天的到来让路。到头来就永不会有开开心心的今天的我。我只是不停地被推搡着奔向明天。如今我发现自己正站在悬崖边。知道最后的幸福日子再不会来临，我却丝毫没有为此而感到不安。

现在我想离开一直强迫我搭乘的汽车。我想远远地打量这辆车，核对一下我的地图和指南针，以便重新确定自己的方向。如果能做到的话，我愿意为我自己和别人做一些坐垫，使旅途变得更加舒适。虽然我面向的也许不是一个有着玫瑰般色彩的梦想之地，但我还是愿意在踏上路途之前知道自己将走向何方。

——全慧真（音译 Chon Hye-jin）

知道像慧真这样的学生开始反思起自己所在社会的现代性，这令人

颇感欣慰。怎样才能终止快速增长和不平衡发展所造成的恶性循环呢？哪些干预措施可以用来打破堡垒似的“私利关系网”并建构一个较为公正的公众基础呢？韩国社会并不是在进入后现代时代，而是处在一个探索一种另类现代性的阶段。创造一种另类现代性是最迫切的一项任务，它只有通过分裂式的“后现代”的思考方式才有可能实现。我将通过对韩国现代史中诸主体性形成的集中考察，来探讨这种转变的可能性。

2. “民族”与“家庭”：“现代国民”的生产史

画中之物宛然逼真，
但它们却并非真的。
他们彼此相似，
却又全然不同。
人看似自由，
却不过是循章而动。^[7]

“合则生，分则死”——这句口号可能是在反抗日本统治的民族主义抵抗运动时期进入公众话语的，它也表达了通过有效的群众动员来实现压缩型殖民地发展的思想倾向。在这一部分，我将仔细考察与“国民”和“家族”这两个概念相联系的支配性权力，这两个词最能够生动地唤起人们对这种动员的记忆。在韩国现代生活的构造中，它们是发挥力量最大的两个主要的能指。从某种意义上说，韩国社会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获得奇迹般的经济增长，应归功于它在创造“国民”上的成功。这种“成功”通过抹杀市民社会的生长空间而得以成为可能。正如上面所引的一位艺术批评家的话所说，人们表面看来是自由的，其实却是在按规章行事，这些规章使他们仅仅成为民族主义国家的主体，此外便什么都不是。压缩型增长时期生产出这样一个社会，其间只有冠冕堂皇的国家权力和家长制家庭，却没有公民或是自律的个体。当然，这种“民族人”



(national persons) 必然会使压缩型发展得以成为可能。

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被高度工具化了。社会体制有效地运转着，在人们中间复制出“同一性”，把他们放置在一种无差别的状态中。当一个社会面临的是总体性危机的境况时，结构性的调整也就不可避免。我感到，目前只有通过致力于把一直彻底遭到“国民”和“家庭”这些能指压抑的多种多样的主体性解放出来，才能有效地实现结构性的改造。

2.1 没有市民社会，只有国民

据报道，金大中总统在前往参加于今春举行的亚欧会议时，接受了英国泰晤士报一位记者的采访，在采访中他被问到：

“韩国人的骄傲是很出名的。他们对外国投资者会怎么看呢？”

“他们对外国投资人的看法有点消极。他们认为国外投资会使韩国沦为殖民地。在于‘市政厅’所作的对国民的电视对话中，我已经努力劝他们，钱可没有什么民族性，最重要的是它被投资在哪一个国家。我们要想取得成功，就需要通过增加出口赚取外国的硬通货，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得到外国公司的重大投资。近来，我们的人民已经开始懂得这个道理了。他们转变了许多。”

在这次访谈中，金总统一边承认韩国人非理性的族群中心主义是一个问题，一边又力劝国外投资者们要耐心等待，韩国人的爱国主义问题终究会得到解决的。如果总统这番话里所暗含的意思广泛传播开来，很多韩国的国民会感到被他出卖了。对危机的反应并没有怎么逾越民族主义的畛域。人们即使是面对经济破产，也依然断言“爱国主义能使我们实现盈余”。他们觉得勒紧腰带，开展集金运动，提倡只买国货，增加海外韩国人的投资，减少海外旅行，所有这些都将有助于避免危机 (Pyon 1998)。国外媒体都指出韩国最强大的力量是其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并



赞扬了韩国人的民族主义特性。当然，考虑写这些时评的西方人的立场和意图是挺重要的。很可能他们都是右翼民族主义者，他们对韩国的爱国主义大加赞扬，只是为了推进自己国家的社会经济政策，增进他们自己的利益。

事实上，集金运动和悬挂国旗已经不仅仅是民族主义的展示。它们是在危机中所产生的景观。这些景观是由一群群爱国的国民组织和上演的，他们觉得应该马上做点事情来回应危机。比如，一些爱国的小学校长和老师告诉他们的学生，他们家里为“集金”运动献金而得的收据是可以赚钱的。另一些更加勤勉、民族主义倾向更加强烈的中小学校长则在早晨的集会上提出，学生们应该把国旗贴在他们的背包上。中学生们觉得这很有趣，于是在他们中间，在背包上贴上一面国旗竟然成了一种时髦。

就这样，年青人也被鼓动起来，汇入了蔚为壮观的席卷整个社会的表现爱国热情的风潮之中。以这些学生为目标的礼品店收起了在“全球化”话题热门时库存的世界各国国旗，而代之以韩国国旗；这些店主就能成为“快乐而良好”的国民，他们既能赚钱，又能表现他们的爱国精神。在公众舞台上，仍然有许多“爱国者”——在这一点上韩国广播电台（KBS）堪称一个例子，在其晚间新闻时间里，他们宣称看电影《泰坦尼克号》所花掉的外汇会比“集金”运动所积攒起来的还要多。就像去看《泰坦尼克号》的人会被视如罪犯，韩国社会中到处弥漫着一种恐怖的气氛，一切与“民族”神圣性相悖的东西都是不允许言说的。国民们接受了要在危机时期“团结一致”的教育，他们为能够通过投身“救国”运动，为克服危机而尽到自己的本分而感到自豪。大众传媒则一直活跃在提倡“全国性”捐款运动的最前沿。结果，那些参加此类仪式性活动的群众，通过对此种运动的全身心的投入，证明了他们是健康的国民，并由此获得了安慰。

我感兴趣的是人们在理解诸如“民族”和“统一”等语词时的无意识的、巴甫洛夫式的反应。这引导我去分析民族主义话语的根底。民族

主义话语在韩国是与殖民地时期的民族解放运动历史地联系在一起。然而，我并不认为今天的民族主义只是殖民地时期的延续，我认为它更多地复制了在社会经济快速转型时期所涌现出的当代民族主义的虽然相似但又经过了修正的形式。今天的民族话语是在解放之后的民族国家建设期间重新建构起来的。其话语权力起初源于国家安全的需要以及相关反共主义。70年代以后，民族主义话语与旨在寻求民族强大发达的经济第一的政策直接联系在一起。在韩国举办了1988年奥运会，随后不久又加入了经济协作与发展组织之后，人们又转而欢庆自己的国家终于被接受进了强国的圈子。在一个被分为发达民族和不发达民族的世界的历史上，韩国国民的自尊因为自己国家的不发达而遭到过严重的伤害。他们不愿错过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的机会。这就是为何即使是在80年代的民众运动中非常活跃的左翼知识分子也没有真正反对市场第一的政策的原因所在。不管精英们的意识形态立场是如何不同，他们的根本目标却是一致的，即使国家强大起来。在某种意义上讲，民族主义和现代性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大抵是一起演进的。

还是让我更具体地考察韩国历史上现代国民的生产过程吧。刚解放后的一个时期里，反日情绪是一种能维持国家统一的有效机制。李承晚总统就很成功地激发了这种敌对的情绪。朝鲜战争之后，国家遭到分裂，其间又添进了亲美（或反美）主义。朴正熙总统当政时，因为60年代经济协作的缘故，与日本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国家便又借助于反共而非反日的情绪，在统一民心上取得了成功。在经济增长时期，国家又借着“振兴祖国”之类的口号，成功地将人民发动起来。严格说来，韩国民族主义在殖民地时期是一种抵抗排外的民族主义。解放后，它与国家命令相结合，成了为生产国民服务的意识形态，使国家得以进行卓有成效的动员。总之，韩国民族主义是在与反对日本殖民主义、反共产主义、亲美主义（如今则是帝国主义本身）等的分离与联结中发展起来的。在共产主义的威胁下，藉着跻身发达国家行列的目标，发展中的威权主义国家能够很有效地动员民众，但它对人民的福利或是反法西斯的民主政治



却漠不关心。

在官方话语中，民族、国家和人民是同一个东西。韩国社会在制造一个由社会中的中产阶级中年男性组成的“大多数人”上是极为成功的。直到最近，大众媒体还在频繁地使用国民情绪之类的表述，它们起到了堵塞其他意见和想象的作用，而且这些咒语般的语词还能为生产“国民”的单一的主体性贡献力量。“有伤和睦”（wihwagam chosong）这个语词在压制新的声音出现上也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一位电脑公司的总裁指出，强调“一体化”不仅会压制人们的自由，而且也会阻碍经济的发展。他回顾说，尽管韩国已经开发出自己的彩电，但政府在一开始却不同意投入生产，理由是这会引起纷争，“有伤和睦”。

复杂的现代社会只有通过将差异予以体制化才能达到统一，韩国却通过复制同一种东西来创造一致性，这显然是与建设现代国家的目标相悖的。每逢危机发生，顽固不化的保守派就会得势，其原因也许不在于这些集团拥有潜在的权力资源，而是因为社会上没有能与它们相抗衡的别的压力团体或是一种新的激进话语。通过普遍动员来实现现代化，不仅削弱了个人日常生活的维度，而且也生产出一种极权主义文化，人们受到纪律和监督的训练，市民社会也无从产生。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一个人要是站在与其民族或家族身份相异的其他主体的立场上来思考或行动，那是很危险的。

生活在这样一种单一的极权主义的文化环境中，国民如今也因为无力创造自己的身份，而时不时“自愿地”加入到他们自身异化的再生产之中。比如，人们读到一则日本游客的评论，说韩国人令人钦佩，因为他们在公共汽车上会主动给老年人让座；于是他们开始为了确证其作为一个韩国人的身份而勤于让座。他们的举动参与进了大韩民国生产“值得尊敬的国民”的过程。如果有人问：“韩国人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他们头脑中会下意识地涌现出一个在汽车上让座的韩国人的形象。

我并不否认有诸种相区别的主体存在。但是，这种区分却未能在官

方文化领域得到确立和自我表达。快速的经济增长以及这一势头将延续下去的神话不允许这些主体维护一种“差异”，而一直最卖力地鼓吹“团结起来就能生存”这一口号的大众传媒也没有倾向于包容这些变化。有些大众传媒的管理者至今仍想用诸如“国民情绪”和“有伤和睦”这些语词来把不同的人联结为“一个伟大的大众”。

韩国能将这种国民的再生产延续多久呢？一位前往观看今年春天进行的韩日足球比赛的学生告诉我的一幕场景透露了一些可以预期的变化。以“红魔”著称的狂热球迷和来自日本的“超强日本”（Ultra Nippon）啦啦队一起欢呼，在体育场里营造出一种友好的气氛。那些嘲笑辱骂日本球迷的是其他一些观众，而不是“红魔”。那位学生说他们看上去都像是一些找不到自己生活目的的人。他们也许是那种人，只有在有一个敌人或是一个仇恨对象时，他们才会活跃起来，才会真正献身给作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的民族。确实有这样的国民，他们为诸如“我们要打败日本”、“不是胜利就是死亡”、“拯救我们的国家”以及“在日本的韩国人，不要屈服！”之类的话所感动。他们个人的梦想是和盼望国家跃升为一个强国的民族主义野心联结在一起的，他们渴望的是一种等级清楚的秩序和可以用力量和数字来衡量的成就。他们被一体化的美景所迷惑，遭受着相对剥夺的痛苦，习惯了用“中心”和“边缘”的两分法来思考问题。他们想要通过成为一个强国的国民来克服自己的自卑情结，所以将一切体育竞赛都转变成与自我和自尊相关的东西。在足球比赛中要击败日本的不可思议的力量不过是正在上演的维护民族自尊的整场戏里的一个情节。很显然，“民族”这个词在韩国仍然有力量动员一批人。

然而，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不再乐意加入到这样的爱国主义游戏之中。由于目前的危机，对国民的意义产生怀疑的人更加多了。下面这段文字节选自延世大学的学生李贞恩（音译，Yi Chong'un）在我的“文化与人性”课上提交的一篇报告：

“集金”运动掀起了这样大的风波，使我颇感不安。虽然

我无法确定这究竟是什么原因，但我的感觉确实糟透了。最近发生的关于电影《泰坦尼克号》的荒谬的争论，使我终于无法再控制住这种情绪了。即使这件事是真的（男主角列奥那多·狄卡普里奥说了些侮辱韩国的话），我们（我）对社会上这种通过大造声势来压抑个人看一部电影的欲望的现象又该如何反应呢？……那些没有看电影的人会感受到一种愚蠢的爱国主义，好像他们为国家做了一件好事，而那些看了电影的人则会觉得像是犯了罪。文化趣味竟由爱国主义的需要所决定，人们又竟然会“心甘情愿地”踩进这样的陷阱之中，在这种境况下，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即使是为了救国，人们也不应该受到这种具有欺骗性的爱国主义的蛊惑。当然，我也知道生活在社会中是不可能完全独来独往的，但至少我不愿意一切事情都是迫于大多数人的意见的压力而作出决定的。这个社会要压抑和否决看一场电影的普通的自由，它让我感到厌恶……就在刚才，我看到一条贴在互联网上的消息。有人声言品牌背包“EASTPAK”的意思就是“消灭东方”。发贴的那个人表达了一种报复的欲望，说是“我们要做一个WESTPAK的品牌”。（当我看到这条消息）我忍不住叹了口气，同时也觉得可怕。这种不正常的爱国主义是如何产生的？又是如何得以维系不坠的呢？它还会持续多久？也许有人会被“韩国人在危难中团结起来”这样的词句所感动，但这些词句在我听来却很可怕。对我来说，这些虚假的辞藻只不过是一种文字游戏，和一种欺骗。

我能看见个体在快速增长的阴影下，在国民这一单一主体的幽影里屏气凝息。我也能看见具有反思精神的“非国民”的涌现，他们怀疑是否还能再相信这样一个国家，它竟然坚持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财政援救声明之前韩国根本就没有任何危机，却完全不顾这一事实，即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声明之前，韩国金融破产已经昭然若揭。现在，

国民的生产以及一种单一主体性的构建似乎再也不能通过外在的压力或是内部的分化而延续下去了。留下来的任务是如何去解构国民，如何去承认并组织内部的种种差异。

前一阵子，我听一位劳工运动方面的专家说，只有当在一个阶级内部能形成对于谈判的共识时，阶级之间的谈判和妥协才有可能进行。这位专家指出，韩国在建立有效的谈判程序方面一直举步维艰，就因为谈判即使在一个阶级内部也很难达成。工人们在短时间内能组成一个团体，但事实上，他们仍然是被其个人利益分割开来的。由于在一个阶级内部甚至是在每一个职业团体内部都从来没能通过谈判达成一致，要想获得任何一种全面广泛的赞同就更加困难了。只有当差异性能够得到充分的表述，脱中心化和灵活性被认为有价值时，一种广泛的和解和赞同才有可能实现。韩国人迫切需要认识到社会分化的存在，学着去建构灵活的另类主体性，这些主体性能使他们与形形色色的“他者”同存共处。

2.2 没有个人，只有家庭

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挽救家庭”成了最急切的呼声之一。家庭是与“强国”梦相连的另一个神圣实体。就像现代化生产出了大批绝对信奉“永恒国家”观念的国民一样，它也大量生产出了大批虔信永恒家庭观的家长。

大众传媒正在积极地掀起“给男人一点鼓励”和“支持父亲，为他们加油”的运动，这些父亲们已经被金融危机弄得沮丧不堪。因为担心父亲们的失业会造成家庭的解体，大众传媒再次呼吁人们要团结起来。在告诫人们要支持一家之长的同时，大众传媒又毫不犹豫地指责女人们浑浑噩噩、挥霍无度，败坏了国家。政府失业救济金也首先发放给男性工人。根据工人的工作表现定酬的“基础性调整”由于家庭意识形态和家庭工资制度——它无条件地支持作为养家糊口者的父亲们——的缘故而被迫延搁。这些不同的尺度清楚地显示了谁才是国民的核心。男人被认为是必须首先予以保护的国民，而女人作为边缘化的国民，却要先被

解雇掉。

“挽救一家之主”的运动进一步证明了这一事实，即在压缩型经济增长时期，父亲们已经被简化为挣钱机器。随着经济危机开始对作为养家者的家长的角色构成破坏，人们担心以男性家长为核心的整个家庭结构会分崩离析，因而才会出现“挽救家长”的运动。被高度工具化的家庭如今遭到了极大的危险。为何现在有一些父亲会抛弃家庭而选择自杀呢？仅仅是因为他们丢掉了工作吗？而家庭却向来被认为是一个躲避非人性的竞争世界的庇护地。

家庭本身因作为家庭栋梁的家长之故而解体，这暗示着早在危机发生前，家庭即已处于解体之中。许多父亲除了赚取家庭生活费用之外似乎别无它用，他们没能履行作为一个家庭成员的角色，尤其是没能创造出亲密的关系。在压缩型经济增长时期，许多男人作为经济赡养者确实赢得了尊敬，但是与此同时，父亲却成了家庭里最最工具化的孤离的成员。

在别文章中我曾经写到，韩国的现代化如何创造了“男主外、女主内”的现代性别空间。我也试图去揭示在这两种空间之中，男人和女人之间发生的看不见的战争是如何进行的（赵慧净，1996）。在对家庭的理解上，男人和女人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别。对男人来说，家庭是建立在通过父系传承的血缘关系之上的家的扩展。而对于女人来说，家庭既包括了其所出生的那个家和她的孩子们，也包括了她“姥亲”那一系的家。男性家长的家庭观一直被普遍认为有着官方权威性，对家庭的官方性的阐释便成了掩饰现实的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当资本主义发展抵达高级阶段，这种现代家庭自然而然会瓦解，性别角色也必须重新予以界定。随着电视和录像侵入到起居室里，电话和寻呼机将家庭与外面的世界联系起来，变化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学校、大众传媒和消费主义轻而易举地破坏了父母的权威，在家庭成员之间维系一种亲密的对话关系已变得越来越困难。韩国社会经历了一个戏剧性的现代化过程，意识形态与现实之间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可是

国家却仍然牢牢地控制着家庭生活。

韩国的教育制度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可以用来证明国家对家庭的干预达到了何种程度。韩国的教育制度是以培养学生准备大学入学考试为核心的，它使国民动员得以有效地进行。学校作为人们接受训练的地方发挥了作用，而这种训练是为促进国家的出口导向的压缩型增长所必须的。在此过程中，家变成了大学入学考试战场的训练基地，而不是一个关心和爱护的空间。母子关系变成了类似于选手和教练的关系。由于担心自己的孩子考不上大学，父母们心甘情愿地参与到他们的孩子的“工具化”之中。孩子们得成为“战士”，为他们的“私利关系网”、为再造其家庭的社会地位而战。作为回报，孩子们获得了消费的权利，他们可以动用父母赚取和积攒下来的钱。作为消费者，孩子们渐渐开始按其提供物质条件的能力来评估他们的父母，而父母们甚至也按其支付家教费用和满足孩子物质需要的能力来进行自我评价。在压缩型变化的过程中，父母的文化角色严重地衰退了，与此同时，他们作为物质供养人的角色却在相应地增强。

当家庭的现实与其理想形式相距越来越远时，有可能会出现两种反应：人们或是对其理想家庭的观念进行修饰，或是更加执着于现存的理想形式。后者是一个有能力应付危机的社会的反应，而前者则恰好相反。那韩国的情况又是如何呢？为何权力精英和大众传媒丝毫不提要“重建家庭”呢？

不久以前，我到当地政府机关（“洞”）去，发现以前那位工作起来安安静静、效率很高的女职员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位“家长”，他做起事来既缓慢又懒惰，还与旁边的职员瞎聊天。有相当数量的妇女因为丈夫失业，为了养家糊口而被迫加入到劳工行列之中。然而，妇女们的这种处境却极少被提到，惟一被强调的是她们如何努力想办法帮助丈夫，使他们不致陷入到沮丧之中。有不少妻子实际上是一家之主，能赚到钱的妻子也不在少数。她们惟一希望的是在工厂中能得到与男人平等的对待，他们的丈夫能停止大男子主义式的夸夸其谈，料理好自己的事情。

尽管时代变了，但大众传媒却仍然把关注点放在男性家长身上，执意认为结构性的改革能够挽救他们。在全部一家之主中有 16.8% 是妇女，妇女还占据了工人总数的 40%，这些统计数字和事实在此却并无意义（Cho S. 1998）。

我最近从一个好朋友那里听到，一家外国银行新任命的一位部门经理制定了在雇佣上实行性别平等的政策，说是必须改变公司的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既然人们已经认识到以财阀为中心的体制是问题根源所在，他们为何却认识不到以男性为中心的特权制度同样也会对经济造成损害呢？为何至今还有人会沉湎于这样一种鲁莽的想法，即哪怕不改革现存的性别关系——它把男人和女人划分成“社会的领导者”和“在家里的”两种人，仍然能进行结构性的改革呢？

我认为其原因是和前面部分所讨论的问题相关的；即“私利关系网”的存在阻碍了能在国家、家庭和个人之间进行调节的健康的公共空间的产生。在压缩型增长时期，社会成员认为被动员起来、被工具化是很正常的事，同样的过程也出现在家庭内部。家庭甚至必须承担起本应是国家职责范围内的福利功能。随着国家体制的加速崩溃，家庭也濒于崩溃的边缘。到目前为止，家庭似乎通过由血统和紧密的生存单位意象而唤起的强大情感，成功地把家庭成员联结成了一个统一整体，但这仅仅是表面上的现象。

事实上，在朝鲜战争期间以及其后飞速发展的紧急状态时期，家庭确实发挥了为其个体成员提供基本需求和生活意义的核心作用。然而，在经济危机中，当代家庭的现实已显露出来；家庭内部的交流途径已经崩溃，这一事实已变得越来越清楚。韩国迄今未能发展成为一个福利国家来关心其国民，与此同时，家庭也不能提供其成员所需要的更多的关爱和亲密感情。就像有人开始质疑国家一样，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对家庭的价值提出了质问。许多年轻人开始认识到家庭令人窒息；他们认为家庭仅仅只是一个经济学上的生存单位而已。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乐意离开他们的家庭。但在这个时候，他们却并不具备经济上的条件。这是那种

时间进程的非同步性所带来的另一悲剧，也是韩国人必须予以处理的问题。

3. 我们应该寻找何种主体性，联合哪些人？

过去人们曾经互相利用、彼此压迫。
一种力量通过伤害他者而获得兴盛
另一种却通过爱护他者而得到兴盛
我们应该选择哪一种？

我不时地会碰到一些年轻学生问我，如若没有从家庭和民族而获取的力量和情感，怎能书写历史和维系生命呢？有时我自己也为这个问题而深感困扰。在这场危机中，除了那些植根于民族和家庭之爱的力量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种类的力量和动向呢？政客和商人之间的密室交易和勾结——家族的、地方的以及校友之间的关系网络使其得以成为可能——是给韩国经济发展这趟快车提供动力的“燃料”。真有可能解开这种食物链的环扣吗？在反常的经济发展时期牢固建立起来的私利关系网和官僚威权主义是否能够铲除呢？

迄今为止，那些无力谋生的人还能依靠一些积余存生，这还得感谢持续的经济增长所造成的涓滴效应。而如今为了生存却将有一场真正的斗争。外部环境的变化使目前的体制已无法再维持下去，国内的阶层分化也到了一个危急的阶段。与此同时，那些自感陷于困境中的人们越来越趋于自我保护，越来越忧心忡忡。倘若压缩时间的强度阻碍了市民社会养育起其自我意识，那么韩国人如何能创辟一个新的开端呢？他们能信赖那位据说是非常勤于学习的新总统吗？无论他有多么精干，也不论他的智囊们有多么睿智，对他来说，要从“三金时代”的威权主义政治文化中脱身而出，摆脱民族主义的本质论以及由训诫和大众动员的极权

主义政治所创制的“恐怖文化”，仍然会是很困难的。

韩国的知识分子必须认识到他们所生活的世界是一个自己身陷其中的封闭的圈子。压缩型的高速增长造成了发展的不平衡，也制造了一种扭曲的欲望网结。由于陷入了身份认同危机，相爱的人也会因令他们甚感困扰的种种欲望和文化专制主义而彼此伤害。历史的破产已显露无遗，在这种历史中，为了创制一种国家主义的或民族主义的主体，各种各样的主体性被删削殆尽。社会在迅速地丧失其自我生产的创造力量。

韩国社会如今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打比方来说，韩国人需要作出决定，或是疏浚他们的灌溉系统以便更好地耕作，或者只是在权力精英们中间分割已有的收获物，而放弃这一年里更多的产物。他们会继续耕作还是会让自己堕入毁灭呢？有人说阶级结构正在以世界性的规模进行重构。不论其属于哪个民族，全世界人口正在被两极分化成比率为 20 : 80 的富裕阶级和贫寒阶级。^[8] 尽管这些事实已是确凿无疑，许多韩国的权力精英却仍然“选择”相信民族是永恒不灭的。当一个民族中的大多数人都将落入世界阶级体系中被边缘化的类群时，爱国主义心理却拒绝认真探讨阶级和资本问题的一切努力，产生这种心理的根源是什么呢？在韩国人中间谁参与了改变世界阶级体系？最近，多国资本通过更加巧妙的办法为其主宰世界而建立了一个牢固的基础。它也开始将民族主义援为己用，不管他们是否认识到，激昂的民族主义者和多国资本家极有可能联合起来。

在过去三十年里，韩国人一心扑在经济上，想在极短的时间里把经济搞上去。现在他们必须动用自己所有的感觉和思想能力，迅速地判断出自己所面临的是何种危机。这正是他们“通过实践学习”如何解构和建构自身主体性的好时机。个人应该从哪种观点和立场出发，与哪些群体达成联合呢？我觉得伟大的现代思想家们已经说出了很多需要说出的东西。留待每个人去做的是创造出真理得以在其间付诸实践的个人自己的局部空间。对那些舒舒服服地躲在他们的“知识”之“井”中的专家学者，我感到有些怀疑；他们不想承认变化。现在已到了需要对专业化

这个概念重新加以界定的时候了。现在已到了人们开始创造出一种能够用来理解在压缩型和殖民地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本土制度的时候了。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就必须抓住政治经济和文化心理戏剧之间复杂的相互影响，以获得一种认识论上的超越。

我曾提出过关于民族、国家和家庭的一些观念都应该重新加以检验（赵慧净 1997）。只有在那些观念被成功地解构之后，才会出现围绕阶级、性别和资本问题展开的更加生机勃勃的辩论。关于韩国民族主义，我赞同权晓范（音译，Kwon Hyokbom）的论断，即它是“一个业已成形的系统，在其间事物只在一个自动封闭的圈子内部运行。”（Kwon 1998）民族主义已成了话语政治的核心，国内保守的和激进的政治集团都拿它来获取权力，而围绕它建立起来的制度至今仍是巍然不动。他们的语言丝毫不留反思的余地。

为获得必需的“认识论”上的超越，就必须对时间性的性质进行反思。我看到有越来越多的人想要恢复在现代化过程中被摧毁的日常生活世界。日常生活世界的恢复有可能通过对时间的管理而得以实现。如果对时间不加控制和管理，就会一无所获。人总是要死的，从这一本体论的认知出发，还需要有一种哲学观和方法论，它可以减缓变化的步伐，直到最终能发现一种可用来节制欲望和管理日常生活时间的制度。人们也许习惯了抱着悲观主义而不是乐观主义的态度生活。在此意义上，金融危机可以视为一个转折点，它提供了从龙卷风中脱身而出的机会。减缓变化的步伐最终意味着资本的流动需要加以节制。若是不作广泛的努力来调节垄断资本制度、扩展日常生活的领域，那么就不会有任何变化。

我/我们要承认社会分化的事实并在分化主体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新的体制。我得重申全民一体化的美景已不复存在。那种可以在“危急情势”的胁迫下动员起来的“国民”也将不会再有。我们费尽辛苦想谋求的较高的社会地位只会引发更多的焦虑。被工具化的家庭只会要求自我牺牲，从而使我们的痛苦永远摆脱不掉。对我们来说，只有各种各样的关系和群体，要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上，这些关系和群体必须在各

种不同的层次上予以创制和维持。

因此，在讨论民族之前，让我们先谈一谈男人和女人、年轻一代和年老一代、有钱人和没有钱的人之间的差别。在讨论家庭之前，则让我们先谈一谈个人。我现在关心年轻的生命，并不是把他们当做“学习机器”，而是把他们当作是活生生的文化行动者和遭受挫折的失业的年轻人。我既是朝鲜半岛上的一位居民，同时也是一个亚洲的和全球的女性主义者。我从自己所拥有的各种各样的立场中作出选择，正是它们决定了我之为我。

作为一名学者，我/我们必须停止在已有的框架内进行思考。我/我们应该用怀疑的眼光来看待现存的有学者匠气的概念，推翻我/我们一直使用的语言，并改变现代学术自身的边界。现在已经到了需要将现实置于意象之上、将归纳置于推演之上的时候了。这个时代需要我们去作翔实透辟的田野工作和参与性的观察，就像人类学家置身于一个陌生的世界，回还往复地穿越各种边界，让时间和空间面对想象而敞开。

结 语

米兰·昆德拉在他的小说中这样评说“缓慢”：“在缓慢和记忆之间，在速度和遗忘之间，都有着一种隐密的联系。设想一下这个极其普通的场景：一个人沿街而行。在某个时刻，他努力想回忆一些东西，但记忆却从他那里逃走了。他不知不觉就放慢了脚步。与此同时，一个想要忘记自己刚刚经历的不愉快事件的人，则会开始不知不觉地加快自己的脚步，就好像在竭力使自己远离一件在时间上依然相距很近的事情一样。”

韩国人一直在匆匆忙忙、不暇思索地往前赶，是不是为了忘记那些他们被迫经历的可怕经验呢？“别谈论什么现实！别放慢脚步！”韩国人民一直顺从这些命令，并允许它们控制自己的日常生存，这使他们能够获得经济上的奇迹。

我认为这种情形并不是韩国独有的。相反，我认为这是许多第三世

界国家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甚至是第一和第二世界的国家，在其不得不经历的压缩型高速发展中也会遇到这一现象。经历过现代化的许多社会都曾遇到过这种无力形成其自身历史的问题。

今天早上我打开电视机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条关于政党内部分裂的新闻标题，声称“这一周至关重要。”我/我们生活在一个每个星期都是至关重要的社会里，这个社会不仅其危机是长期性的，而且还使危机变成长期性的。面对这样严峻的现实，我常常觉得难以忍受。瓦尔特·本雅明曾写道，“危急的情状不是例外，而是规律。”这句话多少也给人一些慰藉。

我梦想着有一天能够安排自己的时间和空间，能有更多的想象力和爱心。我要开辟一个崭新的反思空间，它将冲破那个只会无休止地复制贫乏语言的封闭圈子。我要写一篇比这篇文章更具对话性的文章。我真想知道是谁在操纵时间，使我的生活变得如此忙碌。

【附记】 本文是为汉城延世大学研究生会组织的一个研讨班而准备的，因此最初只是为当地听众作一些解释。韩国知识分子在目前的“金融危机”中的沉默让我感到愤怒和挫折，本文即是在这种心情下写成的。重读此文，我为其中洋溢着“启蒙精神”的夸张表述而感到羞愧。在译成英文时，我基本上未作大的改动，这部分的是因为我至今未能从经济衰退所造成的郁闷心情中恢复过来。同时也因为我作为政府顾问和解决突发性失业危机计划的组织人，一直忙于在目前的“危急情势”下做一些实事。此外，我也看不出为了英语读者而改写此文有何意义。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上，阅读“原汁原味的文本”，训练自己用敏感的感受力来理解，这对说英语的人们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这项工作在经济上得到了现代韩国研究学会的资助。感谢迈克尔·申(Michael Shin)翻译此文，萨拉·罗尔斯顿(Sarah Ralston)和珍妮·马丁提出了批评意见，在编辑上也给予许多帮助，对此我也深表感谢。

(倪伟 译 [韩国] 朴姿映 校)



参考文献

马歇尔·博曼 (Berman, Marshall) (1982) 《一切固定之物都化为乌有》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New York: Penguin Books.

赵慧净 (1997), 《“亚洲话语”兴起中的女性主义干预》 (Feminist Intervention in the Rise of “Asian Discourse”), 《亚洲妇女研究杂志》3 (3)。

——(1996), 《以男性为中心的国家里的婚姻故事》 (Marriage Stories in a Male-Centered Republic), 《重写婚姻故事》 (Rewriting Marriage Stories) 1 (2), 汉城: 另类文化。

——(1995), 《韩国考试战中的儿童》 (Children in the Examination War in South Korea), 收入沙伦·斯蒂芬斯主编: 《儿童与文化政治》 (Children and the Politics of Cultur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曹喜渊 (Cho, Hyiyon) (1997) 《亚洲发展理论的再检讨: 以国家发展概念为考察核心》 (Reexamination of the Theory of Asian Development: Focused on the Concept of the Development State), 载《经济与社会》 (Economy and Society) 36: 46-76。汉城: Hanul 出版社。

崔善敬 (音译, Cho, Sun-kyung) (1998) 《对市场经济和儒家家长制的评论》 (A Critique of Democratic Market Economy and Confucian Patriarchy), 为韩国妇女研究协会举办的每月论坛提交的论文, 3月21日 (未发表)。

安东尼·吉登斯 (Giddens, Anthony) (1991) 《后现代性》 (Post-modernity), 李贤姬 (音译, Hyoun-hee Yi) 译 (1998), 汉城: 民荣社 (Minyoungsa)。

大卫·哈维 (Harvey, David) (1989) 《后现代性的条件》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Oxford: Basic Blackwell。

金皓起 (Kim, Hogi, 1998)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时代的社会学》 (Sociology of the IMF Era), 载《知识分子报告》 (Report of the intellec-

tuals), 汉城: 民音社 (Minumsa)。

米兰·昆德拉 (Kundera, Milan) (1995): 《缓慢》 (Slowness), 金边旭 (音译, Byonwook Kim) 译, 汉城: 民音社 (Minumsa)。

权晓范 (音译, Kwon, Hyokbom) (1998) 《市场 / 经济崇拜时代的全球化和民族主义》 (Globalization and Nationalism in the Age of Market/Economy Worship), 为韩国妇女研究协会举办的每月论坛提交的论文, 4月18日 (未发表)。

保罗·拉法耶 (Lafarge, Poul) (1997) 《懒惰的权利》 (The Right to be Lazy), 曹炯俊 (音译, Hyoung-jun Cho) 译, 汉城: 新潮社 (Saemulgoyl)。

汉斯·彼得·马丁, 哈罗德·舒曼 (Martin, Hans Peter, Harold Schumann) (1997) 《全球化的陷阱: 全球化和对繁荣与民主的攻击》 (The Global Trap: Globalization and the Assault on Prosperity and Democracy), London: Zed Press; 康秀东 (音译, Kang Sudong) 译, 汉城: 永林社 (Youngrim)。

J.N. 皮特斯, P. 毕库 (Pieterse, Jan Nederveen and Parekj Bhikhu) (1997) 《想象的殖民》 (The Colonization of Imagination),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平英植 (音译, Pyon, Yongsik) (1998) 《韩国人的爱国主义》 (The Patriotism of the Korean People), 《朝鲜日报》 (Choson Newspaper), 2月9日。

杰里米·里夫金 (Rifkin, Jeremy) (1996) 《劳动的终结》 (The End of Labor), 李英浩 (音译, Young-ho Lee) 译, 汉城: 永林社 (Youngrim)。

伯特兰·罗素 (Russell, Bertrand) (1997) 《懒惰赞》 (In Praise of Idleness), 宋恩敬 (音译, Eun-gyong Song) 译, 汉城: 社会评论 (Sa-haepyongron)。

莱斯特·瑟罗 (Thurow, Lester) (1997) 《资本主义的未来》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 柳宰勋 (音译, Jae-hoon Yoo) 译, 汉城: 高丽苑

(Koryowon)。

李秋魂 (音译, Yi, Chuhon) (1998年2月19日) 《从艺术中看20世纪: 福柯与玛格丽特》(Seeing the 20th Century Through Art: Foucault and Magritte), Hangyoreh Newspaper。

注 释

[1] 这个题目借用了艺术评论家李秋魂 (音译, Yi Chuhon) 的一篇论艺术思想的文章的标题, 该文见 Hangyoreh Newspaper, 19 Feb. 1998: 13。

[2] 千里眼是韩国最大的电脑网络服务商之一。

[3] 马丁和舒曼指出, 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勒特韦克 (Edward Luttwak) 第一个使用“涡轮资本主义”这个词。

[4] 翻译讨论全球资本主义之黑暗未来的书已经成了一个热潮。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数马丁和哈罗德·舒曼 (1997)、杰里米·里夫金 (Jeremy Rifkin) (1996)、和莱斯特·瑟罗 (Lester Thurow) (1997) 等人的著作。

[5] 论述压缩时间性的著作包括: 安东尼·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 1991)、大卫·哈维 (David Harvey, 1989) 和马歇尔·博曼 (Marshall Berman, 1982)。有趣的是, 其后出现了许多讨论时间性和忙碌的生活方式的书和文章, 比如米兰·昆德拉 (1995)、伯特兰·罗素 (1997) 和保罗·拉法耶 (Paul Lafarge, 1997)。

[6] 当然, 我并不是说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是根本不同的社会。事实上, 我根本不想让自己陷入到把世界分为“我们/他们”这种二分法中去。我深知, 即使在同一个国家里, 人们也会因为阶级和性别的差异, 而对时间和空间有着截然不同的体验。

[7] 这段话引自艺术批评家李秋魂 (音译, Yi Chuhon) 论热内·玛格丽特 (Rene Magritte) 和米歇尔·福柯的一篇文章。该文发表于 Hangyoreh Newspaper (1998年2月19日13版), 这段话原本是用来解释后现代状

况的诸多方面的，但它也包含着另外一些东西——它们准确地抓住了生活在封建、现代、后现代相互混杂的时代里的人们的体验。

[8] 马丁和舒曼 (1997: 26-2) 认为在一个“20:80”的社会——其人口中只需要 20% 的人劳动——里，要维持世界资本主义并没有什么大的困难。不论其民族性，这 20% 的人都能获得一个职业并积极地投入到生产与消费生活之中。按照他们的说法，剩下的 80% 的人将不是面对极其不稳定的半失业的状况，就是得悄没声息地活着，满足于统治结构所提供的很少的一点娱乐和营养品。

寻找“近代”

——来自日本的思考轨迹

孙 歌

1942年，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的一群知识精英召开了一个以《近代的超克》命名的座谈会。以战争的暴力性为背景，这个座谈会折射出当时日本全民参战的社会氛围，和知识精英在太平洋战争爆发这样一个特定历史时刻投入战争的“学理性”热情。除少数人提交的论文之外，座谈会本身并没有正面讨论战争，它的主题是欧美的现代性催生的基本问题和西方现代性在日本产生的效应和副作用，以及日本精神的再发现等等问题。主持者在座谈会结语中强调会议的主旨在于张扬被大东亚战争的宣传性口号所压抑的精神上的努力和能力。这个结语还特别指出，在那个意识形态高压的时代里，所谓“想说的不能说”其实仅仅是一种感伤的独白而已，这个座谈会既区别于意识形态口号，又区别于感伤的独白，它要讨论的是“我们怎样才能成为现代日本人”^[1]。

尽管座谈会忠实地实践了这个结语归纳的宗旨，但是它忽略了现实的残酷性。这个在温泉旅馆里相当奢侈地持续了两天的讨论，无论它多么远离战场，却没有在形式上区别于官方意识形态或反官方意识形态以外的第三条路可走。在反官方意识形态基本上不存在的1942年，以表面上配合或默认官方意识形态的形式进行独立的思想建设，很容易与真正的官方意识形态混为一谈。事实上，在这个座谈会里，这两者基本上被混淆了。因而，尽管具体评价有种种差异，其后的日本思想界对于这个座谈会的一致性看法是它与当时的法西斯战争意识形态有某种复杂的共谋关系。



然而一个悖论现象却一直与这个评价并行不悖，那就是尽管这个座谈会口碑极差，但在后来的思想者那里，它却远远胜过同时期的任何一个质量更高的座谈会，被不断地提起和分析。在重新分析这个座谈会的一系列努力里，传达出对于一个基本事实的确认：这个座谈会对于后世仍然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意味着它并不仅仅是一时一地的意识形态喧嚣，其中暗含着某种对于后来者仍具启发性的价值要素。

于是，这个悖论就被以下述方式加以处理：人们试图超越这个座谈会本身而把它视为那个时代的一个思想符号，从而通过这个座谈会引出二战期间乃至更长的历史时段内日本思想的基本问题；因而“近代的超克”在完成这个符号化任务的同时，就不得不承载远远超过它自身含量的历史和思想内容：它被要求回答日本近代意识形态与法西斯主义的关系、日本现代性基本问题以及战争和知识分子责任等一系列重大的问题，也因而被谴责它未能有效回答这些问题。

沿着这样一个基本思路，我们可以读到出自战后知识分子之手的一系列“近代的超克论”。座谈会《近代的超克》与后世的“近代的超克论”，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和独立的问题群，向我们展示了日本知识分子有关“近代”问题基本思考的轨迹，对于这个轨迹的勾勒，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所谓“近代”的冲击所激发的那些并不仅仅属于日本或东亚的问题。

一、《近代的超克》座谈会的基本轮廓

《近代的超克》座谈会，是由杂志《文学界》在1942年主持召开的一个跨学科的知识分子座谈会^[2]。这份杂志虽以文学为本业，但是在当时却是以跨学科的开放式讨论闻名的。据河上彻太郎回忆，为了创造这种开放式的意象，《文学界》特意把哲学家三木清拉来作同人，并时而在文人们内部为三木清的评价问题发生口角^[3]。然而即使如此，有一个事实仍然是不可忽视的，那就是，《文学界》同人基本是以文学为基点

思考和讨论的。进而，另一个事实也必须强调，那就是当这个杂志的同人决定发起这个座谈会的时候，他们构想了讨论的基本思路；这意味着，这个貌似跨学科的讨论其实拥有一个相当文学化的架构^[4]。

这个持续了两天的座谈会讨论了这样一些内容：文艺复兴的近代意义；科学中的近代性；科学与神学的联系；我们的近代；近代日本的音乐；历史的演变与不变；文明与专业化的问题；明治的文明开化的本质；我们之中的西洋；美国主义与现代主义；现代日本人的可能性。仅仅从这些小标题就可以看出，这个座谈旨在通过讨论西方现代性的基本局限达到“超克”它的目的，并且在超克近代的意义上强调日本本土文化的优越性。但是如果沿着这些小标题指示的方向去寻找座谈会的内涵，我们不会有太多收获：所有的讨论都因为参加者思路之间的差异在深入之前就被抵消了。寻找这个座谈会的真正内容，必须摆脱话题的局限，而追寻讨论话题的方式。

参加座谈会的除了《文学界》同人之外，还有来自“京都学派”的两位学者，以及专攻神学、自然科学、音乐等等学科的知识人。他们的参与使讨论呈现了立体性，也使本来就语焉不详的主题变得更为众说纷纭。但是恰恰由于他们、尤其是由于两位京都学派“代表选手”的参与，使《近代的超克》座谈会获得了有效参照：来自京都帝国大学的哲学学者西谷启治、历史学者铃木成高，在同一时期参加了另外一个由京都学派的学者举行的系列讨论《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它分三次在《中央公论》上连载，并与《近代的超克》相继结集成册^[5]。《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作为完成度相当高的系列讨论，反衬出了《近代的超克》的混乱，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就此断言，后者是一个失败的跨学科之举。

1952年，《文学界》又一次举办了被称之为《近代的超克》续集的讨论会，题为《现代日本知性的命运》^[6]。该讨论的内容姑且不论，比起内容来，更值得注意的问题在于人员构成：曾经参与过《近代的超克》座谈会的《文学界》同人基本出场，而几位学者一个也没有露面。假如在两次时隔10年的座谈会之间建立某种联系，那么，可以清楚地看到的



是,《近代的超克》其实是一个文人发起和延续的讨论。参加了这个讨论的那些学者战后的活动,更可以证实这一点:在战后几乎同一个时期,另一个讨论会则在讨论“什么是现代”的问题,司会的是参加过《近代的超克》讨论的铃木成高^[7]。该讨论会在某种意义上曲折地延续了《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中讨论世界史学理的部分,却与《近代的超克》的内在方向没有什么联系。

详细比较一下《近代的超克》和《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这两个座谈会的内在导向是非常必要的:在同样貌似挑战西方现代性、充当了大东亚共荣圈意识形态的两个座谈会中,讨论的导向有非常微妙但却是根本性的区别。通过这样的比较,或许我们可以接近那个棘手的问题:在后来的时代里,为什么混乱而无建树的《近代的超克》会被人反复提起,理路清晰的《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却只能被置于陪衬的位置?这个奇妙的现象背后,是否隐藏着某种历史的逻辑?

当《近代的超克》在河上彻太郎主持下开场的时候,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文艺复兴的近代意义”^[8]。这使得整个讨论获得了一个特别的出发点,使有关近代的讨论从文艺复兴这个起点开始。被指名阐释这个问题的是京都学派的铃木成高。尽管铃木在为会议提交的论文中谈到文艺复兴的评价问题,他的用意却显然在于对这个起点进行质疑。作为历史学者,铃木试图把话题引向历史学内部的学术复杂性:“尤其是在西方学界,最近十几年有关这个问题已经有了好多讨论,例如关于文艺复兴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也有各种说法,有的说文艺复兴是古代的复活,有的说文艺复兴是对于人和自然的发现,对自我的发现……但是在历史学内部,出现了只依靠这些概念性的规定难以处理的问题点,由此生发出了很多学问上的问题。关于那些问题,日本也有出类拔萃的博士写的东西,而且那是专门性的学问,我想一般人没有必要深入这样的问题。”^[9]

铃木成高试图传达的,其实就是京都学派的看家功夫——哪怕是进行意识形态表述,京都学派仍然试图把它学理化;而且,这种学理化在

他们看来正是“一般人没有必要深入”的问题。座谈会《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进行的。

但是在《近代的超克》座谈会上，文人们并不给铃木这个面子。他的学理性发言立刻被打断，曾经笃信马克思主义但已经转了向的文人林房雄不客气地问道：“你自己对文艺复兴是如何看的？”^[10] 铃木成高试图把话题再度引向学理，他一方面强调说自己的专业是西方中世纪历史学所以不是文艺复兴研究专家，一方面委婉地指出对于文艺复兴的通行认识太“近代化”了，他强调的是文艺复兴否定了中世纪但是也继承了中世纪。于是他又被主持会议的河上彻太郎打断，后者替他总结说：“那就是说，文艺复兴是中世纪的结论吗？”^[11] 铃木感到为难，因为文人们使用的是他刚刚指出的无法处理具体问题的“概念规定”，对话很难进行，然而他还是决定妥协：“说是结论，真让人为难。不过简单而言，也可以这么说吧。”^[12]

就常识而言，有关近代问题尤其是近代性问题的讨论，至少应该从18世纪法国大革命开始，启蒙应该成为一个重要话题，然而这个由日本文人结构起来的座谈会，却把近代的讨论与文艺复兴缠绕在一起。这当然很难归结为文人们的历史考证癖，倒是更让人联想起30年代中期日本文坛的一个特定时期：文艺复兴时期。

昭和8年亦即1933年，是日本文坛丰收的一年。这一年里不仅集中涌现了如谷崎润一郎等既成文学大家的峰巅之作和新兴文学家们的优秀创作，而且是《文学界》、《行动》、《文艺》等等在其后颇有影响的“纯文学”杂志同时创刊的年头，而在此之前，所谓“纯文学”杂志只有《新潮》一家。在1934年，改造社还出版了“文艺复兴丛书”。这种状况有一个特定的上下文，那就是20年代中期之后曾达到顶峰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运动的退潮。不言而喻，30年代日本政治局势的法西斯化和白色恐怖是导致这种局面的直接和主要的原因，但是马克思主义以“理论”的形态进入日本知识界从而并未催生出真正的本土思想传统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想立场，从它进入日本知识界的

时候开始直到现在，一直被以非常曲折的方式继承了下来，但是它与日本本土基本问题的关系却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一个难题。在 30 年代前期和中期，文艺界风靡一时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退潮，代之以“纯文学”的兴起，具有某种隐喻的意义：它象征着曾经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魅力所征服的文学家们，迫于白色恐怖的政治压力，更迫于无法有效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的窘境，在寻找突破途径的时候，求助于“纯文学”。与稍早些时候的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与现代派艺术运动合流的状况相比，这个求助于“纯文学”的思潮暗示了日本文坛的又一次艰难探索。正是这个时期，从 1933 年到 1937 年的 4 年间，被后人称做“文艺复兴时期”^[13]。只要粗粗地翻阅一下这四年间的文艺杂志，就可以发现，当时“文艺复兴”这个词的使用频率很高，而且被文坛各派的文人随意使用。它几乎是一个与“近代的超克”同样没有确定内容的煽情口号。

当河上彻太郎把“近代”的话题引向文艺复兴的论述时，他是否被记忆中的这个特定时期的印象所驱使，我们不得而知。能够判断的仅仅是，河上给西方近世开头的这个特定时期派定了一个独立和重要的位置，使它充当了有关现代性讨论的起点。这种做法明显违背了铃木成高作为历史学者的学术习惯，以至于他不得不又把话题引向启蒙时期和法国大革命。铃木在自己的发言中委婉地否定了河上的看法，他指出文艺复兴被简单地定义为近代的起点不合适，倒是它与中世纪的既否定又承续的连带关系更值得讨论。铃木和西谷一起合作，把有关文艺复兴的讨论转化为对于中世纪和近代关系的讨论，力图使它获得某种流动性，消解了河上彻太郎所强调的独立性。但是，由于神学者吉满义彦的不断插嘴，他们的努力也只能半途而废。

在同年 11 月的《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中，铃木成高和他的三位讨论伙伴也同样谈到了文艺复兴问题。把这两段讨论对照起来阅读非常有趣，因为在两段讨论中主要发言者都有铃木成高和西谷启治，而他们所谈的也是同样的问题；但是，在由文人设计的上下文和由京都学派学者

设计的上下文里，这同样的发言却显然具有相当不同的指向性。

在《世界史的立场和日本》中，文艺复兴的讨论出现在有关历史哲学理论诸种概念的讨论之后，其小标题为《西洋的文艺复兴与近世史》。在学者们的讨论中，文艺复兴不仅不具备独立讨论的资格，它的近代性本身也要加上很多注解。铃木强调说，过去的世界史观强调非连续性，因此在中世纪与文艺复兴之间建立了一个断层；与此相对，在中世纪内部发现古典的要素，在文艺复兴内部发现宗教性根源，成为另一种连续性的历史观。这就意味着，近代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世纪而不是近世的文艺复兴。他还指出，文艺复兴其实是意大利历史中的一个特定时期，不能简单抽象化为整个欧洲的历史时期。西谷启治在铃木成高的基础上把话题复调化，说连续性中有非连续性，非连续性中有连续性。而高坂正显则进而把话题从文化史概念转到了政治史概念，强调它与获取殖民地的过程直接相关，并且在此意义上把西谷的命题进一步历史化。要言之，在这个讨论里，文艺复兴作为认识欧洲史和世界史的一个环节，而不是作为近代的出发点，被确定了一个不能单独讨论的相对性位置。与河上彻太郎规定的文艺复兴话题相比，它既不具有近代起点的重要性，也不具备独立于其他历史时段的绝对价值：它只是欧洲近世的一个组成部分。

与《近代的超克》相比，京都学派的学者在自己的对话空间里显然没有遇到他们在前者那里遇到的麻烦：《文学界》同人们不喜欢纯学理的讨论，他们向学者们要的仅仅是个“说法”而已。换言之，他们希望在这些训练有素的学者那里找到一些有用的结论。正如学者有关文艺复兴的讨论被文人打断的方式所象征的那样，当对话被学者们复杂化从而偏离了某些易于接受的结论时，文人们的作用似乎就在于打断这种讨论。在整个《近代的超克》混乱的局面里，呈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基本结构。与此相对，在《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中，讨论沿着不会被打断的学者思路绵延下去，引经据典地阐发着“世界史”的学理——完成度的差异，来源于两个座谈迥然不同的内在结构。

与内在结构的差异相辅相成的，是两个座谈会主题的差异。表面看来，两个座谈会都试图处理二战白热化时期日本在世界中的定位问题，并且都在鼓吹日本的卓越性和领导权，但是由于讨论者定位的不同，导致了主题的根本差异：《近代的超克》规定的主题是讨论者主体的自身问题，而《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规定的主题却是讨论者面对的学理对象问题。这个根本性差异明确地表现在前一个讨论会的分工当中：学者们被派定的工作是在第一天的讨论里阐释西方近代的基本问题，而对于日本近代的讨论则是《文学界》同人的使命。在第二天的讨论里出场的主角们开始把话题引向自身的体验，这种微妙的差异从开场的小林秀雄与铃木、西谷的对话中清楚地呈现了出来。

小林秀雄是《文学界》同人中最为“学贯东西”的一位，在这个话题里，他和京都学派的学者表现得极为配合，使对话呈现了难得的和谐气氛。他们讨论的话题是历史里变化与不变之间的关系，在大致的方向上，似乎没有什么矛盾。三个人都认为前世伟人的到达点是后人不可企及的，而历史中新的创造其实都不过是以变化的形式对不变的历史主题的模仿；但是小林的出发点是“反近代”，亦即在对立于近代历史发展理论的意义建立一个历史亘古不易的叙述，而西谷、铃木的用意却在于强调现代人与古代人精神连接点的悖论性格。这个差异在河上的插话中被明确化了。当小林陈述了一套古典的不变性以驳斥进化史观的时候，在河上和他之间发生了这样的对话：

河上：“那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不过好像不说它是历史也没关系吧。”

小林：“不说是历史，说它是什么？”

河上：“更有普遍性的人学什么的……”

小林：“或者说它是一种美学……”^[14]

紧接着发生的事情，就是西谷打断这种典型的文人对话，把话题又一次引向历史。经过短暂的调整，两位京都学者终于夺取了话语权利，有效地镇压了文人们的“反历史”论调，基本上把对话者限定在小林一

个人那里。小林秀雄似乎也被他们的雄辩压倒了，不能不把自己的“美学观”又一次转向历史。当讨论在克服历史主义这一点上达到一致之后，铃木开始追问小林秀雄：他所表达的历史变化中的不变是从什么地方观察到的？而小林则回答说，“使我们惊叹、尊敬的对象没有时间也没有发展。……这是我们日常的经验。”^[15]

在京都学派的《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中，日常经验不占有位置。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几位学者，哪怕是表述自己的个人看法也必须引经据典。这当然并不保证他们的立场具有客观性，但是这却保证了他们的学术视野拒绝以日常性为基础。因此，在这个连续三次的讨论会里，学者们尽管比《近代的超克》更直截了当地讨论了战争并且在学理上论证了大东亚共荣圈的合理性，但是后来受到的社会谴责却没有后者受到的那么强烈。这并不能仅仅归结为《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在意识形态上没有讨好官方。正如铃木成高在与文人们讨论文艺复兴时强调的那样，“一般人没有必要深入这样的问题。”^[16]在排斥日常经验的意义上，京都学派的学者们排斥了“一般人”和他们的体验。与此相对，《近代的超克》中的文人们为自己的日常经验赋予了重要价值，这当然也不等于他们代表了“一般人”和他们的体验，但是在思路上，他们确实使日常经验变成了观察和思考的一个视角^[17]。

这既是《近代的超克》混乱性所在，同时也是它胜过其他座谈会不断被提起的原因所在。在日常经验的基础上，文人们组织了被归结为小标题的一系列话题，而京都学派的学者们是从学理意义上理解这些话题的。这样，在貌似相同的话题中，叙述被引向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就文人而言，“反近代”意味着对于本土“清洁的传统”^[18]的肯定，而对于学者而言，对于日本优越性的论述仅仅是世界史叙述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第二天的讨论“存在于我们之中的西洋”这个专题里，西谷启治与小林秀雄的对话典型地反映了这一点。

小林：“（西谷等人的论文）极端一点说，没有作为日本人语言的肉体感觉。这让我们感到，对于不能不使用国语写作这一宿命，哲学家们

实在是漠不关心的。无论怎样诚实地、逻辑地加以表现，既然言语是日本的，那么在文章的形态上就必须体现除了日本人就不可能有的味道。文学家对此总是有一种职业性的关心，这关系到文学的现实性，从而鼓动人或不能鼓动人。”

西谷：“要说使用为一般日本人所易于了解的语言写作，实在是没有那个工夫。说实在的，我们反倒是在感情上更意识到西方思想家的存在，想在思考上走得比西方人更远；比起关心日本人是否看得懂这样的问题来，还是突破西方人的死胡同的愿望来得更急切。……我认为，现在的日本文学和哲学都有一个不利之处，就是不存在那种兼有哲学家和文学家两种气质的中间性大人物，例如帕斯卡尔、尼采那种类型的人物。没有奠定产生这种人物的基础，对此文学与哲学两方面都有责任。”^[19]

小林与西谷表达的这个分歧呈现了日本知识状况的一个基本层面。由于明治以来的近代日本存在着根深蒂固的“西方情结”，跻身于西方列强的愿望在知识的层面上曲折地反映为“以西方为对象”的视角。京都学派在他们的学术活动中，始终贯穿着西谷启治所表达的那种面向西方的急切之情，对于他们来说，文人所关注的本土问题其实只不过是“突破西方人的死胡同”时必不可少的材料而已。在京都学派宏大的世界史叙述里，“日本”虽然被置于取代现代西方的重要位置，但是却从来没有被作为论述的终结点。“近代的超克”和“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这两个标题所表现出来的差异，正象征着前者包含了充满日本式“肉体感觉”的“对抗西方”的立场与后者“没有工夫”意识到日本式肉体感觉的“世界史”立场在方向上的微妙差异。

在1942年前后的历史时段中观察这种差异，可以看到貌似对立的这两种立场之间的基本关联性。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不仅使日本知识人在侵略战争问题上的不同立场获得了短暂的统一，而且使他们在如何对待西方的问题上获得了某种似是而非的同一性。就前者而言，弱小的东亚岛国向强大的美国乃至它的西方盟国挑战的姿态，遮蔽了日本此前对于东亚邻国的侵略为进步知识人所带来的焦灼感和罪恶感，以至于在偷袭珍

珠港之后的短暂时期里，日本知识人基本上只发出了支持战争和支持大东亚共荣圈的声音；就后者而言，明治维新以来一直存在的日本中心的立场和西方中心的立场之间的对立，以及这种对立派生出的种种复杂变种，也在这个短暂的时期里被统一到了“日本”的立场上来。借助于太平洋战争这样一个契机，日本内部围绕着西方近代冲击所产生的种种分歧，获得了被暂时搁置起来的可能性，《近代的超克》显示出来的文人学者间无法咬合却又勉强合作的状态，突出地体现了这种被暂时搁置的分歧，以及在分歧基础上所硬性推出的日本取代西方成为东亚强国的虚幻“同一性”。正如战后《文学界》再也没有力量召集京都学派的学者参与自己的讨论所显示的那样，1942年文人学者的这次勉为其难的合作，其实是借助于太平洋战争而完成的一次艰难的“文化认同”。它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因为它在同一个言语空间里统合了肉体感觉和理论思维、日常经验与学理思考、近代的主体性和历史观念与建构日本传统叙事的立足点等等难以统合的对抗性要素。必须强调的是，尽管这个讨论没有把战争作为中心议题而仅仅把其作为背景，但是它比任何讨论都更凸现了战争的暴力性，更揭示了这种暴力统合知识界的强大功能。

然而问题还不能就此了结。既然我们不可能把西方和东亚乃至日本视为均质的自足的实体，尤其不能无视东亚各国近代过程中接受与融合西方各国近代性要素的基本状况，上述分析就不应该导出“日本对西方”的二元对立模式。事实上，差异并不存在于日本和西方、传统与近代的对立中，而恰恰存在于这种二元对立的叙事在太平洋战争中被瓦解的过程中。文人并不真正代表本土传统，而学者也不代表西方的近代。在传统与近代、日本与西洋之类的问题上，40年代初的日本知识人并不存在真正的立场分歧。他们在《近代的超克》中所发生的争端，是紧紧围绕着近代叙事中的“日本”与“西洋”应该如何叙述的问题展开的。正是这“如何叙述”的根本分歧，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其后的“近代的超克论”，而《文学界》同人与京都学派学者之间的上述分歧，在其后的半个世纪里又引发了更为复杂的讨论和歧义。

二、竹内好与荒正人的“近代的超克论”

经历了战败的惨重打击，日本的知识人以极其复杂的心态面对《近代的超克》这样一笔精神遗产。特别是东京审判和美国占领军的进驻，使得日本的民族主义和文化认同问题变得不再单纯。假如仅仅在批判日本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帝国主义功能的层面讨论它们，批判的任务和边界都比较清晰，但是加上了反美和检讨日本战后无主体状态的课题之后，这种单向度批判忽然变得有些隔靴搔痒。问题在于日本在战后面面对特殊的“被殖民”状况而又毫无道德正当性可言，既有的民族主义和文化认同都无助于摆脱这种尴尬的局面，但是又无法在既有的民族主义之外寻找新的认同。一个严峻的考验是，日本人是否有可能绕开民族主义的问题寻找新的自我认同方式？战后的一批进步知识人分别进行了尝试。共产党知识分子试图把自己的立场组织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中去，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给了他们直接的精神资源；而如丸山真男这样的批判知识分子，则继续坚持在西方的现代性理论中寻找思想资源以建立日本新的民主传统。不言而喻，这些批判和建构对于封闭的日本言语空间而言，都是积极的和有效的，它使得某些为日本人所陌生的语汇获得了合法性。但是与此同时，这些进步知识人也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些批判并不足以真正取代它所批判的对象而成为日本社会新的“日常经验”。在日常经验的层面上，《近代的超克》所提示的那些“日本人的肉体感觉”并未得到知识人自家消费的现代性话语的真正打造，小林秀雄和西谷启治所触及的那个基本问题，即言论和学理针对谁而发的问题，在急剧的社会转型期又一次浮出水面。

在战后的全民总忏悔之后，《近代的超克》作为一个“隐痛”，从京都学派相关学者的战后叙事中消逝了。相反，“世界史叙述”通过所谓“日本文化论坛（forum）”这一具有官方背景和保守色彩的民间论坛得以传承，京都学派的四个学者几乎又都在这个论坛中露面，而《文学界》

的文人们与这个团体无关。在“世界史”叙事和“超克近代”叙事之间，本来就存在的方向性隔阂，在这种状态下进而扩大为一堵墙，把对于这个座谈会的回忆完整地留给了文人。1952年4月《文学界》发表的座谈会《文学界二十年的里程》，由河上彻太郎、林房雄、小林秀雄等人又一次提起了《近代的超克》，它完全被描述为文人们的私人活动。^[20]就当事者而言，这个座谈会已经成为了怀旧的对象，不再是思想史上的事件。而作为战后批判和反省战争中知识分子协同鼓吹法西斯意识形态时的反面教材，这个座谈会在另一方面也遭到了各个层面日本人的非难，这样的非难又进而引起了维护这个座谈会合理部分的“复权”要求。

在这样的状况下，1959年11月，竹内好发表了他著名的论文《近代的超克》^[21]。这篇论文中心的论点是，要把象征符号、思想、思想的使用者这三者区别开来，寻找那些相对独立于体制的、以意识形态方式呈现的思想（竹内好称之为“作为事实的思想”^[22]），从中提取出建构日本思想传统的资源。不言而喻，竹内好继续了他在战后一直坚持的“火中取栗”的思路，试图在这个名声不佳的座谈会中寻找战后日本思想界的真正课题。

竹内好在论文开头就清醒地指出，“近代的超克”是知识人纯粹为了自家消费而制造出来的用语，它与民众消费的用语不同，但是在缠绕着复杂的战争与法西斯历史记忆这一点上，它与民众用语的功能是一致的。因此，在当时30岁以上的日本人那里，没有人能够对这个特定用语不做复杂反应地加以使用。

可以说，竹内好的整篇论文都是围绕着这种知识阶层的复杂反应展开的。他注意到，座谈会的当事人并不具有推动一个思想运动的能力，但是这个驳杂的座谈会却被视为一个意识形态的符号，从而在座谈会的评价问题上产生了“复权”与“否定”两种对立的看法，而它们在同为意识形态式批评这一点上，又是一致的。竹内好尖锐地指出：以小田切秀雄的《近代的超克》批判为代表的左翼知识人的理论把这个座谈会分为抵抗与屈服两个侧面，认为它的结局是屈服，与军国主义本质上是一

致的，而在哲学史和思想史方面，对于《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的评价也是大同小异的。但是，（小田切）“这样的解释既不能有说服力地否定‘近代的超克’的复权要求，而且对于他认为的‘近代的超克’的现代版也是同样没有否定力度的。”^[23]

没有否定力度，是由于这样的正确解释与具体的事实之间有微妙的游离，这个游离恰恰存在于《近代的超克》的主题与它的实际话题之间。后来的论者基本上把这个座谈会的小标题作为着眼点和切入点，从而仅仅抓住了问题表述的混乱并从而断言这个座谈会必须和它之外的要素结合起来讨论；但是这个座谈会内在的结构与实际的话题其实并未呈现在小标题里。如上所述，由特定的文人集团和学者集团借助于太平洋战争的暴力性所完成的这样一个艰难的文化认同，集中展现了以学理的方式和日常经验的方式吸纳近代要素时的不同方向感，以及由此派生出一系列问题群；处理近代问题的不同方式之间的差异，是这个座谈会真正的内在骨骼；它构成了这个座谈会与它的主题貌合神离的真正原因。事实上，使用为军国主义张目之类的批判视角，正确固然正确，却无法说明这个座谈会真正的内在结构，也无法说明这个座谈会在当时的历史时期内所面对的真正课题。换言之，小田切这样的左翼文学家在进行批判的时候，其实遮蔽了批判对象的复杂历史面貌，所以不能够有效处理作为事实的思想。竹内好指出，处理“所谓作为事实的思想，是指观察某一思想为自己规定了什么课题，它又是如何在具体状况中被解决，或者未能解决。”^[24]显然，这与把分析仅仅导向正确的意识形态结论是完全不同的。竹内好所说的“思想”，当然不仅仅是正确的思想，它也包含各种各样错误的乃至有害的思想。但是，只要是思想，它就有相对独立于政治体制的影响力，这也正是思想对社会发生影响的立足点。《近代的超克》和《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恰恰拥有这种“思想”性，尽管正如竹内好指出的那样，它以思想形成为指归却以思想丧失为结果，但是它究竟并不是以对于体制的简单依附为前提的。

那么，《近代的超克》作为事实的思想究竟是什么？

竹内好紧扣住了太平洋战争。他指出，这个座谈会的真髓在于它传达出了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个特定历史瞬间里日本知识界的精神状态。它不仅反衬出此前为止长达十年之久的侵略战争中“自由主义”反战思想的无力，而且传达出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区别侵略战争和抵抗战争的两面性这样一个实际状况。竹内好援引了诸多同时代人的文字证明了一个令人痛心的事实：不同于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二战中的日本以“全民战争”的形态裹胁了日本民众，这场全民参与的法西斯侵略战争完全堵塞了在侵略战争之外反对侵略战争的空间。事实上，不仅当时的社会气氛根本不允许反战言论的存在，而且几乎所有的青年知识分子都不得不走上战场。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在主观上一贯拒绝和厌恶神话（即‘圣战’、‘大东亚共荣圈’等宣传——引用者注），同时却以二重、三重的曲折形态在结果上卷入了该神话，这一判断恐怕对大多数知识人是适用的。”^[25]在此意义上，竹内好认为除了少数例外，基本上不存在能够与旁观和逃避相区别的反战态度。

正因如此，竹内好紧紧抓住了河上彻太郎为《近代的超克》所作结语中的一句话：“作为我们的知性活动真正原动力的日本人的血，与迄今为止强行赋予它以体系框架的西欧知性之间的相克，致使我们知识人作为个人也难以摆脱这一切。”^[26]在战争状态下，这种相克正是导致诸如高衫那种把认同苏维埃的感情直接置换为支持太平洋战争态度的根源，它融合了日本知识人亚洲主义的历史记忆，把战争正义与否的问题遮蔽殆尽。这也正是致使抵抗与服从的行为表面上难以辨认的特定状况。当战后世界格局重新分化，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世界两大阵营取代了欧美对亚洲的历史记忆，也取代了轴心国和反轴心国的战时格局，导致“日本人的血”不得不重新寻找它赖以流淌的动脉。竹内好深知，战后左翼阵营的批判，其实并没有克服这种状态，所以它没有能力面对战后依然存在着的“日本人的血”，以及它的“二重、三重的曲折形态”。

但是，“日本人的血”并不是均质的，这也是《近代的超克》内在混乱的原因所在。竹内好完成的主要工作，就是对于这个座谈会以及它

所处的那个高度紧张的时代内部的具体状况进行甄别。作为一个思想家，竹内好在这篇论文中留给我们的一个重要遗产，其实并不是那些被后人反复引用的论断本身，而是在状况里面分析这样一个思想立场。这个状况，首先就是大部分国民参战的现实。竹内好指出，国民参战并不是因为服从军国主义者的命令，而是为了民族共同体的命运自愿尽力。区分天皇、国家和国民是战后的事情，无法类推到战争时期。竹内好的这个清醒的认识，帮助他有效地指出抵抗和服从之间的一步之差才是当时最真实的状况，换言之，他看到了战后被建构的所谓“反战力量”的虚假性，察觉到真正的反战可能性其实仅仅存在于主流意识形态之中，那是因为，除掉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没有其他思想力量能够对全民参战这一现实发生影响。

竹内好进而在《近代的超克》中寻找这一反战契机。这个座谈会当然是一个使用主流话语并且在结果上配合了战争意识形态的讨论。但是在这个话语空间里，其实仍然存在着使用主流话语（亦即战争话语）但却从内部改变它的可能。竹内好看到的可能性，首先是京都学派体现的“教义胜于现实”的立场，它虽然没有给这些学者带来有效的参与现实的视角，并且事实上导致他们把自己的理论发展为一片空论；但是在主流意识形态被高度法西斯化的时代，这种对理念独立性的强调却暗示了某种思想独立的可能。^[27]与此同时，《文学界》同人所显示的对于“日本人的血”的关注，以及对于明治以来日本社会“文明开化”和盲目追赶西方这一状况的批判态度，也让竹内好看到日本建立自我主体性的渺茫希望。在此基础上，竹内好更关心的是被视为日本浪漫派核心人物的保田与重郎在他臭名昭著的著述活动中所显示出来的“打破所有范畴、以此灭绝思想”^[28]的功能。他指出，在以毒攻毒的层面，这种思想破坏的力量在逻辑上可以被利用于意义转换，从而在区别于脱亚入欧意义上的强有力思想主体的引导下，建立不同于京都学派战争理念的行为自由。但比这些具体分析更重要的在于竹内好提出了一个原理性的问题：在所谓集权制国家里，真正的民主可能性不是在体制之外以对抗的方式

形成的，它恰恰是在体制之内以“修改”体制的方式艰难生长的。因此对于主流意识形态而言，真正可怕的未必是“反体制”的力量，而是体制内的异己；对于反体制的民主派而言，有效的手段也恰恰是在主流话语内部改变它的性质，而不是在外部做出对抗的姿态。这就是“火中取栗”在集权制国家的重要性。战争和二战时日本的白色恐怖状况，作为一个极限状态，提供了观察这一情况的有效材料。

但是，竹内好并没有在《近代的超克》中找到这些可能性的生长点，他看到的仅仅是一个试图在极限状态下创造思想传统但是却最终被极限状态压垮的失败尝试。日本近代史上所有进退两难的困境都集中在这个座谈会里，而它却没有正视这一切。竹内好说，由于困境在这个座谈会里烟消云散了，它最终只变成了官方战争观的解说。他无法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知识界会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毫无矛盾地把支持日本军国主义与支持苏维埃反法西斯战争视为同样性质的行为？这后面隐藏的，不就是日本知识人对于“近代”的基本认识框架吗？“西方”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对手，作为日本最大的威胁，左右了日本近代以来的全部世界想象，战争作为现代化过程中一个暴力性的环节，被组织进了这样一个想象之中。但问题还在于，《近代的超克》这一未能面对的困境，在战后不但依然存在，而且依然未能被面对和解决，用竹内好的话说，这造成了日本战后思想的虚脱状态。

这个困境，就是围绕着东亚近代化过程所发生的日本何去何从的问题。战后的日本政府接受了一种不得已的观念：“占领即解放”，从而把日本捆绑在美国的战车上，并且趁机推卸了日本的战争责任；而曾经卷入过整体战争的国民，在战后则沉醉于新的文明开化风潮，亦即建设以西方为蓝本的现代经济福利社会。在日常经验的层面，人们封存了日本对于亚洲、特别是东亚的责任这样一个明治以来的老问题，也同时封存了以日本的亚洲主义为线索贯穿起来的半个多世纪的曲折尝试。京都学派学者显示的那种面向西方的急切心情，由于战后的复杂政治局势，被合理化乃至获得了某种道德正当性，反倒压抑了“近代的超克”曾经显

示过的那种微弱的“肉体感觉”在开放视野中艰难再造的可能。在对抗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的意义上，在抵制日本天皇制的民主主义建设意义上，西方的思想资源构成了日本进步知识分子的有力批判武器，而西方近代所具有的殖民主义性质和对于东方的黑格尔式历史认识，却构成了进步知识人的盲点。观察一下 50 年代日本知识界数不胜数的座谈会，可以发现讨论阵营的划分其实并非严格受制于进步知识分子和保守知识分子这样的区分标准，而是更多地受制于对西方现代性理论资源的使用方式和熟悉程度。借助于战后日本的归属问题，意识形态与政治立场在知识阶层呈现的，是比简单划分立场远为复杂的知识组合形态，知识界在日本何去何从这个大前提下，不断调整着思想分歧的讨论角度，也不断重构着思想阵营。

竹内好敏锐地察觉到，建立新的东西二元对立模式不可能解决日本何去何从这一难题。这是因为，50 年代末期日本优越论又一次沉渣泛起，在诸如“日本文化论坛”某些文人的表述中，日本被叙述为东亚的指导性国家。在《近代的超克》失足之处，战后的日本主义者又重蹈覆辙，而进步的知识人却几乎无法借助于西方的资源有效对应这种局面。危机意识引导竹内好重新开封《近代的超克》，试图在被简化为意识形态结论的这个思想史事件中发现新的可能性。竹内本人或许并未意识到，他的这次并不成功的尝试，意义其实不在于是否发掘出了他所说的健全的民族主义，而在于显示了政治正确的思想立场其实往往无法有效处理状况中的问题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难题。

竹内好的论文在当时的知识界立即引起了反响，有一些看法与竹内好的看法形成的张力关系，构成了当时知识状况的一个基本层面。1960 年 3 月，杂志《新日本文学》以竹内好为中心组织了题为《关于“近代的超克”》的座谈，其中哲学和大众文化研究者鹤见俊辅的发言是值得深思的。鹤见说，他对于竹内整理这个座谈会的方式无法认同，因为他不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他强调说，日本从明治以来，自小学教育开始就在灌输非战的常识，民众层面存在着反战的可能性，所以不能说整体

战的思想是存在于日本国民深处的基本思想。他还举吉本隆明为例，说明竹内好所主张的发掘健全的民族主义的路是走不通的。鹤见主张不避简化之嫌地强调和平反对战争，因为“杀人不好”，明知会失败却故意发动的战争更不好。他把自己的立场称之为“算术式的和平论”。^[29]竹内好有礼貌但是却毫不客气地揭示了鹤见俊辅这种政治正确性的无力：他说，鹤见俊辅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都一直在美国，事实上他并不了解战争中那一代人的真实感受，也不了解12月8日作为一个感情上的分水岭所具有的微妙功能。至此，竹内好与鹤见俊辅显示了同样处于进步立场的知识分子在课题意识上的差异：竹内好要处理的是战争时期的国民体验，他苦恼着的是，这种国民体验并不是算术和形式逻辑之类的教条能够左右的；而鹤见俊辅要处理的，却是一个正确理论的推论和应用的可能性。他作为一个在美国接受了大学教育、相当国际化的知识分子，尽管一直在话题上关注日本的大众文化，但是却并未在体验上进入过他所关注的对象。这种微妙的距离感保证鹤见俊辅远离了那些最危险的视角和领域从而始终保持着正确姿态。在日本的进步知识分子里，鹤见或许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是他的代表性意义却恰恰由于这种极端性而显示得非常充分。

另一种意见与鹤见俊辅不同，基于战时的体验而发，但是同时也与竹内好相左，这就是荒正人所代表的某一类左翼知识分子的意见。荒正人作为曾经加入日本共产党、又因为政见不和而退党的进步文人，从学生时代开始就以其热情的文人气著称。从1960年3月开始，他在杂志《近代文学》上连载长篇论文《近代的超克》，直到8月号为止，共发表了6篇。尽管该论文在结构上东拉西扯，而且毫无交代地就从9月号停了笔，但是作为对竹内好同名论文的回答，荒正人的话题远比鹤见俊辅深入，因为他基于战争中的某种“体验”提出了一些重要问题，而且击中了竹内好的某些盲点

在第一篇里，荒正人提出了一个不无见地的看法：竹内好似乎有一个理想的《近代的超克》意象，所以他脱离了实际的座谈会，把不在场

的一些人拉进来，又对在场的人进行有选择的忽略，这种做法不利于讨论这个座谈会本身，比如竹内好完全无视在座谈会中最为活跃的神学者吉满义彦的言论，而他却是最彻底的“近代的超克”论者。荒正人强调说，《近代的超克》其实仅仅是那个讨论会，没有必要把它看得那么重。^[30]

尽管荒正人自己后来的讨论离开这个座谈会更远，但是他的这个看法仍然指出了竹内好讨论方式中的一个潜在限度，那就是竹内好的确有一个自我设定的《近代的超克》意象，这与他在战后执着于火中取栗地开掘日本思想和民族主义的可能性有直接关系。在竹内好的论文中，座谈会本身其实并未得到讨论，他讨论的仅仅是这个座谈会在那个特定时代以及在历史脉络中的定位问题。这个限度恰好与竹内好的课题意识相关，因为他关注的是座谈会所体现的特定时代氛围，而不是这个座谈会的话题本身。不言而喻，这妨碍了竹内好从整理话题的角度继承这一笔精神遗产。比如，他几乎完全无视《近代的超克》与《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之间的差异，把后者归纳到前者之中；这样，竹内好无形中限制了思考特定时期思想形成的多种可能性。

继而，荒正人对于竹内好在文中谈到太平洋战争时提出的“不可能依靠帝国主义打倒帝国主义”的观点进行了激烈抨击，因为在这样的观点之下，苏维埃的反法西斯战争将无从定位。荒正人对于竹内好的批判虽然有些强词夺理，但却暗示了一个重要分歧：在竹内好看来，苏维埃的反法西斯战争仅仅是一个背景，它并不能构成讨论二战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暗示了竹内好对于战争和现代性关注的基点，其实在于东亚如何回应西方现代性的冲击，俄国在竹内好那里被定位于西欧内部分化的标志；它作为一个特殊的思想资源，一直是竹内好思考中的盲点^[31]。同时，竹内好以战后东京审判为契机，最终奠定了这样一个观点，即日本和美国不过是在争夺东亚的殖民地而已，其关系并非是文明对野蛮、正义对侵略，而是帝国主义对帝国主义。^[32]与此相对，荒正人则一直把俄国视为看待二战的一个视角，他由此引申出了一个命题：美国作为俄

国和中国的盟国，在事实上支援了民族统一战线，抗击了日本的法西斯主义。所以，尽管美国是帝国主义，而且战后在东亚的所作所为具有明显的扩张和殖民性格，但是荒正人仍然坚持反对竹内好这种对美国和日本等而视之的做法，他认为应该从法西斯与反法西斯这样一个基本轴线上多角地把握第二次世界大战^[33]。在这样一个基点上，荒正人展开了他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并且尖锐地指出：《近代的超克》就没有否定资本主义这一点而言，其实是没有超克近代的。他还援引了当时另一个座谈会《复古的真意义》，指出后者与《近代的超克》同样否定了个人主义而没有否定资本主义^[34]。进而，在下一篇文章中，荒正人翻出了竹内好战时写作的《大东亚战争与我们的决意》与《中国文学的废刊与我》，不依不饶地把竹内好描绘成了一个为侵略战争张目的法西斯知识分子^[35]。

就事论事地看，荒正人对于战争的把握比竹内好更为接近当时的国际局势与政治判断^[36]。但是在事过境迁之后，我们却不得不谨慎地面对一个困难的课题：竹内好在他的《近代的超克》中提出的那个日本如何回应现代性冲击、如何在东亚建立日本自身的“健全的民族主义”的设想，是否由于鹤见俊辅的理论推演和荒正人的激烈抨击而被消解掉了呢？后者的工作是否能够取代竹内好的课题意识，从而有效回击新一轮的“日本优越论”呢？

同年12月，《近代文学》发表了由荒正人、竹内好、花田清辉、山室静出席的四人座谈，题为《日本人与文学》。花田也以《近代的超克》为题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尽管竹内好对其给予了高度评价^[37]，但是由于它是一本随笔集，处理的问题过于分散，所以似乎影响力受到了限制。时值荒正人严厉批评竹内好的论文连载之后不到四个月，竹内好与荒正人的坦诚相见，展现了真正的危机意识之下才有可能出现的动人合作关系。

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有关《近代的超克》的话题并未成为这次讨论的中心。而且由于参加者之间的差异，这个讨论整体上看是散漫而肤浅

的。但是在话题由民族主义到国际主义再到日本文化论之后，荒正人与竹内好之间仍然开始了有节制的辩论。通过讨论广岛长崎核爆炸的责任问题，荒正人再次强调太平洋战争的“反=反法西斯战争”的性质，而竹内好则伺机把话题引上日本和美国都是帝国主义的方向。荒正人和竹内好的分歧在于，前者不同意把太平洋战争视为日美两国之间的战事，强调它是轴心国和反轴心国之间的较量；这样，无论如何苏维埃的定位就得提到日程上来；后者则坚持强调说美国在战后居于其他西欧国家之上充当了霸主，日本事实上只是向美国服了输；因此，把美国独立提出来正面交锋是必要的。荒正人主张日本必须先承担侵略战争责任，然后才能讨论广岛的问题，竹内好则在同意这一原则的基础上强调美国是已经了解了日本准备降伏的情况之后才开始轰炸的。最后，辩论没有任何进展不了了之，两个人的看法没有找到任何接触点。

然而这个讨论却象征了其后的日本进步知识人内部的基本分歧。时隔四十年，日本知识分子在广岛问题上还在重复荒正人与竹内好的问题意识，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推进，这究竟是因为什么？

一个基本的思考线索仍然存在于竹内好的《近代的超克》之中。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众多的“近代的超克论”中，任何一个在政治立场上比竹内好正确、在解读上比竹内好精细的文本都没有能够像竹内好的这个文本那样超越时空地被一次次重提，只有竹内好的这个充满了民族主义乃至大东亚主义“嫌疑”的《近代的超克》，在日本思想史上成为了名著。

我相信，那不是因为这个文本没有瑕疵，而是因为，只有竹内好在那个进步与反动被单纯地归类为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状况下，敏锐地觉察到了问题并不存在于这种归类之中，并且以最为直接的方式强调了打破日本对西方、民族主义对国际主义、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这种二元对立思维的迫切性。竹内好没有找到取代二元对立的理论模式，但他充分调动了战争经验者的感情记忆，并且尝试在感情记忆中挖掘活着的原理；对于竹内好来说，战后对于这场战争的反思遮蔽了它的原理性，那



是因为，日本的现代性问题以二战为顶点，它基本存活在各种形式的对外扩张状况之中。竹内好不相信整整一代人除了意识形态之外没有任何思想，不相信这段思想史是一段空白，在战争历史中甄别出现代思想形成的基本路向，甄别出思想与暴力之间的复杂关系，是竹内好的基本课题。当他在《近代的超克》中找到思想形成的蛛丝马迹时，最棘手的问题在于，他试图挖掘和重造的日本思想资源几乎都是被“污染”过的，它们不仅在历史上与日本的军国主义相关，而且在新的时代状况中仍然基本上是日本保守派乃至右翼的意识形态。不仅如此，竹内好本人也曾经在战时试图使用这些被污染的词汇制造思想。竹内好诉诸于战时的感情记忆和体验，并且试图在感情体验中寻找流动的原理，是因为他深知抽象表述会遮蔽一些微妙的差异之点——在对外侵略的意识形态中，隐含着在历史上曾经萌发但又被扼杀了的对于东亚的责任感；在对抗西方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之中，也包含了使日本成为世界史一部分的努力。假如这一切都被“正确”理论一笔勾销，竹内好的疑问是，日本人还有什么资源可以建立思想传统、可以承担历史责任？外来的思想和观念依靠什么转化为本土的思想观念、又如何影响本土的日常生活经验？

当竹内好的这个疑问转化为他寻找和清洗本土思想资源的行动时，他遇到的阻力来自左翼知识人。如何在状况中寻找原理、如何在状况中保持原理的生命力，这一切都取决于自我否定的能力。使竹内好区别于鹤见俊辅这一类知识分子的，是他进入复杂现实状况的能力；使他区别于荒正人这一类知识分子的，则是他在状况中寻找原理的本能。对于竹内好而言，理论不是认识状况的出发点和归结点，它只能存活在状况之中。正如竹内好与荒正人的分歧所显示的那样，前者追寻的原理是流动的和生长的，而后者则执著于某些既定的原则。这样的分歧本身就是原理性的，它的悬而未决致使当年发生在竹内好与荒正人之间的分歧今天仍然是一个基本的分歧。竹内好呼吁把困境作为困境来对待，是他给自己，也是给日本思想界提出的重大课题；遗憾的是，这个竹内好自己无力解决的难题，并未得到同时代人的关注，在一次次论争中，他的

努力被扭到完全不同的方向上去。当竹内好在 70 年代初宣布自己走下论坛的时候，他只好把这个未能解决也未能引起关注的难题留给了后人。

三、广松涉的《〈近代的超克〉论》 与西尾干二的《国民的历史》

当竹内好退出论坛埋头于《鲁迅文集》的翻译工作时，1974 年至 1975 年，又一部《〈近代的超克〉论》在杂志《流动》上开始连载；而当它被印成小册子的时候，竹内好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

新的《〈近代的超克〉论》出自左翼哲学家广松涉之手，他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宝贵的文本——假如没有这个文本，今天在梳理《近代的超克》这条思想史线索时或许要面对更多的技术性难题。

广松涉的这个文本非常难读。这倒不是因为他使用的语言和文体佶屈聱牙，而是因为他并没有像他的前辈那样明快地提出自己的问题。他似乎总是动摇在意识形态批判和思想分析这两者之间，最终也没有找到有机组合它们的方式。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比较顺利地进入这个文本，因为他花费了一些篇幅来批评竹内好。

广松涉对于竹内好的批评在第七章才展开，换言之，他并未把竹内好当年的课题意识作为自己立论的出发点。事实上，尽管广松涉的思路实际上很受竹内好的影响，但他并不认为竹内好的文本提出了重大的课题，更不认为应该沿着竹内好开辟的思路把这个课题进行下去；他认为这个文本对其后有关“近代的超克”的讨论起到了定向作用，应该对其进行重新讨论。但是为什么竹内好的文本会对其后的讨论起到定向作用，这种定向又在何种程度上被篡改或利用，这一切似乎不是广松涉关心的问题。

广松涉对于竹内好的批评集中在两点上：一，竹内好在文中提到“近代的超克”论在战争期间连战争与法西斯的意识形态也未能充当；二、日本从大东亚战争到太平洋战争的整个过程中隐含的“战争的二重



性”未能得到剖析，这同时意味着日本没有把困境作为困境来对待。

广松涉的确抓住了竹内好提出的核心问题。然而遗憾的是，他的批评并未超过当年鹤见俊辅或荒正人的水准，甚至有些地方还不如荒正人精彩。就第一点而言，广松涉的批评是：京都学派即使仅仅拥有可以完美地论证开战诏敕的教义学，已经足够充当战争和法西斯意识形态的工具了。他们的思想力量的确不足以推动现实，但是思想的力量有时不必直接推动现实，他们的解释能够使当时的青年相信大东亚战争的世界史意义，就足够充当现实的能动性契机了。关于第二点，广松涉进行了有意无意的误读。他抨击说，“竹内氏明确地提出，‘《近代的超克》是所谓日本近代史上困境的凝缩’、‘复古与维新……国粹与文明开化、东洋与西洋，这些基本轴线上的对抗关系……一举作为问题爆发出来的，就是《近代的超克》的讨论。’这岂不是说《近代的超克》的讨论正是被当成解决这种困境的认识对象了么？有关战争的二重性格的说法也可以同样置疑。不过，或许有人会说竹内好并不认为这个座谈是对于困境的真的认识，而且也不认为它真的剖析了战争的二重性格，即便就最终确认而言不可能与他硬唱反调，但是就当时的问题看，‘近代的超克论’是以它的方式认识竹内好所说的‘困境’和‘二重性格’，并立志于‘解决’乃至扬弃统一它，正因如此，它才得以回应了往日意识形态的要求。”^[38]

广松涉这种明显无视竹内好上下文的做法并非出于矫情。同当年荒正人与竹内好的对峙一样，广松在此也显示了与竹内好的分歧。这个分歧在于，竹内好试图火中取栗，而广松涉要做的却是洞若观火。换言之，前者作为战争的直接体验者，作为一个在战时曾经为大东亚共荣的理念寻找新的正当性和生长点的失败者，在《近代的超克》中要寻找和复原的是一种历史的临界状态，以及在特定情境下转化这种临界状态的必要条件；后者作为战时尚且年幼的间接体验者，关心的却是对于历史的裁决。尤其是当广松涉面对 60 年代末世界性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所提出的反叛既定秩序的课题，面对来自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又一次“近代的超克”



要求时，解构新的“日本浪漫派”意识形态的课题被他视为己任。但与竹内好不同，一直依靠西方现代哲学工作的广松涉可以在理论上反对西方中心论，但是却在感觉上并不相信东方存在处理现代性课题的思想资源。更何况当时他面对的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日本的右翼思潮泛滥，他很难像竹内好那样思考东亚现代化的不同模式，只能凭借西方近代以来的思想资源重新开掘历史。这样，广松涉在建构与京都学派同样浩大的“超克近代”的叙事时，理所当然地忽略了竹内好叙事中最基本的思想契机——置身于历史对象内部，寻找历史真正的张力所在。广松涉的叙述充满了火药味，但是却缺少必要的内在紧张，这使他在扮演历史裁决者的同时，也与历史中最为跃动的部分失之交臂。

广松涉在认定了《近代的超克》意识形态功能的前提下，亦即在拒绝从这个座谈会中寻找思想尝试或思想失败契机的前提下，展开了他对于这个座谈会的思想清理。对于一个以哲学思考为业的人来说，把握“座谈”这样一个特定的言语空间是相当困难的，所以他基本避开了对于座谈会本身的讨论。同时，他把话题从一开始就引向了京都学派的世界史哲学，但是同时也避开正面讨论京都学派分三次进行的座谈会。这样，广松涉依靠的主要材料是出自京都学派学者的专著或论文，而不是他们在座谈中的对话、尤其是对话中的潜在分歧和冲突——不言而喻，相对于个体性的著述，座谈会的特征在于提示个体思路之间的交错和碰撞，以及这种交错和碰撞所暗含的思想路向的组合可能；尽管竹内好也没有如同荒正人强调的那样仅仅把目光设定在两个讨论会中，但是他关注的显然是昭和前期和中期的特定言论空间，以及在这个空间中不同思考与主流意识形态的不同张力关系；所以，竹内好得以提出对于符号化的“近代的超克”进行内部的一系列甄别这样困难的课题；广松涉虽然试图建立一个有关这个时期思想状况的庞大深层结构，但是由于他基本不进入“座谈”式的思路，他的空间意识其实只是形同虚设，流于概念而已。他不仅把《近代的超克》与《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混为一谈，而且基于对竹内好的批判把二者间立场的微妙差异无差别地简化为替主流意识

形态张目的工具。广松涉说：竹内仅仅把《文学界》和京都学派的两个座谈会以及日本浪漫派置于视野之内，忽视了三木清这样的意识形态鼓吹者，“在此前提下，诚然会导致他所认定的结论，但以他的视野处理‘近代的超克’论，作为昭和思想史论的方法论程序还是过于狭隘了。”^[39]

广松涉进行的一个明显的置换，是他无法进入《文学界》同人的思路所导致的^[40]。他把竹内好只提了一笔的三木清作为连接文人与学者的重要纽带，是因为三木是文学界同人，同时也是京都学派出身。当三木清被视为《文学界》的代表时，广松涉就可以把对文人的讨论束之高阁，保持其话题的学理严整性了。但是姑且不问三木清对于《文学界》以及这个杂志同人的代表权问题，问题更在于，这种置换方式完成了一个理论上的偷换，把历史上那个有明确限度的象征符号“近代的超克”无限地扩大为整个昭和思想史的基本结构。这个基本结构就是广松涉最关心的以天皇制为顶点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及其意识形态。对于日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的批判分析，是广松涉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思想课题，他指斥竹内好的“程序”过于狭隘，是由于后者仅仅在文明论和文化论的视野中处理相关问题，不能从社会史角度处理广松涉的课题。就其他课题（比如亚洲主义的课题）而言，广松涉的批评也许是正确的，但是就《近代的超克》而言，他的批评恰恰显示了他的弱点：在宏大的社会史和观念史叙述中，广松涉通过对于竹内好的批判遮蔽了一个被竹内好提出又被荒正人等明确化了的重要思路：《近代的超克》作为一个言论空间，它在日本现代思想史中所起的作用不能等同于讨论者乃至相关者个人的观点，更无法简单还原为社会史问题；它本身显示的问题的多面性和它在当时社会气氛中为某些无以名状的感觉赋予固定形状的独特功能，是只有少数座谈会才可能完成的；就此而言，任何独立的著述都无法与之相比；恰恰是在这样一个为感觉赋予固定形状的意义上，这个充满了冲突和对抗但又高度妥协的座谈会提供了把历史分析从图式化推演中解救出来的契机。

广松涉对于这个问题显然毫无兴趣。他不仅过分强调了《近代的超克》中京都学派的作用从而不顾事实地认定只有京都学派的学者确定了这个座谈会的基调，而且强迫这个座谈会承载超乎它负载限度的社会历史内容。在前后共 10 章的长文中，广松涉分别讨论了京都学派学者高山岩男的世界史哲学、西田几多郎哲学的定位问题、三木清哲学的意识形态窘境、日本资本主义的特质、昭和维新和日本共产党转向声明的特定社会史含义，日本浪漫派的民族主义情结与其世界感觉的关系，文人的近代的超克论的虚无主义倾向等等。但是，这个貌似博大的架构中暗含的问题其实是非常集中的，它们可以简要地归纳为如下几点：

一、广松涉认为“近代的超克”无论是口号还是这个座谈都没有解决要超克的近代是什么的问题。由于对象的不明了，所以讨论不会有结果。与此相关，京都学派的学者所设定的世界史理念和超克近代的课题也没有提供有效的突破现状的理论模式；

二、以反驳竹内好区分思想与意识形态这一设想的方式，广松涉强调无论是座谈会本身还是当时的知识人，都在起为意识形态助阵的作用；虽然他同时强调知识人的思想功能，但是他反对把思想从意识形态中区分出来的做法。

三、广松涉通过对于西田哲学和京都学派世界史理念的分析证明，所谓“本土对外来”的模式是不符合历史状况的，在当时的京都学派和《文学界》同人那里，日本与西方并未以简单的方式截然分开；在此意义上，广松涉认为当时的课题意识达到了相当的水准。

四、通过两章昭和政治史和社会史分析，广松涉揭示了“大东亚共荣圈”是如何把对外侵略与内部权利关系的调整结合在一起的。尤其是借助于对于日本入侵满洲时国际国内关系的分析，他指出内外危机的调节是如何相互制掣的。

作为一个思维缜密的哲学家，广松涉的文本很注意把握问题的多侧面性，他提出的很多结论几乎无可指责。他似乎既照顾到了意识形态批判也照顾到了思想立场，既分析了哲学和历史学理论建构的概念，也没

有忘记理论之前的“心情”。在抽象结论的层面，广松涉似乎没有遗漏什么。然而，有一个隐藏在这些结论背后的基本问题很容易被忽略：当广松涉进行立场正确而又面面俱到的分析时，他混淆了两个基本视角之间的差异，并通过激烈的批判遮蔽了这差异本身的重要性。这就是意识形态批判与思想批判立场的差异。就前者而言，它追求的是立场的正确和对现实的直接指导功能，所以广松涉对于40年代知识分子的基本责难就是他们在意识形态上的为虎作伥和没有指出一条摆脱现代性困境的出路；就后者而言，思想批判并不简单等同于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分庭抗礼和为现实寻找出路，它关注流动状况之中的原理，并献身于这样的原理。广松涉在展开他的论述时，其思路与他的结论常常背离，结论中出现的在意识形态中整理思想的意图并未成为他组织自己论证的框架，相反，他把分析集中导向了对于《近代的超克》的意识形态批判。就连书中最精彩的昭和社史分析也没有为他带来任何思想性的清理，它们仅仅被用来驳斥竹内好的“狭隘”。竹内好在他的论述中强调了京都学派的空论与大川周明这样的实际活动家的言论的区别，暗示了应该在两个方向上认识这两种言论的性质；同时，竹内好在日本近代以来的一系列“困境”中为这个座谈会定位，强调的是多种要素的“一举爆发”，这也为座谈会确定了一个限度：它虽集中了多种张力关系，却并非是社会政治权力关系的直接投影。广松涉无视了竹内好论述中最微妙的分寸感，通过扩大座谈会的容量，他消解了竹内好的问题。表面上看，广松涉的视野更为开阔，提出的问题架构也更为宏大；但是追究起来，在把竹内好提出的“思想传统的形成”这一困难的课题简单地等同于“文化形态论”并且试图以把握资本主义体制的社会史角度补充其不足的时候^[41]，广松涉错过了一个继承竹内好的机会。广松涉的宏大架构中不缺少正确的批判立场和观念分析乃至社会史分析，它缺少的是建立思想传统的努力。在这个篇幅浩大的文本里，不仅充满了对前人的指责，更重要的是，有关战争的叙述是以旁观者身份进行的。这种旁观者的身份使得《近代的超克》中所包含的“前理论的心情”仅仅被含糊其辞地解释成对于“今日的风

潮”的“前车之鉴”，但是在此项下进行的整理与批判是极其草率的。竹内好花费大量篇幅讨论了弥漫在当时知识界的特定精神状态，在此它被简单地归结为“以对现状绝望为媒介的犬儒主义，以及与自认穿透了西欧文明的认识互为表里的国粹式审美意识”^[42]，于是，这个对于竹内好来说最重要的思想生长的可能之点，和竹内好试图追究的那个知识人何以同等对待日本的太平洋战争和苏维埃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艰难课题，就被广松涉轻易地否定了；而在小林与西谷当年对话中出现的那个“日常体验”的课题，也被这种旁观者的立场消解了。问题不在于广松涉这样的批判知识分子是否意识到了“今日的风潮”的危险性，而在于他以似是而非的方式回应了这种思潮。广松涉又一次重蹈了竹内好曾批评的日本马克思主义者的覆辙，以“外部的”和“理论的”方式简化和置换了日本的复杂现实问题，这使他的批判热情与现实责任感只能与他批判的对象无伤地共存。

在其后的历史中，这个无情的逻辑首先在广松涉自身的论述中呈现了出来。

1994年3月16日，《朝日新闻》晚报版的《文化》专栏发表了广松涉的一篇题为《东北亚将成为历史的主角》的评论，提出了在欧美中心的世界观走向崩溃的时代，以日中为基轴建立“东亚”新体制、以此为前提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基本设想。文章说：“东亚共荣圈的思想曾经是右翼的专利。日本的帝国主义行径被搁置起来，而只有与欧美的对立被强调。但是，今天历史的舞台已经大幅度旋转了。以日中为基轴建立‘东亚’新体制！以此为前提建立世界新秩序！现在是时候了，以包括对日本资本主义重新进行根本性追问这一课题在内的形态，这一切该成为反体制左翼的口号了。”^[43]

在广松涉面对21世纪作出如此乐观而短路的展望之后不到一年，全世界开始纪念二战结束50周年。中日之间、日韩之间的战争记忆时隔半个世纪又一次被激活，“东亚新体制”、“世界新秩序”这些并未被清洗干净的“口号”，如何面对这复杂的状况？它如何成为日本“反体制左

翼”的口号？在广松涉的《〈近代的超克〉论》里，政治正确的理论批判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广松涉本人并未承担任何历史责任。那个曾经使竹内好大伤脑筋的“日常经验”——战争的体验者所拥有的包括意识形态口号在内的经验——以及在这个经验内部改变它，从而创造新的日常经验的努力，由于广松涉的外在批判立场而被消解了。在《朝日新闻》的短文与洋洋洒洒的《〈近代的超克〉论》之间，并不存在逻辑上和感觉上的对立，它们的内在连接是非常紧密的：自身不投入被批判的状况内部，就不会提供改变状况的有效思想武器，相反，当状况发生变化时，批判者甚至会陷入批判对象的逻辑。广松涉短文里的逻辑甚至用语与他十几年前批判的京都学派的世界史哲学惊人地相似，实在令人深思。

距广松涉呼吁日本的左翼重新使用大东亚共荣理念不到两年的1996年12月，日本社会出现了名为“新历史教科书编写会”的组织和“自由主义史观”的思潮。这股以批判“自虐史观”为名修改战争历史的动向，其实是以另外一种“前理论”的“心情”重提并未过时的“近代的超克”命题。它的基本要点是日本在二战中所犯罪行并不甚于世界上其他国家，通过经济赔偿，这笔旧帐已经清算过了；日本人应该从自我否定和自我怜悯的对立中走出来，建立第三条出路亦即自由主义的历史观。这个理论上并不复杂的思潮立刻引起了反响，尤其是在感情上抓住了年轻一代日本人。对于试图批判该思潮的进步知识人来说，最困难的课题莫过于寻找精良的批判武器。广松涉提供的前车之鉴已经显示，正确的立场和意识形态并不能够有效批判这种“心情”，理论分析也很难在抽象层面完成它的批判功能；而竹内好留下的那个半途而废的课题，却已经被悬置得太久了。

1999年10月，“新历史教科书编写会”会长西尾干二出版了近800页的《国民的历史》一书，并在一个月之内第二次加印。同时，由产经新闻社出版的这本超厚的书，竟然以低于2000日元的廉价销售。进入2000年之后，相传此书已经销售了100万册之多。无法判断日本的批判知识分子中有多少人认真地读过此书，然而这本缺少学术性的书与“自

由主义史观”的影响力却并非可以一笑置之。

《国民的历史》行文简明易懂。它讲述了人格化的日本从古到今的艰难历程：它懂情理、有自尊、讲信用，在近代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充满了苦恼和委屈。该书尤其强调，在近代以来西方列强操纵世界的国际关系格局中日本因认真遵守由西方列强制定的国际条约反倒不断被指责和利用，而它无论是兼并朝鲜还是侵略中国，都只不过是想把邻国从沦为白人殖民地的窘境里解救出来，那是国际政治力学所导致的选择结果，日本并没有干坏事。朝鲜 20 万慰安妇的历史只是一个谎言，而说起大屠杀让人想起纳粹。与此相应，日本国民在战争中饱受苦难，不仅经受原子弹的创伤，而且忍受无数次空袭轰炸，还有伴随着几代人的恐惧感。《国民的历史》指控美国一直以日本为假想敌，强调美国才是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真正的霸主，并以细致的笔触重新唤起了战败时日本国内有条不紊地接受这一现实时带给世界的惊讶。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天皇休战的诏书所带来的环绕全体国民的那个死寂的沉默瞬间，带来的的是一个深深的暗示；这个暗示里包含着异国人无法感知的沉重。异国人就此可以得到一个证据，以了解日本人尽管结束了战役，却并未结束战争，日本人仍然继续保有着无声的抵抗意志，保有着不服从的意向。〔41〕”

这个意象几乎可以用以象征全书的主题。“无声的不服从”是西尾眼中迄今为止“多数”日本人面向世界和面向内部批判知识分子的态度。《国民的历史》和“新历史教科书编写会”要做的，就是把“无声”变成“有声”（尽管西尾宣布此书与该会活动无关）。在此基点上，《国民的历史》试图建构古代独立于中国、近现代独立于西方的日本主体性，该书因而不仅激烈抨击追究战争责任、批判日本社会的知识人以及社会力量，而且也激烈抨击了西方中心论的价值体系与历史和现实状况。在抽象议论之中，该书极富对照性地穿插进包括作者本人在内的战争亲历者的创伤经验，并且在暗示日本人才是真正受害者的前提下呼吁停止对历史进行道德化判断，在国际政治的力学关系中重新“客观”地讨论历史。

无论在意识形态立场和学理上还是在资料使用方式上，该书的弊端都是极其明显的；但恰恰是这样一本为进步精英不屑一读的书，却反衬出日本知识分子批判立场所面对的困境：这本书意味着对于《近代的超克》以来日本知识界围绕近代冲击进行的思想建设的全面反动，那个被竹内好称之为“困境”的日本主体建构问题，被彻底消解在“有声的不服从”之中了。《国民的历史》以最为单纯的方式重新整合了一直受到严厉批判和解构的日本想象，而其基础却是二战中日本人的创伤经验和对于日本民族的英雄主义书写。诉诸于这些被否定了的记忆，《国民的历史》试图重新塑造日本人的“日常经验”，这也意味着进步知识人使用西方思想资源批判日本民族主义工作的有效性受到质疑。或许只有到了今天，我们才会了解竹内好为什么要“火中取栗”，才会理解竹内好寻找日本主体性的尝试被批判民族主义的抽象论述简单消解之后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国民的历史》以竹内好最为痛心的方式证实了他的预言：民族主义“具有当被无视之时就会成为问题的性质。民族意识因为受到压制才会发生。”^[45]

当年竹内好着手整理《近代的超克》时，他希望找到“健全的民族主义”。对于竹内好而言，“近代”是一个自我否定和自我更新的契机，而不是一个可以实体化的对象。在竹内好的一系列论述中，始终贯穿着一个危机感：他感到如果不进入日本战争历史的内部，如果不去体验战争中日本人复杂的精神和心态，真正的批判主体不会产生，真正的可能性也不会呈现。正如他在《近代的超克》结尾处阐述的那样，当投入战争的能量被浪费、不可能继承的时候，思想也就不会依靠传统形成。没有传统的思想，就是竹内好所说的不依靠“自身力量”的思想，它借助即成秩序中占优势的意识形态和思想结论来巩固自己的权威性，竹内好称其为“冒牌知性”。竹内此话易被误解为“日本主义者”和“反近代主义者”，假如有能力祛除这样的浅薄误读，我们就可以看到竹内好不是在东方-西方、传统-近代对立的意义上抽象讨论此问题，他始终在状况之中。

《国民的历史》有效地显示了这个状况。时隔半个多世纪，这本书又一次开封了《近代的超克》，以通俗、挑战的姿态全盘否定了战后日本进步知识人的批判工作。它把立场倾向有各种差异的批判知识分子统统划入“对现实视而不见的知识人”一类，并警告说“想搞政治就去从政，想做学问就老老实实守住学问的本分。不要在学问名下塞进政治的空想。战前战后那些对现实视而不见的教养派的政治空论也差不多该收场了。”^[46] 尽管这批判并不公允，但是它从反面又一次证实了竹内好当年对日本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批评。如果把战后围绕《近代的超克》的一系列讨论联系起来思考，或许《国民的历史》的出现是一个重新认识思想传统形成方式的契机。当批判被单纯定位于广松涉式的裁决历史，或者被单纯理解为荒正人式的国际主义判断时，一个最棘手的问题就会被遗漏：日本人作为“日本人”的文化认同方式，不可能仅仅依靠否定性批判加以消解；当它不被赋予某种重新建构的形状和某种思想可能性的时候，它往往会以“无声的不服从”或最具破坏性的方式突然呈现。在“日常经验”的层面，文化认同的问题远比理论分析来得复杂，理论层面的正确性并不能保证日常经验尤其是感情经验的同等“正确”，因为日常经验总是被排除在意识形态乃至理论视野之外的。日常经验的无声，不等于它不存在，它一旦爆发，理论常常无法有效应对，更无法简单改变它。这一状况不仅存在于批判理论与保守现实的关系之间，它何尝不是进步知识人本身也在体验的困境呢？

当日常经验在竹内好的意义而不是小林秀雄的意义上获得了重要位置的时候，“火中取栗”的必要性就产生了。日本浪漫派从火中取出的仅仅是形骸，竹内好则希望取出生命的营养。“火中取栗”要冒的风险，就是丧失“政治正确性”。“近代”带给日本乃至东亚的最大冲击，或许就是这个风险本身。在近代以来的东亚，西方的相应理论资源往往被转换为某种革命的要素，这种复杂的转换通常会伴随着各种意义上的简化和由此而生的政治正确性。所谓的“传统——西方”之类模式的出现，就是这种转换过程中简化的结果。与此相对，对于传统的开掘也充满了

各种简化，在回应西方近代冲击这样一个前提下，本土文化被实体化为与“西方”对立的观念，对于本土资源的开掘因而往往与保守甚至反动的定位联系在一起，事实上，保守和反动力量也确实最容易依靠所谓“本土文化”。在此状况之中，开掘本土的思想资源不仅需要与种种保守势力划清界限，而且也需要承担“落后于时代潮流”的风险。这项工作的艰难，在于它必须与直观的和实体化的本土想象不断冲突，并且不断以落后于时代半步的姿态融合“西方”和“本土”的思想资源，打破那种二元对立的简化模式。这种两面出击带来的直接风险就是“自身为了成为自身，必须甘冒失掉自身的危险”^[47]，它比外在的丧失政治正确性的结果还要严重。但是，在东亚各个民族形成自己的现代思想传统时，承担这一风险却是无可逃避的选择。

当年竹内好密切关注的鲁迅“历史中间物”的特征，就是东亚民族承担这一风险的一种途径。在谈到中国现代文学传统时竹内好说，“从‘文学革命’以前到最后与其共存亡的，只有鲁迅一个人。……为什么他有如此长的生命力呢？鲁迅不是先觉者。”^[48]即使中国知识分子在处理思想传统形成等课题时遇到的具体问题不尽相同，但是“火中取栗”却是同样必要的程序。鲁迅不是先觉者，竹内好也不是。但是当时代一次次淘汰了先觉者之后，“历史的中间物”一次次显示了他们的分量。传统和历史如此左右着我们的思维，却又不存在可以直接继承的现成的传统。历史的中间物们通过自身的挣扎，显示的立场完全不同于《近代的超克》中文人们那种传统代言人的姿态，也完全不同于《国民的历史》那种使传统简化和实体化的思路，更不同于某些批判知识分子的先觉者立场。这个通过挣扎而显现自身的立场致力于建构思想传统，它基于主体的内在自我否定原理。当竹内好强调中国的近代与日本的近代之间的差异时，当竹内好痛斥日本的优等生文化时，他在讲述一个为日本也为东亚所陌生的原理：近代化的冲击作为一种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入侵，的确来自东亚的外部，而现代性的冲击，在原理上却必须产生于东亚内部：竹内好说，在没有抵抗的地方就没有近代。假如在抽象概念上理解

竹内好的近代观，他似乎并没有摆脱黑格尔式的历史主义模式；而一旦在历史状况里，在论争里，在座谈里加以理解，新的问题就呈现出来了：竹内好孜孜以求地寻找的那个以“抵抗”为媒介的东亚“近代”，就存在于对类似《近代的超克》这样的历史事件的重新认识与整理之中；当抵抗的契机被消解在右翼保守知识人的日本想象之中时，当抵抗的可能与左翼知识人的先觉者姿态擦肩而过时，正是竹内好在提醒我们：假如放弃“火中取栗”的尝试，我们可能会失掉自己的近代。

注 释

[1] 河上彻太郎、竹内好：《近代的超克》，富山房百科文库 1994 年第 6 次印刷，167 页。

[2] 杂志《文学界》在 1942 年 10 月号以《近代的超克》为题刊登了该讨论会的记录，1943 年 7 月，创元社出版了同名单行本，初版发行 6000 部。

[3] 林房雄、小林秀雄、河上彻太郎等：座谈会《〈文学界〉二十年的里程》，《文学界》1952 年 4 月号，108 页。

[4] “超克”这个日语单词具有对困难的对象进行超越、攻克等等含义，具有相当明显的暴力性和感情色彩；“近代”相当于中文概念中的“现代”和“现代性”乃至“现代化”，是一个含义非常庞杂的词汇。在 40 年代初期，这个口号以其暧昧性得以传递了当时广泛涵盖整个知识界的特定情绪：清算明治以来日本以西方为蓝本的现代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抗击来自西方特别是英美的经济文化渗透，确立日本文化的独有价值，并进而确立日本作为东方现代化强国的领导地位。但是这些情绪并未以如此简单的概念得到传达，它作为一种弥漫在空气中的感觉，统合进大量青年被送往战场并为侵略战争而捐躯的残酷现实中。在此状况下，当时文学界煽情式的口号反倒最有效地传达出了当时的时代氛围，作为一个口号，“近代的超克”传达出了当时的特定气氛，与下文提到的《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相比这一点尤其明显，后者很难作为一个口号使

用。

[5] 该讨论会分三次召开，只有四位学者参加，除西谷、铃木之外，另外两位是哲学学者高本正显和高山岩男。综合性杂志《中央公论》分别在1942年1月、4月、1943年1月分三次刊载了讨论会记录，三次的题目依次为：《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东亚共荣圈的伦理性与历史性》、《总体战的哲学》；1943年3月，该讨论会记录由中央公论社结集出版，初版发行15000部。与《近代的超克》相比，这个连续座谈会由于没有文学家的参与，话题不仅具有学理性深度，而且观照现实的方式也更为统一。仅就座谈会的完成度而言，《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远远高于《近代的超克》，其发行量也是后者的两倍半。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后世却没有出现正面处理这个规模更大、完成度更高的座谈会的论著，对它的讨论仅仅是在对《近代的超克》的讨论中附带性地进行的。

[6] 《文学界》1952年1月号，第6-85页。

[7] 创文社编辑部编：《现代史讲座 别卷·战后日本的动向》，创文社1954年，第167-295页。该讨论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题为《什么是现代》，铃木成高司会，参加讨论的有上原专禄、竹山道雄、林健太郎、丸山真男、务台理作；第二部分题为《世界与日本——分析与课题》，林健太郎司会，除上述讨论者外还有都留重人参加。

[8] 这是讨论的第一个小标题。参见河上彻太郎、竹内好：《近代的超克》，富山房百科文库1994年第6次印刷，175页。

[9] 《近代的超克》，177-178页。

[10] 同上，178页。

[11] 同上，178页。

[12] 同上，178页。

[13] 这个时期是否可以称为“文艺复兴时期”，在日本文人的圈子里一直有争论。至少在《近代的超克》讨论会召开的时期，这个称谓并不存在。但是从1933年到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的4年之间，日本文坛发生了重大的转折是一个基本事实。参见野口富士男：《感性的昭和文坛

史》，文艺春秋社 1976 年第 1 版，98-152 页。

[14] 《近代的超克》，220 页。

[15] 《近代的超克》，231 页。

[16] 同注 [6]。

[17] 有关日常生活和日常性在本世纪前半期的特定内涵，美国学者 Harry harootunian 在《以近代超克近代》一文中有精辟分析。他指出有关近代日常生活的话语建构最终催生了关于社会整体的日常性话语，《近代的超克》座谈会是这一话语的顶点。它压制了排除了那些对植根于都市理解的、把自身的经验普遍化的做法的批判。参见《思想》882 期，1997 年 12 月，131 页。本文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日常经验”这个概念，希望指出的是，同样作为知识人的自家消费，日常经验构成了一些文人的讨论视角，而为另一些学者所拒绝。

[18] 《近代的超克》，244 页，河上彻太郎语。

[19] 同上，248-249 页。

[20] 《文学界二十年的里程》，《文学界》1952 年 4 月号，108-111 页。在这段谈话里，林房雄说这个座谈会是河上彻太郎一手策划的，其他人由于友情而轻率地赞同；还提到座谈会在温泉旅馆举行，结束时连盘子都摔破了等等。河上彻太郎则提到他请来了铃木成高和西谷启治，但是没有任何人呼应他的这个回忆。

[21] 本文与该座谈会均收入《近代的超克》。富山房百科文库，1994 年 7 月第 6 次印刷，274-342 页。

[22] 同上，283 页。

[23] 同上，282 页。

[24] 同上，283-284 页。

[25] 《近代的超克》，301 页。在这一段文字之前，竹内好引用了太平洋战争爆发时编辑《文艺》的高衫一郎的回忆。偷袭珍珠港的消息传来的当晚，高衫在家里找出了莫斯科出版的英文版《国际文学》中苏维埃反击德军入侵的专号，并在第二天向日本的作家们发出了稿约，决定

模仿该专号也编辑一期反映日本人战斗意志的专号。他发出的稿约得到响应，没有一个人拒绝。竹内好指出，高衫在心里是站在苏维埃一边且厌恶纳粹德国的，并且他在理智上也厌恶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径。这一切在他那里一直以压抑的形态存在着，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本的宣战姿态而获得“解放感”，从而毫无矛盾地把前苏联抗击德国与日本抗击美英的行为等而视之。

[26] 《近代的超克》，166页。

[27] 正如竹内好和其他日本知识分子指出的那样，京都学派被视为宣传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座谈《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不但没有讨好官方，还受到了东条英机等保皇军官的迫害，若没有海军的庇护恐怕将全军覆没。

[28] 有关保田与重郎的评价，值得参考的著作有桥川文三的《日本浪漫派批判序说》，未来社1965年；Kevin Michael Doak的The Japan Romantic School and the Crisis of Moderni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日译《日本浪漫派与民族主义》，柏书房1999年。保田与重郎在日本浪漫派中所占有的重要位置，是与他通过追溯日本古典而建立美学式民族主义表现方式密不可分的，他对于整个近代日本的文明开化的否定态度给反近代意义上的日本民族主义提供了立足之地。保田创造了一种打破西方近代式合理主义表述方式的表达形态，但在我看来，真正具有穿透力的见解却是并未发表日本浪漫派研究的竹内好的意见。

[29] 参见《新日本文学》1960年第5期，总第154期，134-149页。鹤见有关说法分别见135页、139页。参加这个座谈会的，除了竹内好与鹤见俊辅之外，还有佐佐木基一（兼司会）、伊藤整。竹内好的反驳见137页。

[30] 荒正人：《近代的超克（一）》，《近代文学》1960年3月号，1-13页，引文见8页。

[31] 在早期的亚洲主义者中，有一些人也曾试图参与俄国的社会变革，但是当竹内好整理亚洲主义问题的时候，这一部分基本未得到他的

重视。不言而喻，竹内好在思考亚洲问题时，下意识地保留了日俄战争的历史记忆，在当时它被东亚各国视为“有色人种战胜白人”的战争，俄国被视为西方的一个部分。

[32] 在注 [26] 中所提到的那个座谈会中，竹内好非常明确地提到了这一点。他强调说，尽管在与中国的关系上，日本所犯下的罪行不能与美国相提并论，但是在殖民地争夺战这一点上，日本与美国同等恶劣。他甚至在座谈进行到民族主义有可能催生中国的大国主义和小国的激进民族主义的时候，表示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于西欧近代的评价问题。竹内好特别强调日本人很难接受不信任西欧这样一种感觉，但这是一个必须建立的感觉。他甚至强调，对于西欧的不信任，是太平洋战争合理化的一个根据（147页）。这让我们联想到，竹内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执笔的《大东亚战争与我们的决心》，其思想基础正是这种对于西欧的不信任。

[33] 《近代的超克（二）》，《近代文学》1960年4月号，1-16页，此观点见3页。

[34] 《近代的超克（三）》，《近代文学》1960年5月号，1-4页。该观点见2页。

[35] 《近代的超克（四）》，《近代文学》1960年6月号，1-5页。

[36] 在日军偷袭珍珠港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就发表宣言指出：“这一太平洋战争，是日本法西斯为了侵略美国、英国及其他各国，而发动的非正义的掠夺的战争，而在美国、英国及其他各国起而抵抗的一方面，则是为了保卫独立、自由和民主的正义的解放的战争。”转引自《民国史大辞典》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565页。

[37] 花田清辉：《近代的超克》，讲坛社1993年。竹内好认为，在战后处理“近代的超克”问题的文字里，只有花田的这本小书是从正面迎击近代的，因为它抓住了日本民众这个基本的问题。参见《新日本文学》1960年5月号，148-149页。

[38] 广松涉：《近代的超克论》，讲坛社1989年11月，171-172

页。

[39] 广松涉：《近代的超克》，169页。

[40] 广松涉在文中提到日本浪漫派和《文学界》的时候，目的在于以此反衬三木清等“昭和研究会”的学者和京都学派学者“近代的超克论”的深度。他甚至还讥讽说，文人们谈论的自我经验一类的话题，根本用不着贴上“近代的超克”之类的标签，干脆开个文艺畅谈会不是更好吗？他还指责说，文人诸氏既没有提供取代近代意识形态体系之思想，也没有提供打破近代社会历史现实的实践，他们不过说了些空话（197-199页）。

[41] 广松涉并未直接提出这样的观点，但是结合他认为竹内好的视野“过于狭隘”的指责（169页）、对于近代认识三个基本形态的归纳（179-180页）和全文立论的方式来考虑，他的这一看法是显而易见的。

[42] 参见182页。

[43] 《朝日新闻晚报版》1994年3月16日。

[44] 西尾干二：《国民的历史》，产经新闻出版社1999年11月，643页。

[45] 竹内好：《近代主义与民族的问题》，1951年9月，《竹内好全集》第7卷，34页。

[46] 《国民的历史》，683页。

[47] 竹内好：《何谓近代》，《竹内好全集》第四卷，筑摩书房1980年，131页。

[48] 竹内好《鲁迅》，《竹内好全集》第一卷。9页。



阐释与分析

引导性的哲学与认知性的哲学

石元康

(一)

许多哲学家都认为哲学是一门第二序的学问，人类的各种知识及活动，都是它反思的对象。由于这个特点，哲学并没有什么特定的领域。知识、道德、艺术、法律等，都可以是它反思的对象。对这些领域的反思，形成了知识论、伦理学、美学及法律哲学等不同的哲学分支。哲学的反思性这个特点，不只是表现在对人类各个领域的活动做第二序的反思工作，同时它也时时对它自己做反思的工作。因此，在不同的时代哲学家常常都会重新问，“究竟哲学是什么？”以及“哲学究竟应该做什么？”这些根本性的问题。一个生物学家或数学家，除非在碰到他的研究的科目处于革命性的改变时，他是不会去问“生物学是什么？”或“数学是什么？”这种根本性的问题的。由于哲学本来就是以追问基础性的问题为它的特色的一门学问，因此，哲学家几乎在所有的时代都会追问上述那些基础性的问题。用库恩 (Thomas Kuhn) 的话来说，哲学是处于前典范 (pre-paradigm) 时期的。也许，由于哲学的性质，它永远也不会像科学那样进入典范时期。

最近在西方哲学界中，对于哲学的定义、功用、目的等根本问题，又有一场大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走得最极端的一些哲学家，如罗蒂 (Richard Rorty)，福柯 (Michel Foucault) 等，认为传统式的哲学已经应该

寿终正寝了。那种哲学即使从人类的文化中消失掉，人类的文化仍旧可以照常地延续下去而没有什么损失。较为温和一批思想家则指出，虽然我们不能再像传统哲学家做哲学的方式做下去，但是哲学仍有它的意义。它对人类的文化仍有它可以作出贡献的地方。但是，我们要把哲学作一个相当大幅度的转形。哈柏玛斯 (Jurgen Habermas) 所提出的重建式的科学 (reconstructive science)，麦肯泰尔 (Alasdair MacIntyre) 所提出的叙述性的哲学式的历史 (philosophical history) 等都是这种尝试将哲学转型的努力。^[1]

自从西方哲学进入中国以后，我们把经、史、子、集中的经及子方面的作品，视之为哲学。而把包括在其中的思想称为中国哲学。这样的做法，当然有它的道理。这两部中所谈的问题，虽然与西方哲学所谈的问题不尽相同，但是它们之间也有许多相同的地方。如果我们认为它们之间相同的部分比不同的部分来得多而且来得较为重要，则将它们名之为哲学就是一种很恰当的做法。如果一个人认为它们之间相异的部分比较多，而且比较重要，则将它们名之为哲学可能就值得商榷了。今时今日，很少人会再采取第二个立场，也就是说，大家都认为经、子二部中所包括的思想内容、形式等与西方哲学中相同的部分比相异的部分要多得多，而且重要得多，因此，以哲学来命名那些传统的中国思想是一个恰当的称呼。^[2]

但是，即使我们把传统的经与子两部分的東西称之为哲学，这也不表示它们与西方哲学在方法、目的及所注重的问题上是完全相同的。它们两者之间可能只有部分相同。即使就西方哲学本身而言，它的历史也显示出在不同的时期哲学家所关注的问题以及所用以探讨问题的方法都有极大的差异。希腊哲学家开始所关注的是宇宙论的问题，到苏格拉底时，道德、政治问题变成了他们主要的探讨对象。中世纪的哲学则与宗教及神学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在近代，知识论变为它研究的重点。由于哲学是一门无所不包的反思性的学问，因此，不同时代、文化、历史有不同的侧重面是很自然的事情，而哲学家们以不同的方法来处理问题也



是很自然的事情。

如果说，传统中国的经与子的部分是哲学，但是由于它与西方哲学只有部分的相同，而不同哲学之间的歧异又可以是很大的，那么我们似乎应该认真地去探讨一下，究竟传统的中国哲学有没有它的特色？它所侧重的问题是什么？它用什么方法来处理这些问题？以及它的最主要的目的何在？由于哲学的反思性，这个工作本身就是一种哲学的工作——哲学对自身的目的、方法、功用及性质的反思。

劳思光先生在最近的一篇文章及一次演讲中作了对这些问题的反思。他指出了中国哲学的特色。他的想法可以带给我们一些启发，促使我们对这个问题作更多的探讨。^[3]

(二)

劳先生在上引的两篇文章中，指出了他认为中国哲学的特色之所在。他将中国哲学名之为引导性的哲学 (orientative philosophy)，以别于西方以认知性的哲学 (cognitive philosophy) 为主的哲学传统。认知性的哲学以建立某种客观的知识为其目标，而引导性的哲学则是以达到某种转化为其主旨。^[4]也就是说，认知性的哲学是把哲学活动视为一种追求知识及建立知识体系的活动，而引导性的哲学则是要在世界中造成“转化”，无论是“自我转化”也好，或是“世界转化”也好，它的目的并非去探求对世界的知识以及建立知识体系，而是将意志，无论是个体的或集体的，引导到某一个领域或方向去。

哲学究竟能不能给我们带来知识是一个可以争辩的问题。如果我们以科学作为知识的典范的话，则似乎只有科学能带给我们知识。有些哲学家虽然以求知为它的目标，但是他们的尝试只是一种英雄式的努力，最终必归于失败。罗蒂曾指出，由于哲学家不像科学家那样，对于问题的答案有共同的想法，因此，我们倾向于把哲学视为是一门特别的学科。知识是它的目标，但是，它所能得到的只是意见而已。^[5]哲学究竟可不



可能有一天也像科学一样带给我们客观的知识这个问题，我想现在谁也没有办法回答。但是，西方哲学家们以求知为它的主要目的则是不可争辩的事实。

什么是引导性的哲学的特色呢？上面说，它以引发意志的转移为主要的目标，因此，它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去了解世界，虽然在提出引导性哲学理论时，它无可避免地会牵涉到世界及人性的结构这些认知性的问题。但是，对它们的理解的目的还是为了去达成某种转化。劳先生指出，引导性的哲学一般包含下列三个成素：

- (1) 选定一个目的，而将它作为智慧之正当目标。
- (2) 对以上决定给予理据。
- (3) 提出实践规条，表明这个目的如何达成。^[6]

这个对引导性哲学的陈构，与熊彼德 (Joseph A.Schumpeter)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有点共同之处。熊彼德指出：

就某一个重要的意义而言，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宗教。对于信者来说，第一它显示出一个最终极的目的系统，这个系统含着对生命的意义的看法，而这些最终极的目的又是绝对的标准，我们用它们来对事件及行为下判断；其次，它含有对这些目的的一种指引，这个指引蕴涵着一个拯救的计划以及对邪恶的显示。人类，或一部分被选出来的人类，将被从这些邪恶中拯救出来。^[7]

熊彼德对马克思主义的定性工作，指出了上面三项之中第一及第三两项。虽然他没有提到第二项的工作，但是，很显然的，马克思的著作中也包含了第二项的工作。当然，马克思的哲学与引导性的哲学之间有这种吻合也并不是什么足以为奇事情。马克思的名言说：“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方式在解释世界；但是重要的地方是改变它。”这种改变世界正

是要对世界进行一种转化，使世界走上他认为的理想的境地。^[8]

表面上看起来，引导性的哲学似乎与实践哲学有不可分割关系。只有在实践的领域中，目的这个范畴才会出现。在客观知识的领域中，目的没有地位。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无论是儒、释或道，都是成德之学，也都是实践哲学，因此，对目的的向往是这种哲学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是，引导性的哲学也未必一定要局限于实践哲学的领域。最近有些分析哲学家提出了一种对哲学的看法，这种看法他们称之为“提议的哲学观” (proposal view of philosophy)。他们指出，当哲学家看起来是在做概念分析时，他实际上并非对语言去从事分析的工作，而是提出一套新的对语言用法的提议。^[9]这种提议的哲学观的拥护者指出，哲学家如柏克莱 (Berkeley) 在做哲学分析时所指出的“我们所吃的，喝的，以及所穿的都只是观念”^[10]这种讲法，并非要表达一种必然的分析命题，也不要指出日常语言是如何使用的，他的目的是对我们所用的字一种该如何使用的意见。当然，哲学家之所以提出对各种语言的用法是有他的目的的。他们的目的可能是使得我们对世界有更好的了解，也可能是使人们能避免在沟通时引起不必要的误解。所以，这种提议的哲学观基本上所作的也是一种引导性的工作。

(三)

在这节中，我想对上述劳先生所提出的引导性的哲学中所包含的项目做一个分析，以彰显出这种哲学的特色。

劳先生所提到的第一个项目是：选定一个目的，而将它作为智慧之正当目标。这个项目就实践哲学或成德之学来说是很容易了解的。因为成德之学一定要有一个心目中向往的目标才能构成人们努力的推动力。如果没有目标的话，则引导性的哲学一开始就无从着手。但是，在建立目标的工作上，最困难的事乃是我们如何找到这个最终的目的 (ultimate end) 呢？这个目标只是人类随意选择的吗？或是有什么客观的标准告诉我



们那是人类真正的目标，其他的目的都是虚假的。自从世界解了咒之后，我们不再相信从实然可以推出应然，因而，人生目标不能再由事实中推导出来。在没有客观标准的处境中，目标只是任意选择的产物。但是，如果真的没有客观的标准来衡量一个目标的价值的话，在这里哲学似乎也丧失了它的功用，因为哲学所要做的并不是目标的选择，而是对于这种选择提出它的理据来。但是，如果目标纯粹只是个人的爱好的话，则每个人有不同的爱好，因而做了不同的选择。至于我们对自己的爱好虽然可能提出一些说明 (explanation)，但是，我们却不必要也不能对它提出任何理据 (justification)。有关这个论点的最有名例子是祁克果的人生三阶段的理论。他所提出的三个阶段中的每个阶段之中，可能都有它内在的逻辑及理性。但是，在对它们三者之间作选择时，我们却没有一个超乎三者之上的理性标准来评定三者之间的高下。在这里，只有内在的而无超越的理性标准。^[11]从这个分析可以看出，在解咒后的价值主观主义的世界中，哲学在人生终极目标这个问题上已经不能做出什么贡献，因为要区分目的的高下所需要的客观标准已经不存在了。人们的选择只是一个无标准的任意的选择。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认识到，只有在客观标准还存在的情况下，人们的选择才可以被理据支持。而这时的选择就有了对、错之分。哲学所给予的理据就是要证明某一个目标是真的或对的。这是引导性的哲学中第二个项目的工作。我在这里想借用亚里士多德的功能 (ergon) 的论证来对它做一个说明。毫无疑问的，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是一种引导性的哲学。他指出伦理学的目的并非求得理论性的知识，而是行动。而行动是由某一种目标来带引的。他说：

我们当前所进行的工作，不像其他分支那样，以理论为目的 (我们探讨德性是什么，不是为了知，而是为了成为善良的人，若不然，这种辛劳就会无益处了)。所以，我们所探讨的必然是行动或应该怎样去行动。^[12]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科伦理学》的一开始就指出，人类的活动总是有目的的。医学的目的是健康，经济的目的是财富。但是作为一个人，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在这里，他指出幸福 (eudaimonia) 是人生的目的，因为幸福一方面是自足的 (selfsufficient)，另一方面是终极的 (final)。幸福的人，不假外求同时也不会再有什么缺憾，因此他是自足的，我们不会把幸福作为达到别的目的的手段，因此，它是终极的。但是，分析到这里，亚里士多德还没有真正告诉我们幸福的内容是什么？不同的人，对于幸福似乎仍然可以有不同的了解。自足性及终极性都只是形式的概念。如果提不出具体的内容的话，则价值的主观主义在这里仍然可以出现。也就是说，哲学思辨在这里仍然派不上用场。亚里士多德当然不是一个价值的主观主义者。为了给幸福这个概念填上内容，他提出了有名的功能 (ergon) 的论证。^[13] 这个论证使得幸福得到了内容。而且，由于任何存在的功能对于该种东西而言，都是有效的，因此，它也有了普遍性。由于它的普遍有效性，人们以实践自己的特有的活动这个目标不再只是纯主观的任意的选择。亚里士多德的这个论证，是哲学理论在引导性的哲学中所扮演的角色的一个很好的说明。它使我们了解到，哲学论证在引导性的哲学中的工作是什么，以及它之重要性的所在。

这种客观主义不仅在亚里士多德中表现出来，同时在所有价值客观主义的哲学中也都存在。儒家提出的“循理即是善”及“良知即天理”的讲法，也是设定一个客观于人存在的标准。主观的意志以它为目标，以期能够达到一种境界，这种境界要么是良知的全幅呈现，要么是天人合一。

哲学除了在提供目的的客观性以及它之值得追求这两点上提供理据之外，它另外一项工作是提供人类有能力达到上述的目标的理据。也就是成德之学可能的基础。在这里，最重要的工作当然是建立起一个有关人性的理论，以及人与天道或那种被认为是具有客观性的目的之间的关系。孟子的性善说以及佛教的人人皆有佛性的理论，就是这种理论性的

工作。

至于第三项中所提的是功夫的问题。它提出一套实践的规条，并指出，要达到设定的目标，所必须要做的功夫。我认为功夫论本身并不是属于哲学的范畴，它是属于实践领域中的学问，而哲学所作的工作则是思辨性的工作。

(四)

对于引导性的哲学作了上述分析之后，接着我想讨论几点有关把哲学视为引导性的学问所引起的一些问题。

第一点我想讨论的是，引导性的哲学能离开认知性的哲学而独立被建立起来吗？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劳先生并没有详述他心目中所谓的认知性的哲学究竟有些什么特色。但是，从他所说的西方的哲学传统是以建构知识或取得知识为其主要的目标这点，我们可以得知他心目中的认知性的哲学的面貌是怎么样的。我们可以以亚里士多德的形上学作为认知性哲学的代表。亚里士多德把形上学视为第一哲学，它的工作是要探究存在作为存在的根本原则（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all being qua being）。也就是说，形上学所探究的是宇宙的一些基本原则。这种哲学与引导性的哲学究竟有什么关系呢？我以为后者的可能性必须建立在前一种哲学的知识之上。

上节中我已经提到过，在世界解咒以后，人生的最终目的已经成为个人主观选择的结果，在这种多神主义的境况下，人们只能把最终目的视为是一种根据个人的品味所做的选择。这也就是为什么韦伯会认为这是一个众神与众魔的世界，你的神可能是我的魔，相反亦然。在这里没有理性可以参与的余地。祁克果的各个人生阶段之间没有理性的标准可以来判定它们的高下正是这种价值主观主义的最典型的表现。在这个世界中，理性就最终价值及目的的选择这个工作上来看，是无能为力的。这也是为什么休姆曾指出理性是爱好（passion）的奴隶了。^[14]



如果我们认为人性的最终目的并不只是个人主观的品味，而是客观有效的，那么我们就必须对它提出理据来给以支持。这是哲学的工作。在这里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呢？什么样的知识可以作为哲学的理据来给予我们选择的目标作为支持？我想在这里，我们需要的就是认知性的哲学了。认知性的哲学以两种形式的知识出现。第一，它告诉我们世界是如何构成的？为什么我们所指出的目标是人生的终极目标，而其他的目标为什么不是终极的目标。哲学在这里所作的工作是提出论证来支持一种客观的价值的存在，以及这种价值为什么是人们应该去追求的。而这种工作很显然的是跟世界的构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也就是说，对于世界的知识是人类选择目标的标准。第二，人们所提出的目标必须要是人类能够达到的。只有这样，这个目标才对人类有意义。如果我们提出的目标是不可能达到的，那么它永远只是遥不可及的乌托邦。在这里，哲学家必须提出一套人性的理论来作为实践的基础。而这个对于人性的理论却是认知哲学的课题，它所要建立的是一个哲学的人性学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只有在建立起一套这种认知性的哲学之后，实践哲学才会有稳固的基础。

上述的这两种学问，用传统中国哲学的范畴来说的话，第一个是天道论，第二个是人性论。这两种理论都是认知哲学的领域，然而，它们却是建立引导性的哲学所不可或缺的要素。

第二点我所要提出的是，只是指出前面所引的劳先生所说的三个项目——目的、理据及工夫——并不足以真正能够勾勒出哲学的特色。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如果一个人为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成为一个小提琴家，而且他也提出了许多理据来证明，为什么他的目标是值得追求的，同时他也有一套自己如何能达成这个目标的功夫论。但是，这时候，我们似乎仍不太愿意说他所提出来的这套讲法是一套哲学。一个价值体系要能够成为一个哲学体系，似乎并不能只因它具有了上列三项东西就足够了。一个价值体系之能够成为一个哲学体系似乎必须要能够指出这个价值体系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普遍性之所以是一个哲学体



系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乃是由于哲学乃是要建立某种形式的知识有关。如前面所说的，如果人生的最终目的只是个人的主观品味的话，哲学也就没有用武之地了。

同样的道理也可以用在认知性的哲学之上。现今这个科学的时代，大家认为只有科学才是知识，而且知识就是科学。一个要提倡认知性哲学的人，也必须指出哲学所能提供的究竟是什么知识，它与科学所提供的知识不同之处何在，等问题。

如果上述的分析是正确的话，则只是提出目的、理据与工夫三项东西来刻划引导性哲学的特性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更进一步指出，引导性哲学中所包含的目的与理据有何特色，它与个人人生中的目的与理据有何不同。只有提出了这些答案之后，这项工作才能算是完成。同样的道理，当我们刻划认知性的哲学的特色时，仅仅指出它的目的是取得知识也是不够的。我们也得进一步指出这种哲学性的知识究竟特色何在，这项工作才能算是完成。

最后，我想谈一下工夫论的问题。我前面讲过，我比较倾向于不把工夫论视为哲学。我的理由是，哲学所处理的是终极性的问题，无论是人生的终极目标，或是宇宙的终极结构。但是，工夫论所处理的问题却不是终极性的问题。它所关注的是在终极目标设定之后，如何达到这个目标的方法的问题，因此，它实际上所处理的是技术性问题。一般我们不把技术性的问题视为哲学问题。我们常听人说，中国哲学不像西方哲学那样，它所注重的是实践而非思辨。我认为这是一个极易误导人的说法。哲学本身是一门思辨性的学问，哲学理论是用思辨的方法所建立起来的理论。我们可以说像规范伦理学这种学问的最终目的是要指引人们能够有一个美好的人生，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但是，规范伦理学本身却是以思辨来建立的，它本身并非一种道德实践。当我们说，中国哲学较重实路而没有那么重视理论时，我想这句话真正的意思是说，中国哲学家认为在道德实践中，理论所能发挥的作用并没有那么大，实践才是比较重要的。但是，我怀疑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如何可能是合理

的。哲学的最大功用就在这里吧。

注 释

[1] 见 *After Philosophy*, ed. Kenneth Baynes, James Bohman 及 Thomas McCarthy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87) 及 *Proceedings and Addresses,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 1987* 中之 *Symposium Papers, The Future of Philosophy*。

[2] 西方有许多哲学家认为只有西方文化中才有哲学，这当然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对中国一无所知所造成的后果，另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的狭隘的哲学观所造成的结果。见 E. Husserl 的 “The Vienna Lecture.” 本文附于他的 *The Crisis of European Sciences*, tr. David Carr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280–284。

[3] 劳思光，“对于如何理解中国哲学的探讨及建议，” 本文收于他的《思辨录》（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96），pp. 1–38。“儒学在中国现代化运动中的正反作用”，本文为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主办之跨世纪的文化反省与展望上的演讲。以下对这两篇文章将简称为《对》及《儒》。

[4] 见《对》第 19 页及《儒》第 3—4 页。

[5] *The Linguistic Turn*, ed. Richard Rort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见他的导言，p. 2。

[6] 《对》p. 20。

[7] Joseph A.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London: Unwin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5。

[8] Karl Marx, *Theses on Feurbach*, 11, in Loyd D. Easton and Kurt H. Guddat (ed. & tr.) *Writings of the Young Marx on Philosophy and Society* (Garden, NY: Dorrblady and Co. Inc., 1967), p. 402。当然，马克思的历史观使得他的哲学包含了许多思辨性及认知性的成分。他认为历史的潮流不是人能够抗拒及转变的。人的理解只能舒缓新时代来临之前的阵痛而已。

[9] Alice Ambrose Lazerowitz, "Linguistic Approaches to Philosophical Problems," in Richard Rorty, *op.cit.*, pp.147-57.

[10] 上引文, p.151。

[11] 见 A.MacIntyre, *After Virtue* (London:Duckworth,1981) ,p.39。

[12]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第二卷 1103b26-30。我用的中译是由苗力田主编的《亚里士多德全集》中的第八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p.29。

[13] Ergon 一般在英文中译为 function, 但是 Anthony Kenny 则将之译为 characteristic activity, 这似乎是较好的翻译。见他的 "Happiness" 一文。本文收在 Joel Feinberg ed., *Moral Concept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 ,pp.43-52。

[14] 见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tr.H.H.Gerth C.Wright Mills (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47) ,p.148。David Hume, *Mor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ed.with an introduction by Henry D.Aiken (New York:Hafner Publishing Co.1948) ,p.43。

约翰·密尔论自由、功效与民主政治

江宜桦

一、两个密尔？

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经常留给后世两个（或甚至两个以上）不同的印象与遗产。这也许是因为深邃的哲学家原本体大思精，能够冶众说于一炉，故矛盾对立之理论虽并存而不相害。又也许只是因为后人痴愚，不识镜花水月真幻之别，故强指一贯者为不一贯、一体者非一体。无论如何，我们已逐渐习惯了思想家有两个本尊的说法。柏拉图 (Plato) 有两个，一个恹恹惶惶，以建立哲君制度为终身不渝之理想；另一个则忧谗畏讥，以远离政治为哲人乱世自保之上策。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也有两个，一个将好人等同于好公民，坚持人人皆为政治的动物；另一个坦言政治荣耀有其局限，政治参与不如静观沉思。马基雅维里 (Machiavelli) 的两面性表现在《君主论》的现实主义与《罗马史论》的共和主义，同时也就表现在他对平民大众时而鄙夷轻贱、时而推崇歌颂之复杂情感。卢梭 (Rousseau) 以社会契约论之合理化赢得了捍卫自由平等的美名，却又在暧昧的全意志学说中令人感受到极权统治式的恐惧。类似的命运降临于黑格尔 (Hegel) 身上，使他既成为主张宪政君主制的自由主义者，又是鼓吹日耳曼至上论的国家主义者。马克思 (Marx) 的割裂性相对而言容易理解，因为这基本上只是岁月造成的差别：青年马克思的异化论里有浓厚的人道主义情怀，而晚年的马克思似乎就只知历史唯物论、阶级斗

争、共产主义革命等等。

有的思想家比较单纯、比较明确，似乎没有“两面性”的困扰。但其实这也只是程度的问题，因为即使体系严谨如霍布斯 (Hobbes)，或文字清楚如托克维尔 (Tocqueville)，也不乏视之为本尊分裂诠释者。因此，当我们论及约翰·密尔 (John S. Mill, 1806—1873) 的思想遗产时，就不会惊讶于为何连这位现代自由主义的理论大师，竟也遭人议论纷纷，知识化根本存在两个不同的密尔。譬如当代思想史巨擘以塞亚·伯林 (Isaiah Berlin)，就曾在他那著名的关于密尔思想的演讲中，反复强调密尔的终极关怀是多元性、多样性、以及独特的人生选择，而不是如一般所以为的追求功利与幸福 (Berlin, 1986: 299—308)。伯林所看到的两个密尔是“多元主义的密尔”与“功效主义的密尔”，而另一位研究者 G. Himmelfarb 所看到的则是“自由主义的密尔”与“社群主义的密尔”。Himmelfarb 说：密尔在《自由论》及《论妇女的屈从》中视个人自由为最高价值，故致力于人类所受种种社会桎梏之解放。至于在《代议政府论》与《功效主义》等著作中，密尔则转而标榜美德、传统、社群关系与慎思明辨等价值，因此个体自由得到一定程度的节制，不致僭称为人类最高的理想 (Himmelfarb, 1990: xvii—xxii; 张福建, 1995: 104—105)。

将密尔的思想一分为二，或是分离出密尔思想的两种面向，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对某些人来说，这足以证明密尔在不同著作中留下相互矛盾的理论，而此一矛盾甚至使我们有理由怀疑若干作品并非出自密尔之手。譬如《自由论》就经常被认为是反映其夫人之观点，而非密尔本人的意见。这种猜测其实根据不足，因为正如本文稍后证明，密尔绝大部分观点都曾经在不同著作中出现。我们最多只能说他的强调重点有别，却不能推断作品之间存在着系统性的断裂。另外，也许有人采取了 Leo Strauss 所批评的“历史主义” (historicism) 的立场，在诠释古人经典时，认为我们有可能看出古人所未掌握的历史脉络，从而比古人更了解自己 (Strauss: 1988: 66—68)。如此一来，点出密尔的两面性不就说明了 we 彻底知道密尔思想的纠结所在，即使密尔本人自以为理论一贯？这种诠释



观点当然也值得保留，因为密尔可能确实谈不上有任何矛盾，所谓密尔“两面性”的问题也许只是今人在现存脉络下所意识出来的问题，而密尔本人则未曾、也不必烦恼这些问题。换言之，对于古人不自觉有问题的文本，今人固然有权利将之问题化，但我们得提醒自己，这可能是今人对自我存在处境焦虑之投射，所谓密尔的问题其实不属于密尔，而属于我们自己。从这个角度反省，将密尔的思想一分为二，也许最大的意义不在发现密尔的内在矛盾，而在于透过他的“矛盾”观察我们现实处境上的困惑与不安。

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我将大致依循伯林的诠释，将密尔的两面性界定为“自由原则”与“功效原则”。“自由原则”代表的是个体性、自由、欲望，“功效原则”代表的则是群体性、幸福、德性。这两个原则并不是分别体现在不同著作的原则，而纯然是分析上的对比概念。它们的作用在于标示两种性质不同、理趣相反的理论原点，顺着这两个原点推演下去，人类行为的是非与政治社会组织的良窳将会出现截然不同的评断标准。接着在第三节中，我将进一步把这个对比联结到密尔对代议民主制的讨论。我们会发现“自由原则”所要求的是一种消极有限的政府，而“功效原则”则预设了一种积极有为的民治政府。密尔对后一种政府形式的肯定，显示他“最终”还是比较坚持“功效原则”，而不是伯林所说的“自由原则”。在最后一节中，我将以种种困扰现代人的社会问题检视密尔政治学说的适应性，并试图说明密尔的两面性必须复归为一，否则我们将被目前所流行的自由主义版本所误，坐失解决问题的契机。而这种复归为一的密尔观点，也正是一种力求“自由”与其他价值保持动态均衡的自由主义观点。

二、自由原则与功效原则

密尔的“两面性”有许多种不同的诠释，譬如“个人主义”对比于“社群主义”、“自由主义”对比于“社会主义”、“普遍主义”对比于

“特殊主义”、或“帝国主义”对比于“不干涉主义”等等。本文选择切入的角度是“自由原则”对比于“功效原则”，主要原因是这两个概念都是比较具有哲学意涵的概念，它们在密尔的思想体系中也都扮演着纲领性的角色。透过这组纲领性哲学概念的对比，我们比较容易看出密尔思想体系的断层所在。但是笔者要强调，这组原则的对比基本上是概念分析的对比，不是《自由论》与《功效主义》两部著作的对比。虽然“自由原则”的展开以《自由论》叙述最为详尽，而“功效原则”则完整地呈现于《功效主义》之中，但是《自由论》并非只提供“自由原则”，“功效原则”也清楚地有其一席之地。同样的情形不仅在《功效主义》中出现，甚至密尔的其他作品也有类似状况。因此，重要的不是作品与作品之间的对比，而是所有作品内部两种纲领性原则的对比。当然有些人认为这种概念上的分裂与对比根本不存在，所谓两面性只是我们误解密尔所导致的结果。在回答这个质疑之前，且让我们先试着分析这两个原则分别代表什么。只有理清这两个原则的意蕴与推论之后，我们才能判断密尔思想究竟一贯还是分裂。

所谓“自由原则” (the Principle of Liberty)，是指一个人应该享有最大程度的思想、言论与行动自由，只要这个人 not 侵犯其他人的权利、不伤害其他人的利益，外界就不能随便限制或剥夺他（她）的自由。众所周知，自由原则乃是密尔《自由论》的核心论旨，也是我们一般观念中英美自由主义传统的终极信仰。在确立了自由原则的优先性之后，有限政府、分权制衡、政教分离、法治程序等等自由主义的信条才会逐一推演出来。因此自由原则确实是一种纲领性的原则，它体现了自由主义维护个体自主性的基本信念，往下则展开了现代立宪民主政体及自由经济制度的庞大设计。

密尔自述他之所以伸张自由原则，乃是有鉴于欧洲人民在民治政府逐渐普及之后，误以为专制暴虐已不复成为个人生活的威胁。其实民主政治中的“人民” (the people) 仍然可能成为压制少数人的暴君，而这种“多数专制” (the tyranny of the majority) 却是欧洲人在推翻君主专制之

后，所必须警觉与面对的一种新祸患。“当社会本身成为暴君时——社会集体地对付组成的各个分子——其专制的手段就不会局限于政府官员的一切可能作为。……它所实施的社会专制要比许多政治压迫更为可怕，因为纵然这种专制通常并不以严刑峻法为后盾，却少有逃避的余地，它更深入生活的各项细节，而且奴役人的心灵。(L8-9)。^[1]如同密尔所明白承认，他并不是第一个警觉到社会专制危险的思想家，因为托克维尔先前在《美国的民主》中，已反复指陈社会舆论专制之可怕。^[2]但是托克维尔对付多数专制的办法是提供独立自主的结社组织、分散中央政府权力、以及加强民众的政治参与；密尔则另辟蹊径，主张确立某种规范群己权界的“简单原则”，据以保障每个人免受社会或政府不当干涉的自主领域。

密尔的“简单原则”今天已成大众耳熟能详的原则，它的规定是这样的：

只有基于自保的目的，人类才有正当理由，以个别或集体的方式，去干涉任何成员行动的自由。只有基于防止他伤害别人的目的，才能不顾他的意愿，正当地对文明社会中的任何成员行使权力。若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不管是身体上或道德上的利益，都不算是充分的理由。……任何人的行为，只有涉及他人的部分才须向社会负责。在仅只涉及本人的部分，他的独立性，就权利而言，乃是绝对的。对于他本人，对于他自己的身体与心灵，个人乃是最高主权者 (L14)。

这个“非常简单”的“自由原则”所要说明的是：人的行为可分成“涉己” (self-regarding) 与“涉人” (other-regarding) 两大部分，其中涉人的行为若伤害到他人的利益，则社会有权利以法律或其他方式加以惩处。至于纯粹涉己的行为，则无论这些行为对当事人造成什么影响，别人都不能加以干预。他们尽可表达他们的关切、劝告、或者嫌恶、不以



为然，但是没有权利透过法律手段或社会舆情加以制止。这个当事人尽管可能由于不听别人的劝告，而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但是比起他人为了他的好处而强迫施加的影响，前者的坏处还远不及后者 (L83-85, 104)。

具体地讲，密尔所要保障的“自由行为”包含三大领域。首先是内在意识方面的自由，这又进一步涵盖了信仰自由、思想自由、以及表达意见的自由。意见的表达与出版虽然实际上会涉及他人，但由于其重要性和思想自由几乎无分轩輊，因此他必须获得充分的保障；其次，个人也应该拥有追求品味及志趣的自由，人人都可以为自己规划适合自己的生活蓝图、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只要这些事情并未损及他人，不管行为本身在他人看来如何愚蠢或乖张，也不必向社会负责；第三，人与人之间可以有相互结合的自由。人要结合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伤害他人，则成年人均可在不受蒙骗或强迫的情况下相互结构 (L16-17)。以上第一种领域即为思想言论自由，第二种领域为表现“个体性” (individuality) 的自由。这两大领域分别是《自由论》第二、三章的主题，密尔为它们提出了许多精彩的论证，本文限于篇幅无法一一转述。但笔者愿意指出，密尔在讨论这些自由时，不仅展现出了极具怀疑论色彩的经验主义 (因为他认为我们不能假定自己相信的真理永远无误)，而且假定了自由讨论与自由个性必然有利于人类社会之进步发展。人类的“进步” (progress) 意味着人类整体幸福 (happiness) 的增进，而增进幸福即是追求“功效” (utility)，因此自由原则与功效原则在他的了解里并无任何冲突。

自由个性与社会进步虽然在原则上没有矛盾冲突。但是密尔对自由原则的铺陈却显示出两者之间难保和谐一致。譬如在主张个体性应充分发挥时，密尔强调特立独行的表现之所以值得鼓励，并不是因为它们提供了什么机会，使我们可以发现更好的行为方式或更值得普遍采行的习惯；也不是因为我们认为知识优越的人，应该有理由在生活上自行其是。事实上不管智愚贤不肖，每个人都应该有权利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表现自己、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人类的生存，没有理由要建立在某一种或

某几种模式之上。如果一个人具有相当的常识与经验，他为自己所规划的生活方式就是最好的方式，那并不是因为它本身是最好的方式，而是因为它是他的方式” (L75)。这种论证说明了密尔极端重视特异行为的发展。虽然少数人的特殊行为或想法在某些时候会被推崇为天才 (genius)，在另外一些时候被排斥为怪异之举 (eccentricity)，但其实天才也好、怪胎也好，密尔认为这些边缘性的表现都必须受到保障。即使社会大众觉得不习惯、厌恶、或无法忍受，只要它们并没有对别人造成直接或明显的伤害，密尔仍然主张社会必须容忍之。

这种“只要不伤害他人，就可以从心所欲”的态度正是自由原则的精髓。用密尔自己的话来说，“唯一实称其名的自由乃是以我们自己的方式去追求我们自己利益的自由——只要我们不企图剥夺别人这种自由，或阻碍他们求取自由的努力” (L17)。当自由的领域被定义得如此宽广，自由是不是必然带来进步或繁荣，已经不是关键的考虑。密尔本人自然相信两者永远可以并行不悖，而且整个社会的进步与繁荣似乎也是我们放任个体自由发展的终极理由。但是如同伯林所意识到的，强调个体性、多样性与自主的人生选择，并不一定要以促进社会进步为着眼点，如果特异的思想与行为明明被社会大众认定有害社会安定，在自由原则的理路下，它们仍然应该受到保障。这是为什么伯林认为密尔的终极关怀在于自由选择与多样性，而不在于功效或社会进步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支持密尔自由原则的论证之中，有一个说法是强调“每个人都是自己利益的最佳维护者”。密尔相信没有任何人会比当事人更关切他自己的利益 (interest)，因此也没有任何人会比当事人更了解自己的利益所在 (L84-85; RG246-46)。这个假定不仅帮助密尔完成一个重要命题——亦即，人人都有权利以自己认为最好的方式追求自己的幸福——而且它也成为现代自由民主政治之所以肯定普选权的重要前提。Robert Dahl 曾经说，民主政治必须假设“人人都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否则我们没有理由不采取类似柏拉图主张的“护国者制度” (guardianship)，由那些更了解我们利益所在的人来替我们规划人生 (Dahl, 1989: 52-79)。这确实是自由原则

与民主政治结合的一大关键，尽管其有效性仍值得商榷，但我们已经可以从中窥见自由原则的内在张力了。

相对于自由原则的是功效原则，所谓“功效原则” (the Principle of Utility)，是指人类行为的对错应以该行为是否促进幸福而定，凡是越能增进人类幸福快乐的，就是对的行为；凡是可能带来痛苦的行为，就是错的。因此功效原则基本上是一种伦理学的主张，其作用是为了判断行为的对错。密尔认为自古以来哲学家都比较鄙视功效原则，因为他们不喜欢把道德建立在增进快乐或免除痛苦这一类“低俗”的衡量标准上。对这些哲学家而言，道德行为的本质应该是“德性” (virtue)，或者“义务” (duty)，否则我们无法解释牺牲奉献或克己复礼的高尚行为。但是密尔继承功效主义的传统，认为德性或义务等等其实都依附于追求快乐的欲望之上，而追求快乐幸福乃是人类天经地义的生活目的，因此道德行为应该以增进快乐、免除痛苦为主要依据。密尔说：“功效主义的信条以功效原则，或者说最大幸福原则，为道德的基础。它主张行为之为是 (right)，与该行为增进幸福之倾向成正比；行为之为非 (wrong)，则与该行为产生不幸福的倾向成正比。幸福是指快乐、免除痛苦；不幸福，则是指痛苦和丧失快乐。……快乐以及免于痛苦乃是人生中唯一值得追求的目标” (U137)。

为了避免误解，密尔在《功效主义》中反复申明功效原则所追求的快乐幸福，并不是以肉体或感官的快乐为限。其实精神方面的快乐——包括智能、感情、想象力、道德情操——在功效主义中具有比感官快乐更高的价值。我们一般认为边沁 (Bentham) 所创立的功效主义并不考虑精神层面的快乐，但密尔则设法为之开脱，或至少设法使自己的理论与边沁的功效主义看起来一致。他说：

我们必须承认一般功效主义的作者都看重心灵的快乐甚于肉体的快乐，主要是因为前者更持久、更稳当、更不花钱等等——也就是，在于它们附带的好处而不在于其本性。就这些方面而

言，功效主义者已经完全证明他们是正确的。然而，他们也可以采取另一种立场（或可称之为更高的立场）而保持体系一贯。他们大可以承认某些种类的快乐比其他种类更可欲也更可贵，这么做功效原则仍然是融合无间的。当我们评量其他事物时，总是把品质与分量一起考虑；如果在评估快乐时，竟只以数量为度，那就未免荒谬了（U138-39）。

密尔对早期功效主义所做的扩大解释具有多重意义，一般人注意到的是“质量并重”，从而改变（或甚至终结）了原先功效主义的企图。但对本文而言，真正值得注意的有如下几点。首先，密尔相信每个人感受快乐痛苦的能力有别，有些人具有比较高的品味，因此宁可放弃低俗的享乐以追求高尚的快乐，但品味低下的人则没有这种辨识好坏的能力。后者之所以欠缺辨识力，密尔认为是经验不足所致，只要真正体验过各种不同的快乐与痛苦，一个人就不会满足于低俗的快乐，而知道如何培养高尚的嗜好。因此，在评价生活方式的好坏时，“那些知道两种生活内涵的人应该有最后的发言权；或者，如果他们意见不一致，则其中占多数的意见必须有最终的决定力”（U141）。我们稍早讨论自由原则时才说密尔不论智愚贤不肖，主张人人都有权利依他们自认最好的方式决定自己的人生，而不管他们的选择在外人看来是如何可笑或可恶。但是现在依功效原则的诠释，则生活方式显然有高下之别——如同密尔的名言所说：“当一个不满足的苏格拉底要强过当一个满足的笨蛋”，而且那些个知道高尚生活的人显然有权利指导无知的人如何安排人生。因此功效原则与自由原则开始有了矛盾，前者假定生活方式可以排列出一个等级秩序，后者则完全否定这种层级思考，主张价值的多元性与不可共量性。前者认为智者贤者足为平凡大众之楷模，而如此形成的多数意见又为少数意见之标竿；后者则反抗主流文化不遗余力，宁可保障怪异乖张之行为也不愿臣服于多数。

其次，密尔在讨论功效主义与其他伦理学派的优劣时，为了确保



“追求幸福”可以作为人类行为的最高目的，不惜扩大“幸福”的解释，使它包含德性、正义、权利等等项目。譬如他说：“功效主义的道德观的确承认人类具有牺牲奉献的能力，可以为了别人的利益而牺牲自己最大的利益。功效主义只是不承认牺牲行为本身构成一种利益罢了。……功效原则决定行为的对错，幸福则构成衡量功效的标准，但所谓幸福并不是当事人自己的幸福，而是所有相关的人的幸福。在衡量自己的幸福与他人的幸福时，功效主义要求一个人必须尽可能公正无私，宛如一个没有利益关系、充满善意的旁观者” (U148)。[3] 如此一来，功效原则固然显得面面俱到、颠扑不破，但功效原则所追求的快乐就已经不是一般享乐主义 (hedonism) 所追求的快乐。“快乐”变得不同于一个人欲望之满足，反而意指着克制欲望以成就智能或道德方面的实践。然而人生的意义究竟在于“以自己的方式去追求自己的利益”呢？还是“以所有相关者的幸福为真正的幸福，牺牲自己的利益以完成大我的利益”？前者是自由原则所教导我们的生活态度，后者则是修正后的功效原则对我们的期望。当一个人“刚好”以完成大我为自己的利益时，自由原则与功效原则确实调和一致。但假如一个人就是以自利考虑为生命的目的，同时这些自利行为又不构成对社会的伤害时，自由原则与功效原则或者毫无交集，或者会产生严重的矛盾。譬如一个人尽可为了贪图方便大量使用免洗餐具，而不太考量生态环境所付出的代价。依自由原则观察，这种行为并无不法，自然可以我行我素。但是从功效原则的角度来看，这种行为其实是一种“错”的行为，因为当事人并没有好好衡量私利与公益，没有发挥“牺牲一己方便，成就大家生态利益”的精神。又譬如，功效原则可以期待一个人主动担负起邻里守望相助的义务，或慷慨捐助慈善机构；但在自由原则的逻辑下，一个人大可抱持“各人自扫门前雪”的心态，而且他也可以一毛不拔，因为这都是他的自由。难道说，密尔对人类行为的对错竟有两套完全不同的标准吗？

上述疑难促使我们注意到另外一个问题，或许牵涉到密尔自由原则与功效原则的根本冲突。传统上，凡是认为密尔体系一贯的诠释者，多

半有一个回答上述质疑的方法，就是区分法律责任与道德责任。他们引用密尔本人的解释，主张自由原则所谈的是法律所不能横加干预的行为领域，而功效原则则涉及道德所关切的人类行为。最有力的说法出现在《功效主义》第五章，密尔在那里提到行为对错的区分，预设了该不该惩罚的观念。所谓“对”的事情，就表示我们认为该行为值得称颂，我们可以劝告别人或强迫别人照着那样去做。所谓“错”的事情，就表示我们认为该行为值得惩罚，不管是用贬抑或表达不悦的方式为之 (U184)。但是在这里“错误行为”所遭受的“惩罚”并不必然是法律制裁，很可能只是道德性的谴责。在《自由论》中，密尔也做过类似的区分。他说我们当然可以对品性恶劣的人表示不满或鄙夷，例如对粗暴、固执、自大或纵欲的人表达轻蔑，或劝告别人不要与之伍。但是这种性格的人对别人没有直接的伤害，当事人顶多因此遭他人排斥，算是恰如其分的惩罚。另外有些行为则构成道德上的罪过 (moral vices)，譬如自私自利、虚伪待人、贪求非分、幸灾乐祸等等。这类行为对别人造成较明显的伤害，别人若是对他表示愤怒、憎恨，乃至集体加以抵制，都是正当的反应。其中涉及法律问题者，甚至该接受司法上的制裁 (L85-88)。

但是，密尔的自由原则真的赞成社会大众对那些具有性格瑕疵或犯下道德过错的人加以排斥或谴责吗？从《自由论》第一章的文本看来，这个解释是十分可疑的。我们应该还记得密尔对社会专制的戒心，并不是由于社会上的多数人打算将行为乖张者绳之以法，而是由于多数舆论可能对少数特立独行的人形成看不见的压力，迫使他们循规蹈矩、唯唯诺诺。如果个体性、原创性真的想要有发展的机会，那么自由原则所要求于社会的将不只是法律上的豁免，还必须是道德上的宽容。换句话说，对于一种看起来像是自私自利的行为（譬如故意吃胖以逃避兵役），功效原则虽然没有办法加以刑罚，却可明白斥之为非并放任社会舆论加以声讨，以造成当事人承受某种道德上的压力。但是依据自由原则，则增加体重以逃避兵役不仅无法可罚，而且社会大众还应该自制一点，不能妄加指责，以免当事人的个体性遭受多数专制的压迫，丧失了“以自己认



为最佳方式追求人生理想”的选择权。这种困局不只点出了自由原则与功效原则的矛盾，更暴露出密尔区分“涉己/涉人”、“不悦/惩罚”的脆弱性。

当然，如同本文一开头所强调，密尔的自由原则与功效原则事实上并存于各主要著作。因此在《自由论》中，我们也读到他对功效原则的推崇。他承认功效才是“所有伦理问题的最终诉求”，而自由则绝非抽象的权利，更不可能“独立于功效之外”（L15）。他知道惟有诉诸功效，许多“积极的行为”（positive acts）才能被期待发生，诸如上法庭作证、保卫国家、拯救他人性命、保护弱小等等（ibid）。但是这个认知并不妨碍他继续倡导自由原则，仿佛这两个原则相安无事地共存于伦理的宇宙。由此看来，密尔似乎认为“消极不受侵犯”是自由行为的下限，而“积极帮助他人”则是功效原则对人性期待的上限。在上限与下限之间，我们可以悠游于消极自由的领域，也可以选择积极有所作为，而这一切都随人而定。但是问题却远比这个构想复杂，因为当自由不再只是促进进步的工具，而逐渐获得它自己的正当性，自由与功效就不再是下限上限，而会变成同一位阶的冲突性原则，使人类的每一种行为都承受来自两个不同方向的拉扯。最终而言，人们还是得决定自己应不应该做某一件事，应不应该对他人的某一种行为加以褒贬，而在这个关键时刻，密尔的建议却是模糊的。

三、民主政治的构成法则

我们在上一节中讨论了密尔的自由原则与功效原则，指出这两种原则的对比表现了密尔的两面性。在这一节里，笔者将试图以另一个方式来呈现密尔的两面性，也就是透过他政府功能的看法。我将试着说明，密尔对政府功能看法的歧异，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自由原则与功效原则的对比。因此，自由、功效与民主政治的关系是环环相扣的。

密尔对政府功能的第一种观点是典型放任自由主义的观点。在《自





由论》的最后几页，密尔开始讨论政府权限的问题，他认为基于“不侵犯个人自由”的前提，我们有三种主要的理由反对政府扩大权限、轻易干涉人民的生活。首先，有许多事情由个人做，可能会比政府做得好，因此政府当然不必插手。通常经济活动是最典型的例子，但是还有许多其他活动——如文艺、民俗、休闲娱乐等——大概也都可以划入这个范畴 (L121)。

其次，有些事情由个人去做，未必比政府做得好，但是为了借以培养人民做事的能力，最好还是由人民去做。具体的例子包括陪审制度、慈善事业、地方市政以及地方性的产业组织。密尔认为政府放任人民自己从事这些活动的结果，将可以“增进他们的活动能力，活络他们的判断、以及让他们对自己所要做的事情更有知识”。这种过程事实上等于某种全国性的精神教育或国民教育，也是任何自由民族为了培养积极公民所必需的政治教育 (ibid)。

第三，反对政府职权扩大的最重要理由，是惟恐政府会变成一个强而有力的中心，吸收了全国最优秀、最有理想的人才，而民间社会反而失去活力，完全无法与政府抗衡。密尔这个论证与托克维尔讨论中央集权的弊病、以及公民社会的必要性时所用的理由完全一致。他们两人都认为政府职能的扩大，表面上造就了一个很能为民服务的万能政府，但是实质上削弱了民间社会的活力，同时又徒然使政府变成一个庞大而无效率的官僚组织。诚如密尔所说：

如果社会上每一种需要有组织合作或广博见闻的事业，都操在政府手里，如果政府的职位总是由最能干的人担任，那么除去纯粹思考的方面以外，所有国内具有高深教养和实践智慧的人都将集中于人数众多的官僚组织中，而社会上其余的人也将在一件事情仰承他们的意旨：平凡大众期待指导和命令，要他们做些什么事；能干而有壮志的人，就期待个人的升迁。……在这种政体下，不仅官僚组织之外的大众，因为缺乏实际经验，没有能力



批评或遏止官僚政治的作风，就算偶尔专制机构出现意外，或由于民众机构的自然运作，居然会让一个或几个有志改革的统治者晋升到最高的职位，任何违反官僚政治利益的改革也仍然行不通(L123-24)。

因此，密尔“不侵犯个人自由”的大原则下所主张的政府，比较接近古典自由主义所说的自由放任 (*laissez-faire*) 政府。这种政府本身并不需要太强势、太能干，它只要尽量保留一些空间给民间组织去活动，政治自然会上轨道。

但是，在《代议政府论》中，密尔对政府功能的看法显然与上述观点颇有差距。他不仅主张政府要能干一点（否则如何增进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也主张政府要积极一点（否则人民如何自动变成有种种德性的公民？）。密尔之所以有此转变，当然又与他切入讨论的基点有关。前面自由放任型政府的出现，是在“不侵犯人民自由”的大前提下推演出来的。而在《代议政府论》的开头处，密尔却大谈进步与秩序。当密尔发觉“进步”并不是一个十分明确的概念，他就转而从人民的素质来衡量政府的好坏。其结论是，好的政府形式必须具备两种主要的功能：（1）教育人民、增进人民的智识与德性；（2）组织贤能的人管理好公共事务。密尔的说法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已经为任何一套政治制度所能拥有的优点，找到一种双重分类的基础。一方面，它要能促进社会的一般性精神进展，包括智识、德性、实践能力、以及效率的进步；另一方面，它也要能完善地将社会现有的道德、智识与活动的资产组织起来，使对公众事务发生最大的效果。一个政府的好坏，要看它加诸于人的行动，以及它加诸于事物的行动；要看它把公民培养成什么，也要看它与公民共同完成了什么；要看它的倾向是使人民改善还是恶化，也要看它为人民所做的事以及透过人民所做的事



是好是坏。政府既同时是一种对人心有重大作用的影响力，也是一组处理公共事务的组织性安排。就前一种功能来说，它的有益行动主要是间接的，但并不因此减少其重要性，而它的有害行动却可能是直接的 (RG229)。

在这段引文中，值得我们注意的焦点有二。第一，密尔现在认为最好的政府不是放任无为的政府。一个好政府必须将全国才智之士组织起来，或至少吸收许多才智之士，使他们能“对公共事务发生最大的效果”。这种积极性与前述处处提防强势政府的立场是南辕北辙的。第二，好政府不只要会做事，而且(更重要的)要能增进公民的智识、品德及行动的效能。简单讲，要能改善人心 (human mind)，造就积极向上的国民。这个功能完全背离自由原则对政府的规定，因为在自由原则之下，每个人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基本上不是社会舆论或政府官员所能置喙。但是从功效原则的角度来思考，密尔此处所赋予政府的“改造人心”之功能又显得十分顺理成章。因此，自由原则与功效原则的矛盾再一次展现在密尔对政府功能的看法，使《代议政府论》看起来比较接近《功效主义》，而与《自由论》对政府的讨论越行越远。^[4]

密尔一旦确立了优良政府的两大条件，就进一步检讨何种政府形式最能满足这两个条件。很快地他就发现民主政治比起其他政府形式，更能符合好政府的标准。他认为：就促进福祉、办好公众事务这项要求来看，民主政治必然要比君主制度或寡头贵族好。因为正如我们上面所说，密尔相信每个人都是他自己利益的最有力捍卫者，他也相信一般而言每个人都倾向于自利甚于利他。因此，在照顾人民的福祉这件事情上，没有什么方式会比主权在民更为妥当。其次，就政府对人心的影响来看，他也认为民主政治最能提升公民的智识、道德及实践能力之水平。他迂回地询问何种人格比较可欲——是“积极的人格”还是“消极的人格”？经过一番比较之后，他认为积极的人格较可取，因为积极的人格才有绵绵不绝的动力去探求新知、改善品性、以及参与实务。接着，他就

指出只有民主政治才能培养最大量的积极人格，因为民治政府“不仅使每个公民在最高主权的行使上有发言权，而且至少有时会被征召去实际参与政府运作，亲自担任某些地方性或一般性的公家任务。”透过政治参与，人民的素质可以得到显著的提升，因此民主政治在两项要求上都拔得头筹 (RG244-252)。

密尔对政治参与的重视，其实不下于在他之前就极力鼓吹公民社会理论的托克维尔。密尔说，人生大部分的光阴都是在平凡无奇的规律性作息中度过。然而在日常作息中，每个人所念兹在兹的不外是私人事务的安顿与未来。只有透过参与公共事务——无论是社会性的还是政治性的活动——人心才会振奋起来，开始向外饥渴般地吸收、学习、表达。原先自私自利的私民会转而从公共利益的角度衡量事情，原先孤僻不群的个性也会变得尊重团体纪律与人际合作。“他会打从心里感到自己是社会的一分子，凡是有益于大家的事也都对自己有益” (RG254-55)。密尔在这里所描述的，不仅是日后 Carole Pateman 所推崇不已的参与式民主 (participatory democracy)，同时也等于预告了当前西方“审议式民主” (deliberative democracy) 理论的来临。^[5]

不过，密尔民主理论的吊诡之处就在于他并不能坚持政治参与的理想。当他讲完公民参与的种种优点之后，忽然话锋一转，表示由于现代民族国家的规模太大，无法容许每个人都亲自参与政府的运作，因此代议制度乃成为最佳政府的形式 (RG256)。密尔由参与式民主转成代议民主所做的说明不过聊聊几行，却使后世对他民主理论的评价有了天壤之别。大体上，《代议政府论》的前三章都指向普遍参与的必要性，但是第四章以降，密尔却完全以代议制度为理所当然。于是他劝选民不要凡事都想直接指示代议士如何投票，不要以为每票等值的选举制度是最好的制度，甚至于主张民主政治必须吸收行政官僚制的优点，结合专家与训练有素的官僚 (RG291, 334-336, 381-383)。除了明白讲出“人民也许并不真正喜欢政治参与”之外，《代议政府论》的后半部倒是极符合我们一般对自由民主体制的观感——各自追逐私利的选民、参与度有限的选举、

相互制衡的政府部门、争权夺利的议会。也许我们不能过于大胆推断，强指这是自由原则结合民主政治的结果。但是相对而言，功效原则似乎比较吻合《代议政府论》前面几章所建立的论旨。不管怎么说，密尔确实放弃了人人平等参与的民主，转而鼓吹一种“比例的民主”了。

所谓“比例的民主”，也就是密尔心目中“真正平等的民主”（a really equal democracy）。密尔认为当时流行的民主观念指涉两种不同的制度，一种是“人人平等被代表，所有民众统治所有民众的政府”，他称此为“民主的纯粹概念”（the pure idea of democracy）。另外一种则是“多数人统治所有民众的政府”，这种政府所代表的是多数的利益，不是全民的利益，而其中最容易遭到压迫的便是欠缺代表的少数。密尔说后者已成为流行的民主观念，可是他主张选举制度必须继续改良以促成前一种民主。他说：“在一个真正平等的民主国家中，每一部分或任何部分都会被代表，并不是不成比例的，而是成比例的。选民的多数始终会有多数的代表；但选民的少数也始终会有少数的代表。以一人对一人，他们正和多数一样有充分的代表权。除非这样，否则就没有平等的政治，只是一种不平等和特权的政治”（RG303）。但是密尔事实上并不真的希望看到“一人对一人”的代表制，如果真的“一人对一人”，则简单多数的结果势必造成社会中人数较多的一方轻易赢得所有选举、支配所有决策，这是密尔所担心的“阶级立法”（class legislation）现象。为了对抗此一危机，他主张少数人（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境富裕的、事业有成的精英）的选举权应该加权计算，如此才符合真正的“比例”。因此，密尔的“平等”观念跟我们一般所谓的“平等”观念完全不同。他的平等注重比例上的平等，而这个“比例”却又不全然依数量决定，而是基于其他的政治考虑。他为了保障少数优异分子的政治影响力，硬是主张那些人应该有投两张票以上的权利。在他看来，如果不透过这种“复票制”（plurality of votes）来保障少数精英的政治权利，他们就会“不成比例”地被多数选民以“阶级立法”的方式压制下去。密尔的想法在今天已成为一种笑话，不过笑话背后所蕴含的焦虑恐怕并未完全过时。

对密尔来讲，这种落实“比例平等”的复票选举制完全合乎他对政府功能的观点，也符合他自己对“自由”与“平等”两种价值兼而有之的期待。就政府功能言，密尔希望好政府必须能“借由扩大参与以提升人民素质”，又能“组织贤能以办好公共事务”。前者的实践方式是赋予全国民众选举权，使人有机会参与政治；后者的落实则有赖“复票制”一类的设计。如果说普选权的扩张代表了密尔对“平等”价值的承诺，则“复票制”或“比例民主”可以看成他为保障“自由”（特别是少数人的自由）所付出的苦心。因此在他自己的了解里，代议民主制既实现了自由也实现了平等，同时又最能达成良好政府应有的功能。诚如他为复票制辩解时所说的：“虽然每个人都应该有发言权，要每个人都有平等的发言权却是一种全然不同的主张。当两个在任何事业中有共同利害的人，有了不同的意见时，是不是把两种意见看为有同样的价值，就是公平呢？如果两个人的品德相等，一个人在知识和聪明方面超过另一个人，或者如果聪明相等，一个人在品德方面胜过另一个人，那位有较高品德和知识的人的意见和判断就应该比另一位更有价值。如果国家在实际上主张他们有相等的价值，这种主张将是空洞的主张。在两个当中，哪一个更聪明或更优秀，就应该占有更大的比重。……对共同事务完全没有发言权是一件事，让别人有更大的发言权，因为别人有较佳的管理共同利益的能力，却又是一件事。这两件事不但不同，而且也不能相提并论”（RG334-335）。

但是，密尔认为没有矛盾的地方，在我们看来却大有疑问。笔者综观密尔对民主政治的讨论，认为其中隐隐然存在两种对民主政治本质不同的看法，一种是强调专家行政的代议民主，一种是强调公民参政的参与民主。这两种观点又呼应了我们先前所分析的自由原则与功效原则，使前者可以建构成比较消极的民主政府，后者则发展为蓬勃积极的民治政府。换言之，依着自由原则的逻辑思考，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人生规划，别人不能随意干涉，所以他不一定要对政治参与有兴趣，大可以把公共事务的管理委托给一群有兴趣、有政治能力的行政官僚与国会议



员。这样所造就的代议政府不必凡事向选民请示，而掌握统治权的少数精英则可以名正言顺地治理国家，不用担心低层群众获得普选权后所形成的阶级立法危机。这种政府所须担负的功能比较有限，主要是管理好公众事务，让民众觉得福祉有保障。相反地，若是依着功效原则的逻辑思考，由于集体生活的目的在于增进最大多数人的幸福，而幸福又只有在社群成员彼此关切、舍私从公的情况下才算彻底实现，因此人人应该彼此勉励，以追求具备德性智能的高尚人生。在增进德性智能上，政治参与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途径，所以人人都应该有机会亲自担任某种公共职务，而不只是选举投票。他们即使选出议员代为处理国家大事，也仍然有权利（及义务）督促公职人员善尽其职。因此相对而言，政府也有责任主动关切一般人民是否智能提升、道德精进。它不能只以料理公共事务为满足，而必须思考如何培养民众、教育民众，使之成为积极上进的现代公民。

长久以来，密尔作为自由主义的理论大师，总是轻易被归属于倡导政府功能有限的放任学派。其实密尔的思想有着两面性，在我们比较不熟悉的那个层面，密尔相当强调社群、德性、公共利益、热心参与的民众、以及积极有为的政府。这一个重视政治参与的密尔，曾经在《代议政府论》中写下如后的一段话，即使百年之后读之，仍然令人赞叹不已：

如果人民的道德情况坏到证人普遍说谎、法官和其下属受贿的地步，程序规则在保证审判目的上又有什么效用呢？又，如果人民对市政漠不关心，不能吸引忠实而有才能的人出来管理，反而把职务交给那些为谋取私利的人去担任，制度又怎能提供一个好的市政呢？如果选民不关心选择最好的议会成员，而是选择为了当选而愿花最多钱的人，最广泛普及的代议制度又有什么用处呢？如果一个议会的成员可以被收买，或者如果他们性情暴躁，欠缺公共纪律的矫正或个人的自我克制，使他们不能作冷静的考虑，并且在下院议席上动手打人或互相开枪射击，这样的代议制

议会又怎能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呢？(RG225-226)

我们期望的，其实不是自由原则下所建构的代议民主，而是比较呼应功效原则的参与式民主。如果民主没有这些要求或内涵，那么民主就不是什么值得期待的梦。

四、两种自由主义

平心而论，本文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仲裁密尔的自由原则与功效原则何者为优，或决定代议民主与参与民主何者可取。笔者试图说明的是密尔思想的两面性。我们一方面指出这两面性如何呈现于密尔的著作，另一方面也解释为什么密尔自己认为它们毫无矛盾对立，而我们却又振振有词地认定其间存在不容忽视的紧张关系。事实上，自从《自由论》问世以来，密尔就被大家推崇为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宗师之一。奠基于《自由论》中自由原则的精彩论证，密尔的确开启了一个自由解放的时代。他的激进性表现在反对清教徒立法禁酒、反对禁止毒品买卖、反对限制政治性言论（包括“弑君论”）、反对查缉赌博、反对处罚男女通奸、反对禁止色情交易（或至少反对政府只查办妓女而纵容嫖客）等等（L106-111）。这些主张即使在今日看来，都还有不少争议余地，何况在一百年前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

但是毫无疑问地，密尔所开启的方向，始终有许多人乐于追随。同样打着自由解放的旗帜，今天已经有人进一步主张毒品应该完全自由买卖、枪枝可以自由拥有、赌场可以设立、娼妓及槟榔西施应有工作权。“言论自由”早就包括朝人脸上丢鸡蛋、践踏或焚烧他人的照片、公共场所墙壁涂鸦，而“反对政府干涉人民精神领域”也已扩大到反对所有政府推动的道德重整运动或所谓心灵改革运动。其他方兴未艾的解放运动还包括人民有权通过代理孕母生育后代、同性恋者婚姻合法化、性行为彻底开放……。有些发展密尔也许赞同，另外一些他可能反对。但不管



赞成反对，这些主张都是顺着密尔自由原则逻辑推演的结果——只要当事人出于自由意愿、只要该行为无法证明会对他人造成明确伤害，那么凭什么政府或社会舆论要加以干涉呢？如果密尔居然反对这些主张，那是密尔对自己的自由理论不够忠实。密尔可以因为跟不上时代潮流而变成保守派，但自由原则的进展将永无止境。

密尔如果被打成保守派，当然会觉得满腹委屈，因为他自己从来不曾单方面地肯定自由，从来没说自由原则可以片面地无限推演。在《自由论》里，他就信誓旦旦地说过他并不把自由看成某种“抽象的权利”，自由只是促进人类进步改良的“泉源”。简单地讲，它只是手段，真正的人生目的是幸福或功效。而且也正因为社会整体的幸福优先于个人的自由，所以他才会主张有酒后伤人前科的人应被禁止再度喝醉酒，而懒惰不负责任的父亲可以被强制去劳动 (L108-114)。在这类例子里，顾及社会连带责任的考虑显然优先于尊重个人行为的自由，即使那些行为都还未造成明显而立即的伤害。

事实上，密尔除了为他赢得后世声名的自由原则外，确实还有与自由原则相左的一面。在这个比较强调社会功效的方面上，密尔的言论不仅不像个（所谓）自由主义者，简直就是社群主义的翻版。试看他在《代议政府论》里怎么说：

（功效主义）确实有一种坚强的自然情操为其基础。……这个坚固的基础就是人类的社会感情（the social feelings of mankind）。人有一种欲望想要与同类成为一体，这种欲望目前已经是人性中的一大原则，并且可喜的是，这个欲望即使没有特别的教诲，也会受文明进化的影响而日益强烈。……人们深知自己可以与他人合作，提出集体的（而非个人的）利益为他们行动的目标（至少是暂时的目标）。在他们合作的期间，他们自己的目的和别人的目的变成同一了；至少他们暂时觉得别人的利益就是他们自己的利益。一切对社会联系的加强，以及社会的一切健康的发展，使

人人觉得在实际上顾到他人福利对于自己更加有益；这种增强与发展也使人人越把自己的感情与别人的福祉视为一体，至少越来越会对别人的利益给予实际上的重视 (U164-165)。

由于肯定人的社会性，因此密尔不会全盘否定社会舆论的作用。《自由论》里头他大力抨击社会舆论的专制，视之为个体性自由发展的主要障碍。但在同一本书里，他也强调人群彼此以意见求全责备的重要性。粗暴、狂妄、纵欲的人都会受到社会舆论的指责或集体排斥，“对于这种结果，他们没有权利抱怨” (L86)。

在密尔之后一百多年来，我们对自由主义的理解通常都是循着他所建立的自由原则而推论。于是自由主义不仅代表尊重个体自由甚于社会连带，也代表价值多元及道德中立。但是密尔本人不仅重视社群关系有如上述，而且其道德坚持及道德“不中立”也值得我们留意。实际上，密尔虽然为了维护个体性而显得凡事无可无不可，但骨子里仍然有相当明确的道德标准。他在《自由论》列举过一些“道德罪过” (moral vices)，如虚伪待人、占人家便宜、自私自利、残暴易怒、作威作福、幸灾乐祸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加以声讨谴责的对象 (L87)。到了《功效主义》，他更是明确地指出有些价值或人格特质才是好的特质，可以帮助一个人获得幸福的人生。这些特质包括乐善好施、富有智慧、慎思明辨、克制不当嗜欲等等 (U144-146)。有人喜欢强调自由主义并不预设什么样的人生目标或生活形态才是好的人生，他们应该仔细看看自由主义者密尔到底怎么说。

同样地，自由主义的信徒也常常强调一个人处事必须完全无私，不能偏爱自己的熟人甚于陌生人，否则就不够“中立”。密尔当然也赞成这种就事论事的原则，并期待人民参与公共事务时能摒除一己之私。但是在合法的范围内，密尔却同意“偏袒”是人之常情，不可能也不必要完全压制。他说：“人们认为偏私及偏袒并不全然该被谴责，事实上被谴责的多半是例外而非原则。一个人在不违背其他责任的情况下，如果不



让他的家属或朋友比陌生人在获得好职位上有点优势，那么他被骂比被称赞的机会怕要多些”（U180）。这个论调下的密尔听起来确实比较有人情味，也比较合理，可惜自由主义的主流理论大概避之惟恐不及。

但是，难道密尔不就是一个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吗？难道我们所谓的自由主义只是撷取了半个密尔的自由主义？任何人稍微反省一下，应该都会为这个问题觉得好笑。原来目前大家所了解的自由主义是一套根据密尔自由原则所建立起来的思想体系，为了保持体系的一致性，我们决定排除与自由原则不调和的所有部分，包括功效原则或社群主义式的考虑。其结果是产生了一个逻辑清楚的自由主义思想系统，由尊重个体性、自主意志、自由选择、为所欲为、互不干涉，一直推到价值多元、宽容异己、政府维持中立。其中发挥主导作用的观念是自主性，而唯一具有限制作用的命题是“不能伤害他人”。这的确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则”。然而功效主义呢？德性呢？传统习俗呢？公共利益呢？社群关系呢？它们都到哪里去了？

它们原本不必移到别的地方去，因为密尔原本希望它们在他的理论中也有一席之地。如果密尔的理论最后会被称为自由主义，那么这些元素应该也是自由主义的元素，只是它们都被声势凌人的自由原则排挤掉了。密尔若是地下有知，可能会为此发展感到心痛。因为全然奠基于自由原则和自由主义并不是他心目中的自由主义，他的自由主义——如果我们能创造一个新字眼的话——是一种“力求平衡的自由主义”。他曾说：

除非有利于民主政治和贵族政治、财产和平等、合作和竞争、奢侈和禁欲、群性和个性、自由和纪律、以及实际生活中其他对立事项的种种言论能够被人以同样的自由去发表，并且以同样的才能和精力去贯彻和维护，否则这两种元素都不会有机会得到公平的对待，必然会像天平的一边高起来，另一边降下去（L53-54）。

因此在密尔的心中，安定与进步、自由与纪律原本都应该取得平衡的。我们所看到的两个密尔原来是一个密尔，而自由原则与功效原则虽然在概念分析上水火不容，却也是应该维持动态均衡的。只有将自由原则与其他价值等量齐观，密尔才能复归为一，在密尔复归为一之后，自由主义或许比较能够面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挑战。毕竟，正如伯林生动的比拟所描绘的，密尔身处的 19 世纪是一个“幽闭恐惧症” (claustrophobia) 的时代，在那种时代，自由原则是许多优秀挺拔的知识分子所衷心企求的。然而 20 世纪下半叶的我们却仿佛置身于“旷野恐惧症” (agoraphobia) 的情境中，大家对分崩离析的恐惧，远远超过突破限制的渴求。“人们害怕享有过多的自由，仿佛过多自由将使他们堕入一个巨大无涯的、毫无友情的真空，亦即失落在没有通路、标志与目标的大沙漠中” (Berlin,1986:330)。历史既然时时游移于旷野与密室之间，人类的行为规范便不能只以一套原则对应。当后现代情境已浸浸然成为这个时代的主要象征，我们即使不敢要求价值的天平倾向功效原则或社群主义的一端，至少可以期盼天平的均衡点移过来一点。这种不断寻求新的平衡点的自觉，或许是密尔自由主义所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参考资料

江宜桦

2001 《托克维尔论自由、平等与民主政治》，《学术思想评论》，第七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 年。

张福建

1995 《社群、功效与民主：约翰·弥勒政治思想的另一个侧面》，收于陈秀容、江宜桦主编《政治社群》。台北：中研院社科所。

Arneson, Richard J.

1982 “Democracy and Liberty in Mill’s Theory of Government,”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20:43-46.



Barber, Benjamin R.

1984 *Strong Democracy: Participatory Politics for a New 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ger, Fred R.

1984 *Happiness, Justice & Freedom: The Mor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John Stuart Mil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lin, Isaiah 著, 陈晓林译

1986 《自由四论》, 台北: 联经。

Chopra, Y.N.

1994 “Mill’s Principle of Liberty,” *Philosophy* 69:417–441.

Cohen, Joshua

1989 “Deliberation and Democratic Legitimacy,” in Alan Hamlin and Philip Pettit eds., *The Good Polity: Normative Analysis of the Stat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pp.17–34.

Cowling, Maurice

1990 *Mill and Liber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rosson, Frederick J.

Dahl, Robert Alan

1988 “Mill’s Dilemmas,” *Interpretation* 16:229–245.

Dahl, Robert Alan

1989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Donner, Wendy

1991 *The Liberal Self: John Stuart Mill’s Mor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Gray, John

1991 “Introduction” to *On Liberty and Other Essays*, edited by J.Gra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Mill on Liberty: A Defence*.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 Gray, John and Smith, G.W. (eds.)
1991 *J.S. Mill On Liberty in Focus*. London: Routledge.
- Himmelfarb, Gertrude
1990 *On Liberty and Liberalism: The Case of John Stuart Mill*. San Francisco: ICS Press.
- Mill, John Stuart,
1961 《论自由及论代议政治》，郭志嵩译。台北：协志工业。
1969 《功用主义》，唐钺译。台北：商务。
1991 *On Liberty and Other Essays*, edited by John Gra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ateman, Carole
1970 *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tic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yan, Alan
1987 *The Philosophy of John Stuart Mill*. 2nd ed. London: Macmillan Press.
- Strauss, Leo
1988 *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Other Stud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emmel, Bernard
1984 *John Stuart Mill and the Pursuit of Virtu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korupski, John
1989 *John Stuart Mill*. London: Routledge.
- Skorupski, John (ed.)
1998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il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ullivan, Eileen P.
1983 "Liberalism and Imperialism: J.S. Mill's Defense of the British Em-



pir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44:599–618.

Tocqueville, Alexis de

1969 *Democracy in America*, trans. by George Lawrence, edited by J.P. Mayer. Garden City, N.Y.: Anchor.

Thompson, Dennis F.

1976 *John Stuart Mill and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注 释

[1] 本文使用的密尔原文版本为 J.S. Mill, *On Liberty and Other Essays*, Edited by John Gra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内中包含 *On Liberty*、*Utilitarianism*、*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及 *The Subjection of Women* 等四部作品。本文分别以 L、U、RG、SW 等缩写代表上述四种著作，阿拉伯数字为 Gray 版本之页数。

[2] 详见 Tocqueville, 1969:282–319; 江宜桦, 1999。

[3] 更有意思的是，密尔说功效主义伦理学的精神，在耶稣基督的山上宝训中体现得最完全。“己所欲，施于人”、“爱邻若己”都是功效主义道德观的理想典范，见 U148。

[4] John Gray 试图透过密尔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的若干说法，调合《自由论》与《代议政府论》在政府功能上的冲突。在我看来，他的解释并没有说服力。参见 Gray, 1991:xii–xxiii。

[5] 参见 Pateman, 1970:22–44; Barber, 1984:150–55; Cohen, 1989。

从佛教形上学到佛教诠释学

林镇国

佛教哲学和现代性之间的相遇可以说是十分重要而却长期被忽略的问题。以同属东亚传统的儒家来说，其与现代性的辩证与对话相形之下便可以看到较多的讨论。为什么二者会有如此不同的情境，可以有许多解释，一般多认为儒家的合理主义和经世性格较能契合西方的启蒙传统，而佛教则否。佛教基本上是以证悟解脱为究竟的出世宗教，虽然大乘佛教的发展，特别是在东亚地区，有着明显的世俗化倾向。^[1]但是，和主流的儒家传统比较，世俗化的大乘佛教在现代仍然未能在思想层面将政治、经济、科技等问题列入议题。佛教思想和现代性的问题似乎尚未有过真正的照面，遑论彼此之间的会通或批判。

这种观察虽有所见，然并未完全切中实情。儒家和现代性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会通转化上，一方面和现代西方的民主与科学进行会通，另一方面希望在道德意义上予以转化。不论是会通或转化，都是对现代性采取积极正视的态度。因此儒家和现代性之间在论述层面上显得较为有声有色。相对地，佛教思想界对现代性议题确是缺乏较为深度的反省。就佛教在现代中国和台湾的发展而言，这种观察大体上是正确的。但是若将视野扩大到整个东亚区域，特别是近代日本，甚至于扩及从19世纪以来在欧美发展的佛教研究与诠释，则吾人可以看到全然不同的景观。简单地说，在日本与欧美，佛教哲学提供了在“现代性计划”之外的另一思考方向。



京都学派与批判佛教

在日本，先是由京都学派在哲学层面上从佛教（禅宗与净土真宗）的立场展开对现代性的反省与批判。京都学派自西田几多郎以降，其成员无不熟稔佛教哲学和西方哲学，特别是从康德、黑格尔到海德格的德国哲学。在20年代到30年代，三木清、和辻哲郎、田边元、西谷启治先后赴德，接触到早期的海德格，这对于京都学派在战争期间提出“近代的超克”观点，有其关键性的影响。在这思想史脉络下，佛教哲学被援用为超越现代性的主要资源。这思想发展即使在今天看来仍是十分令人惊讶。

京都学派哲学在西谷启治《宗教是什么》（撰于1954—55年）出版后即逐渐趋向式微。第三代的阿部正雄等人则转向欧美，以宗教对话为重心，不复具有西田哲学与田边哲学开宗立派的雄图，也失去战时高坂正显、高山岩男、铃木成高、西谷启治的世界史哲学的视域。宗教对话取代了现代性的批判，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吊诡表现。

然而京都学派的遗绪在80年代以“日本人论”的姿态再度出现，混杂着右翼的意识形态和后现代思潮，在许多方面仍然影响日本佛教的自我认知。在这种背景下，日本佛学界出现高崎直道称之为迄至1994年为止十年来最为重大的动向——“批判佛教”论争。^[2]由于袴谷宪昭和松本史朗所提出的“批判佛教”除了批评东亚佛教的本觉思想与如来藏思想之外，还特别针对京都学派（西谷启治）和新京都学派（梅原猛、中村雄二郎）的观点提出批判，认为他们的“场所佛教”完全和“批判佛教”相对立。

日本“批判佛教”的立场主张真正的佛教原合于强调以理性为知识和伦理基础的现代性精神，其歧出变质乃产生于本土化过程（在印度的婆罗门化，在东亚的汉化、和化等）中批判精神的丧失，转变为充满神秘主义与体验主义色彩的“场所佛教”。据袴谷与松本二氏的说法，“场所佛



教”指的是以如来藏思想、本觉思想为主调的华严、禅宗，以及立基于华严与禅的京都学派哲学。

实体主义的嫌疑

“批判佛教”与“场所佛教”的对峙争执在佛教发展史上一再出现有其典型的意义。不论是天竺“一乘”和“三乘”的立场分别，或中土的性相之争（如慈恩与法藏的分歧）都和“批判佛教”论争一脉相承。此论争本质上就是实体论和缘起论之争。在现代中国，欧阳竟无的支那内学院和太虚的武昌佛学院之间也有类似的法义之争。较为引人注目的是新儒家（熊十力、牟宗三）和欧阳竟无、吕澂之间跨及二代的争论。对内学院来说，关键的问题在于佛教是否肯定超越的形上实体作为万法的本源，欧阳竟无和吕澂十分明确地站在否定的立场。他们认为新儒家的创造性佛学诠释大抵是顺着《起信论》与禅“返本还源”的路数，此“本源”被理解为能缘生万法的“本觉”、“自性”、“一心”，因此只要能够直了本心，见自本性，便可成佛（禅宗）。换言之，内学院批判中土佛学和新儒家均落于海德格所言的“本体神学”，不合于佛教“缘起性空”的共法。

针对内学院的指控，由于熊十力常从“性相”、“体用”的范畴来说“实体”，的确不免有“本体神学”的嫌疑，但是其所谓的“实体”或“本体”是否就同于数论、胜论或亚里士多德形上学所说的“实体”，实有待较为精致的考察。牟宗三便颇能清楚地意识到此“嫌疑”是新儒家的佛学诠释所必须消除的疙瘩。牟氏从语言分析的角度指出，中土佛学所言之“本体”或“实体”，多是漫话语，是抒情字，非实体字，因此根本就不同于印度或希腊实在论形上学的实体概念。

至于如来藏思想是否就是如批判佛教论者所称的实体形上学或基体论（dhātu-uāda），高崎直道分析“界”（dhātu）的用法时指出，《大乘阿毘达磨经》“无始时来界”和《不增不减经》“一界”的“界”意指生

死与涅槃存在于同一场域，该场域是从生死到涅槃的实践主体所存在的地方。众生的场域为生死，佛的场域为涅槃，其中转换的实践即在于“转依”。此场域（“界”）的存在不能解释为“实体”或“实在”，而应该解释为“实存”或无我的“实存”。^[3]

高崎直道不认为如来藏思想落后于如松本史朗所称的基体论或发生的一元论。高崎将“无始时来界”的“界”解释为“生活世界”或“实存的场域”，不是如真谛解释为某种超越的主体性（“解性黎耶”）或唯识宗解释的染污阿赖耶识。^[4]“界”非指“实体”，也不是超越的主体性，而是实存的生活场域。这种从海德格式的实存本体论而来的诠释虽不同于牟宗三的诠释，然殊途同归，均不认为东亚佛教的主流教养陷于实体形上学的死巷中。

在这波的佛学论争里，高崎直道也看到了方法论上文献学和诠释学之间的紧张关系。袴谷宪昭、松本史朗，以及涉入争论的津田真一等人，都接受过严格文献学训练，并成为出色的文献学者。但是，和上一代的日本佛教学者不同，他们的学问更倾向于诠释学。佛教的诠释学主要表现在中国佛教的教判论和西藏佛教的宗义研究，从某一特定立场对全体佛教教义重新予以组织与判释。这种诠释学当然不同于客观主义的文献学。高崎直道便认为袴谷和松本的“批判佛教”是受到西藏宗义书影响的诠释学。^[5]

佛教研究的诠释学转向

诠释学除了着重于抉发历史文献学所忽略的作者意图与文本意义，也特别意识到各种佛学诠释背后的诠释机制。高崎直道回顾十年来的佛教学时注意到这一点，提及汤田丰的观点，认为西方19世纪以来的印度哲学与佛学诠释其实主要是受到康德哲学的影响。康德区分现象与物自身，在诠释奥义书以降的印度哲学时或许是恰当的，但是诠释缘起论的佛教哲学则不相应。汤田丰主张佛学诠释典范应该从康德哲学转向尼采哲学，

因为尼采与佛教皆了解到自我或实体不外是来自对文法信仰的形上学产物而已。〔6〕

从形上学到诠释学的发展，显示了现代佛学研究的典范转变，而这转变在某些意义上也是对现代性的回应。诠释学，如吕格尔所言，“乃是现代性克服其神圣底遗忘的途径之一”。〔7〕这乃由于在工具理性与实体主义的主导下，现代世界面临意义单向度化的危机。对现代性的诊疗，不仅是西方哲学家所必须面临的问题，也是所有非西方传统，包括佛教在内，无所逃避的处境。如何复制那被封冻的意义世界，成为20世纪哲学的主要关怀。诠释学便是重建意义世界的一项努力。

在当代诠释学运动的趋势中，我们可以借用吕格尔的说法，区分为信仰的诠释学和怀疑的诠释学（或积极的诠释学和否定的诠释学）二途。〔8〕前者有破有立，在批评现代性之后，最终仍是期待神圣的重新临现，其代表性的诠释学家是施莱玛赫、狄尔泰、海德格、嘉达美和吕格尔；后者则只破不立，索隐的活动本身即是诠释的目的，完全不受工具理性与目的理性的规约，在吕格尔所称的三大怀疑诠释学家（尼采、马克思、弗洛伊德）中，尤其以尼采最有影响，并经过海德格的解读之后，在法国形成以傅柯、德希达、德勒兹为代表的后尼采主义。具体地喻说之，信仰的诠释学家属于归乡型，而怀疑的诠释学家则属于游荡型。在拯救意义世界的努力上，前者着重于重建人与神圣（存在）的关系，而后者则愉悦于言谈构成或知识合法性的拆解。

此诠释学运动的分歧，亦可见于晚近欧美的佛学论述。不论是划归为信仰的诠释学或怀疑的诠释学，欧美的佛教学者都逐渐摆脱肇始于19世纪的历史语言文献学风，认知到历史实证主义的局限乃在于对客观真理的获取表示过度的乐观，未能自省到“前理解”或“成见”恒作用于历史知识的构成活动上。换言之，未能认清理解活动的语言性与历史性。但是，这并不表示他们不再重现历史语言文献学的训练。实际上，诠释意识的兴起使欧美佛学研究在原有的文献学基础上开发出更为多元的佛学论述。

佛教的信仰诠释学

就信仰的诠释学路线而言，在欧美影响深远的铃木禅学是众所熟知的典范。铃木大拙的成功有许多因素，其中的关键在于他从禅宗史中抽出普遍性的“禅”经验，使不同文化传统的人也可亲近分享。这是他和胡适不同的地方。胡适致力于禅宗信史的重建，而铃木则认为历史文献的研究或理性的探究并不能真正令人了解什么是禅，除非入乎其中，亲自体验，否则欲知禅味，不啻缘木求鱼。^[9]在诠释策略上，铃木解除禅学原有的历史脉络，重置于现代的语境中，特别是和基督教神秘主义和心理分析有关的语境，使禅学成为可及的“它者”。在铃木笔下，禅学以精神导师的身份出现，为现代西方社会指点解放的途径。

形成铃木学历久不衰之声誉的另一项原因在于他擅长以生动浅显文字描述禅的体验。开悟的体验原是心行路绝，言语道断，铃木却能够准确地予以展示：

灵光爆破通常发生于精致的平衡状态因了某种理由而倾侧时。犹如一枚石子投入完全静止的水面，涟漪立即波及整个水面。开悟就像是这种现象。一声叩响紧闭的意识之门，立即震击了整个人。他真正地觉悟，如同受到创造之火的洗礼，在上帝的作场目睹了他的工作。那开悟的机缘不一定是听到寺院的钟声，而可能是颂读诗偈，或在行住坐卧之际，爆破高度专注的意识状态而开悟。^[10]

上面这一段描述无法不令人联想到神学家鲁道夫·奥托 (Rudolf Otto) 对神圣的现象学描述。事实上，奥托和铃木早年即有往来^[11]，铃木后来钟情于比较佛教和基督教神秘主义者艾卡特 (Meister Eckhart)，开发佛教哲学和否定神学之间的对话，在日本和欧美产生相当程度的影响。^[12]



属于信仰诠释学的佛教论述，除了铃木大拙以外，马孔·艾可 (Malcolm D.Eckel) 在方法论上的反省与实践也值得注意。艾可是研究印度与西藏中观学的杰出学者，特别是清辨的思想。清辨的自立论证立场，使得因明论证在一般研究清辨中观学有其重要的地位。这也反映出佛学诠释和当前北美的主流哲学 (分析哲学) 的密切关系。艾可认为分析进路的佛学诠释往往仅注意论证的层面，而忽略了宗教性意义的抉择。作为一种宗教哲学的佛教哲学，其终极的关切是证悟解脱。虽然在印度佛学传统里，正理一向是追求证悟解脱的主要凭借，但是为了教化目标佛教言谈仍然充满丰富的修辞，如隐喻、象征、叙事、传说、神话等。在此，倘若在佛教的文本诠释里未能处理其修辞成素，则仅凭论证分析将无法恰当地了解其宗教性含义。有见于此，艾可才在《观佛——清辨之空性意义的寻求》里，将清辨的空性思想重置于玄奘《西域记》，叙事中的宗教文化情境，揭显理则与神思、思想与象征、概念与隐喻、精英与民间、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复杂关系。

艾可受到京都学派 (西田几多郎、西谷启治) “绝对无的场所”概念的启发，进一步细致地将“空性”的意义诠释为开显于“不在”所在的场所。^[13] 此场所即是具体的生活场域，世俗的生死流转世界。龙树《中论·涅槃品》早已指出，“涅槃与世间，无有少分别”。唯有即世间 (场所) 才有涅槃 (空性) 可言。空性与场所的关系，就如涅槃与世间的关系一样。这是存有论的相即关系。为了展示“空性”与“场所”，“不在” (absence) 与“在” (presence) 的相即关系，艾可在论述分析上将哲学与隐喻、论证与修辞予以交错重置，使正理与信仰得以相容，共构佛教的意义世界。比起铃木大拙，艾可使得佛教的信仰诠释学不论在方法论意识或实际操作上都更细致地推进一步。

重申铃木禅

在怀疑的诠释学方面，晚近的北美佛学研究则自我指涉地反思西方





之佛教知识的历史构成。这种反思基本上是知识系谱学的批判性考察，在相当程度上是受到萨伊德 (Edward Said) 《东方主义》的影响。佛教如何在西方被表象 (或再现)，成为主要关怀的问题。既是表象的问题，也就无法逃避论述和权力 (特别是政治) 之关系的考察。在这里，最近有关铃木禅学和京都学派的论述分析再度成为焦点。

铃木禅学在欧美的发展过程中，除了来自胡适的挑战以外，还有不少的批评。柯斯特勒 (Arthur Koestler) 批评铃木禅学教人成为“无心”的机器人，既不能正面肯定理性，也在道德上流于相对主义，最终为日本法西斯主义背书。^[14] 法国文评家叶廷伯 (Rene Etimble) 也从人文主义的立场批评铃木禅的反智、寂静、虚无、神秘的色彩，违背了中国禅 (特别是临济禅) 的人文主义精神。叶廷伯以伏尔泰的启蒙精神为依归，欣赏中国的人文传统，对西方人何以会沉迷于神秘体验的铃木禅深不以为然。^[15]

最近批评铃木禅学最引人注目的是夏尔夫 (Robert H.Sharf)，他追溯铃木禅为明治时期“新佛教”的产物，说明日本禅和国体本义、天皇制、武士道、日本主义之间的内在关系。如夏尔夫自述，他的批评主要是从怀疑诠释学的角度揭显铃木禅意识形态和修辞的层面。^[16] 铃木以疑团爆破来解释禅悟体验，夏尔夫便认为这乃由于铃木太过于重视宗教体验，忽略了禅者在禅苑中长期的修持与仪式训练。其实，“印可”本身就是一种仪式。铃木大拙因为受到明治“新佛教”与西田几多郎“纯粹经验”的影响，本身也非禅师，忽略了禅苑体制为仪式在禅学所扮演的角色。也由于铃木禅和京都禅 (西谷启治与阿部正雄) 将禅抽离了原有的传统，使得“一旦挣开了体制与伦理的脉络，这自由流动的禅便可为诸多当代社会的、哲学的、政治的运动，如从达达主义到京都学派哲学，从新世代享乐主义到法西斯主义，提供精神上的合法性”。^[17] 禅宗在战时日本军国主义下成为噤声者，甚至成为支持者，并非不可理喻。^[18]

至于为什么铃木禅在西方广受欢迎，据夏尔夫的解释，那是因为现代西方在发现文化的多样与差异后，许多知识分子试图在历史的偶然和

文化的多元情境寻找一处可以安身立命之处——神秘主义。这是铃木禅和奥托、詹姆斯的神秘主义相互呼应的原因。^[19]夏尔夫还进一步指出，在西方所建构的禅学论述其实反映了现代性带来的充满不确定的焦虑和价值混乱的世界。值得忧心的是，在知性上不满于多元与不稳定会导致在政治上相同的态度，而最后倾向于威权的或集权的政治发展。^[20]很清楚地，夏尔夫忧虑铃木禅（以及西方禅学）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右翼倾向。

将铃木禅视为对现代性的右翼反动，是夏尔夫最切要的批评。相对于夏尔夫批评立场的旗帜鲜明，弗雷（Bernard Faure）对铃木禅的批评则是对所谓“铃木效应”（Suzuki effect）感到兴趣。基本上，弗雷认为铃木禅是“反面的东方主义”（reverse Orientalism）。早期耶稣会教士发现佛教时，视佛教为寂静主义（quietism）或虚无主义，欧洲这种对佛教的看法一直影响到19世纪的毕尔奴夫和20世纪初的普桑。^[21]铃木大拙则是继释宗演（859—1919）、忽滑谷快天（1867—1934）、崎正治、冈仓觉三之后赴欧美宣讲禅学的人。铃木大拙为了矫正西方对禅学的误解，刻意强调临济禅的峻烈风格，批评曹洞禅（宏智、道光）的“只管打坐”与“修证一如”的宗风。早期铃木将禅描绘成反抗偶像、反抗体制的激进思想，终于汇成美国60年代的“敲打禅”（Beat Zen）风潮。但是，如弗雷指出，当“敲打禅”和抗制文化、嗑乐文化合流时，铃木便马上划清界线，流露出铃木禅原有的保守性格。^[22]

铃木大拙反转西方对禅佛教的东方主义想象，结果反而落入另一极端，强调禅佛教的优越性，甚至扩大为日本文化的优越性，成为后来的“日本人论”或“日本主义”的嚆矢。弗雷进一步指出，铃木大拙在战时所写的《日本的灵性》和《禅与日本文化》将日本文化的精华归为禅的无分别智慧，禅终于成为“禅帝国主义”（Zen imperialism）。^[23]

如同弗雷所示，铃木禅具有其“洞见”，但是也有其“溢见”。铃木禅的“溢见”即表现于意识形态的作用中，这种情况亦见于和铃木大拙有密切关系的京都学派哲学。

粗暴的觉悟

京都学派和佛教的关系是从西田几多郎年轻习禅的经验即已发其端。西田的禅坐实证对其《善的研究》的“纯粹经验”概念及其后的“行为的直观”概念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关系，而影响整个学派的“绝对无”的概念，更是明显地可以看出与大乘佛教“空性”概念的关系。^[24]

接替西田哲学讲座的田边元在日本败战前夕，由于全然的绝望，导致他从亲鸾净土真宗的他力道寻求人类历史的救赎。田边元提出作为忏悔道的哲学，认为唯有正视理性的自我矛盾（二律背反），经由自我否定，随顺绝对他力的绝对无，才有重生的可能。^[25]田边元从佛教的他力道立场出发，强烈地批判西方启蒙传统的自力道（理性），在京都学派里较为极端，除了其弟子武内义范以外，影响也较小。反而是西谷启治，在禅宗与华严的立场拓深和西方哲学（康德、尼采、海德格）与神学（巴斯噶、艾卡特）的辩证，在欧美有较大的影响。

1945年，西田几多郎过世，田边元自东大退休，在盟军占领当下的决定下，西谷启治和其他京都学派成员也因支持战争言论被迫辞职。在战后左翼和自由派重返思想界后，京都学派备受批评，趋于式微。

时隔半世纪后，北美于1994年召开一场以“禅宗、京都学派与国家主义”为主题的研讨会，重新探讨京都学派，包括铃木大拙，在战时和国家主义的关系，特别是他们对现代性之批判与超克的哲学意涵。这场研讨会的成果《粗暴的觉悟：禅、京都学派与国家主义问题》于翌年由夏威夷大学出版。^[26]此书甫出，即获得热烈回应，反映出京都学派哲学在西方的发展已经从七八十年代的接受阶段进入90年代批判反省的阶段。

和80年代重新炒热的“海德格案”一样，重审京都学派哲学乃着眼于他们对“现代性”的批判立场。1942年进入太平洋战争后，日本《文学界》杂志召开一场以“近代的超克”为主题的座谈会，西谷启治于会

中认为超克文明开化以来的现代性，应从世界史的立场出发。此世界史的立场，具体来说，即是“无的主体性”及其“道德力”的立场，而这也正是提炼自日本传统的立场。大约同时，《中央公论》也连载高坂正显、高山岩男、铃木成高和西谷启治以《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为题的座谈记录。明显地，京都学派于此际陷入是否为日本扩张战争行为提供理论背书的困境。京都学派固然明白地拒斥当时倡导“八纮一字”、“国体明征”的皇道哲学，试图和以陆军势力为主的军国主义划清界线，但是当日本对美宣战，进入全面战争之际，京都学派也跟着在言论上将战争道德化，将道德历史主义化，也将大东亚战争与太平洋战争合理化为东方道德与西方道德、东方传统与西方现代性之间的斗争。在第三场座谈中，“总力战的哲学”，京都学派终于明白宣称这是一场超克“现代性”的战争，其最高的指导思想则是大乘佛教超越善恶对立的“无的主体性”。于此关键处，京都学派哲学（特别是其所依据的佛教哲学）明白地宣示了其介入政治实践的立场。^[27]

如同海德格和纳粹的议题一般，京都学派和日本侵略战争之间的关系在战后遭受自由主义与左翼学者的批评，乃极其自然之事。其所以会在90年代重开审议，是由于西方在80年代炒热“现代”与“后现代”的文化争论之际，发现这问题早于40年代以极端迫切而具体的方式出现在东亚（日本）的论域中。当时，京都学派从“绝对无”主体性的佛教立场批判地回应来自西方的现代性议题，在哲学和意识形态层面上进行一次深刻的对话。这段思想史却在大陆和台湾这些年来引介后现代思潮时完全遭到忽视。

这次重审京都学派哲学与禅学，突出了佛教遭遇现代性时的实践困境。和海德格一样，由于无我与无分别的主张使得佛教在伦理学的立场备受争议。显然佛教和西方启蒙传统在这一点是截然地对立：无我与有我，般若智与理性的对立，反而和尼采“超越善与恶”的宣示相呼应。京都学派从空性立场批判现代性在历史现实上遭到挫败，在哲学上却写下值得深省的一章。

佛教与后现代

以上我们综观了当代佛教论述，追溯了从批判佛教到场所佛教，从内学院到新儒家，从佛教信仰的诠释学到怀疑的诠释学的发展，察知这些发展或隐或显地都以现代性的反省为其主题。现代性作为哲学反省的主题，如哈贝马斯所指出，可以追溯至黑格尔。但是 80 年代的现代/后现代争论则出现在海德格、德希达、傅柯、李欧塔的论述脉络中。这些哲学家对现代性各有自己的了解，海德格便在《世界图像的年代》一文将“现代性”界定为“世界成为图像与人在存有者的范围内成为主体的同一过程”。换言之，海氏认为现代性的特征表现于主体主义与表象主义。^[28]李欧塔则界定“现代”为“那些明白地诉诸巨型叙事，例如精神辩证法，意义的诠释学，理性主体或劳动主体的解放，或财富的创造，以作为合法化自身的后设言谈的学科”。^[29]在李欧塔看来，现代和后现代的区别主要决定于“后设言谈”（metadiscourse）的态度——现代性以理性言谈来建构其合法性，而后现代乃对此表示质疑。

如果以海德格对现代性的反省为参考点，那么佛教将和海德格一样地批评主体主义与表象主义，并可将佛教的实相概念类比于海氏“存有”的开显，虽然这般的类比有其危险。西谷启治的哲学是努力提供这项类比工作最好的典例。

如果以李欧塔对“后设言谈”的批评为参考点，则佛教言谈是否仍不免落于追求解脱或开显意义的巨型叙述，确是问题。佛教文献里积藏着非常丰富的追寻解脱与智慧的巨型叙事，其经论注疏传统里到处都是“解甚深密意”的诠释学，而这些正是李欧塔所谓的现代性特色。

除了海德格和李欧塔，我们还可以列举阿多诺、傅柯、德希达、德勒兹的看法，作为佛教哲学的对口单位。不过，我们希望暂时就此打住，因为对号入座的游戏并无甚意义，也因为并无单数的“佛教”可以对号入座。本质主义或同一性形上学已经被宣告终结，本质主义式的“佛教”

概念也已不再可能有认知意义。可以想见的，在未来交开放出更多元的格义佛学，格义的复杂语境将愈来愈不可决定。多音的诠释时代必将来临，如同弗雷所提示，为了让佛教传统的异类性 (heterogeneity) 和多音性 (multivocality)，及其张力与分歧，能够不被压制地浮现，学术研究的论述本身就必须允许多音性与非线性，也必须不畏修辞的效应。弗雷更不讳言其论述的“杂种化” (hybridization)，以期望新声音的出现。^[30]

注 释

[1] “世俗化”于此是指神圣与世俗二分法的取消，强调神圣的实现不可离于世俗。在佛教，龙树在《中论》所揭糞的生死与涅槃无二，离开世俗谛则无第一义可得的思想，即是佛教世俗化的典型。这种用法不完全同于宗教社会学家将“世俗化”视为社会与文化部门脱离宗教而独立，如政教二分。参见 Peter L. Berger, *The Sacred Canopy*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1969), pp. 107-108。

[2] 高崎直道，《最近十年的佛教学》，《佛教学》第36号，1994年10月。

[3] 高崎直道，《最近十年的佛教学》，第2—3页。又参见高崎直道，《佛教思想论》，《岩波讲座东洋思想》9 (东京，1988)，第89—129页。

[4] 真谛译《摄大乘论释》，大正31·165·下；玄奘译《摄大乘论释》，大正31·324·上。

[5] 高崎直道，《最近十年的佛教学》，第6—7页。

[6] 同上，第8—9页。汤田丰的观点与本书的观点不谋而合。

[7] Paul Ricoeur, *The Conflict of Interpretations*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298.

[8] 汤普森 (John B. Thompson) 提要地说明这两类诠释学：信仰诠释学 (hermeneutics of faith) 倾听由神圣启示的信息与象征，希望重建失落的意义，怀疑诠释学 (hermeneutics of suspicion) 则认为象征是一种伪装，

必须经过解神话的过程以还原真相。见 John B.Thompson, "Editor's Introduction," in Paul Ricoeur, *Hermeneu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6。

[9] 有关胡适和铃木大报同禅学论辩, 参见傅伟勋, 《胡适、铃木大拙与禅宗真髓》, 收于《从西方哲学到神佛教》(台北: 东大图书公司, 1986)。

[10] Daisetz Teitaro Suzuki, *Essays in Zen Buddhism (First Series)*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1), p.259.

[11] Rudolf Otto, "Professor Rudolf Otto on Zen Buddhism", *The Eastern Buddhist* 3 (1924): 117-125.

[12] D.T.Suzuki, *Mysticism: Christian and Buddhist* (London: Unwin, 1979)。

[13] Malcolm David Eckel, *To See the Buddha: A Philosopher's Quest for the Meaning of Emptines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64-67.

[14] Arthur Koestler, *The Lotus and the Robot* (New York: Macmillan, 1961), 相关讨论见 Bernard Faure, *Chan Insights and Oversights: An Epistemological Critique of the Chan Tradi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67-72。

[15] Bernard Faure, *Chan Insights and Oversights*, pp.72-74.

[16] Robert H.Sharf, "The Zen of Japanese Nationalism," in Donald S. Lopez, Jr., ed., *Curators of the Buddha: The Study of Buddhism under Colonialis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145.

[17] Robert H.Sharf, "Whose Zen: Zen Nationalism Revisited," in James W.Heisig & John C.Maraldo, eds., *Rude Awakening: Zen, the Kyoto School, & the Question of Nationalis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4), pp.43-44.

[18] 市川白弦 (1902-1986) 便对禅宗和战争责任的问题多所探讨。参见 Christopher Ives, "Ethical Pitfalls in Imperial Zen and Nishida Philoso-

phy:Ichikawa Hakugen's Critique," in *Rude Awakenings*,pp.16-29。

[19] Robert H.Sharf, "The Zen of Japanese Nationalism," pp.139-140.

[20] Robert H.Sharf, "Whose Zen?" pp.49-50.

[21] See Bernard Faure, *Chan Insights and Oversights*,pp.15-51.

[22] see Bernard Faure,前揭, 第 58 页。

[23] 同上, 第 66 页。

[24] 西田虽曾告诫西谷启治不可将哲学与禅混淆一起, 但是西谷启治认为禅体现在西田哲学里。有关西田与禅的关系, 参见 Nishitani Keiji, *Nishida Kitarō*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 ,pp.18-27。

[25] Tanabe Hajime, *Philosophy as Metanoetics*,trans.by Takeuchi Yoshinori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 ,p.107。

[26] 见注 [20]。

[27] 本书第六章有较为详尽的讨论。

[28] Martin Heidegger, "The Age of the World Picture," in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trans.by William Lovitt (New York:Harper & Row,1977) ,pp.132-133.

[29] Jean -Francois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A Report on Knowledge*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79) . "Introduction," p.xxiii.

[30] Bernard Faure, *Chan Insights and Oversights*,pp.10-12.



The Problem of Modernity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人文译丛

后发展国家的现代性问题(上)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现代性”问题成为我国学界关注的焦点,观点歧出、论争激烈,从介绍西学研究到关注中国问题,从现象描述、线索梳理到范畴讨论、结构剖析,对中国学界的现代性研究有相当大的引导和启发作用。本书提供了大量现代性经典文献,对学界把握西方现代性问题的源流,有相当大的价值。

作为源出于西方的学术话语,“现代性”已成为全球关注的问题,其得以在中国激起如此巨大的讨论热情,并将此前种种争论热点——“激进”与“保守”、“民族主义”与“全球化”等,都涵盖其中并得到充分展开,自然与当代中国的思想文化语境分不开,更与中国加速推进的现代化进程和政治经济形势,以及全球各种政治经济力量的消长博弈有着重大关联。本书围绕着“现代性”问题的几个方面来进行论述,重心则在中国学人立足于中国经验、中国情境对“现代性”问题的探寻与反思。